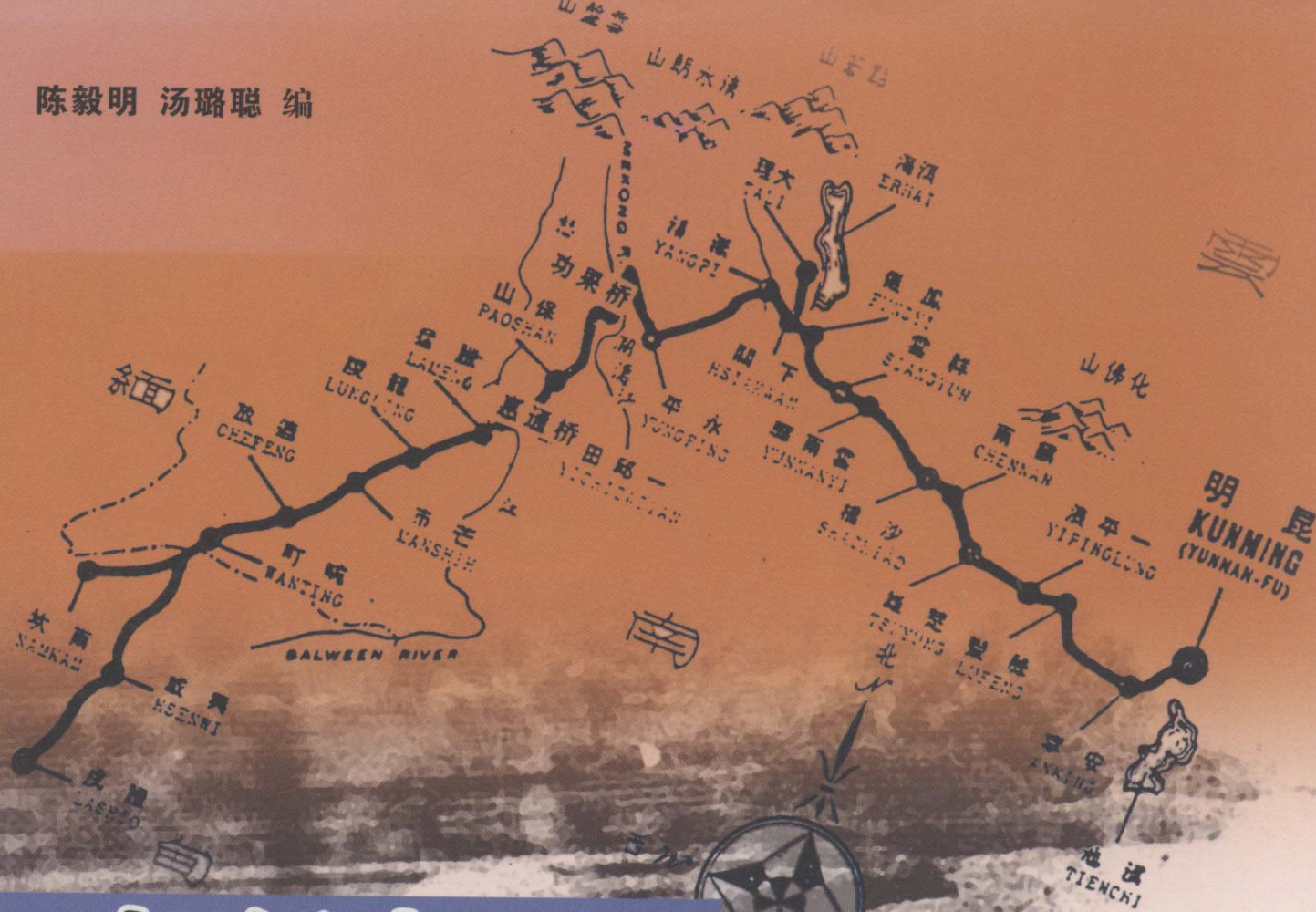


陈毅明 汤璐聪 编



南侨机工

抗战纪实



南侨机工

抗战纪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侨机工抗战纪实 / 陈毅明, 汤璐聪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610-992-7

I. 南 ... II. ①陈... ②汤... III. 华侨—抗日战争—史料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8174 号

南侨机工抗战纪实

陈毅明 汤璐聪 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787×1092 1/16 14.75 印张 8 插页 242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10—992—7
K·55 定价: 25.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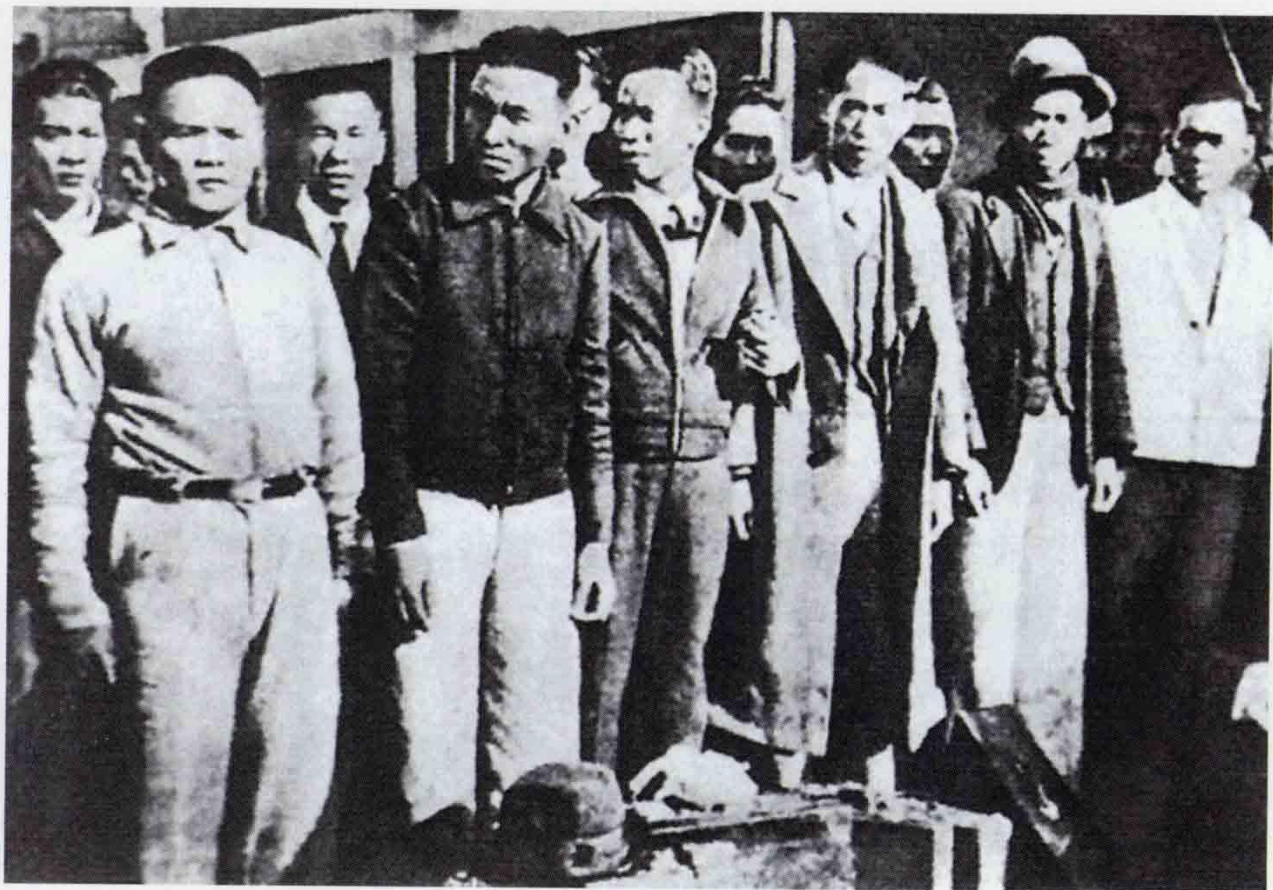
英姿勃发的南侨机工 左一：李青海（印度人）、左二：林福来、右一：梁广昌。（林福来 提供）



1938年八路军总政治部欢迎马来亚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第一批机工抵达延安时的合影，前排右五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黄国光 前排右三 提供）



张金炳当年拍摄的工作照片



1938 年从泰国回国参加抗战的第一批南侨机工抵达广州，陈玉进（后排右一）、方有（前排左二）、吴家运（前排左四）。（陈玉进之子陈文义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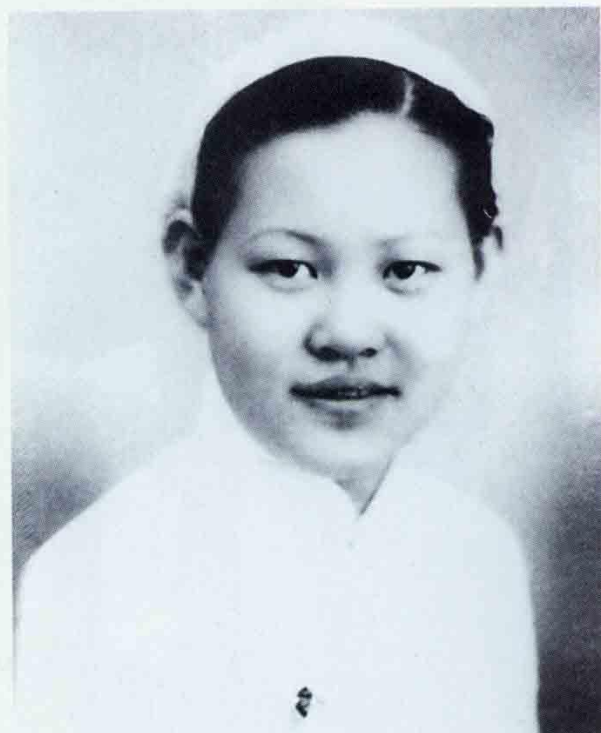
1939 年马来亚麻坡第三批回国南侨机工，后排中为张金炳。（张金炳之子张烈明 提供）

南侨机工中的巾帼英雄



吴秀芬 (1916.11—1973.7.9)

1939年8月，参加泰国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抵达桂林，任护士。（南宁殷红 提供）



李月美 (1918—1968.8.28)

1939年3月女扮男装参加槟城华侨机器行回国技艺工程队回国。1940年在滇缅公路上执行任务时因翻车受重伤被抢救，暴露了女子原貌后，在南侨机工车队当护士（如照片），并与抢救她的战友杨维铨结婚。



白雪娇 (1917—) (白雪娇之女陈耿凡 提供)



陈侨珍 (生卒年不详)

同学到船上为
回国参加抗战的白
雪娇（右二）送行
（陈耿凡 提供）



南侨机工英烈陈团圆穿过的傣装上衣 （傣族老大妈咩帕所 提供）

華 僑 登 記 證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No. 字第 8597 號

茲據 檳城 地方僑民 湯耀榮 呈報

華僑登記規則請求登記合行發給登記證以資保護此證

計開

1 姓名	<u>湯耀榮</u>	2 性別	<u>男</u>
Name		Sex	
3 年歲	<u>三十四</u>	4 籍貫	<u>廣東南海</u>
Age		Native Province	
5 出生地	<u>中國</u>		
Place of Birth			
6 現在居所	<u>檳城打不街</u>		
Present Residence			
7 職業	<u>木工</u>		
Profession			
8 商號			
Establishment			
9 何時入境	<u>民國六年</u>		
Date of Arrival			
10 夫或妻			
Name of Wife or Husband			
11 子女			
Names of Children & Their Sex			

Date

本登記證係第八條遷移居留地外永遠有效
 中華民國八年八月十一日
 檳榔嶼領事館發給

特准本證簽名如下
 湯耀榮
 僑民登記部代登



汤耀荣的华侨登记证（汤璐聪 提供）

華 僑 互 助 會 會 員 證

第 0635 號

姓名 陳壽全 性別 男 年齡 二十九 籍貫 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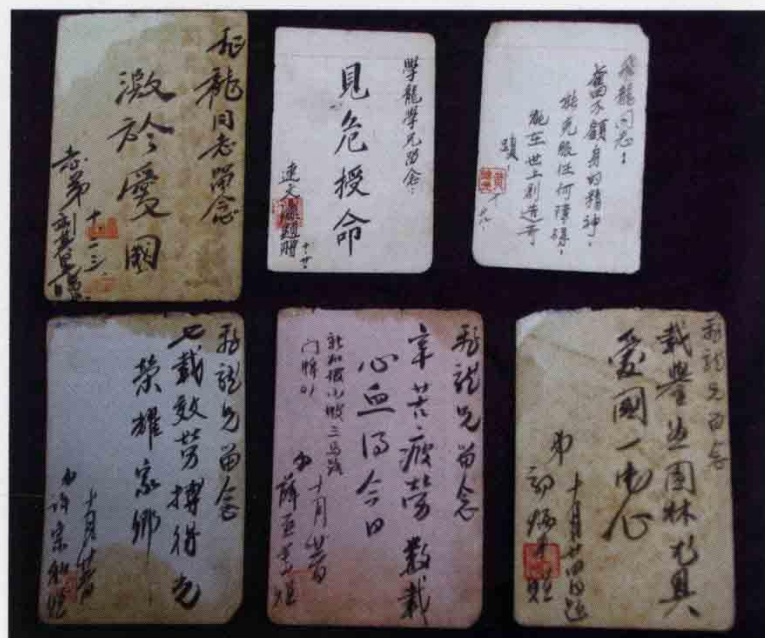
住址 東印度 叻哩洋 坡 先生 十號

職業 東印度 叻哩洋 坡 先生 十號

理事長 侯西反



陈寿全的华侨互助会会员证（陈先雨 提供）



陈飞龙珍藏的南侨机工信物
(陈飞龙 提供)



南侨机工的证章和纪念章





16位南侨机工老人重访马来西亚故乡，抵达吉隆坡机场时受到当地华人社团热烈欢迎（1995.10）。



南侨机工老人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在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前祭拜战友亡灵。



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组团（以南侨机工第二代为多数）参加陈嘉庚先生诞辰 130 周年纪念活动（集美 2004.10）。前排右起：陈达娅（秘书长）、王亚六（会长）、杨保华（创会会长）、罗开湖、翁家贵、罗君里（南宁）。



陈嘉庚先生的长孙陈立人先生和德宏州及畹町开发区领导与抗战老人合影（2005.1）。后排：陈立人（右五）、钱强书记（右七），前排：南侨机工罗开湖（左二）、翁家贵（左三）、杨保华（左四），左一、五、六：远征军老战士。



在畹町光复 60 周年纪念大会暨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奠基仪式上合影的南侨机工两代人（2005.1）。

左起七十一：林晓昌、杨保华（90 岁）、陈立人（陈嘉庚先生长孙）
翁家贵（93 岁）、罗开湖（88 岁）。



陈立人先生在成都市看望南侨机工（2005.5）。左起：陈立人、蒋应生、程龙庆、林广怀、汤璐聪。



昆明西山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1989 年建成)

▼ 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 60 周年纪念活动后在昆明西山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合影 (1999.9)。

中国侨联副主席肖岗 (中)、南侨机工陈爵 (右)、南侨机工李山河 (左)，后排为陈爵夫人王兰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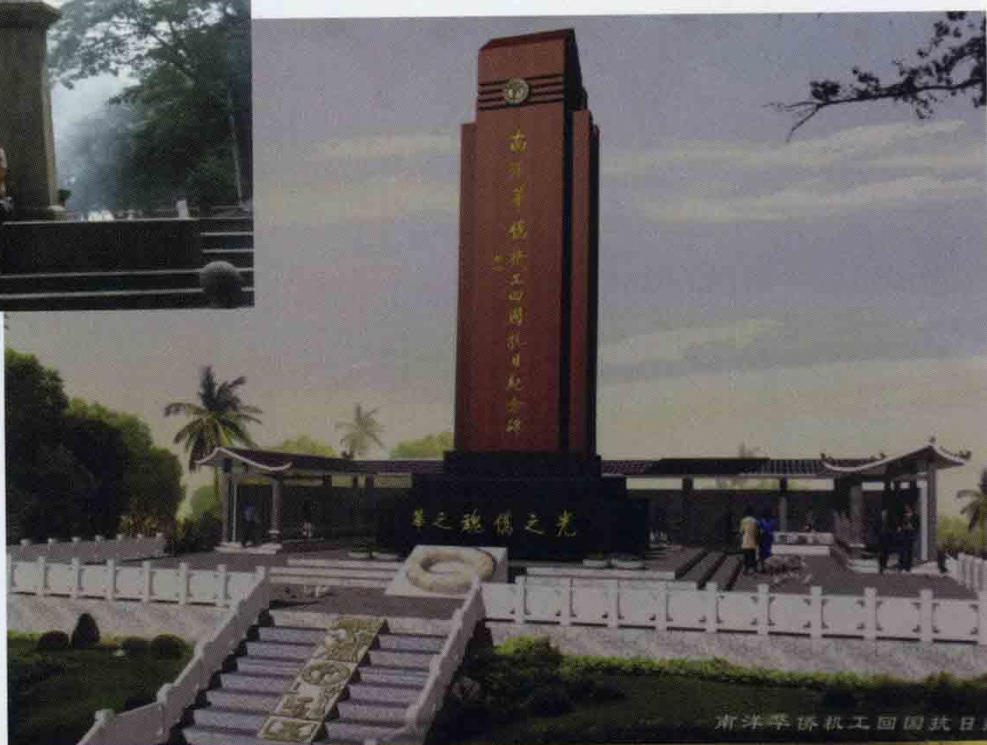


南侨机工子女在西山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



◀ 檳榔嶼華僑抗戰殉難機工罹難同胞紀念碑（建于 1947）

▼ 暹町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紀念碑（效果图，主体工程今年內完成）



▼ 中國著名作家方軍(左)與本書編者陳毅明(中)、湯璐聰。



前言：南侨机工归国抗战悲壮史

方 军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结果。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谈及方方面面的抗战人物都会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我是从 8 年前开始采访南侨机工的，如今，采访过的人物已经有半数谢世。细细品味，这些英雄人物是中国抗战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一场浩瀚而惨烈的反侵略战争而言，实际上南侨机工是一个付出牺牲最多，而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亲历抗战群体。

我的采访是得到很多人帮助的。比方，汤晓梅女士是南洋归国抗战华侨汤耀荣的女儿，曾任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联谊会的副会长。在她的带领下，我于 1998 年开始多次采访中国境内的幸存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在云南的广大地区，我先后采访了 23 人。那时，在云南的南侨机工还有 96 人。仅仅几年！转眼之间只剩 9 人！而且，这 9 人的平均年龄是 90 岁以上高龄！抗战胜利 60 年，当年 20 岁的人现在也 80 岁了。我确实一直没有敢于动笔描写南侨机工群体，我感到有一种班门弄斧的窘迫；多少老鬼子来信，多少老八路、老新四军和我联系，多少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妇女、劳工、国民党将领和士兵需要我去面会，我要采访和写作的人物太多了；历史的一页就要翻过去了，按照自然的规律，战争亲历者会渐渐离我们而去！心理上的紧迫感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我的心，却一直在为南侨机工们当年的英雄壮举而震撼，为他们的命运而感动和伤悲。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镜头里，我清晰的记忆中，永远存留这样的背影：

“采访完了，年老体衰的南侨机工们向我挥挥青筋毕露的老手，微微挪动那饱经沧桑老脸上五官的表情，似乎在微笑中告别。然后，转过身去，沿着鳞次栉比低矮房屋前的小道，悄悄的、默默无闻的、破旧衣衫的，又回到命运安排的、陈旧、黑暗、落魄和无奈之中。”

他们不知道我一直在拍摄他们年老体衰的身影。

他们的肢体语言已经向世人宣告：无力抗争。

虽然他们自己已经是听任命运安排的人群群体，我却始终感到他们是不幸的。

我本来是不相信“命运”的，采访他们，我才感到“命运”的存在。



方军(左)访邓伍浩(中)

许多南侨机工在去世前，无自豪感、住房狭窄、黑暗潮湿、充满自卑、家具陈旧、服装缝补、收入微薄、生活拮据、没有电话、没有汽车、受过批判、牵连子女、不能出国、没当干部等等等等。总之，没能扬眉吐气。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更是如此。

今年是抗战胜利 60 周年，抗日战争的历史在中日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是一段刻骨铭心、惊心动魄的记忆，从 1931 年到 1945 年，侵华战争整整在中国的国土上打了 15 年！这场战争使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人！侵华日军战死、伤、被俘 154 万人！1945 年开始，从中国领土撤退回日本的投降日军有 127 万人！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御敌的抗战，再进一步细细划分参战者的成分和分布如下：

有中国政府军在正面战场和侵华日军在作战。

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广大的地区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

有东北抗日联军、有各地民间游击队。

有世界各国人民从精神到物质的大力支持。

还有南洋归国华侨参加抗战的三千机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伤人数为 6000 多万人。为了避免战争，缅怀死难的人群，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各国首脑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纪念在战争中死难

的人们。不少国家，年年在主要祭祀地点游行、献花，举行国家的祭奠仪式；不少国家永远支付参战者相关参战薪金，直到参战者谢世为止。另外，如果参战者的配偶、遗孀没有再婚的话，也一直可以领到参战军属的补偿。由此国策，使很多国家的战争经历者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和物质上的关爱。我相信任何付出都会有回报，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这一回报也可能就体现在下一场国家与国家的争端之中。

如今，真实地记录南侨机工，已经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事情了，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小事”了。我在这里所指的记录是较为全面的记录。比方，记录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文献资料已经很多，但是，研究南侨机工晚年的文献就很少。好比一架天平，它平衡的支点，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往，天平就倾斜为一边：报道抗日没问题。也就是说，1945年以前，“付出鲜血生命抗日”有很多人写。可是，1945年以后，直到抗战胜利后60年的状况就没有什么人好好地真实地描绘，主要是没有人敢于触摸这段历史。

“无视历史，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这是我们人类社会的常识。那么，我们希望重演什么样的悲、喜剧呢？我们说到抗日战争历史时常常引用一句话，叫“勿忘历史，展望未来”，那么，我们希望展望到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认为，优待“曾经付出过的人群群体”本身就是未雨绸缪。谁能预言“中国从此不会再次遭受入侵”呢？今天的日本人不是在说钓鱼岛是他们的，东海的石油也是他们的吗？他们不是说要击溃一切敢于接近钓鱼岛的外国船只吗？战争的宣言已经在给我们宣读了。难道我们能无视中国的主权？能无视历史这面镜子吗？我们分析抗战前后不是为了亡羊补牢吗？

抗战胜利60年，中国人民值得反思的东西很多。“侵华日军的残暴”和“我们人民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历史事实已经被我们研究几十年了，相关著作可能可以装满一个博物馆了。但是，南侨机工这个光荣、英雄群体的“昨天”和“今天”在尚未清晰之前，这个群体的自然消亡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了，全面的总结他们的历史命运以昭示后人，以告白天下，刻不容缓。

“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的简称叫“南侨机工”，按目前我个人的统计：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知道”和“了解”“南侨机工”历史的人物不过数千人。那么，“南侨机工”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艰苦岁月担当过什么样的重任呢？用最简单的语言可以形容、概括如下：

1939年，正当我们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日寇之手，沿海港口均被侵华日军封锁之时，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对外的唯一国际通道。当时，国际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都要利用这条公路输送。在急需大批汽车司机与机修人

员之际，在新加坡的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仅数月之间即有9批共3226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参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胜利以后，60年过去了，这些南侨机工的命运归宿如何呢？

在抗日战争中，归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南侨机工牺牲1028人；

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返侨居地的参战南洋华侨机工1126人；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滞留在中国而定居的有1072人。

自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由于有海外关系，在中国的南侨机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频受冲击。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乎所有当年归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都受到审查、批斗和关押。“文革”以后的春天里，已经没有人可以随便嘲弄、狠揍、狠整和侮辱南侨机工了，他们的人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侨机工们相继退休。可由于抗战工龄不连续计算，工龄从1949年全国解放算起，收入和付出成“反比”，南侨机工多数心情郁闷。这一问题延续几十年没有解决，在盼望之中，许多南侨机工谢世。但是，近两年，随着曾经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唐闻生女士主持侨务工作以来，在她的多方努力下，当年归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的工资统一涨到999元。2005年1月收入999元！这对于垂垂老矣者来说不单是数字上的体现，而是“国家对南侨机工参加抗战历史”的肯定。因此，是无尚光荣的。

不管昨天还是今天，千多定居中国大陆的南侨机工们领受到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满足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受之无愧的。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云南省政府在昆明西山公园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如今，经过南侨机工口述亲身参战经历和南侨机工子女回忆父辈艰苦卓绝人生历程的新著《南侨机工抗战纪实》一书就要问世了。目前，战争博物馆、历史研究学者、教育家、报告文学作家、社会学研究者都在遵循一套研究套路：就是：“人证、物证、口述史”。《南侨机工抗战纪实》这本书正是这样一本珍贵的历史教科书，是一本弥足珍贵的展示爱国华侨回国参加伟大抗日战争的珍贵史实，是一本我们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共御外辱、同建强国的爱国篇章。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方军 2005年7月2日于昆明

序：我心目中的南侨机工

陈毅明

穿越大洋与硝烟的旋律

1980年底，我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南洋研究所资料室查找陈嘉庚资料时，开始接触南侨机工的一些史料。当我在《新华日报》上读到《一群投入祖国怀抱的孩子》、《滇缅路上的华侨司机群》等有关报道时，《告别南洋》的旋律便穿越时空激起我心中的阵阵波澜。虽然，这首歌我只能连唱带哼头尾的两三句，但却是我童年最初学唱的歌曲之一。太平洋战争期间，一个随家人从新加坡避难到廖内群岛我家所在小地方的女孩子教给我的。那女孩成了我的姐姐、玩伴和老师。她教我读书认字。她教我唱歌时，那些逃难的大人们也往往聚拢在我们身边一起唱。大家唱得时而神情凝重，时而奔放激越，我只觉好听有趣，却不懂得歌词的意思。战后，我家在新加坡租住琼发兴咖啡店楼上，常听店员们唱这首歌。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歌的内容。有一个冯姓店员的兄长，就是“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唐山驾车载枪炮帮中国打日本鬼子的南侨机工”。人们在谈论陈嘉庚和南侨机工时那种敬佩与自豪的言语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是这种记忆，成为培植我的专业兴趣和滋养我心灵的土壤。

从事华侨史的教学与研究，使我对南侨机工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特别是与南侨机工老人交上朋友之后，他们的爱憎与好恶、追求与情怀、事迹和遭遇，常缭绕脑际。他们就在我心中。如果我早出世，也许是另一个“李月美”。这不是浪漫的遐想，而是当时华侨社会的潮流。

华侨，尤其是华侨劳工大众，在异国谋生，与所在国人民风雨同舟，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有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也感受到侨居地人民的信任与友谊。但由于民族、宗教、习俗、文化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及殖民统治者、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华侨，甚至是已经居留了多少个世代之后的华人，往往还因为是“中国人”，或是“从中国来的人”而被另眼看待，有时还成了社会纷争的替罪羊，宰割由人。华侨深切地感受到弱国无尊严、弱国无国际地位和弱国侨民备受凌辱的悲怆。他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侨的绝大多数已改变了国家认同，成为拥有所在国国籍的华人，其命运仍然与祖籍国中国有着紧密的关系。1993年12月，我

在吉隆坡访问马来西亚工程部副部长郭铎镇时，郭先生的一番谈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抬不起头。我们的祖国是马来西亚，我们的祖籍国是中国，华族的祖先自中国来，中国乱了，搞不好，我们感到丢脸，心里不好过。现在好了，中国经济发展了，社会有进步，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我们华人可以昂起头来走路了。”

旧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事事制肘于列强。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更是肆无忌惮加害于中国。“九一八”、“七七”、南京大屠杀、施放化学毒剂和细菌以及“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日本法西斯的一次次挑衅和暴行，犹如一件件利器刺痛着海外侨胞的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广大侨胞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职业阶层，以踊跃参加各种救国活动、慷慨捐输、报效祖国为无上光荣。他们出钱、出力、捐物，或志愿组织“救护服务团”、“义勇工程队”、“学兵队”，奔赴祖国抗战的前线或后方。16岁的朱松胜在回国前因参加抵制日货被捕入狱，一释放出来他又加入了抗敌后援会和工人救济祖国难民会。1939年初，21岁的谢宾元已是新加坡华侨工人抗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年仅13岁的蒋印生也以“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勇气辞别双亲，从印度加尔各答回国，驾车服务抗战。自武汉合唱团到南洋为抗战义演之后，在南洋各地，无论城镇，还是山芭、小岛，只要有华侨踪影的地方，总能听到人们在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着“不愿做亡国奴的，往前冲！”唱着“看吧，中国站起来了，世界已经响遍全中国的怒吼！全中国的怒吼！”许多人并不认得多少汉字，也讲不出几句国语，但却在歌唱中唱出内心的忧伤与愤慨，唱出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华侨社会之一斑。

正是大敌当前，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家、亡族、亡种的危机感和耻辱感，极大的激起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与抗争，极大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华侨的国民自觉。陈嘉庚是有高度国民自觉的侨民典范。在华侨中，比陈嘉庚有钱有势者，大有人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华侨社会需要他，广大侨胞选择他、拥戴他；国民政府器重他，中国共产党重视他，英国殖民政府信任他；他了解侨胞的愿望，了解祖国的急需，也了解华侨寄人篱下应有的克制；因而他能高高地擎起救亡图存的火炬，把华侨的各种爱国力量团结在南侨总会的旗帜下，领导和引领海外华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持久地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华侨政治领袖，成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南侨机工，正是从广大侨胞同仇敌忾为捍卫民族尊严、为收复祖国山河的团结奋起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最具典型性、最有影响力的爱国华侨群体。它有个

西南運輸電華僑機工

本處華僑機工之起原及來源

帝霞之有華僑機工起於民國二十七年。當抗戰開始南洋僑胞激於愛國熱情多自勦願回國服務當時檳城機器工會曾遣送僑工兩批回粵其中一批三十二人即服務於帝霞同時帝霞既感於僑胞之熱誠且正需用駕駛修車及電工等技術人才特請託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代在南洋招募此種僑胞回國服

務於是馬來亞各地華僑聞風而起，修玉璽
嘉坡請來崇加當國政力，遂於廿七年十月
送第一批，以後繼續辦理，至廿八年冬，計共
送來七批，約二千九百名——第一批八十名，第
二批二百零六名，第三批五百九十七名，第四批一百
五十五名，第五批五百三十四名，第六批三百四十九
名，第七批一百一十七名，第八批三百三十二名，第九批

三千華僑機工服務本處。三年以來不獨平時忠於職務對於歷次搶運如廣東廣西同登漢越漢甸諸役尤志勇奮不畏艱危在敵彈射擊轟炸之下冒險工作間有身受重傷仍不退縮惟能掌成其任者生勞績尤足紀錄惟近年以來因內地物價飛漲本處因限於經費對於員工薪給未能增加待遇莫由改善是故日感困難適值各處商人經營運輸事業者日多即以腊成一地而言新組運輸公司多家需用司機士二

西南运输公司关于南侨机工情况的档案资料

发展过程。

1938年初，开始有华侨机工自发或由侨居地救国团体组织回国，规模比较小，由西南运输公司分配任务，或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接纳送往延安。1939年2月7日，陈嘉庚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公司请求，由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办理是要”。陈嘉庚是深受华侨信任的领袖，他一号召，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华侨机工踊跃报名应征形成热潮，他们放弃优厚待遇与舒适生活环境，弃家别亲，踏上报效祖国、服务抗战的征程。自1939年2月至9月，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南侨机工”或“南洋机工”为其简称，又指其成员）分15批回国（其中由各地集中到新加坡出发的有9批），共3192人，加上此前及从其他地方直接回国的，南侨机工总数超过3260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约 5 万人。南侨机工是由南侨总会遣派、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支专业队伍，由来自 9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开赴中国抗战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主要是千里滇缅公路。这是南侨总会动员、组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一项重大举措，又是海外华侨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一大贡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机工老人在讲述当年应征的过程时，仍然神采飞扬，十分自豪，说自己是“响应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

南侨机工，这是一支接受过军事训练、穿军装、无军阶军衔的华侨运输兵。

南侨机工，一支穿越大洋来，偏向烽烟去的乐队，奏响着中国人的自强与自信、至真与至爱的旋律。

不仅是悲壮

华侨机工们舍弃熟悉的环境、告别亲人，像陈寿全甚至卖掉私家车筹钱自费回国，为战胜法西斯强盗而赴汤蹈火。他们历尽艰险，以一公里牺牲一条生命的代价保障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的畅通。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何等的崇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祖籍家乡福建、广东、海南和第二故乡南洋侨居地相继沦陷，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运输公司被拆并，他们被就地遣散。从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了车，失了业，沦为报国无门、归家无路、饥寒交迫的流浪者，一些人因贫病交加又得不到救助而惨死于破庙或街头。留在国内绝处逢生的幸存者，虽经战后国民党统治的纷乱和解放后极“左”的动乱，历尽坎坷，却并无多少抱怨，反而以当年能为抗战救国吃苦而感到自豪和心满意足。这种境界又是何等的仁义！

他们抗日救国，尽着侨民的义务，尽着中华儿女的匹夫之责，义无反顾。但他们不仅是爱国情怀激烈，报国义举悲壮，他们值得颂扬和传承的，不仅这些。

南侨机工不同于当时任何一支抗战队伍。首先是其代表性特殊。这是一支肩负着海外千万侨胞和侨居地人民重托的正义之师，其中还有外籍华人和马来人、印度人。其次是人员构成特殊。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经历过外部世界，有着不同于国内同行和一般人的观念与视野。他们大多读过书或上过夜校或读过大学，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大多受过专门的训练，或在现代公司、企业工作过，精于技术，懂得社会生产生活所应遵循的原则。他们虽然大多是华侨劳工或一般技术员，虽然还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国民意识和中国人的风骨，但他们毕竟是在一个现代西方文明、侨居地土著文化和华风犹盛的华侨社会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熏陶下成长的一代华侨工人，普遍具有宽容的胸襟和良好的素质。其三是他们为抗战服务是多方面的。他们既当运输兵、修车工，又当教官培养国内司机。当工作需要时，他们又能胜任英语、马来语、泰语、印度语、法语翻译和为盟军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回国后参加八路军或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经过学习并在南征北战与敌人拼刺刀的过程中受到锻炼的，如蔡明训、黄国光等来自马来亚的机工，很幸运地成长为华侨干部。其四是他们遇到的困难要比国内的同行多得多。他们来自侨居地，有的是世居海外的第二、三代侨生，有的才十几岁，除了要克服工作条件差、环

境恶劣与危险造成的种种困难，还要面对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以及某些官僚制度、人事关系方面意想不到的麻烦。但他们坚守岗位，忠于职守，无愧于肩负着海外千万侨胞和侨居地人民重托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团员这个称号，无愧于爱国华侨这个角色。

当年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公司的官员们看着爱洗澡、爱梳头、爱吹口琴、唱英语歌曲的南侨机工，横看竖看总不顺眼：“既然在南洋生活那么好，你们为什么回到这里来？”怀疑他们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后来，某些干部对战后留居国内或复员回侨居地后又辗转归国定居的南侨机工，也大惑不解，总觉得他们不可能那么进步、那么爱国，怀疑他们一定是另有所图。

他们图什么呢？杨维铨全力救助受重伤的李月美，他是出于友爱，尽着战友的责任，他哪里会想到他救的战友竟是一个女子！不久，他娶了李月美，不能不说是担当着道义和责任。女孩子的秘密被你知道了，你杨维铨能一走了之？不过，南侨机工当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常人，他俩当然因为相爱才结婚。陈团圆发疟疾躺在担架上，傣族姑娘朗玉宝拿毛毯让他盖。当他送毛毯还傣家时，带一点礼物只是表示谢意，没有别的意思。他不了解傣族送礼物即定亲的习俗。出于对傣家的尊重，他随了傣俗，与朗玉宝结婚。当日军追击而来时，他让战友们安全撤离，自己留了下来。不幸被捕后，直到被活埋就义，面对敌人，他没供出任何人。他对自己已建立起来的家庭负责任，对亲人、对战友负责任。陈团圆忠于祖国，忠于战友，也展示了人性的光辉。他用生命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也维护了人的尊严。

他们图什么？杨保华妻子 1958 年去世时，他 43 岁，子女 7 个，都未成年，最小的才 9 个月。他同时还抚养着战友的 5 个子女、外祖母、岳父母、岳父的婶婶等，全家共有人口 22 个。而他每月工资仅 90 元，加上补贴，也只有 120 元。他当时的任务是支援公路建设，跑昆洛公路，常从城镇带蔬菜给工地工人，也利用空车载一点柴火给沿途小食店。他因而得到优待：买饭吃，不用给粮票。他说：“我帮大家一点小忙，大家帮助我度过难关。”他一直没有续弦。我问他，当时还年轻，为什么不找个伴？他说：“有呵，来讲亲的还不少。我不要。找一个来和我挑这个家的担子，我是让人家来受累。再说，如果人家和这些孩子合不来，孩子又怎么办？”当然，助人者，人恒助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年逾九旬的杨老先生总是慈眉善眼，乐观开朗。去年在集美陈嘉庚先生 130 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揭他的老底”，建议大会主持人请他用闽南方言唱当年在华侨中传唱的《热心救国歌》。他唱着：

热心救国是应该，

做了汉奸臭三代。

有钱出钱寄国内，

无钱出力杀日寇。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阿婶阿嫂阿姊妹，

怀通（切勿）日暝（日夜）抹胭脂。

当今国难的时期，

应该为国做代志（事情）。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他唱起歌来，嗓音响亮，咬字清楚，神情轻松，显得比实际年龄少了许多。他是幸福的。他在对家人、对后人、对战友、对社会施之以爱，为爱尽着责任的过程，得到了尊敬和爱的回报。

善待他们是社会责任

在抗日战争期间，华侨爱国救国不分国共。南侨机工出生入死为抗敌救国，无论什么时代都是值得尊敬的。善待他们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在我们现实中，南侨机工的遭遇并不公平。

1998年8月25日上午，南宁市南侨机工殷华生老人的女儿殷红通过电话告诉我，殷老自1996年以来的医疗费因单位不让报销而积欠，不能住院治疗，于23日在家里病逝。单位的领导认为殷老是“国民党”，病了，死了，没有领导到家看望和慰问。殷红说兄弟姐妹们担心往后更难办，决定将父亲的遗体抬到单位领导家门口，要求立即给报销医疗费。我将情况急报中国侨联主席杨泰芳，建议由领导出面帮助，协调解决，避免酿成尴尬局面。广西自治区侨联副主席李冠华受命亲自处理此事。在殷老火化前，其单位领导签署准予报销2万多元医疗费。但自9月起，该单位扣发了殷老遗孀应得的全部抚恤金和在同一单位的殷老女儿的工资。理由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不能照顾。

殷华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有的更是触目惊心。我想，这也不能责怪具体单位的领导。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只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人民，与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殊死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不了解华侨历史与国家的侨务政策。不能苛求他们。

我只是举例。

南侨机工生活困难的情况得到各级侨联的关注，也引起国务院侨办的重视。侨联、侨办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1986年12月，国侨办会同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发出通知（侨政会字第023号通知），以每月发给定额生活补贴费的形式，解决南侨机工领取100%退休金的待遇。国侨办另又与有关部门协商，制发《关于南侨机工部分成员生活补助费事》，用定期发放补助的方式，缓解少数解放后没有就业的原南侨机工成员的困难。实际上，即使按通知规定落实，对于大多数机工老人来说，生活的改善也是很有限的。

1999年12月9—11日，我在海南，邀兴隆华侨农场的蔡如秋、琼海市中原镇的吴惠民，偕同在海口市的罗杰和李月美的女儿杨玲玉座谈，并一同走访海南省侨办和侨联。侨办的分管领导对8位南侨机工（1人已去世）的情况非常熟悉，虽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86）侨政会字第023号通知”的规定始终没有得到落实。在海口市的陈宗儒是唯一曾获准按文件规定补发工资的南侨机工，但只发一年就停了，并且将已发的4000多元，从每月的工资中扣回，一连扣了一年多。

2000年春节，蔡如秋、吴惠民来电话告知，海南省委统战部、侨办、侨联三家领导春节前专程上门拜会每一位机工老人，各给慰问金500元。从电话中，我听到两位老人爽朗的笑声，他们说出了同一句话：“从来没有的。”春节过后，我将打印好的《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分寄有关省市侨联供参考，请在全国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上再次提交建议或提案，以求切实解决南侨机工的工龄（从抗战算起）和生活待遇问题，并建议给机工们以恰当的身份定位，如可否考虑为“有功于抗战的爱国华侨”，授予相应的荣誉证书，享受相应的待遇。之后，我收到四川省侨联、侨办热情的回复，详细介绍他们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从1993年以来每逢春节和中秋节都登门慰问机工老人和机工遗孀，发慰问金。他们自1997年起由财政拨付、由侨办发放生活补助费，老机工每人每年2400元，机工遗孀每人每年1200元。福建省侨联主席李欲晞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交《关于进一步改善南侨机工待遇的提案》（第1509号）。国侨办为此做出批复，列举历年所做的工作之外，一直都在关注着南侨机工的状况，“今年我办又发了《关于调查统计尚健在的原南侨机工的通知》，据统计，现存南侨机工52人，月平均收入592.65元。我办正积极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拟将原南侨机工成员纳入离退休费的人员范围，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2001年初，按国侨办的通知，南宁市的机工老人吴家运的退休金从每月300元提到1400元。在南宁，吴老先生是唯一活到享受“离休”待遇的机工，他已故去的

11位战友就没有这个福气。可惜，从发放到吴老先生辞世，仅仅三个月。

南侨机工的生活待遇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得到了改善，体现出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抗战归侨的历史贡献和社会地位的肯定，虽然改善做得太晚了，有的并不落实，但毕竟表达着国家社会对他们的敬重和体恤。

南侨机工解放后大多在汽车运输系统就业，早退休，退休金少；自谋职业的没有退休金和有关的社会福利。这是他们普遍生活待遇低的一些客观因素。而政治上的不公却是造成他们相对更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对他们的伤害也更深更大。

南侨机工当年怀揣热血与技术勇赴国难，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对于机工战士的大多数来说，是被编入国民政府的队伍，还是被安排为八路军服务，他们能做出选择的余地是很有限的，在几十年之后，却以此区分他们拥护谁，为谁服务，是否爱国，是否革命，实在是不公平。我们向来都给予为抗日牺牲的国民党将士以烈士待遇，对南侨机工何以特殊？居住南宁的12位机工老人，“文革”期间被当作“专政对象”遭受迫害的有9人。对他们的“专政”不仅伤害他们的身心，而且株连其后人。他们的子女在升学、招工、就业、参军、提干时，往往因“政审不合格”而失去机会，失去选择的权利与自由。随着国家各方面的进步，政策上的失误逐渐在纠正，尊重人的尊严、人格、价值的社会风气也开始出现，受伤的身心也得到一定的抚慰。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根深蒂固，由于对华侨历史知识的缺失，由于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对政策失误的纠正，难免有所犹豫，打折扣。

民心不能伤。南侨机工、归侨侨眷的心不能受伤。他们的心受伤了，海外几千万华侨华人的心会因此而受伤，祖国的形象和利益也必然会受到损害。

关于这本书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各地都有纪念活动计划，也有编印南侨机工图录、画册方面的内容。今年初，在畹町参加滇西光复60周年纪念大会、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奠基暨电视纪实连续剧《南侨机工风云录》开机仪式之后，我与汤璐聪谈到编印一本南侨机工的书，内容要新，角度也要新，才有意义。我重视南侨机工，始终愿为宣传南侨机工的事迹和精神竭尽绵力微才。我为支持青年教师调查研究南侨机工，曾允诺不写南侨机工方面的文章公开发表，但为征集文物、搜集资料、举办展览方面，我舍得人力财力；要我作专题介绍，有求必应；帮助某些单位让机工老人给学生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设法使“国宝”、“活教材”发挥特殊

作用；有意用心用力写书出版的，我也肯花时间与精神给予帮忙。一晃 60 多年，机工老人仍健在的已寥若晨星，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实际上还有许多事要做。对于日本侵略者强加于中华民族的那场战争劫难以及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如何取得胜利的，我们的青年人了解得不多，我们的社会记忆并不清晰。对历史的淡忘和失忆，将使人们陷于盲目，无以明是非、昭褒贬，无以惩恶劝善，也无以维护公正、正义，和谐，和平；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将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尊严，失去自我！关于华侨抗日救国，我们作为个人，所能做到的，也只有写文章、编书出版一途。我一说出想法，立即得到汤璐聪的积极回应。于是，编辑出版《南侨机工抗战纪实》的计划就酝酿出来。这是今年 2 月初的事。小汤随即全力进行组稿。她在昆明、成都、太原或什么地方，写成一篇，就以电子邮件发来一篇。我在厦门家里读着一篇篇稿件，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现代通讯和文字处理手段的快捷与神奇，小汤纵横驰骋的“人脉”和认真负责的办事态度，使我每天都看到成功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小汤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代，我认同和赞赏她在走近她的父辈们、感受父辈们精神境界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有了这种努力，这本书就有了自身的长处。

这本书，在选材上，不与已发表或出版的内容重复；作者大多是南侨机工的子女，写所见所闻父辈的点滴故事；写文章的侨务干部和其他人员，亲自采访过南侨机工，有自己的感受。这是与已面世的作品多为专家、作家所写不同。作者熟悉南侨机工，对南侨机工有深厚感情。在指导思想的把握方面，我们力图通过南侨机工在祖国遭受暴敌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忠”与“孝”，“家”与“国”中作出的抉择，以及战后虽遭遇坎坷而无怨无悔，体现他们的追求，使读者通过读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爱国主义、人文精神、坚持正义、舍生忘死的激情和对待曲折遭遇的宽广襟怀。

因成书时间过短，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文章体例可谓五花八门，文字欠修饰，内容有重复，不够精练，望多包涵，并请给予批评指正。

我与南侨机工的特殊感情

陈立人

根据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先生于2005年4月13—15日
在四川省、重庆市与南侨机工座谈时的讲话整理

我特意从英国赶来看望、拜访大家，时间匆忙。幸有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侨办领导组织安排，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召开这个座谈会。作为陈嘉庚的后人，我非常的感激。在这里，我还要谢谢恒昌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能够为我们在他这新开的酒楼里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在这豪华的酒店里接待、拜会南侨机工老人，使我有幸在这里见到了我们英雄的前辈，以及南侨机工的遗孀和子女，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立人（右一）与杨保华（右二）

我是抗战胜利后在国外出生的，因此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请大家谅解。尽管我是在国外出生，但祖训难忘，祖籍难忘，所以我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每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因为这里等于是我的第二个家。

关于南侨机工老前辈当年响应祖父的号召回到中国参加抗战，我从小就从

我的父亲和叔叔们口中熟知。我了解你们南侨机工当年在滇缅路上的千辛万苦，并为在滇缅路上牺牲的南侨机工表示缅怀。南侨机工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胜利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你们没有回到南洋。而且还有亲人在南洋，可能有的至今还没有联系上，对此我也很感到遗憾。但当我了解到四川省侨办、重庆市侨办，及各级侨务部门对你们如此的关心体贴，逢年过节都有来看望大家，为有困难的机工们解决问题，我甚感欣慰。

记得十年前，在昆明的西山公园，我还见到过二十几位机工老人，这几年我也有机会常到昆明，所见机工老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有机会见到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座谈，我觉得非常荣幸。希望以后能够有多一点的机会与大家见面，多了解一点你们的心愿。此次是为了《南侨机工抗战纪实》一书，和陈毅明女士、林晓昌先生及汤璐聪女士一起策划了这次采访慰问活动，其实也是为了创造一个机会与大家会面，希望大家，特别是南侨机工的子女们能够把这本书写好。我此次受到四川省、重庆市各级侨务部门热情礼遇，我明白这都源于陈嘉庚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创下的不朽业绩，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为他的事业奉献微薄的力量。我会为中国及四川省、重庆市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发挥自身的优势，能够做你们的一座桥梁是我的荣幸。

目 录

前言：

南侨机工归国抗战悲壮史

/方 军 1

序：

我心目中的南侨机工

/陈毅明 1

我与南侨机工的特殊感情

/陈立人 10

第一部分 抗战亲历者自述

槟城巾幗英雄

/陈毅明 汤璐聪 3

我是自费从泰国回国参加抗战的

/蔡如秋（陈丽萍 整理） 8

我参加机工服务团抗战经过

/吴惠民（陈丽萍 整理） 17

读先夫陈爵回忆录遗稿

/王兰英 19

祖国情思

/白雪娇（冰子） 33

第二部分 无怨无悔的英雄父辈

我的父亲杨保华经历不寻常

/杨英顺 37

南侨机工林福来和他的义子林晓昌

/汤璐聪 45

父亲朱松胜的故事从十七岁开始

/梁琨明 54

忆父亲汤耀荣忠孝难两全的人生经历

/汤晓梅 61

父亲罗开湖 88 年的精彩人生

/罗芳玉	67
------------	----

我的南侨机工爸爸陈寿全来自印尼苏岛

/陈先雨	71
------------	----

我心目中的英雄外公陈寿全

/胡 玲	76
------------	----

记汽车“医生”龚勋回国抗战片段

/龚建民	80
------------	----

我的生父陈团圆惨死在日军屠刀下

/叶晓东	87
------------	----

南侨机工英烈陈团圆遇难史实发现经过

/杨维诚	90
------------	----

缅怀我的父亲殷华生

——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前夕

/殷 红	95
------------	----

看电影《海外赤子》引出父亲张金炳的故事

/张烈明	105
------------	-----

泰国第一批回国抗战机工陈玉进二三事

/陈文义	109
------------	-----

父亲温南勋爱国报国也艰难

/温运通	112
------------	-----

第三部分 红星照我去战斗

谢宾元没有给华侨脸上抹黑

/陈 蕾	117
------------	-----

从印度回国的少年机工蒋印生

/敖 勇	122
------------	-----

父亲程龙庆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车队服务

/程晓华	124
------------	-----

南侨机工蔡明训从土乃到延安的抗战纪实

/林卫国	126
------------	-----

南侨机工黄国光的革命经历片段

/林卫国	135
------------	-----

第四部分 南侨机工子女眼中的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子女眼中的南侨机工

/汤璐聪 153

第五部分 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华侨群体

忆 66 年前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片段

/潘金成 185

九十老叟蔡若水对南侨机工的调查研究

/陈宪光 187

我所认识的南侨机工

/林天福 194

战争是把双刃剑

/汤璐聪 196

单骑千里滇缅路

/汤璐聪 200

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

/林卫国 203

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碑记

/ 215

编者的话

/ 216

第一部分

抗战亲历者自述

第一輯

敦煌書目

槟城巾帼英雄

陈毅明 汤璐聪

巾帼英雄李月美的英勇事迹及她悲壮的一生已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白雪娇女士那封催人泪下的家书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还有一位陈侨珍女士。我们还能寻访到这二位巾帼回国后的经历及现在的状况吗？

2005年4月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市羊城晚报记者孙朝天先生打来的电话，告知白雪娇女士的女儿陈耿凡现任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教宣处处长，并将她的电话告诉了我们。这从天而降的喜讯真让我们欣喜若狂，我们马上拨通了陈耿凡女士的电话。都是南洋机工的后代，耿凡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没几天她就将母亲白雪娇的有关照片和资料寄给了我们。这是一包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资料，其中有一张报纸是民国28年5月19日的《光华日报》，上面刊载着白雪娇女士的家书，另一张报纸是南洋商报记者在新加坡码头采访白雪娇、陈侨珍两位女士的报道。

陈侨珍白雪娇访问记

原载《南洋商报》1939年

昨日本报载槟城陈侨珍、白雪娇，两位巾帼，不让须眉，矢志乘长风，破万里浪，北返祖国，投奔战线服务。彼等与北马司机队，同乘丰庆轮来星。记者除钦佩陈白两女士之壮志外，亟慕于轮船抵星之时，得观两位巾帼英姿。屈指计算行程，昨日可到，故于昧爽不显，则坐以待旦，暴日狂肆初破。乃急电探寻丰庆达星之时，所得消息，谓中午可到，然日影斜射，犹无朕兆。迨至四时许，再偕摄影记者赴码头，极力眺望烟波浩渺处，浓烟袅袅飞舞于空际。一轮于弹丸屿边闪出。舟主指谓记者曰：此丰庆轮也。急买棹鼓浪出石堤，船寄碇于西陲灯塔下，以待卫生署之检验，可望不可即。是时，东北天际，阴雾四布，已悉苍穹欲与吾等一开玩笑。言犹未必，雨神伴风，飘拂而下，幸有雨伞，当得一面，尚不成为落汤之鸡。历时一点钟，该轮始款款移至东隅，风雨始告敛迹。远望司机队员，罗列船舷，甫观此间之欢迎旗帜，则引噪高歌《义勇军进行曲》。记者一路抢先，冲上扶梯，首与槟城总领队林水咸君答谈数语，回头

檳城要聞

機工出發萬眾歡送詳情

人潮湧湧

激動僑胞愛國狂熱
路上歌聲與歡送聲響遏行雲

張公權囑機工將情向同胞報告

檳，昨，吉三埠機工回國服務隊，經于昨日下午二時出發，乘意摩輪赴星，出發情形，曾略誌昨日版，僑胞熱烈歡送之情形，本週于廿四日出發時，機工沿途物，當屬不允許穿制服，但他們都一律穿著白內衣及灰色短褲，所經街道，僑胞爭觀，途為之塞，商店掛着歡送橫幅，以壯士氣，在機工出發前，有莊明理先報告是次出星路線，及我交通部長張公權氏登台作懇切訓話，茲將昨日之詳情錄次，

春滿園內

萬頭攢動

在機工出發之前，登載熱心僑胞，男女老少，聯袂到頭條路去歡送，或乘車，或向頭條路去，頃刻間，萬頭攢動，春滿園內，十二時正，機工在春滿園聚餐，此為該園主人陳年君親到，席間僑胞聯席代表莊明理代贈信旗于張總領

把這裏的路，與中國的路比較，同時亦不可以此處的路看中國的路，這是在抗戰後，僑胞們苦幹的血汗造成的，所致因路不好，汽車機件容易損壞，請大家好好的保護，要爭途遠了，須格外小心去檢查，至於送到困難時，可把情形報告，要各位在途中遇了事，不要驚慌，大家都是僑胞國家



母兄弟妻子等，而抱為之熱心與精神，所以各位的責任，非常之重大，我希望大家更加格外努力，排成隊伍

踏上征程

張氏在熱烈掌聲下退出舞台，接着台下來了一陣笛聲，是樂隊的響亮，同時月光台的旁邊，傳來一陣悠揚的樂聲，鐘聲中學的銅鑼聲奏唱了。

頃刻間，三埠的機工都排成整齊的隊伍，全隊都穿著白內衣，灰色短褲，格外表現出勃勃的英姿，莊奕的精神，出發的隊伍，由鍾中銅鑼隊作先鋒，檳城隊第二，吉打第三，霹靂第四，殿後的為歡送僑胞，他們亦自動的排列隊伍，井井有條，秩序良

中華好女兒！

白雪嬌亦上前線

為恐家庭阻擋化名施夏圭
她留別父母信激昂動人

昨日機工隊伍中，千萬僑胞所注目的兩位女隊員，一為陳僑珍女士，一為白雪嬌女士，具為檳城聯席會婦女部職員，同時也在教育界，母親曾加以阻止，其

姓王碼頭

告別南洋

隊伍行至姓王碼頭止，是處僑胞擠滿了，水洩不通，只讓僑胞路，共汽車及機工隊伍通，而全體機工調達，便在萬山機之空地，列起立，然後登岸，是處我們始見有，持秩序，當機工登岸，千萬僑胞的歡呼，跟隨了海潮澎湃，跟隨了熱烈的熱潮，機工們也唱起了別南歌，及義勇軍行曲，船廠響聲響，機工們及歡送者，到登岸上，在船上，陳分發船票，而其上有位船廠夫攜着，箱，向歡送者鞠躬大

剪報：白雪嬌亦上前線（陳耿凡 提供）

見兩女士杂于队群中，便知为记者所仰慕之陈白两位。未投名刺，先询姓名，陈侨珍姑娘，殊曾识荆，略一沉思竟能忆及三年前，马来亚华侨篮排球埠际赛，陈姑娘系棋区之女篮选手，来星夺标，于比赛之前夕，忽患胃肠急性病，不能出场，记者以此询之陈姑娘，相与一笑。是时人多声杂，记者原凭两位至轮上客厅稍叙，弟因白雪娇女士任棋城司机队之宣传，陈侨珍姑娘，任职财政，均为重要职员，须登岸向大会报告，记者不敢累彼等因私误公，只有观机见色亦步亦趋。陈白两位，与欢迎者同乘电船登岸，记者舢舨，紧随于后，幸五十步

与百步，相差无几。至克利福码头，彼等静候后批职员，然后同赴同济医院。此时乃闲谈最好之机会，记者哪敢轻轻放过，兹将访问所得，分述于下：

白雪娇女士，闽之安溪人，生长于槟城，乃正道之槟城“袅娘”，一口北马特殊之语言，较之吴侬软语，各有千秋。昨御兰花白底之旗袍，褐色平底皮鞋，配以白色短袜，身高约五尺二三，体重在百磅间，戴一四百零度之近视眼镜，短发蓬蓬，一任自然，不将脂粉浣面容，只见娴淑堆眉间，其人涵育有素，迥异流俗，有直立不饶，意志倔强之神气。对祖国抗战之认识，极为彻底。此次投奔祖国服务，信念极为纯挚。彼离集美学校后，则肄业厦门大学，倭乱始南返，执教槟城协和学校，现任槟城妇女筹赈会委员。萱堂健在，卜居槟城须条路。椿庭则业树胶于实吊远。其叔白仰峰，乃太平吾侨领袖，犹未知其侄女此壮志。临行之时始告慈母，骨肉分离难免老泪涟涟。

陈侨珍女士，乃粤之澄海人，为暹罗曼谷之侨生，昔年返国求学。集美学校毕业后，则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肄业，学程完毕，乃南返任职于槟城福建女校。为美术唱歌专科教员于今已达三岁。与白女士同任妇女筹赈会委员。陈女士体格矫健，粗枝大叶，高度五尺六寸，体重一百五十余磅，挺胸阔肩，有赳赳桓桓之男子风度，较之碧眼娇娃，未边多让。昨着浅青之方格，发作男装，英英勃勃，眉间天真未泯，眼角童心尚在。家在曼谷，颇觉简单，只有老母与幼弟，然一担仔肩，均由陈女士僉荷。据彼对记者云，返国服务，激于义愤，迄未禀准慈母，来星始以函告。有弟年十六，肄业于暹罗大学，家庭之生活费，曾有数年计划，各地亲友，均出于至诚，乐为帮助。实即此次北返，自己生命，经已置之度外，所谓“匈奴未已，何以家为？”

以上所述，乃记者分别访问所得者。至于两位共同之意见，亦详述于下：

问：你们返国服务的动机，从什么时候起？

陈女士微笑看看白女士，口里还念着“从什么时候起”，意思是要给白女士发表意见。

答：（白女士说）自卢沟桥衅启，我们就感神明的禹域，在敌人蹂躏之下，远托异国，犹苦所悲。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求民族的自由解放，应该将力量贡献给祖国，肩起中华儿女的责任。我们返国服务的心情从那个时候就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但是总没有机会。前次因为看有人跟着司机回国服务，我们觉着机会来了，就请求筹赈会准许我们跟着这批司机队同行。

问：你们打算和司机队一起服务吗？

答：不，我们到了昆明，就要脱离他们的队伍，（两人异口同声答应记者）。

问：你们服务的目的地在哪里？

答：（陈女士葳葳蕤蕤），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定服务的目的地，到了昆明才打算，（白女士插嘴向记者说），起初我们打算到延安去，后来想想，从昆明到延安，路途遥远，又很难走，所以我们的目的地，暂时是建筑在重庆。

问：你们的计划，想在祖国服务几多时候？

答：（白女士重复地说“服务……服务几多时候”），陈女士坚决地说，到抗战胜利为止。

问：你们喜欢服务哪一种工作？

答：（陈女士绝不迟疑地说）我很想到前线去，（白女士审慎了再审慎，才寒暄几句，然后说）到那时才看看哪种工作适合于我们的就埋头苦干的做去。

问：你们在国内的费用，已经全部计划了吗？

答：（白女士好像不在乎的样子，她说）从这里到重庆已经足用，将来我的父亲总可以接济。（陈女士说），槟城各方面的朋友，均答应帮助。

问：你们有任马来亚哪一间报馆的特约通讯吗？

答：（两位的表情都很客气，停了一刻，白女士才说）我们因为学历太差，很少写作，恐怕出丑，所以不敢答应和哪一间报馆写稿。

问：你们有苦干的自信力吗，你们相信你们的身体和精神，能够克服严冬和炎暑的环境？

答：（白女士看看陈女士，陈女士则挺起胸膛，表示起身体的壮健，白女士再看看记者笑说：）国内的天气我们都体验过，我们的自信，是要把我们的精神，去克服一切，我们要救国，当然要吃得苦中苦。

白雪娇给父母的告别信

1939年5月19日在槟榔屿的《光华日报》刊登着华侨女青年白雪娇给她父母亲的这样一封告别信：

亲爱的父母亲：

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是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感动的弱质，或许是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劣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们，走了。我知道，母亲是会因此伤心一场，但是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因而责怪女儿的，一定是引为光荣的事。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理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社会上一个最不值得注意的虫，虽然在救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危安莫卜，是不免悽怆心酸。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更是令人哀惜不置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是不曾辜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现在你俩所可怀虑的不是我，而是弟妹的读书。他们太不懂事了，把上学校当作消遣，这是急需督促教导的。因为“玉不琢，不成器”。

女儿是不孝的，望双亲宽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仅留此作别，后会有期。

叔父母均此，恕我不另。

最后，敬祝健康！

女儿雪娇留书 民国廿八年五月十八日

我是自费从泰国回国参加抗战的

蔡如秋（陈丽萍 整理）



蔡如秋(左二)和儿子、儿媳在海南省兴隆华侨农场的家里(1999.12),右二为编者陈毅明

蔡如秋，1919 年生于泰国曼谷郊外。1939 年 8 月响应陈嘉庚号召，自费回国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战后复员返泰，1953 年再次回国在兴隆农场当司机，1981 年退休，退休金每月人民币 111 元。2001 年去世。下文根据 1999 年 12 月 10 日蔡先生在海口的访谈录音资料整理。

家 庭

我叫蔡如秋，祖籍海南。早年父母带着大哥、大姐来到泰国。二哥、二姐、妹妹和我都在泰国出生。我父亲在一间碾米厂当拖米工人，家里很穷，父母没办法养活我，我只好跟着出嫁的大姐生活。在大姐那里我才能进小学读书。小学四年级时，大姐夫去世了，家里再也无法供我读书，我就随大姐在泰国旧都大城挑水谋生。11 岁时，因为父亲去世了，大哥又不顾家，我只好回到父母家，帮助母亲养猪，有时候也出去当小贩维生。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到了15岁时，我觉得自己没文化，就白天做小贩晚上读夜校。在这段期间（大概十六七岁），“西安事变”发生。我们都很生气，拼命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还把他的相片丢在厕所里（说罢，蔡先生哈哈大笑）。抗战爆发后，我在当地的一个组织“青抗”（青年抗日队）里帮忙做一些救亡工作。例如义卖手巾，就是印手巾去义卖。由于我家周围都是泰国人，比较容易隐蔽，我经常拿着手巾在家里印。我妈妈问我做什么，我说你不要管（蔡先生又是哈哈一笑），印了之后还划着船沿着河边去义卖。有时在春节也参加募捐活动，当时募捐款全部交给分会寄往广州。总之，凡是抗日工作我们就参加，所以在泰国时对祖国还是有一点印象。1938年我也想回到广州从军，后来因为朋友泄漏消息，让我妈妈发觉了，她扣留了我。但是我不死心，经常关心战事变化，从报纸上看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我们都很激动。当时滇缅公路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如果有一技之长，不是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吗？于是我就同朋友文永丰两人晚上偷偷摸摸跟着运猪肉的车去学车。那时没有钱租车买油，我们就买一点酒给泰国司机喝，学了半年，我们就串连了五六个人一起回国。

加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

究竟从哪里回国？行程需要多少钱？我们都心里无数。于是就写信问泰国《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询问机工回国服务的方法和路线。他告诉我们，要从柬埔寨，过西贡到河内，走滇越铁路进云南。每人只要40铢泰币，所以我们就串连了7个人一起回国。当时印支三国称为安南，当天我们就到柬埔寨金边，第二天到西贡时我发现过境书（护照）不见了，好在我有一个同事在当地有一个老师是共产党，原来在泰国教书，现在是西贡《全民日报》的编辑，通过他去当地的国民党党部（中国领事馆）办了护照，才到云南。

我们到达昆明时是8月3日，下了火车在金碧路找旅店。在旅店碰到西南训练所一个新加坡回来的分队长，是海南人，他听到我们要找西南运输处，就在当天带我们到潘家湾训练所。当时接待我们的人，是大队长郭清。我们说明来意后，被编进队里。进了训练所一星期左右，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第九批人员也到了，我被接纳在第九批的队伍里，编在第一中队。中队长叫孙仲汉，第九批机工总领队吴福华（印尼棉兰华侨，潮州人）任中队副。我每天训练驾驶和进行操练，在训练所呆了大概三个月。出发时要考试，我训练三个月就考上了，同批的一个叫郑亚泉也同时考上。我因为是在越南拿到护照，1939年底就

被派到海防。当时广西睦南关（今镇南关）形势紧张，郑亚泉被派往广西，从那时起他就没有消息。在海防，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车去码头，运送美援物质到火车站，用火车运进睦南关。但是西南运输处办事人员很糊涂，不了解当地情况，我们到了以后，首先就说要懂越南语，派了一个越南老师来教越南语。学了一个月，他说不行，要学法语，又改学法语。半个月后，他又说不行，要满26周岁才能拿到当地的驾驶执照。我们11个人全都不符合条件，只好全部撤回。

1940年初，我们就撤回昆明。到达的第二天刚好第九大队要出发到滇缅公路，我们又被编到第九大队出发了。第九大队到芒市后驻在当地，大队长是甘燕庆，大队副是陆绍康。我隶属第二十六中队，中队长刘景刚，中队副董道骏，分队长是陈畅。这次的任务是接“大道奇”新车，从缅境分段把军用物质运回国内遮放，再转运至芒市、保山等地仓库。在等待接车时，有几个班长被调回昆明干训班再培养当干部或分队长，其中一个沈孟昌，还有我的朋友文永丰。他们走后我就当了班长。

后来（具体的年月日忘记了）遮放总仓库被特务破坏，发生爆炸。因为遮放仓库建在半山坡，山坡下让人烧窑。当天车库来了60吨炸药，特务就利用烧窑这个漏洞，在晚上引爆炸药。当时美援物质全部集中在那里，然后再散进内地。12座仓库一下发生爆炸，损失惨重。

年底，我们又再同其他大队合并，成为第十五大队，车队就驻扎在保山。有一次我带了6部车，从保山出发来下关，再经过功果桥，就碰到汽车兵团。我们车队除了我跟一个机工在一辆车上，其他都是一人一车，而汽车兵团每部车都有枪，一部车两个人。我们的一个队员是福建人林亚奇，普通话讲不准，脾气也不好。在交会车时，他们兵团的车要下，我们要上。我们车队有人叫他“快一点”，他们就要下来打人。当时我就跑上前问他为什么打人，有什么事情可以慢慢讲。因为我是领队，他们就把我绑起来打。当时我的手被打裂了，人打伤了，被绑在车尾，他们就走开了。我被打伤后回到永平，就住进永平医院。进医院后就叫我一个队友回中队报告。我们驻在保山的南侨机工队友听到这个消息，就在保山城门外拦住汽车兵团的车，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从那时起我们就同汽车兵团结了仇。

不久，陈嘉庚先生到延安后回来，要从滇缅公路经仰光回新加坡，路过保山，就在保山发表演讲，介绍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并和国民党战区里人民的生活对比，我们都很受鼓舞。从那时我对国民政府就有点怨气，想当初一片热诚回国服务，结果被打，又碰上种种波折，养伤之后就有了回泰国的想法。到

泰国要经过缅甸，但碰上日本南进，缅甸去不了，泰国又被占领了，只好又在西南运输处的送车队工作。这次的工作是专门赴仰光将美国支援的汽车运至车厂拼装以后，开进国内的芒市，再交给国内的司机驶回昆明。不久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仰光，仰光局势紧张起来。有一次我到仰光接车，听到日军已经从半路切进来了，我们当天早上开车越过封锁线，到缅甸旧都曼德勒，行程四百多公里回到腊戍。那时我们送车队的队部驻在腊戍。随着战事的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我就失业了。

吃苦也浪漫

在保山时我遇到爱人林淑华。当时林淑华也是泰国侨生，在保山华侨中学读书，日本南进后侨汇断绝了，她经人介绍到腊戍书店当店员。我在保山用桐油布把她包起来，开车冲过检查站，送到腊戍。她是女孩子，来到腊戍人生地不熟，我送她来，接触多了我们就慢慢有了感情，一直到仰光失守。

当时尽管失业了，我还有一点钱，就同别人在腊戍合伙做一点小生意，后来缅甸形势紧张，曼德勒也失陷，我们就跟着跑，一起疏散到龙陵。由于以前做小生意还有存货，我就想在龙陵销掉这些货。我们估计日军应该不会那么快到这里，没想到就在5月4日，日机轰炸保山。我们在龙陵隔着一座山看见27架飞机，但是我们还是没走，因为看到当地的中国银行还没撤退，中国银行是官办的，银行都没撤退我们何必那么急呢？那天下午日机炸保山，到下午四点多钟，银行撤退了，我们也跟着走。当时我的朋友一辆车要先走，我就叫我爱人先走，她不肯，一定要和我一起走。我们两个人等那天晚上坐六七点的预备车走，可是已经走不了了，公路上塞满了车，国军（当时是云南60军）守在惠通桥，他们怕日军打来顶不住，就把惠通桥炸断了。他们以为只要炸断惠通桥，就能凭怒江天险阻挡日军。我们当天离开龙陵，第二天早上，日军已经到了。那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天蒙蒙亮，因为公路堵车，我们就下车走了，（在路上）看见日军开车拉着小炮，第一部车开灯，跟后的车都不开灯，只在后面挂着一块白布，后面的车就跟着那块白布前进。我们还以为是国民党军撤退了，我同我爱人就拦住一辆车，我爱人从车后爬上去，说，“先生，先生，给我坐车。”其实车上并不都是日本兵，都是中国兵，有山东兵，广州兵，只有两个日本兵押着队。日本兵就吼着“到前面去”，把我爱人推下来，我到车后找她。因为逃难，我就拿着一个旅行袋，袋里装着一条烟，手里拿着一双鞋子。日军看见我拿着袋子，就喊：“拿来！”我一看是日本兵，慌忙把袋子丢给他，就拉我爱人跑到路边的山上。我很害怕。到了山上远远看见圆形的坟墓和墓碑，还以为是

日本车，怕得都不敢动（蔡先生哈哈大笑）。我很快就醒悟到日军停车是因为他们看见国民党兵，我跑过车边时刚好看见他们杀国民党兵，他们不开枪，只用日本刀，左一刀，右一刀，脚一踢，我看见几个国民党兵站在路边，脚还在发抖，看到了心寒啊。一路上碰到散兵，其中还有受伤的南侨机工。我问他们怎么受伤，他们说，大家同在一起，里面有国民党兵，日本兵就用机关枪扫射，所以有的人不死的就断手断脚。就这样我们沿着怒江一路跑。

渡过怒江

沿着怒江，我们准备到西康去，就想办法向老百姓买竹子编竹排，准备过江。当时只有我和几个朋友会游泳，其他人都不会。怒江弯弯曲曲，水流湍急。我们都不会使用竹排，转弯时竹排弯不过，直插江里，一插竹排就翻了。我爱人就被竹排翻到转弯的死水，幸好被我的朋友拉起来，她得救了。而其中有一个不太会游泳，但他告诉我们会游泳，我看见他抱着一个大包，浮在江面上，大家想他会游泳，又带了一个大包就没注意他，结果他就失踪了。我们又走回头路，没法过江困在原地。刚好碰到一团国民党兵也要过江，我们就跟在后面逃难。大概走了半个月，他们找到一条船准备过江，我们去跟他们交涉，他们说等他们过完了才可以。就这样，等这些兵过完江，我们几个人才过。

四处飘零的岁月

渡过怒江之后又累又饿，又没有东西吃。饿得实在没办法，我们就爬上山到老百姓家买了一只鸡，但吃不下，因为当地没有盐，怎么吃呢？我们就跟着当地山民用苞粟、玉米、冬粉做成锅巴吃。过了怒江，我们就一直跑到下关，这时下关发生霍乱，死了很多人，我们很害怕。过江时我的衣服都丢了，只剩下一条短裤和一件衬衣，我穿着它们跑了大概一个月，直到昆明。

随着战事的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运输处不接收我们。我又失业了，只得靠先跑回来的朋友接济维持生活。大概到1941年底至1942年初，华侨中学撤退到贵州五里桥办第二中学，我爱人找到校长要求让她随校到贵州。她进了学校不久又怀孕了，只好离开学校。我没工作又身无分文，只好靠朋友接济。恰好朋友的车要到广西，我们就一起到广西。到了柳州生活无着。我爱人肚子已经很大了，还到卷烟厂做工，没多久就在柳州生了孩子。那些从思茅撤过来的难侨看见我们这样艰难，都帮忙接济我们。但是这样生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又跑到广东韶关找我的朋友，在韶关跟朋友的车跑韶关——新林、梅县——新林，这样又过了半年。

俗话说“祸不单行”，本来已经失业，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安置费来维持生活。一次我回柳州，住在一个烂旅馆，旅馆发生火灾，结果一场火灾又让我一贫如洗（说到此处，蔡先生又是哈哈大笑）。熬了半年多，到1943年我的大儿子出生。有一间捷和钢铁厂在柳州设厂，我经人介绍进厂开车，生活开始好转。后来由于日寇进攻湘桂，柳州紧急疏散，我跟着工厂迁至独山。那时火车可以通到独山。汽车让司令部封了，工厂解散，又没车开了。但是军队硬要我开车，其中有一个少尉，为捞私利，抢了很多轮胎，逼我给他押运这些轮胎。他很凶，我横下心跟他对着干，因为他需要我，他不敢对我不利。我们开着车，过了封锁线，车子没油了，他们就去买飞机机油。其实汽车不能烧飞机机油，爆炸力太强。汽车气缸发生爆炸，我就弃车走了。

不久我和爱人挑着东西和孩子逃难。流浪到昆明后，租住在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开设的旅店，然后到处找工作。当时美军还在昆明，我就去ATC开交通车，以日计算做临时工维持生活，就这样做了两个月。后来，我的一个朋友黄拔如在川滇公路陆良机场驳运站当队长，当时没有名额，刚好有一个人叫陈建华报了名没有去，我就顶替他的名字开车。我们的任务是将美国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物质驳运进仓库，所得的报酬就以进仓库的路程远近发给油票，每日按实用的油料扣除，剩下的折价作为油券金。我们就靠这维持生活。这样子开了半年多，直到日本投降，驳运队结束机场运输任务。因为机场驳运队属于川滇公路，是国内官办的运输机构，我们又失业了，就等着发回剩下的油券金，但总是等不到。后来因为驳运站所有人员要撤到贵州毕节，为了油券金我们一家就跟着搬到贵州毕节。到毕节后因为气候寒冷又下雪，我们无法适应，领了一半油券金只好回到昆明。

回到泰国

到昆明后又没有工作，我就拿出那些钱同朋友合资做生意。直到1946年6月，以前和我爱人一起回国的一个朋友在重庆机场当中尉连长，夫妻俩看到我们没有工作，力劝我们回泰国。当时我爱人已经怀孕七八个月，我考虑到她的身体不方便，犹豫不决，我爱人说，还是回去，反正这边也没工作，熬苦熬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回泰国自己的家，我们的家人都在泰国，坚持要回去。之前和人合资的生意就想办法转让，我又去侨务局上报难民复员，刚好侨务局的侨务科长是华侨书店的老板马燕生，他就帮忙办了。我们就靠四万元的复员费买飞机票到越南河内，从河内经过老挝，由老挝渡湄公河到泰国，在当地补做入境证，因为华侨要缴纳人头税，缴了，才能办华侨随身证。坐车经乌汶，才回

到曼谷。

算来算去，我同七月有缘。回到曼谷那天刚好七月七日，为了七七抗战回祖国，熬了几年，回来又是七七。我爱人的哥哥、嫂嫂靠缝衣生活，听到消息就接我们去他们家里暂住。因为我家在郊外，还不知道我们回来。住了一段时间，才去找我妈妈、姐姐。

回泰国后失业了一段时间，遇到跟我爱人一起回国的一个朋友，知道我回泰国，就开了一个运输行，要我去帮他买车、管理。因为自己刚回到泰国（1946年），没有工作，母亲又在郊外，哥哥在做小生意，境况不是很好，我就去帮忙。刚开始时老板说，将来办起来之后给你一点股份，你来帮我管理，不用再去开车。我想尽办法去买那些没人敢买的车。别人笑我买人家不要的车。因为这些车便宜，但我有办法修好它们，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最终老板还是要我开车，之前答应我的股份也没有兑现。做了近一年，我一气之下，到1947年底就不干了。失业后暂住在我爱人哥嫂家。

不久，我爱人一个在山芭教书的同学（越南归侨）想回越南，叫我们去接替他那个班，我就去滥竽充数了。山芭的小学有六个班，只有两个老师，我们两个人就负责整所学校。两个人1000元，教了一个学期。适逢我的孩子生病了，那里没有医生，就靠草医。刚好放假，我赶快带他回曼谷治病。病愈回去后，泰国政府封校，要求老师要参加泰文考试，学校必须注册，但又不让我们学校注册，我们都不懂泰文，只得辞掉工作又回曼谷。

1948年，中央航空公司开辟从广州、汕头到泰国的航线，在泰国设立一个办事处。办事处有两部车，一部接送旅客的客车以及一部主任坐的小包车。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报名，很多人看见我去就不敢来，因为之前我在车行也教了一些徒弟。最后我凭借技术考上了，就在航空公司开大客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航空公司香港总公司宣布起义，我们也响应起义。那时新中国还没同泰国建立邦交，公司无法发展，就停业了。办事处主任、干事全都撤退，我们两个司机和四个杂差全部被遣散。

在央航时，我们每个月工资400港币，相当于1600多泰币，在那时算高工资了，当时一个经理月工资不超过1000元泰币。工作一年多我有了一点积蓄，失业后就买了一部车自己开。我买最便宜的日本车，10000多泰币。因为我有技术，能管理，就在火车站搞运输。但是因为出租司机是保留职业，泰国政府不准华侨开出租车，因此我就把名称挂靠在一个木板行，作为私人店的车，运费由木板行定，靠此谋生。

在这段时间我碰到一些老朋友，他们组织了一个旅行社，属于共产党领导

下的外围组织，专门集中一些没有组织的青年。他们来叫我参加，我说你们知道我是从西南运输处出来的，你们没有顾虑吗？他们说从你的经历来看谁不相信你呢？因为其中有很多是保山华侨中学的学生，大家都互相了解。我就参加了这个外围组织，每天晚上在我爱人的同学家参加小组学习，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表面上是打羽毛球，晚上学习。在这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和平签名运动”，推销“胜利公债”，组织反对“增加华侨随身证”等活动。

赤子之心 无怨无悔

国内抗美援朝，我又对新中国发生了兴趣。因为新中国成立两年就敢同美国及六个盟国打仗，而过去国民党连个小日本都怕得要死。这次回国想参加祖国建设，另一方面也想把孩子送回国内接受教育。就这样，又丢下我妈妈再回国。

本来，那时在泰国我已经有三部货车，收入也不少，每月给我爱人 1000 元都用不完。1953 年底我们全家回国，先到汕头，进招待所工作，被选为生活组长，管理招待所的难侨。1954 年普选，我负责带队去调查候选人。过了一段时间后，没给我分配工作。不久要分配一批人去兴隆农场，我要求到兴隆也不让。又有一批人分配到陆丰农场，我甘愿去陆丰，上级也不答应。后来泰国《真话报》编辑邱及到汕头访问，我就向上级要求去学习。所以我又带队去台山学习，到台山后被选为学委主席。在学习班负责时事股的出版组。之后又分配一批人去海南，一批人去学习开车，但其中都没有我的名字。后来兴隆农场派场长做报告，号召一批人到兴隆。当时我爱人同孩子还在汕头，我先报名，很快就批准了。于是我又让我家人自费从汕头坐车到海南。回国前带回来的钱这时已全部用光。到海南后，刚好兴隆发大水，我们只好在海口住。住了大概半个月，等那里安顿好了我们才去。

当时兴隆农场有 100 多人。我又被选为热带作物队副队长，下水田、挑肥都要带头，我什么都不懂，可是我还是咬牙坚持。后来碰到一个名叫林学森的泰国归侨，叫我一起去考车。1954 年底考车要经过农场批准，我们还是说服了场部领导。那时候考车很不容易，在海口考车，足足考一个月。先来报名，等一个星期后出榜，再检查体格，合格后考交通规则，再考机械常识，进行技术考核，穿桩，路考。每一轮考试之后，必须榜上有名才能进入下一轮，总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农场有三个人参加考试都合格。考车的整个过程都是自费。为了考驾照，我花了上百元，还向公家借了 15 元，虽然合格，但并未分配工作，审干时又被安上诸多罪名。不久农场要我当车队会计，我还是服从分配，

当了很久的会计。后来隔壁农场向我们借三个司机，又把我借调过去。那时我一个月才30元，没有评级，借过去后，我就跟着他们评级，当时我评了四级。我想把家属接过去，但要被分配到山区去，我不想去，于是又回到兴隆农场。回来后我就从事驾驶工作。接着肃反开始了，刚好大炼钢铁，我又被派到直路(?)去支援，本来派了两部车，另一部车开到直路(?)坏了，就回农场，剩下我作为技术尖子带一个徒弟在那里熬了半年。我们支援他们炼钢、装窑、运材，我每天起早摸黑，别人一天跑四趟，我一天跑六趟、八趟，直到肃反运动把我调回来。回到农场后我就挨整，说我是“国民党”、“运输大队长”，说我隐瞒历史，把我停职。又叫我去洗厕所、种菜、养猪。我什么都干，因为我是劳动人民，心地坦荡，什么都不怕。这样做了两年，被解放了。因为那时物质紧张，缺乏汽油，汽车没有汽油就烧木炭，没人会开木炭车，就来叫我开木炭车。后来要培养一批司机，要我当教练。以后农场经济欠佳，又让我去开车，经常去开没人肯开的烂车，出差支援也有我的份。但是，不管到哪里，我都埋头苦干。

(陈丽萍 厦门华侨博物院 图书资料馆员)

我参加机工服务团抗战经过

吴惠民（陈丽萍 整理）

吴惠民，1919年出生于海南，1939年8月从新加坡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1953年在海南工作，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1979年才获得平反。下文根据1999年12月11日吴先生在海口市奥罗斯克大酒店的访谈录音资料整理。



吴惠民（右）与战友吴家运（左）（1999），中为李月美之女杨玲玉

我是1919年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那时家里很穷，但是母亲把我抚养大，让我一直读书到15岁，才把我送到南洋我叔叔家。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我叔叔在舞狮公会当理事，他对抗日活动很热诚，对祖国很关心，经常带我到学会上活动，叫我参加抗日活动，那时我和叔叔在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下，每个星期参加卖花，赚钱救国，那时我18岁。

1938年日本轰炸广州，那时虽小，但是我满腔热血，看到日本人对我国这样侵略，无人道地轰炸，我参加了新加坡华侨举行的示威游行。有一次我们在牛车水游行，遇见英国兵把我们抓起来，当中都是领头的、拿旗子的、走在前面的，一共抓了12个，他们把我们抓到监狱关起来。一到那里，新加坡华侨送面包、牛奶、糖果等东西给我们吃，他们说：你们放心，他们不能把你们怎

么样。我们自己心里也明白，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怕他们。后来抗敌后援会的沈会长出面向他们交涉，要求把我们放出去，他们不肯，说我们是捣乱分子。“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为了救国。”当时全新加坡各行各业都起来罢工，当局看到没办法了才把我们放出来。

19岁时，我认为新加坡再也无法住下去了，这个地方是殖民地，不是自己的国家，现在抗日救国，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走到前线跟敌人拼。那时候海南会馆组织抗日救国青年回乡，我是海南人，就响应号召，结果我年纪小，只是一个知识青年，也不是共产党员，参加考试，人太多，我年纪小也不让考，怎么办？刚好陈嘉庚先生号召我们参加华侨机工回国，那时候我名叫吴东彪，我叔叔不让我回来，因为我父亲早逝，我由母亲养大，他舍不得让我回来。我就把名字改为吴惠民，不让他知道，偷偷去报名，但人家不肯收，那时我还不会驾驶，就每天晚上出去租小汽车，到加东学习，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就去报名，到双林寺那里训练一段时间才能回家。

1939年8月14日，我们离开新加坡，当时的场面相当隆重。我们身着机工制服，新加坡各行各业派代表为我们送行。离开新加坡后，我们经过越南到昆明，在西南运输所训练。训练三个月后我被派到重庆机械修造厂第二工厂当修理工、驾驶工。在那干了一段时间后，因为我时常到重庆海外部玩，那时有一个海南文昌人在那当外交部副部长，他对海南人很关心，问我想不想考军校，我想我初中才毕业，文化程度不高，人家都是高中毕业，考军校要高中毕业才能考，怎么行呢？他说，不要紧，你是华侨，这是有利条件，可以参加，你去考试，我可以保送你。结果我被保送上黄埔军校，毕业后，还当了排长、连长，最后当了降落伞部队的队长，到广西参加打日本。

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广州后很思念母亲，马上写信回家，母亲接到我的信，高兴得不得了，她马上回信，说我的未婚妻还在家等我（我几岁就订婚了），叫我快快回来结婚，我就离开部队回家。那时还发给机工复员费，我回家后就没有了，家乡哪里晓得这个消息。我住在家乡一直到解放。

解放后我还当了“反革命”，因为我在西南运输公司干过，属国民党管辖，所以把我当作反革命，安个帽子给我戴。1953年，我参加海南岛引进兵团(?)，因为我懂几种方言，那时没多少人懂得普通话、福建话、广州话，他们就把我吸收进去。工程大队第三大队选我当队长，做了一两年后，我家乡的人说我以前是国民党，现在又起来了，就写揭发信到工程大队，第一次人家不理，第二次人家也不理，第三次家乡的人自己去那里把我要回来接受管制。从那时起我就当了反革命分子，一直到1979年我才获得解放，我的经历就是这样。

读先夫陈爵回忆录遗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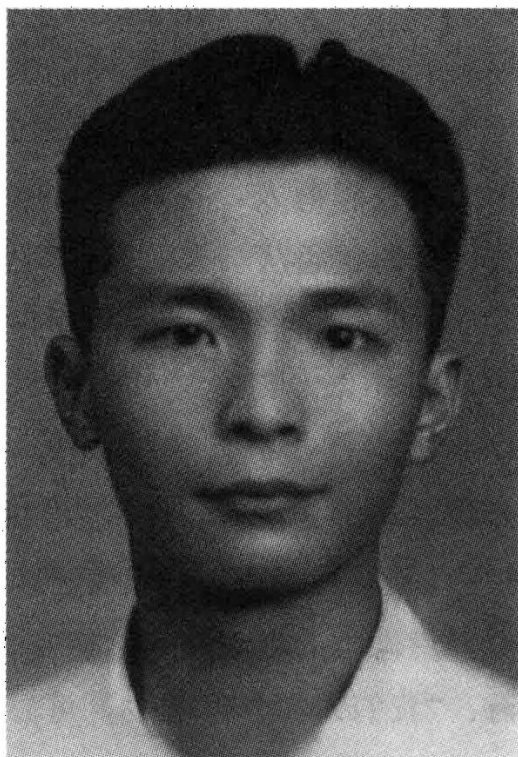
王兰英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缅怀我的先生，我读了他的回忆录初稿，仿佛看到了 60 年前，驰骋在“滇缅生命线”上千山万水之间叱咤风云的南侨机工前辈们的身影……

1996 年 9 月 11 日，与我相伴 43 年的陈爵先生突然心脏骤停，离我而去，享年 78 岁。

先夫的回忆录于 1995 年 2 月开始动笔，实际上是一份草稿，现整理出来，从中也可读出一位南侨机工与祖国生死与共的情怀。

1995 年元旦，得到新加坡中华商会总会前会长陈共存先生的关照，厦门星集公司王昆鹏先生给我寄来《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一页一页地读着我的战友们回国参加抗日救国的壮举，引起我许多回忆。



陈爵(1947) (王兰英 提供)

时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祖父当“猪仔”去南洋

我的祖父陈傅万，祖籍广东赤溪县，出身贫农。为了谋生，他于 1865 年当“猪仔”只身漂洋过海，到南洋群岛——马来亚槟榔屿大山脚打锡肚埠谋生。他历尽辛苦，略有余资，又回国将祖母和两个儿子带到马来亚，共同谋生创业。经辛勤劳动，克俭拼搏，祖父在当地成为经营橡胶园和锡矿的业主。他拥有二十一口之家，生活也很富裕，全家信拜天主教。

祖父虽然没有文化，但希望他的后代有文化、有知识、有作为。我的父亲陈先进就是饱读十多年私塾的书生，并学过中医，但不挂牌行医，只给亲朋好友诊病。我的姐姐陈群娘受家父影响，也懂中医，擅长按摩。

我于 1919 年 3 月 21 日侨生在马来亚，我共有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老六。

未分家时，我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我5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祖父将家产分成三份：祖父、父亲、叔父各得一份。分家后，我和五哥同父亲一起生活。我6岁有了继母马斯琳时，祖父就把我接去与他同住，由群娘姐姐照顾我。姐姐大我8岁，每当我有病时，她总是守在床前精心地照料我。她总是天天晚上向主祷告，祈求保佑我平安。

姐姐平时对我管教甚严，希望我能学有一技之长，她说：没有技术在外受人欺。因此我读完初一，就到槟榔屿泉华电镀电焊机器厂当了一年学徒，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时，祖父母都已相继去世。

1936年夏，我的教父古原发先生带我到泰国勿洞他的橡胶园帮忙管理胶园。教父对我很好。我管理胶园尽职尽责。由于业务关系，我经常接触经营胶园的老板和商人，我的社交随之扩大，同时也得到很好的锻炼。生活好转后，我将群娘姐姐从马来亚带到泰国勿洞埠，共同开辟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

参加救亡运动

1937年，日寇侵占中国，祖国的美好山河被日寇的铁蹄蹂躏，侨居南洋群岛的各地侨胞认识到：“没有国就没有家。”过去从祖父那里，我知道了祖国的一些事情：“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祖国母亲在流血。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南京大屠杀的刀光血影，我忘不了祖父过去对我的教诲：“我们人在异国他乡，可心是中国的，情是中国的。任何时候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华侨的根在中国。”我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身为炎黄子孙，怎能眼看祖国母亲受辱，谁能忍受祖国大好河山被侵略者的刺刀割裂？我当时想，没有国，哪有家？国之将亡，根之将失，人之将死。祖国山河破碎，海外游子的心也破碎了。

“七七”事变那一年，我就积极响应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到华侨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积极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下称南侨总会）领导的抵制日货、清查日货和抗日宣传队的活动。同时，在知名绅士卢焕璋和乡长陈丁的同意下，我在勿洞埠单绒咩拉组织民众剧团，我被选为团长，义务演出，将所得之款交给南侨总会，支持祖国，抗击日寇。

祖国在召唤

1939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根据祖国抗战之急需，在南洋发出号召：年满二十岁的华侨汽车驾驶员和机修工回国服务，支援抗战。我在泰国听到这消息。我虽然不是专职汽车驾驶员，但我曾经和朋友学过开车，考虑自己

符合条件。“男儿回国抗日，是国民的天职。”我决心回马来亚报名，但没有告诉群娘姐姐。她会为我担心、害怕，她不会同意与她相依为命的弟弟回国，离她远走。对我来说，是我对不起姐姐，是我把姐姐带到泰国，她尚未婚嫁，我又不辞而别，当时我非常难过，可是我必须回国，去尽我的一份力，只得舍下孤零零的姐姐在异国他乡，我泪如雨下……

1939年4月，我赶回马来亚槟城，正好遇上欢送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紧接着我先考驾驶证书，并办完报名等有关手续。当我接到被批准为第五批“马华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成员时，当时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临行前，我到叔父、几位姑姑等亲属及好友家辞行。我的父亲送我一本纪念册，首页上题有“国家法令务必遵守，为国效劳是光荣的”。这十六个字我一直牢记在心。

1939年5月，我们500多名南侨机工个个穿着军装，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槟城准备出发。数万华侨在槟城大观园为回国抗战的机工送行。我的父母亲、叔父、姑母等家中能来的亲人，都赶来为我送行。金英姑母嘱咐我：完成救国抗敌服务的任务，要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亲人们为我的平安祷告和祝福，当时难舍难离之情景，只有身临其境远离家门的人，才能体会到此一别的滋味……群娘姐姐人不在场，但姐姐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默默地自语：“姐姐，我要走了，祖国在召唤，原谅我不辞而别，我决心已定，你别怪我，祝福我吧，等把日本侵略者赶走了，我就回来。姐姐，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和南侨机工战友们挺直胸膛，在庄严的军乐声中唱着抗日歌曲，雄壮激扬的歌声响彻云霄。送行的华侨父老摇动着旗帜、花束，亲人们用眼泪和着一声声叮咛与祝福：

“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走！”

“早点回来，我们等着你们！”

“孩子，你们要多保重！”

我站在队列中，目光透过旗帜、鲜花，透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透过摩肩接踵的人群，透过茫茫的大海，我在努力地寻找什么。

“姐姐，我要走了，你要多保重，愿主保佑你。”我觉得贴在胸口上的银色十字架同我的心一起在怦怦地跳动。

我们登上丰庆轮，摇动双手向岸上的亲人挥别。不知是谁带头唱起：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短期军训

1939年5月下旬，第五批南侨机工抵达祖国昆明，全都被集中到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受训，教育长是张炎元，副教育长是薛民城。我被分在华侨第三大队第二中队。到潘家湾训练所，我和战友们的头脑冷静了，毕竟是从狂热的爱国青年变成了战场上的战士。战争是极端残酷的。军训的第一课就让我们这些满怀热情和理想的南洋华侨青年对共赴国难有了更深的理解。

训练所设在市郊，原址是昆明师范学校，这里本是培养教师，陶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育圣地。然而，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一间溅满血迹的教室。听说，1938年，100多名广西学生，正在这里接受驾驶训练时，日寇的飞机疯狂轰炸昆明，几颗炸弹把这些热血青年的生命在一瞬间毁灭了，他们的血溅在残垣断壁上，溅在被炸飞的窗棂上。听了教官的讲述，我和战友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怒吼着：“替死难弟兄报仇！”

我们除接受一般的军事训练，另外还要到崎岖的山路上专门进行驾驶技术的训练。

受训一个月左右，我被混编在西南运输处第五大队（由十三、十四、十五中队组成，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都不是南侨机工）十四中队，当一等驾驶兵。我们车队共有50多辆车，都是旧车。我记得张添兴、肖瑞兴也分在十四中队，我小学同学蔡进昌受训后不知分到何队。

辗转在生死运输线上

开始，我接受的任务是从昆明火车站抢运汽油，送到潘家湾西南运输处加油站。前线车辆用油量很大，我们抢运的任务十分紧张、繁忙，大家都明白前线缺汽油将意味着国家的存亡，谁都不愿休息。

数月后，我被调参加前线运输，从昆明运送枪支弹药到广西柳州。这是我第一次运军用物资，参加火线军运。我是马来亚侨生，对国内交通线路完全陌生，好在沿途有西南运输处汽车站指点，还有别的车队同行。

昆明到贵阳有段路，从山脚到山顶有二十四道弯，坡陡、路窄、弯急，峡谷深渊，望不见底。又遇上下雨，车轮在泥泞的崎岖山路中直打滑，用“寸步难行”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就把事先带的草垫用来垫路，另一位机工战友用他带的木板垫路，前后车互相帮助和照应。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我驾驶的是旧车，前面玻璃没有雨刷器，常要用手去操作。在一个急转弯处，坡又陡，突然车有点问题。“车要出事！”我下意识地紧握方向盘，迅速换挡，稳住了车

向，避免了一次车祸，虚惊一场，出了一身冷汗。真险啊！这种险情在国外是遇不到的。

我的车在一路坎坷颠簸中，半途出了故障，只得停车修理，后面的车过不去，司机（南侨机工）就下车相帮，就像在修他自己的车，真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向他道谢，他说：“谢什么，我们回国的目标是一个，不当亡国奴！”这次我克服了种种困难，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柳州。

日寇即将侵占广西柳州，我又受命抢运疏散的物资到后方。这次的任务，是把榕县“五一”兵工厂的疏散物资和一台大车床运送到贵州遵义再回昆明。广西即将沦陷，从柳州退下来的战车、炮车、军队以及逃亡的老百姓，人车混杂在一起。公路堵塞，汽车很难通行。我们司机坐在车里，有车不能开着行，而是坐在车上，比人步行还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往前移，走走停停，四天四夜我的车还没穿过贵阳。最让我难熬的是禁不住地打瞌睡，为了安全地完成任务，我常把头浸进车上备用的水桶里，提提精神。沿途缺吃少喝，饿得一点劲都没有，幸好遇到一处卖饭的，因为腹中空空，见饭就大口大口往下咽，吃完后肚子疼痛难忍，蜷缩在车上不敢动弹。一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所有的物资安全地运送到遵义。

1942年，我从昆明送军队去畹町。沿途见到多处被炸的尸体，尸体在太阳曝晒下奇臭难闻，忍不住要呕吐。成群的乌鸦，还有苍蝇在尸体上饱食，其惨状目不忍睹。这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实际罪证，更激发我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到了保山，我腹痛泻肚，车上的军医给我打针吃药，也止不住。想早一日把军队送到，听说大烟土能止痛止泻，有人用罐头和一个老乡换了一点大烟土，我吞下果然好些，迅速把军队送到前线。我又从畹町装上一车汽油回昆明。

我回国后患有两种病，疟疾和过敏性腹泻，精神稍一紧张就犯病。行驶在滇缅运输线上，要穿过原始森林，被毒蚊叮咬，难逃疟疾。有一次去畹町，突然大雨滂沱，铺天盖地，在这泥泞的险路中驾车，已经是非常的艰难了，而此时我浑身发冷，忽而又发起高烧，感觉到头昏眼花。“十疟九死”，我努力地挣扎着，费力吞下奎宁丸，我抚摸着护身符昏睡过去。

“姐姐，我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吗？”再倔强的硬汉子也经不起疟疾的折磨，我只觉得天明了又黑，黑了又明，持续的高烧使我昏迷不醒。后来要不是路过的机工战友把我从车里拖出来，送到医疗所，那满是泥浆的卡车几乎成了我的坟墓。

战友献身

南侨机工回国为抗战服务，他们中有许多已葬身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有

许多在滇缅生命运输线上执行任务时，埋身于深渊峡谷里；还有因为失业后饥寒交迫，冻死、饿死在街头。下面的事实是我亲睹与耳闻。

1942年，我在昆明汽车西站，遇见蔡进昌（小学同学，第五批回国），他告诉我说，曹进才（小学同学，第五批回国）开车运行在滇缅公路上，因天气炎热，中暑发高烧，昏睡在永平车站。因无医，当晚牺牲在汽车驾驶室里。

有一次，我完成任务返回昆明，车在贵阳坏了，便送到西南运输处修理厂修理，因暂时修不好，我想乘温仁和（第三批回国）的车回昆明，当时说好第二天走，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到汽车站找他时，别人告诉我：温仁和因有事先走了，我只好改乘别人的车回昆明。当我们过了曲靖站，行至×××地方，前面拥挤着一群人，我们下车观看，原来是温仁和的车在躲让对面开来的车时翻倒了，温仁和的头卡进方向盘内。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整个滇缅公路的运输就是靠这些抗日英雄们的壮烈牺牲来维持着。

在昆明小西门街头，被裁员失业的南侨机工有的在街头乞讨，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战友躺在冰凉的石板上已经奄奄一息，我过去抱他扶坐起来摇摇他的手，战友睁着灰暗无神的眼睛，嘴唇动了一动，却发不出声来。是饿的！我急忙跑到食摊处买了两根油条。当我回来再将他扶起想喂他油条，可他已经死了……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一次我出车去下关，恰巧遇见第五批南侨机工总领队钟椿祥，他在下关西南运输处修理厂任副厂长，我和他讲了身体情况，表示担心患病影响按时完成任务而误大事。经他介绍，我转调到修理厂当技工修理汽车。后来修理厂缩编裁员，我和一些南侨机工被裁减下来。我又返回昆明，经朋友介绍到中缅运输局汽车修理厂当技工。

日寇侵入缅甸，进而占领了畹町。中国守军炸毁了惠通桥，中缅运输局不负责任，裁减了许多南侨机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靠南侨机工朋友的介绍，我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美国空运队当“力工”，装卸从美国运来的军用物资，如炸弹、汽油和食品罐头等。干了三个月。我就考进美国空运队汽车队七十五中队当技工，任务是修理汽车。

外语培训班

为配合盟军总部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配合英、美在南洋开辟第二战场，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总反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干训团外语培训班（昆明东郊场兵营）招生，招收懂南洋各国语言和文字的华侨。受训四个月毕业后分往南洋各国日寇后方做情报工作。我想如果我能参加培训班，结业后就有机

会回马来亚进行地下情报工作，同样是抗日救国，免得在国内人生地不熟，还经常受到官员们的欺压和克扣。事随人愿，我和一部分南侨机工和少数华侨报名后，经严格考核被录取到外语训练班受训。共有一百多人，大队长是王克礼（中校），下设一、二区队，我是二区队学员。二区队长纳××，我们区队有学员六七十个人。记得二区队有陈光荣（越侨）、谭少雄（马侨）、蔡福（马侨）、黄少华（越侨）、符和之（马侨）。在培训期间，听说通过短期特种训练（对外称外语训练班），有部分学员要留在国内搞情报工作。我觉得如果我被留下，实与我愿违，我不愿留在国内工作，只想回马来亚。因此，在结业前一周，正当我值日外出采买食物，就到朋友家谈了上述情况，得到他的同情，并帮助我离开了训练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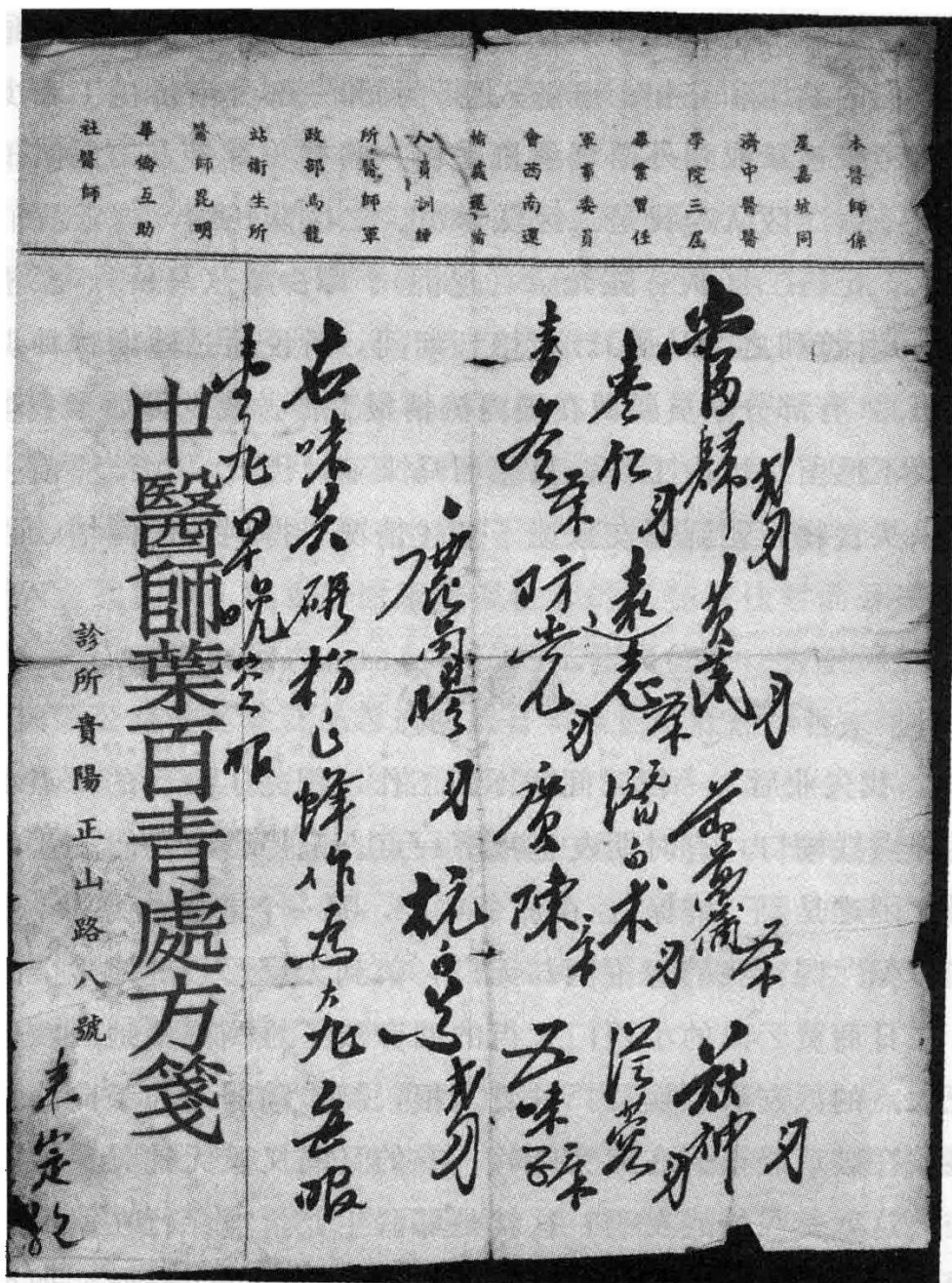
触景寒心

1943年，我失业后，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用完了自己的一点积蓄，靠做小工、杂活挣点钱糊口，有时朋友也接济一点。记得当时我们失业的南侨机工找工作的最大困难是要“铺保”。在那个年代，哪一个老板敢为一个单身无靠的南侨机工当“保”呢？我们想报国却无门，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战时的昆明一派萧条，往日商贾云集的小西门大街的两旁成了难民聚集地。在他们中间我看见有年纪大点的战友衣衫褴褛，拄着木棍，脚步蹒跚地伸手向路过的行人乞讨；有的蜷缩在破草袋里倒在路旁呻吟；有的又痛又饿无铺无盖地躺在角落里奄奄一息……这就是我的战友吗？这就是那些生龙活虎穿行在滇缅运输线上的开路先锋吗？这就是那些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的运输尖兵吗？如今竟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却不见政府当局有一人问及！怎不令人触景心寒。“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心在呐喊！

另找出路

1943年夏，我遇见失业南侨机工黄传芳，他的妻子在贵阳教书，我随他搭乘中缅局汽车队的车到贵阳。在西南公路运输线上的司机同行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当他知道你是失业司机，要随乘他的车同去一个地方，不管路程多远，不但不收费，他还供给你吃和住，到站你若没有钱，他还解囊给你点零花钱，以解燃眉之急。当然，乘车者沿途要主动给司机当帮手，做些杂务活。当时司机间团结互助的精神，十分可嘉。

我到贵阳，因病去正山路一诊所，喜逢叶柏青中医师（第五批回国）。由于崇敬叶医生的为人和对他的思念，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1943年他为我诊病的药



陈爵珍藏的 1943 年的药方 (王兰英提供)

方。不知叶老先生是否健在，他若能亲眼见到他回国抗战服务期间，为南侨机工治病的手笔，我想他一定很高兴吧。后来通过叶柏青医生介绍，我认识了钟兰（南侨机工），他们帮助我找工作。一天，有幸遇见 1939 年在西南运输处第五大队十四中队任事务员的王肇，通过他的关系，我考入江南汽车公司当司机。我们的任务是往返于贵阳、重庆、昆明公路上，往内运汽油，往外运桐油、乌砂等军用物资。前线战局急剧变化，公路运输线越来越短，我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又有被解雇的可能，于是边当司机边寻找别的出路。

在我们南侨机工中，有时传谈着陈嘉庚先生曾访问延安的佳话，我也从报纸上看到延安解放区主张抗日的报道，因为自己能开车能修车，我想到延安解放区参加抗日队伍。有了这个打算，我就留意打听去西北的车辆。事有凑巧，一天下午，我在贵阳市内××茶馆避雨，里面也有十多位司机在喝茶聊天。通

过和他们闲谈，我认识了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工程委员会汽车队工作的杨楚楠、陈可衡等人，一共七位司机，其中杨、陈两位是广东籍，异地见老乡，格外亲切。听说他们车队（有五辆汽车，杨楚楠带队，陈可衡等几位是司机）不久就要北上去汉中，我真高兴，就把我回国的情况和想随他们车去汉中转道延安的打算告诉杨楚楠，他很义气地满口答应，并把我安排在陈可衡的车上。

1944年11月，我便辞去江南汽车公司的工作，告别叶医生和王肇，随杨楚楠的车队北上。唉，事不能如人愿，到重庆时，因下雨公路路基塌陷，从重庆到汉中的公路不通车。为此杨楚楠的车队不去汉中，而改派去湖北来凤抢修飞机场。我滞留在重庆，所带路费甚少，朋友一时不能为我找到去西北线路的车，我一人无能力辗转去延安。杨楚楠先生为人极好，对我的遭遇和处境深表同情，劝我先找个工作解决生活问题。我考虑也对，先找工作，待以后再寻找机会去延安。通过杨楚楠的老同学老同乡的关系，陈可衡也在车队为我找关系，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该队队长同意我在该车队当技工，不久我又当上了司机。就这样我随杨楚楠的车队，一起到湖北来凤工作了4个月。

我在中国“劳协”和全国总工会

1945年，我在重庆军事工程委员会汽车队当司机时，接触到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的干部和会员。听说陕甘宁边区总会是“劳协”的团体会员，都是维护和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人团体，在国民党统治区“劳协”也是进步的工人组织，彼此并肩抗日。我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同年5月，我加入了“劳协”组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欣喜若狂，兴奋得彻夜不眠。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使命完成了！1946年我离开重庆到了南京，不知道南侨机工已复员南返，我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劳协”总会的领导下（当时朱学范先生是劳协理事长，易礼容先生是书记长），我参加了反腐败、反饥饿、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和筹备建立中国汽车工人技术福利促进会（简称汽促会）的工作。该会于1946年2月10日成立，我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当天下午，我带领部分汽车工人到东较场参加维持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会场秩序，保护出席大会的章乃器、李公朴、郭沫若等主席团领导人的安全。汽促会成立后，在短短半年中，从160多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

1946年6月，劳协总会决定调我等6人去上海筹备中国汽车工人总工会。我驾驶西南工程运输处汽车离开重庆到南京再去上海。车队到江西上饶，从报

纸上得知国民党当局武装接收劳协福利社机构并逮捕重庆劳协干部。我在南京与劳协干部齐巨卿（地下党员）、冉瑞武等取得了联系。1947年初得知劳协总会迁移香港，在与香港劳协总会书记长易礼容取得联系后，南京的“劳协”干部决定由我去香港“劳协”总会汇报工作。为了解决路费，我卖掉了和别人合买的汽车，将所得之款大部分用于补助星散、滞留在南京等地的“劳协”会员的生活费和旅费，我带着余下不多的钱上路。

1948年初，我接受劳协总会任务重返南京，以汽车司机职业为掩护，从事联络劳协会员、开展地下工会工作。8月，应香港劳协总会函召，我自筹路费到港。此时，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胜利闭幕，我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便留在香港劳协总会工作。

1949年4月，我被分派去广州进行护厂工作，迎接解放。8月，我接到劳协总会通知返回香港与其他委员汇合，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会干部会议。接着，我参与筹备劳协代表会议的工作，任大会组织组组长。代表会议于11月召开，决定结束“劳协”机构，完成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工会）在组织上的统一。

1949年底，组织上调我去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班学习。半年后，我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直属的产业工会——中国机器制造业工会全国筹备委员会工作（后改为中国第一机械工会全国委员会，简称一机全委会），担任劳保部部长。这期间，我除了曾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去广东新会县参加土改（任该团第三队副队长和三堡乡土改工作组组长）之外，常到沈阳、长春、北京等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推动基层的业务工作，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做贡献。

1953年2月28日，我与王兰英女士结婚。是年11月我们有了一个儿子，1955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

1956年7月，我任一机全委劳动保险部部长时，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部调来一名党员副部长，我多次主动向组织上提出由他任部长，以加强部里的领导力量。组织上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再三说明，我的工作为副职，原正部级不变。是年实行工资改革，我的工资由供给制变薪金制每月124元。当时，正赶上调工资，我从15级提到了14级。我主动提出不涨工资，让给别人。看到别的同志涨工资，我很高兴。

1957年“反右”期间，机关的同志给领导写大字报，提出质问，陈爵同志犯什么错误，为什么降级使用。我见到大字报，便向群众解释，承担责任，给领导解了围。

下放到哈尔滨

1957年“反右”斗争后期，全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精简机构。我夫妇下放到中国第一机械工会哈尔滨职工疗养院搞筹建工作。我的妻子王兰英是一机工会全委干部，按科级干部下放。我们带着一对儿女来哈尔滨落户。我在一机工会哈尔滨职工疗养院任副院长。1959年疗养院“下马”，隶属黑龙江省卫生厅。1960年初，省卫生厅调我到黑龙江中医学院，任总务处副处长。工作的频繁调动，并没有影响我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尽职尽责、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

1958年，我在哈尔滨一机工会职工疗养院工作时，住的是三室一厅。1959年夏季，有一位副主任级医生从外地将调来我院工作。他来信说：他家老少三代，人口较多，需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我当时是主管后勤的副院长，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和妻子商量，我们能否搬到两居室，把我们这套房让给新来的医生住。感谢妻子当时没说二话，尊重我的意见。

1961年初我调到省中医学院工作后，先借住一间12平米的住房，没有厨房，在走廊做饭，共用集体厕所。后又借一间9平方住房。一直住到1982年，才分配到黑龙江中医学院院内家属住宅区。

“文革”中受冲击

1968年9月，我去外地公出，回哈尔滨后不准我回家，就被“隔离反省”。批斗时，我才知道自己被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我扪心自问：自己是回国参加抗日救国的，既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也不是“特务”。但我却被定为是单位中“三个危险人物”中的一个！我实在不理解，不能接受。我被关在一个暗室里，整个窗户玻璃被报纸贴上，睡在只有一个草垫子垫着的水泥地的“床上”，双手捧着毛泽东语录泪如雨下。我和其他被批斗的干部一样，什么都尝到了。

1972年我获得平反，补发了被扣压的工资。1973年恢复公职任副处长。1982年11月，按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清查归侨、侨眷档案，将1958年我下放到哈尔滨后，我所在单位的个别领导强加在我身上的“保卫档案”——“特嫌”之不实材料，当面烧毁。与此同时，妻子、儿子的单位也把受我牵连的“特嫌”材料，从档案里取出销毁。

这一次是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卸掉了24年的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们全家四口皆大欢喜。

我的妻子是按科级下放哈尔滨基层的，受我的牵连，却按一般管理员使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要求落实政策。经过 34 个年头，结果只是落个“享受副科级待遇”，既不给补工资，也不按副科级提工资。对这样的处理不知当时我的妻子是什么心情，反正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平衡，更增加了我对妻儿内疚的心情。

落实政策后，我，一个南侨机工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1984 年 12 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热心侨务工作

1983 年我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我晚年生活很幸福。我的妻子是中医学院主管药师，在我院附属医院西药局工作。1988 年退休，留聘在西药局工作。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于 1994 年自己辞退了工作，回家与我为伴，安度晚年。

我们的孩子都已结婚成家。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理想的工作。我们不必为他们操什么心。

我虽然离休在家，但能自重自爱，珍惜有限余年。我除了做好本院的侨联工作之外，从 1987 年我还积极开展高校基层侨联横向联谊活动，交流教书育人经验，互通信息，增进友谊。学院的党政领导对我也很尊重，很信任。有关领导逢年过节带着慰问品登门探望，甚感欣慰。我常被邀参加单位的科、教、研方面和有关的重要会议，发表意见和建议。

特别是 1994 年 10 月，我应邀参加学院党校举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与民主党派、团体主要负责人一起学习党的统战理论。这在学院还是头一回，说明学院党政领导在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中已把侨联摆在重要位置。我搞了 30 年的侨务活动，能受到如此的厚爱和信任，对我是鼓舞和鞭策，使我乐在其中，我将继续发挥余热，为侨务工作老有所为。

从一个南侨机工，到参加革命队伍，当了国家的主人，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党和政府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待遇，担任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侨联主席等社会职务。我自愧奉献太少。

身为南侨机工，一个老归国华侨，我的亲属分布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美国，国外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加强和他们的联系，联络感情，广交朋友，我责无旁贷。因此，对国外我一直保持与亲属和好友的书信联系，宣传我国的侨务政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欢迎他们来中国旅游观光、洽谈生意，互惠互利。我力所能及地做着侨务工作，做一点促进祖国改革开放的工作，觉得老有所为，生活十分充实。

作为一个南侨机工，很想了解老战友们情况。1983年7月，我接中华全总工会通知，去昆明参加“中国劳动协会”简史稿讨论会。去昆明前，我到北京看望了全国侨联庄明理副主席和夫人，按庄副主席指示，我到昆明开完会后，便与云南省、市侨联有关领导谈了庄主席的精神，在省、市侨联有关领导的帮助下，召开了一次有十多位南侨机工老同志的座谈会。我向大家转达了庄副主席对南侨机工的关心和问候。到会的老战友们谈了他们的现状和有关困难，并提出希望。回北京后，我把当地侨联帮助写的书面材料呈报给庄副主席，并口头汇报了南侨机工的实际困难，如生活、工作、住房、工龄等。

1988年庄副主席给我来信，告知云南南侨机工成立了联谊会，我和联谊会取得了联系，我与罗开湖先生常有书信来往。1989年联谊会举行庆祝南侨机工回国抗战五十周年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和困难，我只拍电报表示庆贺，却未能亲自去，实在是我终身一大憾事，

1994年7月，我自费飞抵昆明，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五十五周年庆祝活动。见到了老战友，虽互不相识，相见特亲。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年过古稀的幸存者，还能在一起相聚几次呢？1994年底，杨保华先生来信告诉我，自我从昆明别后，又有二位老者病故，还有两位有病住进医院，因此说，我们之间相聚的次数不会太多了。他说，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要我一定再去昆明参加活动。

早些年，我一直想回马来西亚一趟，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如愿。1985年我申请去泰国探亲获准，探望我一别46年的胞姐陈群娘。见面时，姐姐和外甥女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们天天求主保佑你，赐你平安！”我认真地告诉姐姐：“怪不得我在抗战时期，有几次大难没死。”74岁的姐姐见到她的朋友，就自豪地告诉对方：“这是我中国的弟弟，从中国哈尔滨来看我了。”我的姐夫生前是胶园业主，姐夫病逝后，是姐姐将三女两男五个孩子抚养成人的。我的甥男甥女们也都有了家。他们非常孝顺母亲。他们的孩子有的已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读书。“小字辈”们好学，团结，互爱互帮。我的大外甥女非常疼爱弟妹，弟妹们也非常尊敬她。这也是遗传吧，因为他们的母亲对我就十分慈爱和关怀。

我在泰国探亲期间，在泰国的表亲们、在马来西亚的胞弟、堂弟和表兄弟、在印尼经商的胞弟都纷纷带着他们的家人到曼谷探望我，每个家庭一来都是好多人，热闹非凡。一句话，我在泰国探亲三个多月，真是太高兴太幸福了。天天沉浸在欢声笑语之中，孙辈们一大群一大群地围着我。天伦之乐，好不美哉！

后 记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侨联给当年健在的南侨机工颁发了一本荣誉证书，先夫的那本写着：“陈爵同志在祖国抗日战争初期，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忱，响应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加入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参加抗日战争，半个世纪以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1995年，记者采访先夫陈爵先生时，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别小看这一纸证书，它的意义是相当深刻的，它代表祖国母亲对海外赤子回国参战这一历史的充分肯定。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人记得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历史，这不仅对我个人是最大的抚慰，更是对50多年前在滇缅运输线上英勇牺牲的1000多位南侨机工的缅怀。”他还对记者说：“更有意义的是，日后待我回马来西亚探亲时，向我的家人、好友也有个交代！”

写到此处，我很难过，因为先夫之心愿未了。他生前就想有机会偕南侨机工战友们同回马来西亚探亲，向那里的亲人、好友做个交代，对他们1939年背负历史使命回祖国参战救国画个句号！可是唯一一个在黑龙江边陲的马来亚南侨机工，由于人为的一些因素，使先夫陈爵先生失去了1995年由海外华人出资赞助国内健在的南侨机工重返马来西亚故乡的机会……

借此机会，我恭敬地向在当年为救祖国而壮烈牺牲的1000多名英雄烈士（这是我个人对他（她）们的尊称）们默哀，你们永垂不朽！

“赤子功勋”，你们受之无愧！

缅怀留在祖国继续服务，默默奉献毕生精力而故逝的南侨机工先辈们，你们永垂不朽！

衷心祝愿健在的国内外南侨机工大哥哥们身体健安！多多保重！

2005年7月6日

祖国情思

白雪娇（冰子）

岁月的波涛在心中奔涌，往事知多少？有的像沙滩上的足迹，被浪潮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有的却沉淀积累，像随日俱增的冲击岩层，永远留了下来。

祖国情思
冰子
岁月如流水般匆匆而过，往事如沙般流逝，有的像沙滩上的足迹，被浪潮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有的却沉淀积累，像随日俱增的冲击岩层，永远留了下来。

祖国情思
冰子
岁月如流水般匆匆而过，往事如沙般流逝，有的像沙滩上的足迹，被浪潮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有的却沉淀积累，像随日俱增的冲击岩层，永远留了下来。

白雪娇《祖国情思》手稿

曾记得，在我还很幼小时，年老的祖父要离开我们回家乡，我不理解。问母亲为什么祖父要走，难道他不要我们了吗？母亲说祖父害了相思病，我还是不能理解，但家乡的概念却留在我心中。祖父临行时再三叮嘱：不管你们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都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乡土，不能忘记我们祖祖辈辈曾经生活的唐山……从那时起，我模模糊糊的感到我们的家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和家乡联系着。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我的父母要远离家乡，却又总不忘家乡。家乡就在唐山。据父母说，唐山很大，离开我们很远，隔着一个大海洋。他们又是经常谈论唐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唐山美丽的印象：一年四季气候变幻。春日融融，繁花烂漫；夏日万木繁盛，满眼碧绿；秋日风雨潇潇，红叶流丹；冬日白雪飘扬，红梅迎霜，多姿多彩，不就是仙人美景吗？不像我们所在的热带异域，长年都是椰风蕉雨，多么单调！更令人神往的是，唐山有丰饶物产，有孙悟空偷吃大嚼的大桃子，有宫中美人破颜的荔枝龙眼……

稍大，从书本里知道我们是炎黄子孙，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广阔的土地上，有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母亲——千年万载滚滚流的黄河，有滋养着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的长江、珠江……还有那民族性格象征的万里长城……多么令人骄傲

和自豪啊！

我懂了，唐山就是祖国。祖国的感情，民族的意识，多少年来，异国的社会并没有能够把它消化掉，是因为我们血缘的根深厚，过去时代留下的精神文化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凝结力，民族的思想意识世代相传，同千千万万子孙（不管他们走到地球的那一个角落）有着强固的联系。

我想念起祖国来了。为什么祖国有悠久的文明史，土地富饶美丽，而人民却不能幸福，是什么阻碍着祖国的进步？我不能明白。我只是经常站在大海边，神驰祖国，凭借海风的羽翼，遥寄我对祖国的遐思和憧憬！

抗日的烽火燃烧起来了。民族在受难中孕育着新生。延安红星在照耀、在召唤，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立即行动。我终于踏着父辈航行过的海程奔赴国难来了，我要与祖国患难与共。山河破碎，我的心也碎了。但我充满信心与希望，因为自古以来，多难兴邦！

但是，蒋介石集团的假抗日真反共，陕北路阻，报国无门，我满腔热血付之流水！八年离乱之后，我被逼又远洋重渡，回到父母身边。刚从日寇铁蹄下光复过来的土地，血迹未干，满目疮痍，一片萧条，家园已残，旧梦已邈。但是，人民从来是不会失望的，他们从坚持四年（日寇占领了三年八个月）艰苦战斗的山林中走了出来，准备重建家园。可是在战时或逃跑或投降的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却趁人民喘息未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了进来，缴了人民的武装，把人民重新推进水火之中，进行血腥的镇压。

我被指控为来自中国的“颠覆分子”，进行关禁，遣送出境，被当作牲口一样押上货轮。船向着祖国的方向驶来，我整天伏在船弦上，翘首北方，恨不得能凌风而去，立即投进新生的祖国。船驶进珠江，我感觉到祖国好像正伸着两只巨手向我迎来。遥望岸上五星红旗在蓝空中飘扬，我不由自主的心潮激荡，热泪盈眶。就是这面红旗，当它第一次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我在殖民地也把它升了起来，却遭到拘留审讯，追查背景。今天，在祖国的上空望见它，我怎能不笑？红旗，祖国新生的象征，我迎着您回来了，回来了，永远回来了！

十年动乱，有人问我：悔不悔当初要回来？我心情苦涩，难道回到自己的祖国应该后悔吗？回答是：挫折坎坷终不悔。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人问我：你走不走？为什么要走？难道不知道失去祖国或祖国不强，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能是犹……（下文遗失）。

（注：本文根据书写在500格稿纸上的手稿打印，手稿由白雪娇的女儿陈耿凡提供。）

第二部分

无怨无悔的英雄父辈

我的父亲杨保华经历不寻常

杨英顺

我的父亲是一位历尽无数磨难，受尽无数挫折却痴心不改，对祖国无限忠诚的赤子；是一位可亲、可敬、和蔼的老人。父亲虽年过九旬乃仍神采奕奕、思路清晰、谈笑风生、乐观向上。父亲丰富的阅历，健康的体魄，豁达的为人，让后辈们望尘莫及。父亲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



杨保华（2005）

我就从父亲的名字说起吧！我的父亲叫杨保华，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于1915年3月29日出生在马来亚吉打州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祖父靠小手工艺加工赚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父亲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也带来忧虑，就是因为贫穷啊！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给孩子取名字不外乎就是富啊贵啊，盼的是孩子长大后能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可祖父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的是由于祖国的贫穷才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很多华侨为了生存才会举家迁到国外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华侨在国外是被人瞧不起的，要使我们祖国富强起来，海外华侨才会被人瞧得起。为了让父亲长大后能够报效祖国，祖父坚定地为父亲取了“保华”二字，就是这个名字决定了父亲后来的人生旅程。

由于国家的贫穷，外国人对海外华侨总是瞧不起，而海外华侨总是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智慧，顽强地生活并执著地繁衍着。据父亲说，他们一家在国外由于兄弟姊妹多，家境并不好。生活的艰辛让过早懂事、孝顺的父亲，13岁就早早地告别了童年的生活，跨入社会挣钱养活自己，还时时帮助家里，为祖父分忧。

父亲当时年龄小，干不了什么重活，而且也没有什么文化，可他凭借着头脑灵活、勤奋好学，很快在当地的车站码头找到了一份“车童”的工作，也就是帮想乘车的旅客提行李，介绍给载客的司机而得到一点收入，有时旅客还会给一点小费。父亲生性好学，为了拉到更多的旅客，他学了多种语言，除当地的几种马来土语以外，还学会了英语、印度语、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等等。他遇到什么地方的旅客就跟人家说什么地方的话，让在国外的中国人犹如遇上故乡人，听到家乡的方言顿感亲切。加之父亲嘴又甜，见到年纪大点的就喊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年青的喊哥哥、姐姐，深受旅客的喜欢。司机们也很喜欢父亲，因为他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旅客。父亲的努力使他的工作要比同行们干得出色，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从小就有着过人的聪明才智。

在司机们热心的帮助下，父亲15岁就学会驾驶汽车。他将大部分的收入用来帮补家用。随着岁月的流逝，困难终将过去，当兄弟姐妹们相继长大，能为家庭出力时，父亲也长成了一位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的青年。他肤色白皙，身材高大，是姑娘们追求的目标。他心地善良，行为礼貌，是老人们所喜欢的人选。据说当时有很多姑娘的父母上门提亲，最后是一位拥有多家碾米房的老板，为了女儿的婚事，经过多方的努力最终得到了祖父母的同意，定下了这门亲事，双方还交换了订婚戒指。此时是1939年。

一天，父亲在街上看到很多华侨在传阅一份报纸，识字不多的父亲也买了一份。看到报上登载的图片及说明，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日本一个弹丸之国竟然入侵我中华大地，杀我父母兄弟，奸我姐妹妯娌，掠我中华财富，无恶不作。中华大地狼烟四起，四万万同胞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内一些爱国志士、进步团体纷纷站出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掀起了抗日战争的高潮。与此同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也在东南亚一带发起了举世瞩目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号召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拯救祖国于危难。并明确地提出，国内抗战急需一批懂机械能开车的技术工人回国参加抗战。父亲原来平静的心境此时再也无法平静了，愤怒占满了整个心胸，他接连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睡，国内同胞备受欺凌的惨状不时在眼前晃动。不行！

岂能容忍小日本在我中国猖狂，我一定要回国参战，消灭入侵祖国的日本强盗。决心已定，义无反顾。父亲毅然报名参加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父亲的这一壮举得到了祖父的支持。祖父说：“当初我就没有错看你，去吧！报效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职责，祖国有难匹夫有责，家里不用挂念，有我和你母亲呢，我们盼着你平安归来。”父亲听了祖父的话后，当时泪流满面。真可谓忠孝不能两全，要离开未及报答多年养育之恩的年迈父母，要与自己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兄弟姐妹分别，要与自己心爱的未婚妻分手，要告别这块生长的土地，父亲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可祖国母亲及四万万同胞还深陷于民族敌人的铁蹄之下，孰轻孰重，父亲选择了回国参加抗日。

父亲退掉了订婚戒指。临别时家人和未婚妻伤心的泪水，并没有阻挡住父亲迈向回国抗日道路的坚定脚步。战争是无情的，而且去之后是生是死，能否再次与家人团聚更是难以预测。父亲则是一腔热血为祖国而沸腾，认为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祖国母亲的安宁，死而无憾。

告别了亲人，父亲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四批于1939年8月到达昆明，在西南运输处培训了两个星期后，被编到西南运输处第十三大队第三十七中队担任运输组长。他们当时的任务是从芒市的遮放运送抗日军火及物资到保山。当时国家贫穷，路修得又急，所以路况极差。在运输过程中，白天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及扫射，夜里不能开灯只能摸黑走，就这样艰难地行进着，使一批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从而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1941年抗日情势紧急，抗日前线急需汽油。父亲由于驾驶技术娴熟，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被调往缅甸的仰光抢运汽油到腊戍。在一次运油途中，突然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为了保证车队的安全，父亲驾车冲出了车队，和敌机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由于他不顾个人安危，以机灵的头脑，精湛的驾驶技术一次次巧妙地躲过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从而保住了车队，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和嘉奖。这样的事迹在南侨机工的经历中，可谓是数不胜数。父亲他们一直干到1942年，因为惠通桥被炸断，才撤回下关，集中待命一个月后返回昆明。由于滇缅公路无法通车，抗战时组建的西南运输处也解散了，当时遣散费也不知道去找谁要，父亲和一起回国参加抗日的司机就这样失业了。

1942年底盟军909也就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开辟了“驼峰航线”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昆明招募50名司机，指名要南侨机工中的司机。父亲再次报名参加并被选中，很快被派往印度。从底布落港拉抗战物资到丁江机场，再由驼峰大队的飞机运往昆明。这样一来抗日物资又得到保证，这对日军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父亲和战友们在那里不分昼夜拼命地干，不怕流血流汗。他们想的是早一日抗战胜利就能早一日与家人团聚。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军从印度撤走，父亲他们几十个南侨机工又被扔在印度没人管。由于父亲他们是在军内干活，美军没有在印度给他们办理任何证件，在印度外国人没有居住证是不能居住的，怎么办呢？好在父亲平时为人好，善交朋友，他会讲简单的英语，结交了一名美军空军上校。父亲就去找他，在他的帮助下，父亲和几十名司机才搭乘美军的货物运输机，安全地返回昆明。

回到昆明以后父亲又一次面临失业。当时局势比较混乱，父亲他们根本无人过问。可是人总得活下去，何况父亲对祖国抱有很大的希望，相信抗战会胜利、祖国会解放，这点困难算什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他没有趴下，走上了另谋生计的道路。可想而知父亲当时信念的坚定和性格的倔强。他卖过小菜，收过废铁，别人瞧不起的活他都干，这是与他从小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分不开的。这时父亲认识了外公，父亲的品格深得外公的赏识，于是把三女儿许配给父亲。就这样父亲在昆明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虽然家里很穷，但能让他这个海外游子尽情地享受着家庭的温暖，接着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相继出世，给本来就幸福的家庭增添了无比的快乐。

1949年全国解放后，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年迈的祖父母。当年出来的时候答应过二老等抗战胜利后，一定回去孝敬二老的。父亲想带上全家老小回去发展，一来可以孝敬父母，二来全国刚解放，国家千疮百孔经济不发达工作也难找，为了生计还是回去的好。可当他去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目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个人出国不安全，一律不予办理出国手续。这样大多数和父亲一起回来的南侨机工就留在了国内。

1950年，由于大多数机工在昆明找不到工作，一些机工在父亲的召集下开了两次会，决定以40多名南侨机工的名义联名反映侨工司机现在的生活状况。接到侨工们的信后，陈嘉庚先生马上发电报给当时昆明侨务处王玉忠处长，要了解当时在昆侨工的生活状况并向他汇报，另外电文强调：昆明不管哪个单位招工，要由侨务处与单位协调，首先应考虑失业的南侨机工。为了这一消息还把母亲吓了一跳。那天父亲出去办事不在家，家里来了两个不熟悉的客人，说是政府的，后面一个还背着枪，说是找父亲。他们见父亲不在，留下了地址，让父亲回来后去找他们。母亲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只说好、好，她生怕父亲在外犯了什么事。父亲回来后，母亲把来人的情况告诉了父亲，并把地址交给他。父亲去后才知道是陈嘉庚先生收到了他们的信，立即发来了电报。王玉忠处长向父亲详细了解了在昆南侨机工的情况，并把情况如实向陈嘉庚先生汇报。他

要父亲转告在昆明的侨工，相信政府会妥善处理好侨工的安置问题。父亲把这一消息转告给每一个侨工，大家高兴万分。回到家后，父亲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母亲才转惊为喜。

1951年滇藏公路建设急需一批汽车司机，在昆明侨务处的推荐下，父亲又抛下妻儿老小，投入了滇藏公路的建设，一干就是两年。1953年底，由于昆明公路建设的需要，父亲被调往昆洛公路支援公路建设，一干又是几年。父亲真是跟公路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这一辈子都在做善事，铺桥修路造福人类，确实是个大好人。父亲长年在外工作，照顾老人哺育孩子的家庭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沉重的担子压得母亲连气都喘不过来。由于母亲过度的操劳，身体极度虚弱，在我出生后不久，一次母亲带学生去参加水库建设劳动，淋了大雨，患上了伤寒病。住院期间由于医生的失误，快要康复出院的母亲突然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真是祸不单行，外婆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急得摔断了腿，父亲又出了工伤事故，阴云笼罩着整个家庭。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但父亲并没有被眼前困难吓倒，他一人肩负起养家糊口、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外公外婆的帮助下，父亲在外拼命地工作，节假日从不休息，含辛茹苦地养育着我们兄妹七人，至今没有续弦。

从回国参加抗日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父亲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多次被评为先进、劳模。可他对自己成绩从来就没有满足过，也从不向领导提出什么要求。

1969年，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要疏散城市的人口。当时我们兄妹几个在外公外婆身边，不属于这个范围。但父亲为了不给领导添麻烦，二话没说就把我们接到了玉溪。父亲在外跑车，我们兄妹年龄又小，连饭都不会煮，好在有邻居的帮助，才能独立自主地生活。我们兄妹几个都还懂事，没有给忙碌的父亲惹出什么麻烦，让父亲省了很多心思。

“文化大革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大批的好人、能人被揪出来并打倒，受到迫害，就连父亲这样的大好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把父亲揪出来，给他加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把他在抗日战争中和盟军在一起工作说成是特务，因为父亲是华侨有海外关系就说他是里通外国，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处处加以迫害，就连子女在升学、参军、工作、入党时都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了牵连。但父亲他一直都无怨无悔，还在默默地工作，他坚信事实总会澄清，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凭着坚定的信念，父亲顽强的挺了过来。

一代伟人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这艘庞大的东方巨轮又朝着

强大、富裕、光明的方向前进。“文革”中大批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平反，父亲的问题也得到纠正。他一心想好好的大干一场，用自己有限的生命为复苏后的中国经济添砖加瓦。正当父亲干得特别起劲的时候，一天领导找父亲谈话，要父亲办理退休手续。父亲当时很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身体还好，可以为国家多干几年。领导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杨师傅你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已经很大了，何况你在工作岗位上多干了5年，我代表国家、人民、单位感谢你，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光荣退休，安享晚年。就这样父亲离开了他熟悉的工作岗位，离开他握了一辈子的方向盘。

退休后父亲一直闲不住，回忆起以往的岁月，心情总是不能平静。他老是想还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事，要给后人留下些什么！抱着这些想法，父亲又重返昆明，联系云南健在的南侨机工，经过多方的努力，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筹建了“云南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机工联谊会”。联谊会成立时，父亲被选为联谊会理事长，主持联谊会工作。从此父亲又变成了一个忙人，成天都到联谊会，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做，从接待外宾到南侨机工的困难以及其子女反映的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南侨机工病了他去探访，去世了他去处理后事慰问家属。在联谊会，父亲为侨工及其子女们做了不少好事，也为他们反映和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和困难。父亲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在多方的帮助下，为南侨机工在昆明的西山建起了纪念碑，向后人展示南侨机工在抗日战争中的伟绩。由于父亲出色的工作，多次受到省有关领导的接见和嘉奖。海外华侨、领导们还把父亲这批老人，称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像“大熊猫”一样应该加以保护。

父亲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回到生他、养育了他二十几年的故土马来西亚，那里还居住他无数的亲人。虽然祖父母早已去世，但他的兄弟姐妹还健在。不过，父亲最想看到的还是祖父母，想在二老的坟前上一炷香，向两位老人诉说几十年来对二老的无限思念，请他们原谅儿子为了报效祖国没能留在他们身边，还要向他们诉说儿子回国后几十年来酸甜苦辣的艰难的人生阅历。由于中国和马来西亚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父亲的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父亲认为一生中最对不住的有三人，前两个是我的祖父母，其次就是我的母亲，自从母亲嫁给父亲，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也是父亲一生当中最为遗憾的。

1993年春节过后，经过多方的努力，通过繁琐的审批手续，父亲的出国申请终于批下来了！父亲兴奋得几夜都不能入眠，很快就要踏上离开了几十年的故地，与离别了50多年的亲人团聚，那样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就像当

年没有任何一个亲人陪同，独自一人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一样，年近80岁的父亲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的陪同下，独自离开昆明前往马来西亚探亲。父亲回到马来西亚后，受到了亲人们的热情接待。父亲的归来，使整个家族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每天都有亲人请父亲到家里做客，听父亲讲述抗战的亲身经历，讲述祖国5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父亲在亲人们的陪同下，到祖父母墓前为二老扫墓，并在二老墓前各上了两炷香，叩了头，以了却长久以来未能实现的孝敬老人的心愿。父亲还在亲人的陪同下游览参观了马来西亚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可以想见，父亲在马来西亚短短的几十天里，和亲人们在一起过得无比的幸福和快乐。

父亲从国外探亲回来以后，整个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比原来精神多了。在父亲的主持下，经过南侨机工联谊会同仁们的共同努力，联谊会的工作成效显著，不但在国内，就连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有很高的知名度。1995年应马来西亚马中友好协会的邀请，父亲同部分南侨机工老人们出访马来西亚，再次踏上了生长的故地。父亲他们的这次出访，受到了马来西亚社会各界及华侨团体的隆重欢迎。他们对这些20世纪30年代回国参加抗日的老人们特别尊敬也很崇拜，在热情接待他们的同时，还特意为这些老人们安排几次讲座，听他们讲述抗战时期的感人事迹。老人们的讲演精彩感人，赢得了听众们热烈的掌声。当地的一些记者采访了老人们，当地的报纸连篇刊登了老人们来访的消息，还刊登老人们抗战时期的功绩。这些活动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祖国今天富强、伟大与这些老人们当年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让后人们知道祖国的今天是来之不易的，是多少革命先烈及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在主办方的盛情邀请下，老人们参观和游览了很多地方。在访问期间，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团体还给这些老人颁发和赠送了很多枚纪念抗战时期的纪念章。这次出访收获很大，联谊会的知名度再一次得到提升，各级政府对联谊会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鼓励老人们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事业再立新功。

1999年，父亲从联谊会理事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担任理事会的终身名誉理事长，可他并没有闲下来，只要联谊会有什么活动他都积极参与，从不缺席，虽然他不参与处理联谊会的日常事务，但对联谊会的发展和前途总是挂在心上。他坚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等多家电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还多次在电视里露面。有名作者要撰写一本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方面的书，特邀父亲重走滇缅公路。父亲没有推辞，克服自身的种种困难，一路颠簸，不辞辛劳，陪同作者走完了全程。回来后作者非常感激父亲，

表示他一定要把南侨机工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写出来，让世人知道，让后人记住南侨机工们的这段光辉历史。

2004年，父亲和部分南侨机工的代表，接受了厦门方面的邀请，参加了由厦门主办的“陈嘉庚先生13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不久，父亲又不辞辛劳赴畹町参加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像父亲这样执著的老人，他们什么也不图，无怨无悔地为国家为人民为后人，无私奉献着自己的余生。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在家里安享晚年，可他们不甘于此，要把自己一生贡献给祖国母亲。他们这种崇高的思想和执著的追求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昆明西山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建成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社会主义爱国教育基地。遗憾的是这批爱国志士、抗日先锋都是年近九旬的人了，今天还健在的已不多了。我经常和父亲在一起聊天，常听老人讲述他的过去。一天我很认真地对父亲说：“你老当年远离亲人，背井离乡，而毅然坚定地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报效祖国，国家既然承认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生活上、经济上就应该给你们相应的待遇。”父亲却很坦然地告诉我：“当时我一心想的是报效祖国，其他的什么也不想，想那么多怎么还能回来。现在国家富强了，祖国安宁了，国家对南侨机工在抗战时期自愿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壮举，在政治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在生活上关心南侨机工，为我们增加了工资。祖国的回报，我们也很知足了，我的老战友们健在的笑对人生，离去的也可含笑九泉了。”这是多么朴实的语言，又是多么高的思想境界。

我非常钦佩我的父亲，并深深地爱着他，愿他老人家以及如今还健在的南侨机工功臣们、“老国宝”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好享受如今的美好时光，为我们这些后人及子孙们多做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活教材。愿好人一生平安！父亲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由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乐观向上身心健康，这是他长寿的秘诀，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我谨代表父亲的所有子女及后人们向我们伟大的父亲致以崇高的敬意！谨代表后人们向南侨机工老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及深切的慰问，也祝他们身体健康，长命逾百岁，安享晚年。

（杨英顺 云南省玉溪市汽车运输公司调度）

南侨机工林福来和他的义子林晓昌

汤璐聪

1993年金秋，我曾见到一位历经沧桑而又很幸运的机工老人，他就是恒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晓昌的南侨机工爸爸——林福来。这是当年我在滇缅公路收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历史文物时，唯一没有让我伤心落泪，唯一没有让我感到伤痛的机工老人。

那年，为了抢救南侨机工的历史文物资料。我与厦门华侨博物院的陈启建先生沿着滇缅公路，追寻着父辈们的足迹，一路走向畹町。作为南侨机工的子女，我也有意借此机会拜访探望父亲的战友，见一见与我同年的南侨机工子女。

我和启建从昆明出发，路经楚雄、大理、保山、芒市，最后到达滇缅公路在国内的终点站——畹町。一路耳闻目睹南侨机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让人十分心寒。在与他们交谈时常常彼此泣不成声，涕泪交流。尤其是在保山，有位吴良顺老人的遗孀，因膝下无子女，七十多岁的孤独老人居住在偏远的工厂中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楼房角落。那种生活潦倒无依无靠的惨景，真让人心酸难受。机工子女林宝珠见到我们如见亲人一般地泪如泉涌，哭诉着父亲林春才的种种不幸与坎坷，最后好不容易盼到平反昭雪，还没来得及享受一天好日子，就去世了。听着机工子女们这些痛心的哭诉，看着机工们那一张张饱经风霜衰老无奈的脸，寻思着这些曾为中华民族做出牺牲，把青春和热血洒在滇缅路上的革命老前辈，我只能流泪听着、看着，无可奈何地悲伤着。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当我们到达滇缅公路在国内的终点站——畹町，走进林福来老人家里的时候，看着他年青时候的照片，听着他平静的讲述，从那慈祥的脸上，很难想到他曾经经历过烽火硝烟的战争，遭遇过人生悲欢离合的苦难和受过十年不白的牢狱之冤。尽管他已75岁的高龄，又身患重病、双腿浮肿，生活已不能自理，但从他衣着整洁、乐观健谈的神态，让我感到这是一位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老有所尊、安享晚年的幸福老人。

这位幸福的老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儿子林晓昌。准确地讲，是林晓昌敬养了一位回国抗日的南洋华侨老战士——南侨机工林福来。为了让老人家安心做他的父亲，按照老人家的意愿，他放弃了自己的黄姓，改随老人姓林，并让自己的儿子也都随林姓。这不仅仅是单纯姓氏的改变，其

中包含着林晓昌一家与林福来老人一段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位南侨机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怎样传承在林晓昌身上并发扬光大的。

1990年到1994年间，在南侨机工联谊会，我不断地从众多的议论中听到了林晓昌这个名字，那时大家都习惯地叫他阿昌。南侨机工林福来老两口跟前无子女照顾，生活贫困年纪又大。阿昌因常来畹町做生意而认识了这位老同乡。了解到这位老人的身世后，从尊敬到敬仰，便主动承担起侍奉老俩口的责任。当时还有叫蔡长梨、刘春泉的两位老机工，也经常到他们家吃住，阿昌待他们也同样敬重如父。据说阿昌是个缅甸华侨，原在缅甸做生意，后来才回到了中国畹町。

听着人们的议论和颂扬，我心下琢磨，这是位有钱的华侨在资助我们这些有困难的南侨机工。作为当时南侨机工联谊会副会长的我，不禁对这位旅缅华商充满了感激。但是，当我走进阿昌那栋陈旧的屋子，看到那简陋的陈设时，我的心被震动了，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不是有钱人对穷人的施舍或是资助，这是一位心地善良、品质高尚的人才有的行为。

那时的阿昌还不是一个有钱的缅商，而是处于一种贫而不困，靠着勤劳辛苦挣钱养家糊口的人。他们夫妻俩已赡养林福来老两口多年。他们不仅把林福来老两口侍奉到终老，而且在林老先生在世时，想方设法出钱出力，帮他找到原配夫人和他的亲生儿子及孙女，使他们骨肉团圆。原配夫人及他的儿子不幸故去后，阿昌又将老人的两个孙女从缅甸接到昆明华侨补校读书，使她们成为有文化、有知识，在生活上能自食其力的人。

在离开畹町前，当地政府官员及侨联主任刘永珍对我说：“这个阿昌对待这位林福来老人啊，我们没话说了，就连亲生儿子也难得像他那样。”后来与阿昌熟识了，问及他当年为什么要赡养林福来夫妇？他说：“自从认识这位老人后，常听他讲述当年回国抗战的事情，从没听他提起过受冤遭屈的事。我是为老机工林福来的事迹和他的精神所感动而这样做的，不只因为他的贫困，也是为了能很好地照顾这位老人，我才从缅甸迁居畹町。林老先生经历这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磨难，对国家对社会从没有一句怨言，他的这种胸襟让我感动，他的这种赤子报国的精神让我敬佩。善待这些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做出贡献的老人，我应该尽这份义务。虽然我在经济上、生活上照顾了他，但他传承给我的精神财富是永远用不完的。你如果想了解这位曾经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把青春和热血洒在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无论社会对他多么不公，遭遇多少的不幸，他为什么依然无怨无悔，你就从我老父亲的述说中去找答案吧！”

1918年，我出生在马来亚太平埠一个华侨小商家庭里，我家祖籍是福建省厦门市。我在太平读书至初小，因父母早逝，我和弟弟无钱继续读书，18岁那年，我便进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橡胶工厂当学徒工，并见习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地。我们海外华侨无不义愤填膺。广大侨胞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焚烧日货。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号召海外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整个南洋。1938年，国内已开展了全面抗战，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战线内移，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军援断绝。抗战前线急需军事物资，然而，军事运输又急需大批熟练的汽车司机始能担此抗战重任。

1939年，我已是一个21岁的热血青年，看到祖国遭难，心里很痛苦。我想自己虽然出生国外，但是个炎黄子孙，如果祖国亡了，对我们海外华侨将是个奇耻大辱，现在祖国面临危难，我应尽一个中国侨民的义务，报效祖国。心里想着我会开车又会修车，不是非常符合机工的条件吗？于是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在马来亚的太平埠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决心为保卫神州而战，为反对法西斯的侵略而战！

听说我要回国参战，亲戚朋友都舍不得我走。有的亲戚甚至提出，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我，条件是只要我留下。特别是与我相依为命年仅18岁的弟弟林亚水，更是哭着不让我离开他。可我回国抗战决心已定。我向他们表示，等回国赶走了强盗，定将荣归故里，回报亲人。亲人和朋友们见我主意已定，也不再强留，便为我打点行装。

我把弟弟托付给了亲人，便挥泪告别了亲戚朋友，登上了运载第五批机工回国的轮船，从新加坡出发了。我们这一批共有200多人。

启程那天，码头上人山人海，送行的华侨和亲人们排着长队，夹道欢送我们这些穿着刚发的崭新机工工装的参战青年，我们迈着大步，踏上了抗战征途。岸上的人们摇着旗帜，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到如此场面，我们个个紧握双拳，热血奔涌，似乎要即刻与日本鬼子交手拼刺一般。

我们的轮船在辽阔的南海上航行了3天3夜。第4天船到越南的海防靠了岸，经过交涉，我们乘火车到达昆明，便受到有关部门接待。记得当时在云南当主席的龙云，还以他个人的名义设宴招待了我们。随后，我们便被送到了昆明潘家湾训练班受训。训练生活十分紧张。每天上午在室外上两个小时的军事操练课和两小时的驾驶操纵课。下午则是卫生常识以及战时护理等课程。大约

只学了两个来月，由于战事紧迫，我们每人领了一套汽车修理工具就被分配到各个大队服务去了。当时我们被分去的大队建制是：1. 先锋队，驻缅甸的八莫、腊戍一带，开雪佛兰牌卡车；2. 西南运输处第十三大队，驻芒市、遮放一带，开道奇牌卡车；3. 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驻贵阳一带，开万国牌卡车；4. 西南运输处第十四大队，驻下关一带，开道奇牌卡车。

我被分配在第十四大队服务。那时我们开车的叫做司机，我们穿的是衣连裤工作服便装。生活十分艰苦，在队部时，虽一日三餐，但早点却吃稀饭。出车执行任务，更是饱一顿、饿一顿的，有时还得自带锅米，途中停车，埋锅做饭。穿的工作服也是质地极差的布缝制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机工归国后，南侨总会曾多次给我们机工团寄来大批物资，可是多数都让那些腐败的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发到手的東西，又少又破烂。

那时候，美国的军援物资主要是由缅甸进入，经滇缅公路运往各抗日战场。我服务的第十四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下关把第九大队运来的军火和汽油等抗战物资运往昆明。战事紧张时，我们也直接到芒市、遮放等地装运。

滇缅公路为战时抢修而成，路基很坏，常常塌方，雨季简直无法通行，有时被堵在途中几天几夜，饥寒难忍，度日如年。那湟漾坡、瓦窑坡更是上下两难。当时就连从芒市到龙陵这三十来公里路，卡车也要走两天。一到旱季，运输特别繁忙，整个滇缅公路上，车来车往，事故频繁，不少机工死于车祸，为抗战捐躯。记得有一次，我从保山抢运军火回下关，在永平至下关的路上，碰上一辆对头车，眼看两车即将相撞，如果引起军火爆炸，便会车毁人亡，我急忙向一边打方向盘，卡车失去控制，翻下山洼，连打几个滚翻，把我从驾驶室内甩了出去。幸未引起弹药爆炸，可我身上被倾翻的弹药箱重重地压住，幸得队友救护，我才免于一死，但我的脸、身和腿部多处负伤，小腿被剥去了一大块肉，至今还留下多处伤疤。新修公路难走不说，还常常在半路上遇到空袭，一旦发现飞机，只得将车开到路边或树下隐蔽起来，随时都有中弹身亡的危险。

我们机工当时还有一怕，那就是疟疾。很多机工到了芒市、遮放等疟疾高发区后，便被染上，一病不起，甚至死于病魔。我们第五批太平埠的机工领队，名叫蔡世隆，回国后在遮放染上了疟疾，高烧不止，几天后死在芒市，时年仅26岁。他出身于马来亚华侨资本家，是个有文化，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当我们闻知噩耗，一个个不禁伤心痛哭，为了表达崇敬之情，我们选派代表来芒市，将他的尸骨掘出火化，将骨灰护送回新加坡交给他的父母。我们的战友蔡世隆，他是为祖国的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

就这样，我们在滇缅公路上面对种种困难，为前线运送着一车又一车武器

弹药，支援着前方的抗战。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坚持运输多年。其间，我曾得到消息，知道弟弟继我之后也回国，受训后分配到贵阳的第十三大队服务。可是我们一直未能见面，后来我又调到华侨先锋队第九中队，驻守在滇缅的八莫、腊戍一带，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4月底，日军从缅甸长驱直入，我们在缅甸已难以立足，便向国内撤退，到处是一片惊恐。为了不让日军占领油库，军委下令将油库所有汽油烧毁。油库爆炸那天，只见满天火光，染红半边天空。日军的枪炮声渐渐逼近，大家奔跑逃命，汽车一辆一辆地向国内开。就在此时，原籍福建的许姓华侨一家五口，作为难民搭上了我的卡车。他们不愿当亡国奴，便与我们一同回国，谁知这一家的出现，竟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从缅甸的八莫经畹町的惠通桥，车子走了几天几夜，路上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逃难的群众成千上万。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坦克在后面尾追，我们只顾奔逃。1942年5月4日早上10点多，当我开车刚刚驶过惠通桥，中国守桥部队奉命点燃了炸桥的引线。“隆”一声巨响，吊桥从中间断裂，桥身坠入江中。守军炸桥主要是为阻止日军越过江桥向内地推进。当时在桥那边成百上千辆卡车再也无法前行，司机和数以万计的群众便纷纷逃命，有的跳下怒江，力图游到对岸，可江流湍急，一些人不幸被江水卷走。有的则在对岸百般呼号而无人答应，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候，有什么法子呢？

我开车继续前进，当天下午到保山东门外，保山刚遭到45架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只见城内四处冒着硝烟，墙倒屋塌，尸横遍街。有的血肉模糊，有的缺臂少腿，惨不忍睹。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我们不敢久留，在保山东门外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天未明便继续驱车上路了。到了楚雄，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许姓华侨一家对我非常感激，硬要拿钱报答我对他们一家的救命之恩，可我执意不收。此时，许父看我与他的大女儿许水治有点意思，便主动提出将女儿相许，老人有意，我们俩小有情，就这样我与许水治在楚雄结为患难夫妻。

那年我刚满24岁。婚后不久，我把许水治一家安顿在楚雄后，便开车至昆明，一到昆明，我们却被收了汽车，莫名其妙地被解雇了。一时间，我成了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失业者。我已经是有了妻室的人了，今后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不行，得找一个职业。正值此时，中美航空公司在昆明的代理人李维明要招收160名汽车驾驶员。为了生活，我报了名。不久，我坐上中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来到印度丁苏加的飞机场，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运输汽油、军用物品和大锡锭。在这个机场，我又度过了两个春秋。我时刻挂念着国内的亲人，每当月圆之夜，

便仰望天空皓月，思绪飞回国内，飞到亲人身旁。机场的待遇比较好，工资报酬不低。我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1944年底，我以探亲度假为名，坐飞机到了昆明，终于与楚雄的亲人见面了。回国后，得知滇西一线的抗日战事进展很快，抗日将士在当地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下，与日寇展开了血战，整个西线节节推进，日寇且战且退。这时，我又到国民政府设在保山的交通部第四运输处开车，继续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为抗日战争服务。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我弟弟林亚水要求重返出生地新加坡，很快他办理好了一切手续，领取了两百美金安家费，准备出国。我因在国内建立了家庭，不能与弟弟同行。分别时，我们弟兄俩哭成泪人。真想不到，7年前，弟弟为我送行，7年后，我又为弟弟饯别。亲人别离的悲痛使我说不出半句话来，我把一只手表戴在弟弟的手腕上，算是分别礼物。谁知那一别至今已40余载，却音讯杳然。

送走亚水后，许水治一家见日寇投降，缅甸已平静，便动了回缅甸之心。于是，我也就随着许家出国到缅甸，曾先后在九谷、瓦城一带居住。我帮一个车老板开车，常常跑腊戍、仰光等城市，以谋取微薄的薪酬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受雇于人，寄人篱下，那时一家人的境况并不太好。我时时想着回国谋生，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国内并不安宁，我只好打消回国的念头。

1953年祖国已经解放，这才坚定了我回国的决心。我怕回国后找不到职业，便决定一个人先回国看看，等找个职业，安顿下来，再把全家接回国。我告别了妻子以及我那刚刚两岁半的儿子，再一次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我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办理回国护照，从瑞丽县入境，又踏上了阔别7年的国土。可是我到畹町20天，便被逮捕了，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徒刑，投入劳改场。刑满后，我又被安置在湾甸劳改农场就业，一晃便十几个年头。这期间。我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79年，我与我的妻子回到畹町定居。1986年5月，在德宏州、畹町市侨联的帮助下，终于搞清了我的案子，经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审，宣告我无罪，撤消了原判。并落实了政策，享受职工退休待遇。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我的晚年，现在每月发给我30元生活补贴费，还支持我发展家庭养兔和经办代销店。我们夫妻的晚年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1985年，我光荣地当选为畹町市政协委员、畹町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同年，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40周年之际，德宏州侨办、侨联组织了原南洋华侨机工参观团赴首都参观游览，我也作为其中一员第一次来到首都。当我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遗容的时候，当我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

漫步的时候，当我在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帝国主义的铁蹄曾经蹂躏这片大好河山，多少祖国的好儿女为了她的今天而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海外赤子、华夏子孙为他所做的微小贡献，党和祖国人民并没有忘记我们，在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我们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的抗战事迹。想不到，我们的业绩已载入了史册，名垂千古。在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泪水时常蒙住了我的双眼。

（选自畹町胡菁整理的林福来口述资料）

林福来老人的眼里闪着泪花。那是一个一生颠沛流离的老归侨百感交激的热泪，是南侨机工这个爱国华侨群体之一员无愧于祖国无比自豪的热泪。

从老人的口述中，我找到了答案。

林福来——回国抗日的南洋华侨机工，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语言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如果祖国亡了，对我们海外华侨将是奇耻大辱，祖国面临灾难，报效祖国是一个中国侨民应尽的义务。”林晓昌的这位南侨机工父亲，无怨无悔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在尽中国侨民的义务。

在老父亲这种“尽义务”的精神激励下，林晓昌继承发扬了父亲的这种精神，多年来在不断地尽着“义务”。他的事业做多大，他的“义务”也就随着尽多大：1995年为庆祝畹町市建市10周年捐赠10万元，1997年2月为修建320国道畹江线路段捐赠13.5万元，1996年捐赠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希望小学人民币14万元，捐赠云南临沧地区云县帮洪恒昌希望小学人民币25万元，捐赠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坡头乡阿西冲小学20.5万元修建道路及饮水工程，捐赠祖籍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老年活动中心10万元，捐赠云南省侨联调研经费5万元……1995年至2003年间，他为家乡及社会无私奉献，捐资公益事业达200多万元。

除此之外，他还为改善侨联办公条件尽心尽力，不仅为畹町侨联配齐了办公设备，今年还将捐赠10万元给云南省侨联更换办公电脑设备。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他又捐资350万元在畹町森林公园建树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现在业已动工，预定在今年8月15日落成。

从1994年认识林晓昌以来，他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企业发展越来越快，社会知名度也随着他对社会所尽的“义务”越来越高。他的思想意识、文化知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敦厚与善良、睿智与高尚。

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是，1993年我从昆明到畹町踏进阿昌的家时，很不凑巧，未能见到这位听说了三年、熟知了三年的阿昌，倒是见到了他的妻子施碧霜女士。施碧霜女士长得美丽端庄，沉静寡言，当我第一眼见到林福来老人那

一身衣着打扮和安详自如的神态，我就确定这是一位贤淑能干的好媳妇。阿昌常年在外奔波忙碌，侍奉老人、照顾小孩的担子自然落在了妻子头上。一切家务全靠妻子一人操持，有空时还要帮助阿昌料理生意。所以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美丽的脸上略呈些许辛苦和劳累。

事隔12年，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我又走进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与他们捐资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比起来，我仍觉得简朴。施碧霜女士亦如十多年前那样朴实无华，只是多了几分成熟，增添了几分健康，比十多年前开朗了一些，活泼了一些。



林晓昌夫妇（中）与南侨机工第二代（2005.1）

为了让林福来老机工的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影响后人，他们为老人家修建了一座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陵墓——怀园。云南省德宏州政府侨务办公室和侨联为林福来立了碑、树了传。为了修筑这座“怀园”，他们从福建老家请来能工巧匠，每天都由施碧霜女士亲自为他们做丰盛可口的饭菜。我无意中发现，她从不给工人吃剩菜剩饭，每顿都是让工人们先吃，自己最后才吃，而且不在乎吃的是剩菜。

也许因为我自己是女人，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平民百姓，我只会以平常人的眼光去衡量一个人的行为与品德。或许还有些人认为这种小事不值一提，但施女士的这种“小事”真的让我好感动，她的胸怀，她的豁达，她的吃苦耐劳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的贤德。她却跟我说她什么都不懂，但她

的行为告诉了我，她懂得很多很多……现在人们都知道林晓昌赡养了一位南侨机工老人，为社会做了那么多贡献，但我更希望人们能够了解、能够认识，林晓昌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地为社会做那么多的公益事业，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位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与他相濡以沫的好妻子——施碧霜。

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人，我们天天都在讲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可怎样才能继承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呢？让我们就像他们夫妇一样从小事上做起吧！

父亲朱松胜的故事从十七岁开始

梁琨明

我的父亲朱松胜是第九批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时年仅17岁，终年61岁。父亲一生中，为祖国的抗日救亡、人民解放战争、剿匪以及新中国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历经沧桑，受尽磨难和委屈。但他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鉴。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将激励子孙后代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一、人小志气大

父亲1922年4月19日出生于马来亚一个从事理发业的家庭里，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县。祖父母在父亲幼年时相继病逝，父亲选择祖父生前好友卓源钦夫妇为监护人和法定父母，卓源钦夫妇将父亲视为己出。父亲从7岁起先后在当地育才和明德小学念书，11岁时萌发自立自强的想法，不愿依赖养父母生活。曾先后在光明书局、广南昌机械厂、南方电器行当学徒。15岁那年，跟随师父到了印度尼西亚巨港造船厂工作。1年多后回马来亚，并在温兄弟汽车修理厂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积极参加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领导和组织的“反对汉奸贩卖日本黄豆的斗争运动”。在散发传单时，父亲被英殖民当局警察逮捕，同时被捕的有20多名爱国华侨。在狱中一个多月后，经马华抗援会和怡保华侨筹赈会等爱国团体的援助，获救出狱。马华抗援会迅速转移他们到马来亚各地。父亲与另一名华侨张剑云被送到新加坡，并在小坡二马路一家机器店当杂工。一个多月后，父亲和张剑云一同请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马华抗援会同意并介绍他们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三批黄子松队（由当地侨领黄子松出资组织的），共30多人。经过短期汽车驾驶技术培训后，于1939年8月到新加坡集中，参加由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组织的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全团五百多人。于同年8月底从新加坡乘船到越南西贡上岸，再转乘火车回国到昆明，由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收。父



朱松胜

（梁琨明 提供）

亲被编在华侨第四大队十五中队（队长刘志刚）当学员。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和汽车理论学习以及驾驶技术训练后，于1939年12月结业，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华侨义勇汽车运输第十大队三十九中队（队长刘清河）当司机，队部设在昆明市东郊大板桥附近。

年仅17岁的父亲，为人正直、勤快，尊重年长的机工，深得华侨机工们的喜爱，他们都亲热地叫他“朱仔”。

二、奋战在“抗战物资输血管”上

1940年4月，父亲被编入华侨先锋运输第二大队五中队（队长白清泉）当司机，到滇缅公路的遮放接新车，接车后队部设在遮放。

1940年12月，父亲调往缅甸腊戌西南运输处腊戌分处抢运新车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当司机。1942年4月因日军占领缅甸而被迫撤回昆明，回国后这三年中，父亲和战友们常年驾驶着汽车奔忙在被喻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行驶的道路弯多陡峭，雨季时路滑难行，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遮放还是瘴疟病流行的区域，沿途人烟稀少，挨饥受渴是常事，还经常受到敌机的袭击。但是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闯过了重重的“险路关”、“两季关”、“瘴疟关”、“敌机空袭关”以及孤独和失去战友的悲痛，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每次出车，父亲总是积极要求担负最危险、最艰巨的运输任务，为此曾多次受到表彰。

三、同舟共济度难关

1942年4月，父亲和战友回到昆明。在西站整编待命几个月后，被调往贵阳中国汽车运输公司当司机，约有半年就被遣散失业。父亲在贵阳、重庆漂泊了几个月都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在同队司机柯德福开的车帮忙一段时间。1943年10月回到昆明并住在战友沈佩仙家，后经沈的朋友黄先生介绍到“美军驻华远征军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1944年8月通过熟人在昆明西站美军第一招待所应招当小车司机。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南侨机工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可是复员回侨居地的消息全无。当时父亲所在的美军第一招待所设立的抗战同盟军在华办事机构也要撤回美国，其负责人邀请父亲一起到美国去，父亲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心愿是回到马来亚看望久别的养父母和祭拜埋在异国土地的双亲，他要告诉他们：儿子长大成人了！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归来了！

父亲和所有活着的南侨机工期盼着能够复员南返的消息。为了生活，1945年11月父亲考进“战时运输局运输人员整训所第三期”学习，4个月后编在第



朱松胜的华侨登记证（梁琨明 提供）

四中队（中队长余胜松），地址在云南省晋宁县盘龙寺，结业后编入“公路总局第四运输处第四大队十六中队”当司机。全大队迁往保山运输抗战遗留物资，半年后撤回昆明黄土坡。在陈嘉庚先生和南侨机工代表的努力争取下，194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遣送南侨机工回南洋。在还没有第二批遣送消息的情况下，父亲听说缅甸仰光抗战遗留的汽车要运送回昆明，为了能挣些钱体面地回马来亚孝敬养父母，他和朋友许年到了仰光，可是车已送完，来回一个多月，等回到昆明时，第二、第三批华侨机工已出发，遣返工作已结束。此时，父亲又生了一场大病，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约有一个月才康复。此后经云南省侨务管理处介绍，才又回到四运输处工作。

1947年8月12日，父亲在大女儿——我降生的日子，本该在家照料母亲（母亲是广东汕头人，从小被卖给国民党军官当丫头，因忍受不了主人家的虐待而出逃打工并漂泊到了昆明，经同事介绍与父亲成了家，在昆明举目无亲）。可他眼下得急着找钱养家糊口，给母亲留下一小锅红烧豆腐猪肉和一些柴米后就匆匆去跑车了。说好一星期就能回家，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左顾右盼，连充饥的东西也没有，只好冒着风雨找熟人借些柴米。那时候父亲和许多华侨机工的处境都很困难，经常失业，颠沛流离，全靠好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才度过难关。只要有人挣到钱回昆明的，都能主动送一大袋米去看望跑车未归朋友的家属和孩子。当时挣钱很少，最大的能力就是送米。1948年2月全大队迁往贵阳，1949年又回昆明。同年7月父亲由贵阳出发到柳州，10月

到南宁运货，遇中航公司起义，与父亲同来的10多辆车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广西南宁解放。

四、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1949年12月，父亲在南宁解放后得到中国共产党管委会的接收并编入广西公路局当司机。此后又运送并跟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广西十万大山一带剿匪并取得胜利。当时，母亲带着幼小的我在昆明的工厂打工维持生活。1950年4月在得知父亲在南宁的消息后，母亲不顾朋友的劝阻，冒着路途遥远和土匪抢劫的危险，带着我搭上运货的汽车，颠簸10多天才到南宁。此时母亲已身无分文，父亲又出差在外，幸得军代表妥善安排暂时的生活。约过了半个月，父亲才回到南宁，一家终于团聚。此后，父亲奔波在修桥开路的工地上，母亲上夜校识字学文化并参加交通厅的家属委员会，还组织家属开展洗衣等有偿服务。父亲由于工作积极和技术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9年8月被选拔到南宁车辆管理所任主办技术干部，主管汽车驾驶员的考试与发证工作，负责勘察鉴定和处理汽车交通事故、核验鉴定汽车技术状况及行驶证以及交通安全宣传管理等工作。父亲清正廉洁，严格管理，积极工作，极少有节假日，深得上级领导的信任和赏识。曾参加了接待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广西的外事活动，也曾随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参加接管钦州、北海（由广东划归广西管辖的地区）等地的工作。

1953年父亲与马来亚的养父母取得了联系。他们来信热情地盼望父亲携家眷回马来亚，读完信，父亲热泪盈眶。养父母犹如亲生父母，他很想念。而且拜祭长眠在异国土地的双亲也是父亲多年的愿望。父亲与母亲正计划着如何去马来亚探亲时，国内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接着又是“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仅去马来亚的念头取消了，连写信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他从此与养父母失去了联系。

由于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史实宣传很少，父亲到了广西后几乎无人知情。但政治运动一来，为了表示自己历史的光明磊落，父亲总是主动介绍自己的历史，并把珍藏回国的照片、证件和奖状等物品交给单位组织。他热切地希望与共产党组织肝胆相照，以便能更好地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父亲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审查，共产党对他的信任，激起了他全身心的工作热情。他培养了一大批汽车驾驶员，探索出一整套交通安全管理的办法及规章制度，为广西的交通安全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家里全靠母亲，忙里忙外，子女

常患病，我的三妹因病致腿残疾，对这些，父亲只能表示歉意而无法顾及。

五、逆境中的赤子之心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犹如烈火在全中国燃起。无人能料到这是一场灾难，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上小学的小朋友都要经受一场非同寻常的“革命”。父亲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已经27个年头，参加新中国建设也有17年了，万万没有想到会遭此劫难。他被戴上“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中美合作所特务”、“牛鬼蛇神”等帽子，关进非法设立的监狱并遭到种种非人的待遇。但是父亲没有屈服。他设法写信托人寄送到在昆明工学院读大学的我，信中他再次表白他的历史是清白的，新中国让他当上技术干部，大女儿上了大学，家庭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从心里感谢毛主席、共产党，他不后悔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可是受一小撮坏人的迫害，随时都有被打死的可能。如果万一他遭不测，一是希望大女儿挑起生活的重担，把弟妹抚养成人；二不必为他申冤，他个人受点冤受点屈不要紧，只要国家好就行；三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接到父亲来信，我泪如泉涌，想起与父亲在空余时间抢着看小说的日子，《苦菜花》、《迎春花》、《731细菌部队》以及《红岩》等爱国主义和革命文艺小说，激励着我的成长。虽然父亲受迫害牵连到我，父亲单位的掌权人给学校寄“黑材料”并要求把我送监狱或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但学院常委会、工军宣传队根据我的表现以及调查核实材料，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在家庭生活极度困难时，学校破例发给我全额助学金并多次派专案组人员到南宁与我父亲单位交换调查材料，同时指出他们歪曲历史是错误的。由于昆明工学院有关人员主持正义，父亲单位某些人不敢太猖狂了。我和我的家人深感“世上还是好人多”，并看到了光明的希望。

1968年夏天，南宁遭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当时抢险救援工作缺少推土机手，有关人员想起“技术权威”的父亲。父亲虽然从未开过推土机，但他非常珍惜能为人民为国家出力的机会。他发挥自己长期积累的机械和汽车技术的功底，忍着伤病痛，在抗洪前线熟练地驾驶着推土机奋战了三天三夜，并培养了几个推土机手。父亲从抗洪前线回家后病倒了，经医院检查是陈旧性心肌梗塞。医生惊呆了，换了别人可能早不在人世了，可他还活着，奇迹！父亲平生极少吃药打针，也许是这个原因，医生的治疗见效极快。由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1969年10月父亲被安排在南宁公路局机械队工作。1970年落实政策，父亲得到了平反，但历史结论并不明确，还挂着。

六、难忘的岁月

父亲重新工作后，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为国为民服务的机会。在国家恢复技术职称制度后，父亲被评为技师，主管汽车和筑路机械的技术检验鉴定，编制机械保养维修计划，培养汽车、推土机、压路机、挖掘机等驾驶员。可能是由于“文革”中惨无人道的摧残，父亲身体远不如从前了。在家他是个备受关照的重病人，在外他像出征的小伙子，充满着活力和笑容，一心用在工作上。经他指导的工作人员，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迅速提高，在公路建设发展急需人才之时，他们很快就能独立胜任公路桥梁机械工程的任务。父亲常常对家里人说，不要在单位张扬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他需要工作！他更不让母亲到单位要车送他去医院看病。父亲看病的任务几乎都由母亲代劳。

1972年父亲在医院滴注“新研制代血浆”中毒，全身发紫，生命垂危。医院领导亲自全力抢救，并向病人及家属道歉。父亲清醒时总是说：“不能怪医生！不能怨医院！”医院领导及有关人员十分感动，并感叹说从未见过这么好的重病人，他心里只有别人而忘了自己。在医院和亲人的细心照料下，父亲脱离了危险，又一次战胜了死亡。父亲高尚的品格给医护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医院表示如父亲到医院就诊将给予优先照顾，可是父亲为了不让医院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内疚，从此再也没有踏过这间医院的大门。

1981年，根据国家对退休年龄的规定，父亲退休了，但单位的技术工作还是离不开他，每天到家请教的人络绎不绝，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指导。此外，父亲感到母亲与子女跟着他吃了很多苦，他总想为家里做点事弥补。他退休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裁缝，起初试着给小外孙做衣服，后来又给母亲和子女们做，我们的穿着都很得体，大家都称赞父亲手艺不寻常。亲家来访，不管是当“官”（二女婿的父母）还是当农民（大女婿的父母）的，父亲一样盛情接待。

1983年1月，父亲因心爱的大女婿英年早逝而悲痛万分，不久就病倒了，经住院检查为心脏衰竭和肾衰竭。单位领导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书后，赶到医院看望父亲并征询他的请求，他只谈了希望做好汽车及筑路机械的维修计划，确保安全生产。他感谢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关心，丝毫不提个人的请求。1983年2月8日的下午，父亲似乎沉浸在深深的回忆和极度的兴奋中，时不时又哼起《国际歌》。此时我们似乎不是在守护病人，而是在陪伴着出征的壮士。伴随着父亲哼唱的歌，我们也浮想联翩：一个6岁的孩子多么需要父母的关爱时他却失去了双亲；11岁的他就去当学徒自立自强；15岁参加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

动；17岁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出生入死奋战在艰险的滇缅公路上为抗日前线运送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社会主义建设默默奉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冤屈和折磨却不改对祖国的忠诚。他的一生历经沧桑，但赤子之心始终不变；他人生逆境的每一幕都是那样的悲壮；他和许多南侨机工一样是一位平凡的工人，却做出了光辉而伟大的壮举。那是催人泪下难忘的一生，是尝尽了酸辣苦甜的百味人生，是值得骄傲自豪而又无怨无悔的一生。父亲哼唱的《国际歌》深沉而有力，胜似鼓舞人心的千言万语，永远激励子孙后代要为真理而努力奋斗。

1983年2月9日凌晨3时，南侨机工朱松胜与世长辞了。单位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和告别仪式。但对他及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的伟大壮举未做定论，这也许是父亲唯一的遗憾。

七、告慰英灵

1988年6月，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林少川先生在广西社会科学院周副院长的陪同下寻访到我家。他代表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商会主席陈共存先生来看望我们。林少川先生讲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侨联表彰南侨机工的丰功伟绩，并为健在的南侨机工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云南省昆明市成立了南侨机工联谊会并且每年举行纪念活动，在昆明兴建“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以及著书出版等消息，还带我们到自治区侨务办公室向领导介绍和反映情况，请他们日后多加关照我们。1994年8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问世，林少川先生签名送与我一本留念。此后我又买了20多本，分发给父亲和我单位的领导，让更多人都来了解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1995年南宁市侨联主席张开辉和委员殷红几经周折寻访到我，殷红也是南侨机工子女，相见时百感交集，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此后，在市侨联带领下，寻访了在南宁的12户南侨机工及其家属子女，成立了南宁南侨机工联谊会筹备小组，每年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7月，82岁高龄的陈共存先生亲临南宁看望南侨机工及其家属子女，并一同到广西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活动。陈共存先生表示将尽其所能，与广大南侨机工及其子女共同努力，通过拍电视、电影和著书立传等方式，宣传和弘扬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光辉史实，以了却陈嘉庚先生的遗愿。我们每年清明节扫墓时，都将这一件件激动人心的事告慰父亲的英灵。

“南侨机工”，这一伟大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海内外华夏子孙的心中。

忆父亲汤耀荣忠孝难两全的人生经历

汤晓梅

关于我的父亲，我实在知之甚少。因为在我还未满周岁的时候，敬爱的父亲就英年早逝了。

从童年起，我就随着母亲的工作调动辗转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远离父亲的亲朋好友，在偏远的大西北一待就近30年。那时的教科书、历史书、刊物杂志，很难见到“南侨机工”的字样。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从未读到过这方面的文章或资料。将近有30年的时间，我只知道我的父亲是马来亚华侨，但不知道父亲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成员，而我是南侨机工子女。

早年，母亲将父亲的有关证件照片视为珍宝收藏着。在12岁之前，我连父亲的相片都未曾见到过。“文革”动乱中，为免遭劫难，母亲把这些珍物藏在她认为最保险的地方——一间废弃的存放旧物的小木屋。有一天，父亲的一张相片不知因何掉落出来，被我拾到。当我将照片拿在手中观看的那一瞬间，有种异样的感觉从我心头掠过，恍然中我认定照片中的人，就是我敬爱的父亲。果然，从母亲的口中，证实了我的这种感觉，同时知道了爸爸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侨。

1989年，我从大西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出生地昆明，邂逅了从小给过我父爱的叔叔杨保华。从那时起，从他老人家的口中，我才渐渐开始了解“南侨机工”，认识南侨机工。同时我还看到了一本有关南侨机工的文史资料《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史》，通过这些才真正的知道了我敬爱的父亲——汤耀荣，是3200多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中的一分子。这年我已37岁了。

我的母亲极其痛恨日本鬼子。无论何时，只要提起日本或看到日本二字，她就会冷冷恨恨地说我最恨小日本。因为日本鬼子入侵香港，让她这位有钱人家的小姐沦为难民逃往昆明避难。尽管日本鬼子被打败60年了，她老人家还从不用日货。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为着父亲。父亲生前常在母亲面前自责自己不孝，几次南返都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最让母亲不能释怀的是父亲在临终前，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再见到亲爱的祖母。他清醒的时候，总是对着母亲说对不起阿嬷（广东南海话——奶奶）。昏迷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叫着“阿嬷、阿嬷。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此情此景，年青的母亲心如刀绞，关山万里，亲人如何相见？因此，她总是对我们说：“要不是日本鬼子，你父亲怎么会成了

不孝子孙？”几十年来，母亲时常对我们姐妹重复着这句话。因为在母亲的观念中，不孝是最大的罪过。可我相信，父亲那时真是忠孝不能两全。

听母亲讲，父亲是一个性格沉稳、不善言语、默默做事的人。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动手做事，爱琢磨，尤其对机械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他跟母亲说过，三天可以学会开汽车，三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技术全面的汽车修理工。父亲的开车技术和修理技术的精湛与熟练，从他的老朋友口中，从云南省交通厅第一届《劳动模范手册》中，可见一斑。

父亲英年早逝真是件憾事。当时有一车救灾物资急需送往受灾地区，但驾驶员都出车了，没有司机。父亲那时已生病在家休养，他听了，不顾身体有病，坚持开车运送。到目的地后，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送回昆明为时已晚，加之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终于无法救治。时年38岁。

母亲常常叹息如果父亲好生在家休养，不要带病去开那辆运载救灾物资的车，敬爱的父亲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可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如果而只有结果。父亲为什么要那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华侨在海外的经历，使他们最懂得爱国，最懂得报国。他们的爱国情结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敬爱的父亲虽然生命短暂，但短暂的生命火花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荣宗耀祖、光耀中华。



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发给汤耀荣的技术证书（汤璐聪 提供）

有关父亲回国抗战的这段悲壮历史，我也只能全部引述刘保全老师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对刘老师的这篇文章，我不敢妄加一个字，也无权抹去一句话。因为刘老师是最早了解和采访南侨机工，而且也是较早发表这方面文章的人之一。我曾询问过他有关父亲的资料来源，刘老师说他从1985年起就开始采访居

住在昆明的南侨机工。那时在昆明的机工还有近百人，其中在采访一位叫许年的老机工时，得到了父亲的资料。在此，我深深地感谢许年叔叔，同时也深深地感谢刘保全老师。

刘保全老师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赤胆忠心无私奉献——记昆明南侨机工汤耀荣

战后留居在昆明的南侨机工汤耀荣，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十年代就英年早逝，可是认识他的人们仍在怀念他！

悄悄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日救亡的热潮席卷南洋。为拯救民族危难，汤耀荣恨不得马上奔赴抗日前线，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国境。可是，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庚好友回国参战，自己却没能报名。这到底为什么呢？原来他不忍心辞别无依无靠的年迈祖母。

汤耀荣原籍广东南海，3岁之时由母亲带往南洋，寻找在槟城谋生的父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病灾袭来，父母不幸相继病逝，小小年纪的他成为孤儿，幸得靠老祖母抚养成长。家庭的不幸变故，生活的艰辛磨炼，使小汤比同龄孩子过早地懂事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汤为了减轻祖母的负担，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由于他刻苦耐劳，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一手熟练的机修技术，十几岁就以熟练的修车技术远近闻名，20刚出头就当上了师傅招收学徒。他一向尊敬祖母，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之时，孝顺之心与日俱增，在南洋青年报名参加回国服务团时，他多么愿意把自己的开车与修车技术报效于祖国。但是，一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祖母需自己来伺候，他就不忍心断然离开这相依为命的老人家。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到第九批时，听说这是最后一批了，再踌躇就报国无门了。怎么办呢？他悄悄地走了三步“暗棋”：（1）悄悄地到筹赈会补办报名手续，并特别交代不能公开登报宣扬，以免让亲友们知道。（2）悄悄地向几位好友与徒弟谈了心里话，请他们今后多关照老祖母，预计两年之后就胜利归来。（3）悄悄地写下一封敬请老祖母原谅的信，准备在启程前才留给老人家。启程那天，他天未亮就悄悄地出了家门，忽然心酸起来，转身跪在大门口，长叹地说：“奶奶，忠孝不能两全，原谅我吧！”说完，悲郁地踏上了征途。

熟练修车

回到祖国大西南，汤耀荣被分配当机修技术员。由于他有高超的技术，颇

受机工战友们的欢迎。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回来个王文松，槟城回来个汤耀荣。在遮放，汤耀荣与伙伴们投入紧张的抢修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上级的表扬。对于汤耀荣的修车技术和为人，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仍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现居在昆明的南侨老机工许年回忆说：“1939年秋，我与汤耀荣同在西南运输处第10大队，后来编为华侨先锋大队，我任第二中队的班长，负责督促全班车子的检修。有时修理工解决不了，就去找汤技术员。经他检查、指点之后，原以为难以排除的故障，很快就能解决。当时，找他的人很多，从10大队到华侨先锋队，可说无人不识汤耀荣。因为找到他，再难的机修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巧妙撤退

1942年，日军经泰国拦腰插入缅甸，局势紧张，汤耀荣与许年、朱松胜奉命一起开车撤退。为了避免新车及汽油、弹药落入敌寇之手，他们还肩负了破坏汽油库等特殊战斗。他们先猛力挥动长柄大斧头砍破汽油桶，让汽油流出来之后，再开车撤退到一段距离，然后回头开枪射击，结果一打就燃烧起来。当他们巧妙地完成了这一特殊的任务之后，随即沿着滇缅公路撤至惠通桥。此时桥的两边已布满炸药包，守桥工兵已将炸药引线安装完毕，情况十分危急。汤耀荣果断地与战友火速通过惠通桥。闯过不久，惠通桥就引爆炸断了。后来，机工队伍被解散了，汤耀荣才与战友们分了手。

无私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汤耀荣调到云南汽车运输公司当驾驶员。他善于总结保养引擎的经验，总结了十条，在公司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应。据他女儿汤晓梅珍藏的1953年云南省生产竞赛劳模大会的《劳动模范手册》有一文：“公司一级劳模汤耀荣——创引擎行驶里程新记录”，专门讲述他创造木炭车^①行驶里程的新记录，超过中央指标175.66%的先进事迹。

汤耀荣保持与发扬了南侨机工的光荣传统和干劲，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他常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我要用实际行动争取入党。”他说到做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于他拼

^① 在滇缅公路中断后，由于没有汽油，先是用酒精代替，而后酒精也没有了，南侨机工们就发明了用汽油桶做成木炭炉，加一个风箱，再做一个清灰包，用少量的煤油点燃木炭做动力以代替汽油。这种木炭车由两人操作，一人开车，一人专门烧木炭。

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被送入医院，终因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仅40来岁。上手术台前，他说：“我回国抗日，青春无悔，遗憾的是未能最后再见祖母一面！”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重温那段历史，再读刘保全老师的这篇文章，我对“自古忠孝难两全”这句古语有了一种全新的诠释。10年前，世界人民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和东南亚人民抗战胜利50周年时，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宁做和平犬，不做战争人。”简短的几个字，多么深刻地刻画出战争的残酷性、毁灭性。

战争的挑衅者是一群灭失了人性的“人”，而被践踏的一方是被剥夺了尊严的人。一群没有了人性的“人”，在奴役着一群被迫失去了尊严的人。人类的文明、尊严、人性都统统地在战争中毁灭了。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大的悲剧。所以，当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在中华民族土地上，大肆烧杀抢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为草芥的时候，当四万万中国人将沦为亡国奴的时候，忠之不存，孝有何为？国破山河碎，无国哪有家，无家哪能尽孝。所以我认为我敬爱的父亲以及与我父亲同行的那三千两百多位南侨机工，他们既是尽忠，也是尽孝。他们共赴国难是大忠，是为保国家，打豺狼。他们懂得只有保住国，才能保住家。有了家，才有孝的权利，才有孝的机会。他们为了人类的和平去消灭那一群失去人性的、沦为豺狼的“人”，所以，他们是大忠大孝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大忠大孝的儿女。

滇缅公路中断时，父亲很幸运地到了母亲的家里开车。其中还有张发奎和张青两位机工与他在一起，得以免遭其他南侨机工因滇缅公路的中断而受的流落之苦。母亲的娘家是国共合作的大家族。我的外婆是信仰马列的共产党人，为政治避难到新加坡教书。四位舅公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家资比较殷实。抗战时期举家从香港迁来昆明，在昆明的拓东路开有几间铺面，还有3辆木炭车。

我的母亲虽身为富家小姐，但却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女性。她敬佩父亲尽忠报国的义举，不顾自己的小姐身份，毅然与父亲结为夫妻。但父亲走得那么匆忙，留给母亲的只是四个不懂事的孩子，还有就是那几份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的派司、护照和《劳动模范手册》。母亲是一位好强不甘落伍的人，在父亲的影响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只有在起夜的时候才能见到母亲的身影，清晨醒来时母亲早已工作去了。所以，每年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的合影中，都有母亲美丽的靓影。

母亲为了抚养我们，费尽心力，但工作中难免东奔西颠，有时不得不抛下我们姐妹。不过父亲留下的遗物，她总是紧紧地带在身边。这几样小小的什物，

跟着母亲从南到北东奔西走都没有丢落。特别是在那政治运动不断、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这些证件会给一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难得她一位弱小的女子，几经风雨、历尽磨难，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保存了下来。

这些幸存下来的资料现在已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了。为研究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这段历史提供了历史佐证。尽管我们全家实在舍不得父亲留下的这份“遗产”，这毕竟是父亲和母亲半个多世纪以来用心、用血保存下来的啊！但深明大义的母亲在得知厦门华侨博物院正在收集南侨机工的历史文物与资料时，毅然将这些珍贵的文物捐了出来，她还告诉我们姐妹：这份资料跟着我奔波了半个多世纪，要想让这份遗产永远安全地保存着，博物院就是最好的归属。

母亲不愧是忠孝两全的父亲的好妻子。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有 52 个年头了，但父亲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子孙后代的人生道路。

父亲罗开湖 88 年的精彩人生

罗芳玉

每当提到父亲，朋友及同事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老人家的身体特别健康，他以 83 岁高龄登上丽江玉龙雪山顶，实在令人赞叹，也令许多年轻人汗颜。但我心中最佩服的却是他健康的思想、心态和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父亲 1918 年 6 月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叫鲤鱼塘的偏僻小村庄，几亩薄田和祖父在南洋的血汗钱支撑着一个 6 口之家勉强度日。幼时的父亲聪明好学，酷爱读书。在祖父的关爱下，他得以上学并高小毕业，在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了。贫寒的家境没能让他继续学业，只好回家务农，用自己稚嫩的双肩替祖父分担着生活的重担。1934 年，积劳成疾的祖父病逝，一筹莫展的祖母无奈中只好把家中的几亩水田典给了别人，祖父才得以入土为安。年仅 16 岁的父亲，为了家庭生计和偿还债务，含泪辞别了祖母，踏上了到南洋谋生的旅途。

初到马来亚，父亲在他的一个堂叔的小店里当学工，端咖啡、抬糖包、扫地抹桌就是他的工作。他不嫌脏、不怕累，终日忙忙碌碌、早起晚睡。下班后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堂叔见他肯干肯学，十分喜欢，便让他收费。父亲不负堂叔的信任，帮着他精心经营着这个小店，生意做得像模像样。两年后，父亲终于用辛苦得来的薪金，让祖母还了债，赎回水田，缓解了家中的困难。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华北、上海、广州等地，日寇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消息传到南洋，在华侨中引起极大震动。中国铁路、公路干线多为日军占领，大批国际援华物资无法运进国内，刚开辟的滇缅公路运输线上急需大批熟练机工，陈嘉庚先生接受委托，由南侨总会登报招募，大批爱国华侨青年争相报名回国参加抗日。年方 21 岁的父亲热血沸腾，毅然舍弃安定的工作，不低的底薪，辞别了一再挽留他的堂叔和亲友，于 1939 年 7 月 27 日，与编为第八批南侨机工服务团的三百多爱国青年一起，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经越南抵达昆明，在潘家湾接受短期训练后编入华侨先锋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班长，奉命担负从缅甸腊戍到中国畹町地段的运输任务。

滇缅公路山高坡陡，道路崎岖，驾驶时稍有不慎，便会车毁人亡。父亲和他的机工战友们，望着堆积如山的国际援华抗日物资，听着前线催要各种抗战物资和药品的消息，心急如焚。他们不顾气候炎热，道路颠簸，每日驾车奔忙

在群山峻岭间，饿了吃干粮，渴了喝涧水，常常是伴着明月开车，顶着晨星早出车。实在困了，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室睡一觉是常有的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更加剧了局势的严峻和运输任务的紧迫。父亲所在大队奉命移驻龙陵，继续抢运物资到昆明。1942年5月，畹町沦陷，日军快速向遮放、芒市、龙陵推进。当时父亲正驾车在滇缅公路上。一路上撤退的军队，抢运物资的货车，向后方撤退的华侨和商人挤成一片，局势混乱、道路阻塞。父亲无意中听说为阻止日军渡过怒江，阻断日军向滇东推进，中国守桥部队还做了炸毁惠通桥的准备。父亲心想，我是回来抗日的，绝不能落在日军手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车货拉回昆明去。抱着这个决心，他一路走走停停，堵车时都不敢下车休息。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推进，终于顺利地过了惠通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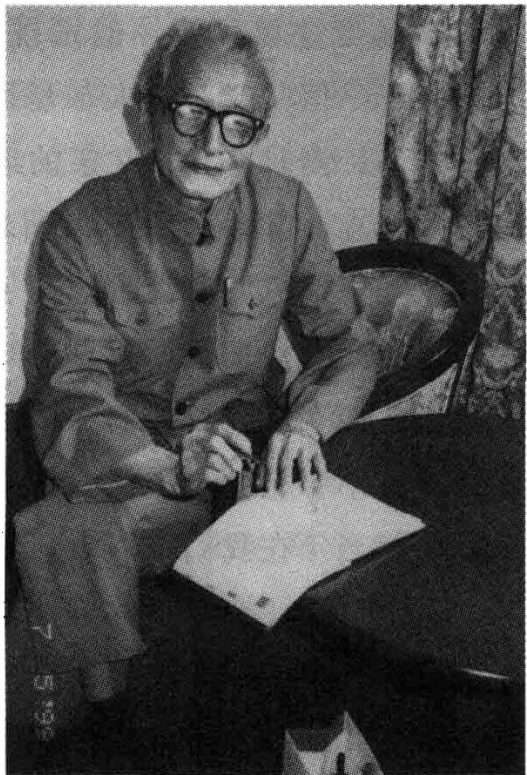
家对南洋机工“海外赤子”的认同，还了他一世的清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父亲终于熬过严冬，看到春回祖国大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享受着安宁。

父亲一辈子生活俭朴，从不浪费钱物。衣服破了，总让母亲替他补补又穿。这些年来，大家常给他买些好衣服并要把他的旧衣服丢掉，他总是说：衣服或新或旧，不过是保暖罢了，现在虽说日子好过了，但还有许多山区和农村里的人连旧衣服都穿不上，比比他们，我算是穿得好了。一次，我悄悄地把他的一些旧衣服当垃圾丢了，他发现后生了几天的闷气，直骂我太糟蹋东西，是个“败家子”。但父亲对别人却是慷慨的。文革中，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吃顿饱饭不容易。当时有几位父亲的老乡在昆明郊区工作，休息日进城总喜欢到我们家喝水休息。父亲总是拿出留着的米和油，再让妈到自由市场买上几个鸡蛋，留几位吃了饭再回去。时间长了，妈常叹息说：要不是几个孩子当知青的地方好，分得的粮食多些，我真不知拿什么替你招待他们啊！父亲总是劝妈说：好歹我们还能有点米。他们在郊区工厂上班，干力气活，那点供应怎么够吃？星期天进城不容易，总不忍心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去嘛！直到现在那些伯伯叔叔们总爱说起当年在我们家混饭吃的事，总说爸妈是好人。

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营业员，他对工作总是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多次受到单位的表彰。他所在的小五金柜，货物品种多，规格更多，但他从不嫌麻烦，管理得井井有条，从未错乱过。这些货都很重，一箱总有几十公斤，他每天搬出搬进，摆货上柜，累得满头大汗，但从不叫苦。晚上值班，一些女孩子有约会或有的女同志要带小孩，总是求父亲替她们顶班，他从不拒绝，有时一周竟然值了三天的夜班。他总是说，女同志有孩子，够辛苦的，我老了，又没什么家务，闲着也就闲着，能帮别人就帮帮吧！但父亲最容不得别人对工作马马虎虎，为此常常得罪人。记得有一次他们柜的一个女学工上班迟到，卖货时又记错了账，下午她告诉父亲说想提前下班，父亲问她是不是有急事，她笑笑说想和男朋友去看电影。父亲听后放下脸来，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弄得那女孩子下不了台，跑到我们家向母亲哭诉。父亲下班回家，母亲劝他说，你一不是领导，二不是党员，管什么闲事，把一个娃娃骂得哭哭啼啼，真是一个“假积极”！父亲一听正色道：领导把她交给我带，我就要对单位负责，教会她做事；她叫我一声师傅，我就要对她负责，教会她做人。这是我的责任，你怎么倒说我是多管闲事假积极呢！一席话倒让一向伶牙俐齿的母亲哑口无言。父亲一辈子喜欢读报，喜欢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大事。文革中的一天晚上，我和父亲谈到国家现状，父女二人都对时局十分困惑。父亲对我说：共产党是最反对封建专制的，但为什么毛主席这么伟大的领袖，却愿意接受大家高呼万岁、万万岁，

听任一些人把他的话称作“最高指示”而不能多说一个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我一听慌忙制止他说：爸你不要命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你何必这么认真呢？爸后来不再和我议论时事，直到党中央1981年6月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了科学、客观、公平的评价。父亲仔细地读了这篇决议后对我说：共产党就是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文中对毛主席晚年错误的评论，真叫人口服心服。

现在，父亲对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热爱越来越溢于言表。每天他都要到云南日报社的贴报栏前看两个小时以上的报纸，风雨无阻，成为习惯。家中所订的各种报纸，也要一一认真阅读，在家中说起国家大事和各地新闻，如数家珍，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博学广知。记得一次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采访他时，问他当年没有回南洋去，留在国内又吃了不少苦，对此后不后悔？父亲说，当年回来，就不是为享福才回来，在抗战中，我尽力了。解放后虽然受到一些打击，但总的说生活是安定的，孩子们都上了学，有了工作，一家人还是幸福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孩子们都调到昆明工作，有的还入了党，当了领导干部，在单位个个都是工作骨



罗开湖（1999）

干，给我很大的安慰。我的几个孙女都已经大学毕业，都有一份好的工作，还买了房子买了车，全家人团团圆圆、衣食无忧，过得快快乐乐。我在国内的生活，比那些回去南洋的人并不差多少，我为什么要后悔呢？当年我们回来抗日，用青春和热血报效祖国；后来我留在国内，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祖国。两次人生的重大选择，我真的无怨无悔！父亲言之切、情之真，令人动容。

今年，我父亲已88岁高龄。他的最爱，仍是读书读报。每次回家，总见他坐在沙发上捧着《参考消息》之类认真读着看着。父亲用他平凡的一生，实践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他的身体力行，让后辈读懂了什么是拳拳赤子之心。

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父亲，儿孙们祝愿您健康、快乐、寿比南山！

我的南侨机工爸爸陈寿全来自印尼苏岛

陈先雨

我父亲陈寿全是爱国归侨，1918年3月5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一个华侨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归国抗日，1943年到三江电化冶炼厂工作，毕生报效祖国，于1989年12月10日逝世。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我国，中华民族奋起抵抗。海外侨胞饱含爱国之情，掀起抗日高潮，特别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倡导和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海外的影响最大。他们广泛开展募捐救济、号召有志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等抗日救亡活动，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和南侨总会的组织下，年方21岁的父亲热血沸腾，满怀报国之志，准备回国参加抗战。然而爷爷、奶奶坚决不答应，因为我父亲虽然有兄弟姐妹9个，但7个哥哥姐姐都各自成家立业，只有我父亲同最小的叔叔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父亲当时在商店上班，家庭生活还算不错，爷爷奶奶舍不得他离开家，去那炮火连天的中国。父亲在说服不了爷爷奶奶的情况下，毅然背着家里人，悄悄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决心回国抗日。

当时，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日，可以报销归国路费。但是父亲想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更需要经费，于是悄悄地卖掉了家里的小汽车，自己花钱买票，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出发那天，我父亲怕爷爷奶奶伤心，没有告别，悄悄地离开家，一个人去了码头。当船慢慢启航时，父亲才后悔没向爷爷奶奶告辞，想到此去出生入死，不知还能不能回家与亲人相见，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对不起爷爷奶奶的负疚之情。父亲双眼凝视着离船越来越远的海岸，泪珠一滴滴从脸上滚下，正在这时，父亲看见他12岁的小弟弟正向轮船跑来！兄弟俩拼命互相挥手呼唤，但他们谁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只听到隆隆的马达在轰鸣。父亲遥望着跪在码头上的小弟弟，哽咽着说不出话，只在心里默默地向爷爷奶奶告别：“父亲、母亲，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原谅儿子的不孝吧！”轮船迅速前进，父亲回到激奋万分的同伴之中，同大家一起激昂地挥臂击拍高唱起来：

向前走，

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抢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

我们绝不能接受！

祖国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丢！

父亲直到晚年，还不时挥动右臂哼唱这首慷慨激昂的抗日歌曲，我们兄弟姐妹深受其爱国之情的感染和熏陶。

当时，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本鬼子滥施淫威，用武力阻断交通，妄图卡断抗日军队的军需资源。一时间，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得我国的对外交通濒临瘫痪，当时新建的滇缅公路成了抗战最重要的军运大动脉。千里滇缅公路，是短时间抢修而成的毛路，在滇缅公路上搞军运，人人要闯山高河多路险关、雨天泥泞塌方关、路窄车多摩擦关、瘴疠疟疾夺命关、抛锚无援饥寒关、日寇轰炸任务未完身先死关。当时“机工团”的战友说，过这道道关，比过鬼门关还难呢！

我父亲回国后，就同其他“机工团”成员一起，将生死置之度外，运军火于这条随时都有车毁人亡可能的滇缅公路上。十多年后，父亲还常给我们讲起他在“机工团”服务期间遇险受苦的一些故事。

一天晚上，父亲的汽车在一片树林旁抛了锚，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嗡嗡作响，根本无法修车。父亲只好紧闭车门，在又闷又热的驾驶室里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开始修车，但仍然被蚊子叮得周身起红点。父亲忍饥挨饿一天多，开车到达昆明时，浑身时冷时热发起疟疾来。幸好他是在昆明病倒，医疗条件相对好一些，如果是在路途上病倒，恐怕就没命了。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于疟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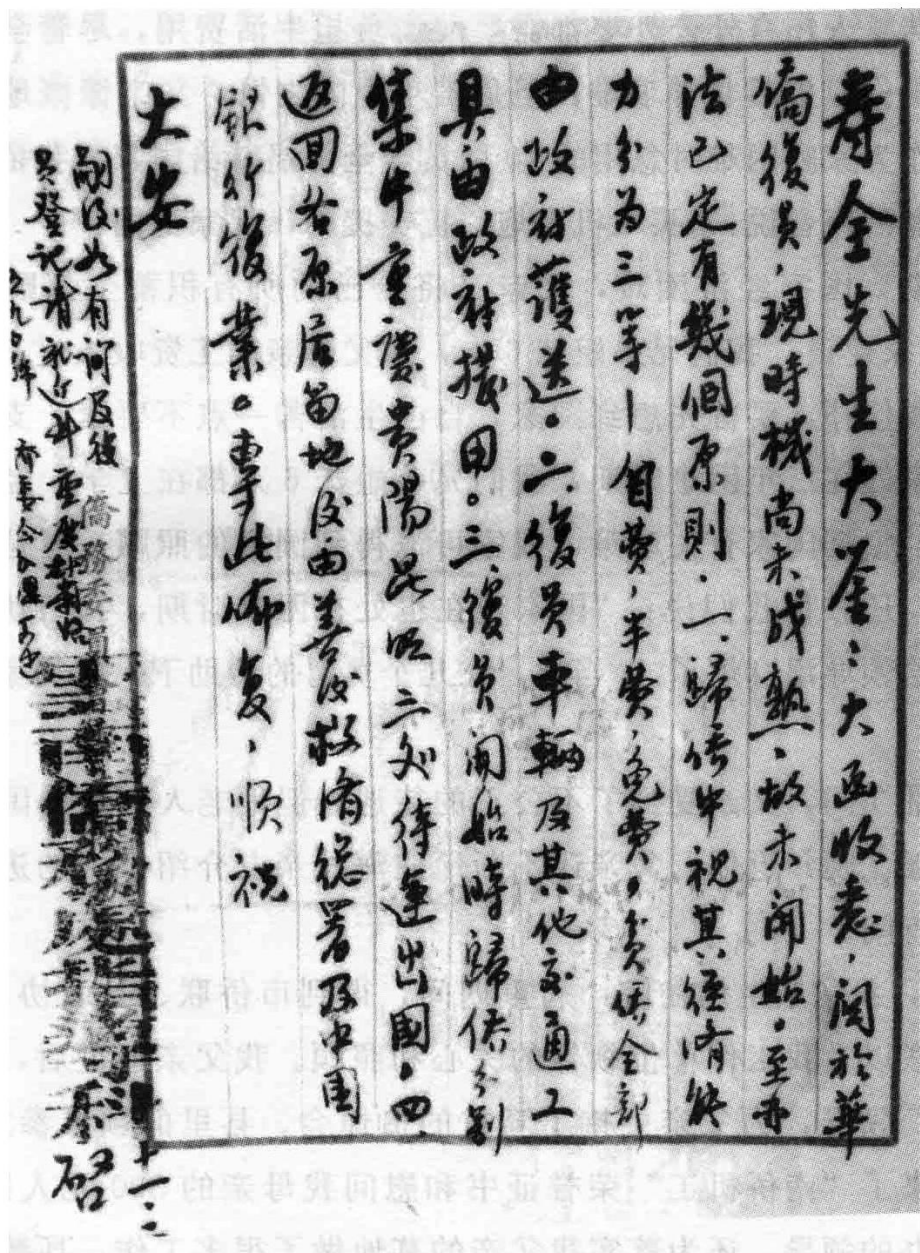
有一次，父亲的军运车开到半山，突然雷雨交加，山洪爆发，右边山崖上磨盘大的石头朝下乱滚，左边悬崖下浊浪翻腾。面对如此险情，车绝对不能停下，停下就会被滚下的石头砸烂，父亲只好驱车冒险前进。过了险区，父亲浑身瘫软，好半天不能继续开车。据父亲回忆，就是这一天，有一辆车连司机带军火一同翻下了悬崖。

还有一次，遇到几架日本飞机轰炸扫射，就在离父亲的车不远的公路上，几辆车被机枪射中引起军火爆炸，车毁人亡。父亲的车也差一点中了日本鬼子的枪弹。

父亲自己的事，他讲得不多，但我们兄弟姐妹都知道，父亲及其“机工团”

的战友，是在极其险恶、充满牺牲的滇缅公路上英勇地从事抗日救国的崇高事业。

到了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无法运输。



陈寿全收到的信（胡玲提供）

离开滇缅运输线，父亲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曾经以卖纸烟为生。1943年，父亲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担任汽车驾驶员。在这期间，父亲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败。父亲为共产党的进步思想所吸引，长期订阅《新华日报》，还阅读《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三江做出了贡献。1949年11月，父亲满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爱国爱厂之情，作为工人代表第一个打开厂门，和广大工人群众一道，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电化冶炼厂。

1950年至1951年，父亲担任冶炼厂工筹会主任兼组织委员，为冶炼厂工会组织的创建做出了贡献。父亲工作兢兢业业，公而忘私，多次被评为厂级、

县级、市级先进，并两次荣选为綦江县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和喜悦，使父亲兴奋不已，为建设新中国而出力的主人翁热情，冲淡了父亲想回印尼探望伯伯、伯母、叔叔与姑妈的愿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尽管我家姐妹4人还有外公外婆都需要父亲负担生活费用，尽管全家8口人只有他一人有工作，生活非常艰难；但是出于爱国之情，父亲慷慨地将自己从印尼带回来的作为家庭困难时急用的10两黄金全部捐献给国家。我依稀还记得父亲当时用洪亮的声音说：“买飞机大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父亲又将自己的所有积蓄全都购买了“公债券”，支援国家建设。我们兄弟姐妹6人，靠父母亲的工资收入过日子，父亲教育我们生活要俭朴，要首先想到国家，自己生活苦一点不要紧，支援国家建设更重要。国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兄弟姐妹6人都在上学，经济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我家可以得到国家的照顾，可是父亲就是不向国家伸手，还教育我们说：“国家现在也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就自己尽量克服，不要再给领导添麻烦了。”当时，在几个舅舅的帮助下，我们家才渡过了难关。

十年动乱期间，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老人家的爱国之志始终没有丝毫的动摇。晚年退休，父亲还不断地向海外亲友介绍祖国的进步，爱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1989年，我父亲生病住院，病重期间，得到市侨联、县政协、县统战部、县侨办、侨联以及我工作单位领导的关心和照顾。我父亲逝世后，他生前工作的重庆冶炼厂领导，为父亲主持了隆重的追悼会。县里的领导参加了追悼会，省政府还送来了“南侨机工”荣誉证书和慰问我母亲的300元人民币慰问费。县侨联和侨办的领导，还为落实我父亲的墓地做了很多工作，县教委和城郊区有关领导，亲自到桥河青龙山公墓为父亲落实墓地。

各级领导的关心，让我父亲国内外的亲人都感到很欣慰，如果说父亲生前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委屈的话，他老人家逝世后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肯定，已足以告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父亲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老人家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却长留世间，永远激励着我们。

现将一些友好人士送给我父亲的挽联、墓志铭抄录于后，以表对我父亲一生高尚爱国情操的纪念之情。

挽联：

抛父母家园，八千里劈波斩浪，百年赤子丹心报祖国；悼精英楷模，四十

载隐虎潜龙，千秋高风亮节催新花。

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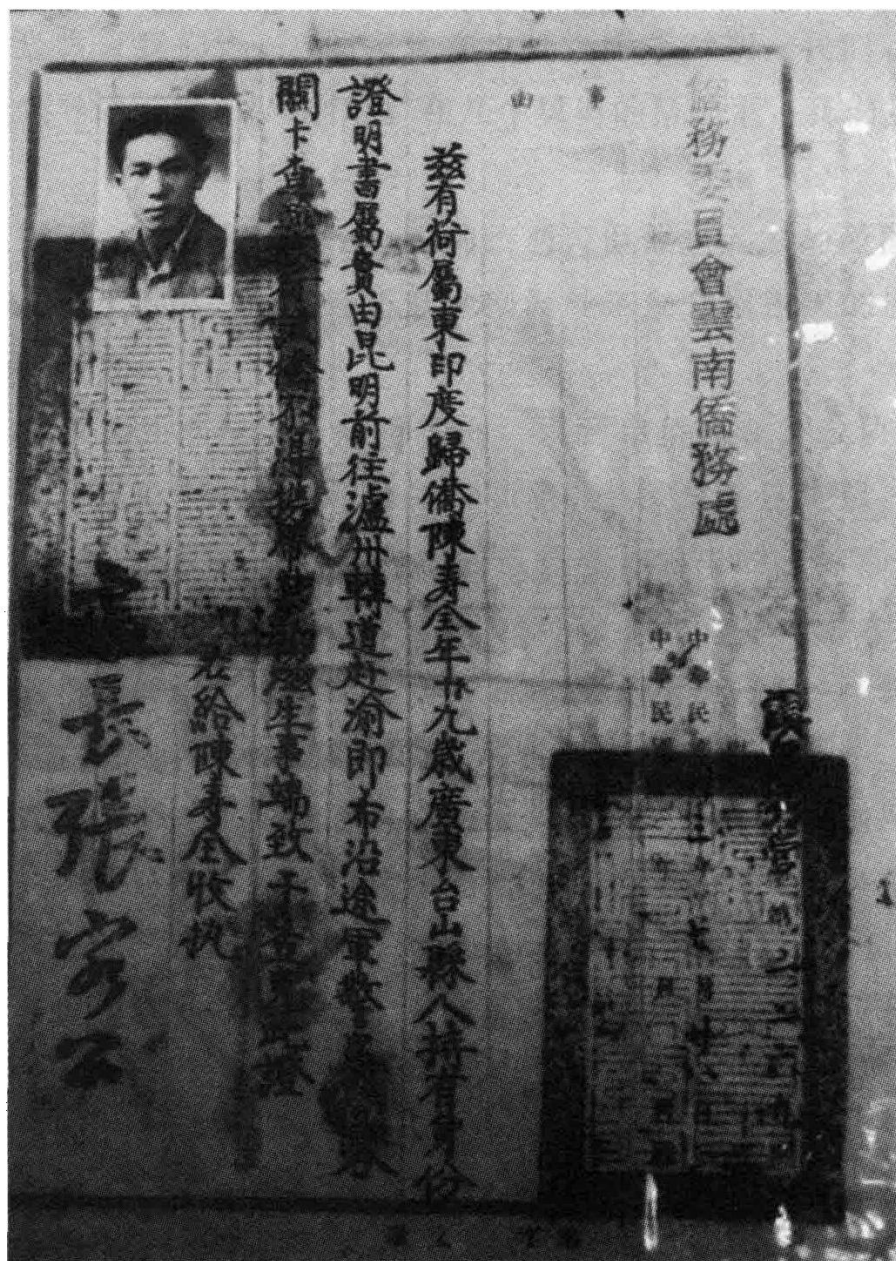
荣屈系一生，生死跨两邦。抗日起烽烟，归国赴疆场。系生命于生死细线，运军火于滇缅险疆。护“重冶”，迎解放。捐十数两黄金抗美，献十数年积蓄兴厂。委屈亦未易其爱国之志，清贫亦不开其照顾之腔。呜呼！赤子之情溢与慕水共永，爱国之志留与瀛山齐长！

我心目中的英雄外公陈寿全

胡 玲

“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祖国的领土，一寸都不能丢！”这是我记事以来会唱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是外公教我唱的。每次外公唱起这首歌情绪都分外激动，唱完这首歌，外公又会久久的陷入沉思中。我知道外公又在想念印尼的亲人们，又想起他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抗日的往事。外公他一生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常随着歌声涌上我心头。

我外公出生在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在那美丽宁静的小岛上，有兄弟、姐妹



陈寿全归侨身份证明（陈先雨 提供）

九人，一家人生活富足幸福。外公19岁那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向中国。在日本鬼子的枪炮声中，中国百姓遭难，祖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鬼子的暴行举世震惊，也激起了海外侨胞的无比义愤。海外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侨胞们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卖花筹赈，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抵制日货。外公怀着爱国热情积极参加这些抗日爱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外公学会了许多抗日歌曲。每到一处，外公他们先用歌声召集同胞，然后演说募捐。每一次活动都让外公的爱国激情得到升华。他开始渴望亲临祖国的抗日前线打击侵略者，捍卫祖国的尊严。

这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正组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招收南洋各国汽车驾驶技术和修理技术的中、青年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原来随着日寇的疯狂入侵，中国沿海港口全都被日寇占领或封锁了，刚修通的滇缅公路成为保障获得抗日前线补给的唯一国际通道。那里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国内这方面人才匮乏，只好向海外求援。外公决定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日。那年他21岁。

当外公把这一决定告诉他的父母时，他们不同意。外公虽有哥哥、姐姐、弟弟，但哥哥姐姐已成家分出去过了，家里只有他和刚满十二岁的小弟弟。年老的父母需要有人赡养，年幼的弟弟需要有人照顾。再说日本鬼子的凶残，侨胞们早有耳闻，外公的父母怎么舍得让儿子去那炮火连天的人间地狱呢？看着白发苍苍的父母，外公心里十分难过，但国家的危难不能不顾，于是充满爱国激情的外公偷偷到苏门达腊客属工会报了名，毅然决然随“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抗日。临行前，外公不忍心告诉年老的父母，只身来到码头。码头上军乐阵阵，锣鼓震天，其他回国参加抗日的机工队员们，胸戴大红花与簇拥在身边的亲人们告别。这时外公开始后悔没跟父母道别，此去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当父母发现自己不见了，该有多难过啊！小弟呢？昨晚不是说一起到码头看热闹吗，此刻他在哪儿？轮船马上就要起航，外公站在甲板上，心潮起伏，激动、难过、自责一齐涌上心头。他凝视着缓缓后退的码头，默默向父母告别，向所有的亲人告别。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小的熟悉的身影向码头跑来，是小弟！只见他边跑边大声呼喊：“哥哥！别走呀！爸妈怎么办呀！”外公也拼命挥着手大声对他弟弟喊道：“回去告诉爸妈，我回唐山去了，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回来！”轮船加速前进了，小弟一下子扑跪在码头上，放声大哭。面对痛哭的小弟，想到年迈的父母，外公痛苦得咬破了嘴唇。当祖国危难时，外公毅然选择了祖国，选择了这撕心裂肺的生死离别，他坚定勇敢地离开了舒适的家，告别了年迈的父母、情深的兄弟。回到舱中，外公看到机工队员们仍沉浸在离愁别

绪中，不少人还悄悄地抹着眼泪。外公看着大家心想，我们能流着眼泪上前线吗？码头上的军乐声隐隐约约地传来，外公不由哼唱起来：“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歌声激起了机工们的斗志，全船的机工不由跟着唱起来。大家的眼里都流露出坚毅不屈的神情。在回国途中的那些天，外公常用抗日歌曲鼓舞大家的斗志，用歌声来倾诉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机工们亲切地称外公为“歌全”。我小时候，外公就教我唱了不少抗日歌曲《九一八》、《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毕业歌》、《全国总动员》等。小伙伴们都羡慕我有个会唱歌的外公。

外公他们终于回到了战火连天、满目凄凉的祖国，汽车载着机工队员们向云南昆明前进，沿途无数倒塌的房屋，沿街乞讨的老人儿童，路边饿殍随处可见。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叫机工队员们痛心。他们把发给他们在路上吃的面包，分给儿童和老人们，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大家心里都十分难过，情绪也不免有些低落。车厢里沉默了，空气也变得沉重，外公对大家说：“我们来唱歌吧。”外公带头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车队响起了雄壮的歌声。

几经辗转，外公他们终于到了滇缅公路。在这条“抗战输血管”上运送着国内急需的军用物资。在滇缅公路上开车运输，毫不夸张地说，“处处有危险，时时会送命”。这条公路蜿蜒在横断山脉纵谷区，海拔五百至三千多米，沿途全是峭壁、陡坡、急弯、险谷、悬崖、深流，车行一分钟，转弯无数次。行进在如此险恶的山路上，令人心惊肉跳。几乎每天都有翻车的事故发生，车子翻下悬崖深谷，尸身也寻不到。机工队员们却乐观地戏谑说：“初一往下跌，十五到谷底。一路风花雪月。”（即公路沿途所经过的不同经纬度所呈现的物候景色）如此险峻的山路，如遇上“雨季”，道路除泥泞黏滑，还有塌方、山洪时时袭来。外公他们真是一步一险境啊！再加之滇西至缅甸是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不少机工就病死在这条公路上。自然环境的恶劣让机工们吃尽了苦头，日本鬼子的轰炸更让机工们像在刀刃上过日子，不少机工在敌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但机工们在敌机的轰炸下仍勇敢地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前仆后继，加紧运输来为死难同胞复仇！整个滇缅公路运输就靠着机工们壮烈的牺牲来维持。我曾问过外公：“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你们靠什么坚持下来了？”外公沉默了好久，最后说：“忍啊！回国是为了抗日，不会有福享。”“还唱歌吗？”“唱啊，想家了唱，高兴了唱，悲伤的时候也唱。”机工队员们常对外公说：“‘歌全’，我们来唱歌吧。”我知道这些抗日的歌曲让外公他们战胜了思家的痛苦，战胜炼狱里非人的磨难！

日本鬼子终于切断了滇缅公路。国民党政府遣散了机工团。这些昔日的抗战英雄，如今只好流落街头，有家不能回。贫病使不少机工队员惨死异乡。外公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1949年，终于盼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外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曾多次荣获“先进生产者”的称号，是全厂出名的踏实积极的“老黄牛”。外公曾被基层党组织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报到上级机关，一句“海外关系难查”，上交的一个月党费被退回，外公也永远被关在党的门外。

“文革”十年，人妖颠倒，外公不能幸免，“里通外国”、“反动机工”、“假积极”、“假老黄牛”的脏水泼向外公。面对种种非难，外公悲愤地掉下了眼泪。在批斗会上有人竟这样质问：“国外生活那么好，你回来干什么？肯定受到什么派遣吧？”外公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为爱国抗日回来的！”那段让人难以理解又心酸的日子里，外公最爱哼唱的歌仍是“向前走，别后退……”这首歌陪伴着外公度过多少艰难困苦，这首歌也给外公带来多少幸福的回忆。我记得外公在世时，最开心的莫过于和我一起放声高唱这首歌。他唱得那么深情，那么雄壮，我常常会停下来，惊奇的看着平时气喘吁吁的外公，霎时间变年轻了。

如今外公已离我们而去了，他唱的歌常常在我心中萦绕激荡。外公可歌可泣的一生难道不是一首歌吗？这是一首深情的眷念祖国的歌，一首不屈不挠永远奋进的歌，也是让我们子子孙孙难以忘怀的歌啊！外公为天下兴亡尽了“匹夫”之责，外公把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注进了我们的心田。外公，您放心，您用您一生经历谱写成的爱国主义赞歌，我们将永远传唱下去，矢志不忘！

记汽车“医生”龚勋回国抗战片段

龚建民

1939年5月，在马来亚流传着一首题为《南侨机工》的诗，大意是：

祖国在危急，

我怎能空闲着两膀的力气！

每一个黄帝子孙捏紧拳头，

走上斗争的战场，

去争取民族的解放！

无数海外的中华青年，

狂风般投回母亲的怀抱。

热力，把这一群烧成钢链；

光明，引导着行列到杀敌前线，到祖国大后方。

我的父亲龚勋就是这样一批海外爱国华侨青年中的一员。

父亲的早年

我家祖籍海南岛。父亲1918年12月5日出生于乐会县（今琼海市）九曲江沙美村一个半耕半渔的贫穷人家。龚氏先人自国清公定居此地至今已十几代。祖父龚太丰的兄弟龚太春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抗战时为国捐躯；龚太楷早年旅居马来亚，是一位记者、教师、校长。父亲兄弟姐妹共有5人，由于祖父早逝，家境贫困，从小品学兼优的父亲无力完成学业，被行船（当海员）的姐姐龚月英和姐夫陈俊良带到新加坡。经过半工半读，考取了英国皇家机械学校电工专业文凭。

祖国在呼唤

在1937~1938年父亲读书期间，中国华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的铁蹄开始践踏华北、华东、华南……祖国母亲在流血。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罪行，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善良的人们都感到无比愤慨，华夏儿女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最后的吼声”。

在校期间，父亲就多次积极参加声讨日寇侵华罪行的各种集会活动。1938年他学习期满毕业，在“东电”得到了一个较好的职位，收入很可观（约150

元叻币)。就在他准备再进一步求学之际，不断地从国内传来日本鬼子残害同胞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他心中的怒火。他心中酝酿着一个要投身于抗日的强烈愿望。恰在此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发出了动员，号召具有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特长的爱国华侨回国效力。1939年3月27日，我的父亲心怀抗敌救国志，眼含离家别亲泪，紧紧地抱着多年以来无时无刻不在照顾着自己的胞姐给准备的简单行装，带着亲人的叮咛与祝福，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南洋，踏上了回国参加抗日的征程。

机工生涯

父亲作为第三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回国参战。在1939年3月~1942年6月的抗战前期，父亲先后在保山汽车修造厂及其所属“遮放汽车修理所”、“永平站”、“功果桥”等厂站做电工及领班工作。1942年调到川滇东路汽车修理厂任工程师。而后曾在“川、滇东路局”的“典靖汽车修理所”、“中一印、缅盟军联合勤务总部”的汽车修理保养厂从事电工、技术员、技佐等机修工作，负责车辆的维修与保养，服务于当时的战时运输，直至抗战胜利。



龚勋的回国服务证明书（龚建民 提供）

根据父亲的回忆，当时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开车执行任务，要闯过“瘴疟关”、“雨水泥泞关”、“险路关”、“日寇飞机轰炸”等几道鬼门关。而南侨机工勇士们，为了实现报国的志愿，就是迎着这一道道“鬼门关”、“拦路虎”，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战斗着。虽然父亲他们的具体工作主要是修车，但同样要闯“流行瘟疫”、“敌机轰炸”等生死关。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就有不少人被

病魔与敌机夺去了生命。与此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工作上的许多难题。

其一是道路极端恶劣所造成的故障频发。由于滇缅公路是一条为了战争的需要而“速成”的“生命通道”，难以达到修筑标准要求。当时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可单程运输最少也要跑7天，平均每天仅能跑160公里。主要因为“路窄”（如在“麦庄坡”路段，路宽仅4米左右，最多只两车道）、“路烂”（大部分山路全是泥巴路）、“路急”（到处都是盘山路，肘拐子弯特别多）、“坡陡”（滇缅公路上如麦庄坡这样坡度为30度左右的有许多处），一路上险象环生。一部新卡车在南洋正常可行驶五六年，而在这里仅能跑五六个月。1940年陈嘉庚先生回滇缅路视察，据其回忆录记载：当初西南运输处新添置的3000辆汽车，在滇缅路上跑不到两年光景，剩下能用的汽车已不足1000辆了。道路的极端恶劣，造成了大量的汽车故障，机修工即便是没日没夜地干，也难以保证不压车。

其二是车辆牌杂、无备件带来的巨大困难。在滇缅公路上跑的车，有政府购买的，还有南洋爱国华侨等各方捐赠的，来源有多种渠道。父亲记得他们修过的车有美国的“道奇”、“欧姆”、“福特”等多个品牌。而这些车，既无说明书，也没有随车备件及清单，备件的供应就更别奢望了。据文史资料记载：“……西南运输处从1937.10—1941.11先后接新车约3500辆。结束时移交中缅运输总局可用车500辆。综观西南运输处整个历程，每一措施、活动都在种种被动条件下挣扎过来。”又记载：“……战争爆发了，仓促间组成该处。待运军品已到国门，车辆才来，开箱装配。有车待找司机，维修设备运在行车之后。车辆不与配件同来，配件从大洋彼岸，后来还须绕道中立国入境，时间拖延大半年甚至两年。”正因上述原因，父亲他们往往为了修好一部车，除了要进行拆除损坏件外，还要进行测绘（当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检测仪表与绘图仪器），待制造出基本接近的零件后再更换。战争造就锻炼了一批能工巧匠，实践培养出了他们的丰富经验。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只需表面看看就可以判断出一个汽车零件的大致物理性能，并迅速制造出基本接近的备件换上。

其三是由于运输的极端繁忙、任务紧迫导致车辆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养。滇缅公路上运送着大量的“军需急件”物资，由于前方战事激烈，军需补给“十万火急”，运输任务紧急繁重，而且必须限时限期不得贻误，车辆常常是昼夜不停地跑，没有时间进行正常的保养和维修。有文史资料记载：“……西南运输处承运的主要对象是兵工署入口军品……还有特殊任务，如迁厂、抢运战地仓库、各兵工厂急用机具材料等……运输无定线、无定量、无定期，以致缺乏及时准备和休整工夫，打乱了运输布置，极度摧残了车辆，得不到定期检修、维护。云南话叫做‘马儿死了，才卸驮鞍’。”因为当时战事就是命令，所以作

为抢修车辆的员工，常常无昼夜之分，有任务随时就干，通宵工作是经常的事。

其四是专业人员、资料、工装和设备的极度缺乏。在抗战前，我国还没有汽车工业，即使是“维修”，也刚处于萌芽时期，各种专业人员极缺。父亲他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南侨机工真可谓是难得的人才。当时国内出版的黄叔培之《自动车工程》、杨光聪之《实用汽车学》，也仅是以美国、法国通用教科书为基础而编译的，而国内资料几乎为“零”。父亲在抗战后期搞到的几本资料（英文



龚勋的英语专业资料

版），如美国华盛顿战争局 1942~1943 年出版的《汽车产品说明书》等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专业机修钳工、汽车修理工更是无处寻觅。新招的修理工是边干边学，南侨机工则需边干边教。当时用于检修的设备、机床、工卡辅具，中心修理厂还凑合有些。下边的各站所，条件就极简陋了。记得父亲曾经讲过，当时的“永平站”，除了台锻锤、车床外几乎没什么设备。而且工装、工具也是非常有限。其实仅有的几台设备，也是一缺图纸，二缺资料，三缺备件，根本无法保证正常使用。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南侨机工们还是“有条件

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总之一切为了抗战。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当年那些 20 来岁的毛头年轻人，竟能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冒着极大的风险，硬是挺了过来，并用尽一切办法，以保证抗战“生命线”的畅通，简直是不可思议。有些人还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们告别南洋，离开亲人，奔赴充满死亡威胁、腥风血雨的战场，为了什么？图的又是什么呢？回想过去那段艰难的战斗岁月，父亲的心情总是很沉重。对于这样的疑问，他回答说：“人的命只有一条，谁都会珍惜的。但当日本鬼子已经把刺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时，怕有什么用！敌人就是妄图用武力征服我们！我们甘当亡国奴吗？我们是中华的子孙，在这已是‘尸横长白山，血流黑龙江’的民族存亡的当口，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起，反抗，直至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华民族！”

在永平的日子里

在 1940 年前后的一段时期，父亲始终战斗在“永平站”。当时全滇缅公路又分为六个小段，永平段为其中之一。该段自顺潯桥至黑羊箐，全长 78 公里，是比较险要的一段路。如在大檁树的“麦庄坡”一段路面非常窄。按要求要三车道，最少 7 米，但实际仅 4~5 米左右，而且坡度约 30 度，这在当时以泥巴铺地、地面摩擦力小的情况下，平时行路已很难，下雨天满地稀泥，更是爬坡不成。据母亲讲，当时从永平到下关，在滇缅路没修成前，赶马走路也要三四天。更为“险处”，还在于这一段原是深山老林。此处 20 年代末，曾是惯匪盘踞之地。“山高”、“坡大”、“车行慢”也正是土匪行抢作案的便利场所。从当时流传的一首诗中，亦可见此地“匪特”之猖獗：“永平行过功果桥，河水湍急山又高。车子抛锚人莫走，提防汉奸放火烧。”

当时永平站建在永平县城“老街”街口滇缅公路旁。此处距下关 101 公里，离横跨澜沧江上的公路咽喉桥，也是日军重点轰炸、破坏的“功果桥”47 公里。永平站即肩负着这一段路上来往运输车辆的正常行驶。由于永平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要的地势，成为滇西抗战中第二道防线的战略要地。据父亲讲，“永平站”名为站，实际人员不过十来人，而其中又以四五名南侨机工为中坚骨干。父亲因学过些专业知识，又肯钻研动脑，就与另一位南侨机工老乡李连负责技术。在站里、站外人们亲切地叫他“阿龚”。许多汽车故障是在南洋根本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而当时无从去咨询，大小事都要自己一一处理。在实践中他学会了許多知识，如对六排挡的道奇、福特、欧西姆以及后来的“八缸三吨”福特的基本产品结构、主要部件性能都比较熟悉。加上他年轻好学，精通英语，所以业务提高很快。不久就提为领班，后又升为助理工程师、机师、机佐，直

到抗战胜利时升为技士（相当中、高级工程师，享受“少校”待遇），时年不满27岁。据父亲讲述，他们这个小小的“永平站”每天接到的修车任务少则十几辆，多则几十辆。有些还是由武装军人押运的车，丝毫不能怠慢。尤其是在英国封停滇缅路前的一段时间，为紧急抢运物资，车流与事故频频出现，抢修任务成倍增加，“永平站”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据统计，在抗战的几年中，滇缅公路为抗战运输了45万吨军用物资，“永平站”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父亲与战友们也为之付出了自己的血汗。

滇缅公路的沿途各站，生活条件极为简陋。为了给过往司机提供短暂的休息场所，以确保运输线路的畅通，父亲与母亲经过商定，拿出他们仅有的80块光洋，在“永平站”旁开设了“永平客栈”。“永平客栈”占地近半亩，全部是木结构的板房，大小约二十来间，可放几十张床铺。客房虽然简陋，但终于可以为司机战友们提供一处遮风避雨的休息之地。当时的收费标准也很低，原则是有钱可付现金，没带钱的也可以赊账。而且客栈还为南来北往的司机提供餐饮。可以说当时跑这段路在“永平客栈”落过脚的战友们都曾吃过我母亲烧的饭菜。具有典型白族民家人纯朴、善良心地的母亲赵有清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司机们吃得饱，吃得上热饭、热菜。有时司机半夜投宿，母亲就半夜起来为他们烧水、做饭。总之，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

1942年日军侵入畹町。同时派遣特务、汉奸毫无人性地在滇缅路沿途的饮水中投放“霍乱细菌”。当时“永平站”多人也染上了“霍乱”，我的姨夫和外祖母都被霍乱夺去了生命。母亲当时也染上了此疫，上吐下泻，父亲在此刻为了保住大人、孩子，当机立断，决定关闭“永平站”和“永平客栈”，马上将母亲送往医疗条件还算可以的下关。而将“永平客栈”交付给了邻居苏大妈。从永平出来后，待母亲病愈，父亲便带全家往贵阳、曲靖，最后到昆明，继续为抗战从事运输服务的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光阴似箭，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到了父亲故去时的年龄。在进一步了解了当年南侨机工抗战中的那些生动的战斗经历后，我才深深体会到，父亲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中，在遭到来自极“左”思潮的影响，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与打击迫害下，仍然保持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是多么的不容易。作为一名爱国归侨、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过去滇缅公路上的抗战功绩反而成了历史污点。在一切只讲“政治”的年头，技术专长成了“白专”，精通英语加上“海外关系”就成了“特嫌”，一时间，父亲成为“内控”的对象。接着又以“光荣锻炼”的名义，下放到吉林省双阳农村，再转到“新立城水库”改造世界观，还

去省委农场“光荣”两次。尽管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一次次的打击、迫害，父亲仍一如既往地为国家和社会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回想父亲走过的风风雨雨，我们的内心怎能不被他们这老一辈人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震撼。

60年的蹉跎岁月并没有抹淡、抹去当年南侨机工用鲜血染红的爱国主义旗帜。几十年来，南侨机工先辈们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振兴中华、强我民族，不断地努力奋斗！

我的生父陈团圆惨死在日军屠刀下

叶晓东

我的生父陈团圆是南洋华侨机工，在回国参加抢运抗日物资时被日本鬼子杀害。他牺牲时，我和姐姐都很小，姐姐晓英两岁，我刚出生两个月，还无记忆力，可以说我们没有见过生父。父亲的相貌和经历，我们是从他亲友的讲述中才得知的。

父亲原籍广东潮州。潮州地方方言“陈”字读成“单”。同事们叫陈团圆为阿单。阿单的祖辈移居马来亚以种植橡胶为业。他十八九岁就开始帮助祖父经营橡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相继占领了我国华北、上海、广州等地，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激起了海外华侨的愤慨。海外各地侨胞纷纷抵制日货，上街游行，捐款捐物，赈济灾民。华侨青年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抗日。当时日寇封锁我国各港口，妄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为打破日军的封锁，1938年，滇西20万民工，以血肉之躯铸成滇缅公路，成为当时我国陆海唯一的通道。为抢运国际援华物资，急需一批熟练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广大南洋华侨机工响应南洋华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入抢运抗日物资的战斗中。

据与我父亲交往较深的璐西市法帕乡芒蚌寨92岁耄耋傣族老妇女咩帕所介绍说：“阿单中等个子，身体魁梧，圆脸型，浓眉大眼，性格豪爽，乐于助人。运输间歇，他常帮助后勤人员下到农村采购蔬菜、粮食。他们向我买大米。我经营的大米，一袋百来斤，我请他帮忙扛袋，累得他满身大汗。事后，他用凉水淋淋身子，笑一笑说：‘大姐，有事说一声，我们年轻人有使不完的力气。’”由于阿单热情活泼，赢得姑娘们的好感。不久，他爱上了傣族姑娘朗玉宝。他们成婚后有了两个孩子。

1942年5月初，阿单最后一趟把物资从芒市运至保山，途中在腊勐听到“轰隆”的一声，原来是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军队过江，炸毁了惠通桥。桥断了，父亲的几个战友，用汽车内胎囚渡过江。父亲毫不犹豫地对战友说：“我有妻室儿女，我不能与你们同行。”于是父亲潜回了芒市。这时，日本鬼子到处搜捕留下来的中国军人和南洋机工。咩帕所老大妈为掩护我父亲，给他换上傣族民族服装，戴上竹叶帽，让他到后山放牛。后来他又躲到允景。但最终还是被



陈团圆之子叶晓东与傣族老人咩帕所（叶晓东 提供）

日本鬼子抓去了。

咩帕所对我们讲：“阿单死得真惨！被日本鬼子活埋。阿单遇难的那天，我约着朗玉宝去看望。我们赶到时阿单在土坑里，胸部以下已被实实在在地埋着。朗玉宝看到丈夫惨遭毒手，奋不顾身扑了过去，被我咩帕所及乡亲一把抓住，小声而严厉地对她说：你是要丢下他的两个孩子不管了！这伙禽兽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

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南侨机工家属的迫害，外婆领着我们母子三人在中缅边界一带到处逃难，住在人家的牛圈、马棚里。外婆带着她的外甥和我们姐弟俩，母亲帮人挖地、栽插、收割、养猪、打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母亲把对父亲的思念和对鬼子的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她的儿女面前从不显露悲伤之情，只是背着我们才抽泣抹泪。

抗日胜利，我们迁到畹町，母亲常帮商人背货涉水过畹町河。干季没有什么，雨季河水暴涨，随时有被河水卷走的危险，可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冒险呀！“一个寡妇人家，怎么能把两个娃带大？”在亲友说服下，母亲嫁给流落畹町的抗日军人叶森。外婆看到我们母子有了安身之处，便返回她的老家缅甸芒占去

了，一年半载步行五十里路总要来看望孙儿一次。老人身无分文，只能带上芭蕉水果之类的东西，可她一颗滚烫的心抚慰着阿单的遗儿。

流落在边疆的南洋机工，家境都十分困难，可是他们情同手足，互相关心。南洋机工王亚文和我同在畹町农具厂工作，是王伯伯手把手教会我驾驶汽车的。我爸爸生前的战友蔡文兴师傅在龙陵瓷厂开车，每次送货到畹町，总是带着一把面条、一把香菜或一点糖果到家里看望我们姐弟俩。他总是亲切地抚摸着我们说：“你们两个长相与你爸爸一模一样，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你爸爸。”这时，我看到蔡伯伯眼眶里噙着泪花。

2000年10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抹不掉的记忆》，其中有一段是在我父亲牺牲的地点举行悼念陈团圆英烈的仪式。我跪在父亲的“坟墓”前哭诉：“我们做儿女的对不起爸爸呀！50年后的今天，才找到你牺牲的地点，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祭奠您，只有把国家颁发给您的‘南洋机工纪念章’埋在您的‘坟墓’下。”我和随团来的部分老机工及其子女，在悲愤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今年1月20日，在畹町桥头举行了盛大的滇西反击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南侨机工后代林晓昌先生带头捐资兴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公园”的奠基暨工程招标仪式也同时举行。就在这十分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我们在畹町的南洋机工后代也组建了自己的社团——“南洋华侨机工联谊会畹町分会”并开展了活动。我们要继承南侨机工英雄父辈爱国、建国、强国的遗志，发扬他们把青春热血奉献给祖国的伟大事业而无怨无悔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作出自己的贡献！

（叶晓东 畹町民族贸易公司司机）

南侨机工英烈陈团圆遇难史实发现经过

杨维诚

中秋季节，秋高气爽。湛蓝的天幕上薄薄的几朵白云，宛若披着白纱的几位少女，翩翩起舞欢迎远方的亲人。亚热带南国边疆的太阳火辣辣的，可是空气清新、湿润，沁人肺腑，使人心旷神怡。

2000年10月16日，一辆大客车沿着320国道驶入被誉为太阳当顶的地方——畹町。这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高级经济师李佩铎率领着几位年过古稀的南洋老机工王亚六、翁家贵、罗开湖和部分老机工的后代以及省州侨联、摄影师一行23人，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来到当年南洋机工为祖国抗日救国，抢运国际援华物资时不断进出的畹町桥。到了桥头，车刚停稳，兴致勃勃的老机工就走下车四处展望感慨万千：畹町啊，你历经沧桑！抗日初期建成的溅着血迹的石拱桥在战火中已被毁，1945年初打通中印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架设

抢劫、无恶不作的消息传到南洋地区，引起很大震动。华侨学生纷纷上街义演募捐，阿单也为学生爱国热情所感动解囊捐助。

一天，阿单走到街上，见人群将街道围得水泄不通。过去一看，原来是学生拿着报纸刊登的照片，披露日寇在南京等地进行大屠杀，肆意枪杀、活埋无辜平民百姓的罪行。还看到日军士兵用刺刀戳在婴儿的心窝上咧嘴狂笑。学生噙着眼泪控诉，群众激愤，有人高喊：“打倒日本鬼子！”、“血债要用血来还！”阿单回到家里一头倒在床上，吃饭也叫不动。“病了吗？”母亲抚摸儿子的额头，没有发烧，却见他满脸通红。母亲将刚才在街上的所见所闻嘀咕给老伴听，两位老人心里明白了几分。

这时，中国新开辟的滇缅公路运输战线正急需大批熟练机工，经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华侨总会登报招募，华侨青年踊跃报名。两天后的一个傍晚，阿单在院场徘徊踌躇了一会儿，走进堂屋向父母禀告：“我要报名回国服务”。“阿单，你是二十一二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母亲很为难地说。“爹，妈，现在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堂屋里的气氛凝重，父亲手上的卷烟一根接一根。“现在南洋地区形势一样也越来越吃紧，要把你拴在家里也拴不住，你妈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苦上几年，你就放心去吧。”深明大义的父亲终于点头同意。母亲叮嘱说：“你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凡事要小心，你的好友蔡文兴也要去，你们要互相照顾。”

阿单等三百余名青年组成了第八批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他们于1939年7月搭乘丰祥轮经安南海防抵达昆明。经过短期集训编队，很快投入抢运国际援华物资的战斗。首个任务是到缅甸腊戍接运物资到芒市。

车队到达腊戍，只见国际援华物资堆积如山，他们装载军火沿滇缅公路奔向祖国，从缅甸九谷进入中国畹町。车辆往来络绎不绝，街道上人流熙熙攘攘，搬运工人背着上百公斤机压棉花包，气喘吁吁，汗流浹背。阿单内心升起怜惜之情：多么勤劳的同胞！车队继续向前行使，经过气势雄伟的黑山门山峦，繁茂的森林，行至遮放、芒市坝，满眼是涓涓溪流，田园阡陌，竹林掩映下的傣家茅舍炊烟缭绕。阿单想：“祖国的大好山河怎能让日寇来践踏，人民的和平生活怎么能让日寇来破坏，赶快行驶，把枪炮运上前线去，消灭日本狗强盗。”阿单思绪澎湃，加快了行车速度。

滇缅公路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又是疟疾高发地区，有的战友死于恶性疟疾和车祸。阿单经过磨炼，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爱上了富饶美丽的云南边疆，还结识了许多当地的朋友。阿单是脚勤手快的人，一有空就帮助后勤上街到农村买菜买米，久而久之，阿单结识了一位傣族姑娘朗玉宝并建立起感

情。1940年初，他与这位姑娘结为夫妻，先后生下了小英、小东姐弟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形势日趋严峻。1942年3月8日，日军侵占缅甸仰光，储存在缅甸腊戍、八莫，国内畹町、遮放、芒市等地的军火物资急需抢运。5月2日，阿单最后一趟从芒市装载抗日物资运至保山，由于车辆多道路拥挤，走走停停速度十分缓慢。行至龙陵腊勐，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守桥部队为了阻止日军抢占惠通桥，奉命炸毁桥梁。听说日军尾追上来，阿单和他的战友为了不让军火落入敌手，泼上汽油将军火烧毁。然后从车上放下备用胎取出内胎，准备泅水过江。阿单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他说：“同志们，我不能与你们同行，我有妻室儿女，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离开战友后，阿单潜回芒市。

阿单回到家，岳母告诉他：“外面风声很紧，到处搜捕流下来的抗日军人和你们华侨先锋队人员。”阿单遵照老人的嘱咐，每天破晓躲到山林里，夜深人静才回家。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阿单像个落汤鸡似的回到家里，妻子、岳母关切地叫他赶快换衣服。突然传来一阵狗吠声，不久两个便衣带着日本鬼子闯了进来，将阿单带走。原来阿单被奸细出卖了。

这一夜，阿单的妻子朗玉宝和岳母都哭成了泪人，阿单被抓走的消息很快在村内外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

“阿单是个好人，为什么要抓他？”

“阿单是南洋华侨先锋队运军火的。”

“玉宝带着两个孩子真可怜。”

玉宝带着两个孩子，大女儿两岁，小儿子只有一个多月，脱不开身。

阿单被抓走对玉宝和她母亲打击太大太大了。玉宝脸色惨白，神情呆滞，欲哭无泪。母亲还不到五十岁的人，一夜间变得苍老多了，眼角上的皱纹增加了许多，平时有说有笑春风满面，而今愁眉不展，老泪纵横。一天之内，她从允金、芒蚌、法帕到芒市，不知要走多少趟，打听阿单的下落。她一遍遍回想：这个好女婿每次出车回家总是买些她爱吃的东西孝敬她；玉宝坐月子时，他亲自挑水做饭、洗衣，岳母换下来的衣服他也拿去洗，阿单比亲生的儿子还要亲。她心里越想越激动，默默叨念：“宰高！宰高阿单（傣语：我的儿！我的好儿子阿单），你在哪里？我们家里不能没有你。”老人家到熨房上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阿单化险为夷。

可是，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日本鬼子要在他们的宿营地（现今芒市开漠）活埋阿单，还通知周围村寨头人、群众去看，以显示他们的震慑力。咩帕

所得知后，瞒着老人和朗玉宝来到现场。日本鬼子事先挖了一个垂直深坑，将五花大绑的阿单推下坑里。当朗玉宝、咩帕所赶到现场时，土已埋到阿单的胸部，只见阿单低垂着头，已是奄奄一息了。玉宝看到自己的丈夫，不顾一切，从人群中扑向阿单，被咩帕所和乡亲一把抓住，连抱带拽地将她拖到僻静处：“你可是要去找死！这伙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什么心狠手辣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丢下两个孩子你就不管了？！”

咩帕所向寻访团讲道：阿单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对人和蔼热情。他经常到我家买米，我们就认识了。他总是称呼我比朗（嫂子）或称谢弄（大姐），又肯帮助人，见我抬不动的东西，就帮我抬。他不怕脏，干起活来很麻利。日本人占领芒市后，最初，阿单在家躲避日本鬼子的搜捕。后来，我拿出傣族农民的衣服给他换上，给他带上笋叶帽，穿上草鞋，还给他起了个傣族名字岩相，在芒蚌寨后山放牛。以后因为到芒蚌洗澡的人多，怕走漏风声转移到允金去躲。我至今还后悔，如果他仍在我家说不定会免除这场灾难。

现今 86 岁高龄的咩帕所，虽然年老体弱，但是精神矍铄。她讲到阿单被日本鬼子活埋的惨状时，拄着拐杖，从座位上站起来，眼里闪着愤怒的泪花。她激动地举起拐杖在地上跺了两下，说：“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他们活埋中国人，不让你迅速死去，填一层土压板后要间歇一段时间，再填再压，要让你受活罪，阿单死得真惨。”我给寻访团做傣语翻译，讲着讲着哽咽得讲不下去了。老机工的后代男女青年含着悲愤的泪水在小本本上用心地记录，泪水滴到了纸页上：“杨叔叔请继续翻译下去，讲详细点，陈团圆为国捐躯的事迹太悲壮了。”

咩帕所年老体弱，没办法带我们到陈团圆殉难的地点去，她就叫她侄儿周金明带领我们去看看殉难的地点。陈团圆殉难的地点在一个荒坡上，老机工及随行人员在附近拾了些石块，垒起了个“坟墓”，想对这位亡灵进行悼念，以表示我们的哀思。可是事先没做任何准备，老机工的后代头脑很机灵，他（她）们折了几枝柔软的树梢圈了个环，又找了些叫不出名的野花，将他（她）们对陈圆团的哀思倾注其中，扎成一个花环。

在制作花环时有的同志感到遗憾，早晓得在街上买个现成的花圈该多好。几位女同胞则有另一番想法：你看，环圈是用折下的树梢圈成的，陈团圆和其他为国牺牲的南洋机工就像树木一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野花生长在祖国母亲的大地上，祖国母亲用她的心血——滴滴雨露，滋润着花朵的生长；系花用的细长细长的苦葛藤，它把 3200 名南洋机工的亲属、祖国人民和海外赤子的心连接在一起。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花圈，它深深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抗战中千千万

万万牺牲的英烈的怀念。

我们也没有准备悼词，陈团圆的战友王亚六即兴致辞：“陈团圆同志，你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你响应祖国的召唤，从南洋回到祖国，为抢运抗日物资抗击日本侵略者，你献出了生命。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你的战友来看望你来了。我们沉痛地哀悼你的亡灵。日本鬼子已被中国人民打败，你的血没有白流，陈团圆同志，安息吧！”

老机工和老机工的后代把野花环安放在“坟墓”上，陈团圆的儿子叶小东跪在他父亲的“坟墓”前：“爸爸！爸爸啊，你的儿子今天来看望你来了，你被日本鬼子杀害，死得太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才寻找到你惨死的地点，我们做儿女的多么对不起爸爸呀……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来祭你的亡灵，现在把南洋机工联谊会发给的这枚纪念章埋在你的坟下……”此刻，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此情景所震撼。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恸哭失声，老泪纵横，透过泪花，我仿佛看到野花环系到陈团圆的脖颈上，放出一道道光芒。

霎时间，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天阴沉下来。天地与我们同悲！

老机工和老机工的后代喊出：“今天日本国内一小撮好战分子妄图复活军国主义，我们要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老机工和老机工的后代唱起半个多世纪前 3200 名机工告别乡亲父老、奔赴抗日前线的那首壮丽的歌曲——《告别南洋》：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个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
这几百个荒凉岛上。

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自然的丰富供养，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再会吧。

我们要去争一线光明的希望。

歌声、口号声飘得很远很远……

忽然，阳光将云朵染成一片彩霞，映红了整个大地。

（杨维诚 原中共畹町市委副书记，已离休）

缅怀我的父亲殷华生

——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前夕

殷 红

2000 年 10 月 12 日，是我难以忘怀的日子。作为国内部分南侨机工后代的代表，我荣幸地接受云南省侨联、陈嘉庚国际学会的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重走滇缅公路”摄制组，协助拍摄一部反映南侨机工后代继承先辈爱国爱乡光荣传统、为振兴中华民族努力奋斗的电视纪实片。

上午 10 时正，参加拍摄工作的全体人员聚集在昆明西山公园“南洋华侨抗日纪念碑”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发授旗仪式。云南省侨联等五个涉侨部门领导参加了出发授旗仪式，陈嘉庚国际学会陈共存先生亲手给南侨机工后代授旗，还有健在的南侨机工及家属、子女 200 多人也前往西山为我们送行。随着一阵阵欢送声，汽车缓慢地离开了纪念碑，沿着滇缅公路的起点西山出发了……此时此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如泉涌，我仿佛感到父亲还活着，他就坐在身边陪着我重走滇缅公路……

沿途，我们的汽车翻越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高山峻岭，穿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天堑。现在的滇缅公路路况要比从前好多了，路基坚固，道路宽阔笔直，铺的是沥青和水泥。当年那条崎岖、泥泞、坡陡路险的旧滇缅公路已被现在的公路代替了，只留下了一些旧路段的痕迹。我们的汽车到达麦庄时，大家下车沿着当年旧公路步行，确实感受到滇缅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之惊险。汽车经过 707 高地、老鲁田路段时，正下着倾盆大雨，雾水蒙蒙，风云突变，时冷时热。我坐在车上深深体验到父亲当年回国参加抗战的艰辛，触目生情，不断勾起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追忆。

—

父亲生前曾向我们讲述他当年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滇缅运输线上度青春的经历：

我的名字叫殷华生，曾用名殷金成，1914 年 7 月 26 日出生。我的祖籍是广西北流县平政乡石榴村。在我出生时父亲早已随祖父远渡南洋，在马来亚文冬埠的橡胶山做工。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将我和母亲、祖母接到文



殷华生 1941 年摄于昆明

冬。母亲和祖母除了料理家务外，还到胶园给父亲和祖父做帮手。我年纪小，父亲把我送进私塾念书。我边读书边帮父母干活。几年以后，父亲将积蓄置了十几亩地自己耕作，主要种植果树和花生等一些农作物。再过几年，果园扩大到60多亩，又添置一部40座的大巴士做生意。我18岁就学会开车，从文冬开往九条石，每天跑两趟，所以驾驶技术精湛。我们一家就这样过着忙碌但安稳舒适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海外华侨十分震惊，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与祖国同胞生死与共，同抗日寇。一时南洋各埠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我们这些不知忧愁的青年人开始沉思：“国土沦陷，家园何存？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在筹赈会的组织下，我们文冬埠的华侨青年和华侨学生一起上街进行义卖，将义卖所得的义款全部用于支援祖国抗战。

1939年，在祖国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刚建成通车的滇缅公路急需大批技术娴熟的驾驶员，以保障军用物资运输。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急祖国之所急，号召爱国华侨机工用自己的技术回国服务。当时许多报纸都有关于各地华侨社团热烈欢送回国机工出发的报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为国效力，形成华侨社会的风气和潮流。文冬的很多青年都前去报名应征，我当然也不甘落后。我是个独子，家中有双亲和年迈的祖父祖母，更有结婚才一年的娇妻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我怕家人不让我走，就没把应征之事告诉他们，回到家中，我背着家人拣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收入皮箱，等到晚上家人都熟睡了，才溜出家门，搭上朋友的车到10多公里外的筹赈分会报名。我是个有几年驾龄的年青司机，又无喝酒、抽烟等不良嗜好，筹赈会人员一下就选中了我。

1939年4月3日，我们第四批回国的南侨机工100多人（其中文冬埠有9人，广西籍就我一人）在吉隆坡集中两天，再从新加坡港口启程。那时我们身穿制服，排着队从夹道欢送的队伍中穿行而过登上丰庆轮，欢送的人们不时地往我们手中和衣袋里塞面包、水果等物品，依依不舍地挥泪向我们告别。当父亲闻知我回国参战的消息后，开车追到新加坡来找我，此时，我已在丰庆轮上了。父亲没有找到我，我们就这样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我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在抗日热情的驱使之下，毅然不顾家中年迈的祖父母及疼儿心切的父母，甚至割断了朝夕相处的夫妻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时至如今，我已80多岁，做了祖父，才切身体会到当年我的祖父母、父母、妻子该是怎样的心情！古语云：“忠孝难两全。”当年我满腔热血回国抗战，一片忠心报效祖国！如今，只能求我那已逝的祖父母、父母在天之灵原谅我吧！（笔者：父亲每次谈到这段经历，心情都非常激动，每次都是热泪盈眶。

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忠孝难两全”这句名言的含义。其实，我的父亲却做到了两全。)

我们第四批回国的南侨机工是从越南西贡入口，再改乘火车直达昆明。到了昆明后，马上进行军事运输训练。军训要求很严，我们这些在南洋过惯了自由自在生活的青年司机一下受到这么多的约束，起初很不习惯，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一周才能洗一次澡，在南洋我们一天至少也要洗一到两次澡。艰苦的军训生活，使一些机工思想产生了波动，我们就互相鼓励：“我们是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参战的，一定要经受艰苦的考验，决不能当逃兵，给南洋侨胞丢脸……”我们咬紧牙关，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下来。

在潘家湾训练所军训一个多月后，我们接到了紧急抢运物资的命令。我们文冬埠有7人一起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2大队34分队，大队长是谭江柏，分队长是谭英祥。刚报到就被安排到龙陵去将美国支援的军车接运回昆明，接着抢运炮弹。开的是刚接回的美国道奇3.5吨军用车，每辆车只能装三枚炮弹，从龙陵、遮放运往昆明。

当时滇缅公路刚从高山险谷中开辟出来，路基不坚固，坎坷颠簸，非常难走，来往的车又多，都是赶任务的，稍一疏忽就出事故，白天还常有敌机来轰炸，对我们这些在南洋跑惯了柏油马路的南侨司机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沿途常有翻车人亡，令人胆战心惊。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沉着谨慎，看准路线，不超速，不抢道，会车时主动让道。凭着熟练的驾驶技术，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军火抢运任务。

在完成炮弹抢运任务后，我们分队的任务大多仍是军火运输。所跑的路线主要是从畹町至昆明，全程有900多公里，要行驶八九天，途经深山老林，不仅常遇野兽出没，毒蛇袭人，还会碰上被称作“藤甲兵”的土人，而最可怕的是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痞土匪。有一次，部队派我和助手用8吨的车子运载步枪子弹到亦龙，车子途经马龙山陡坡之处时，忽然从山上窜出四五个人，其中一个冲下山来，手扬着德国造的手枪示意我们停车。车刚一停，他立即用手枪顶着我的脑袋，逼我们交钱出来。我心中一惊，连忙说：“好，好，我们给钱。”我将衣服的口袋外翻，对土匪说：“老兄，我们穷司机没几个钱，你就包涵包涵吧。”“不行！没钱就把你们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好、好，我把衣服给你。”我急中生智，一边脱衣服一边向助手使眼色，就在我脱下大衣的一瞬间，出其不意将大衣罩在土匪头上，我的助手一步跃上去把他的枪夺下。山上的土匪见状，立即就朝我们开枪。在这危急的关头，训练营运送新兵的车子刚好来到，土匪碰上正规军，知道大势不好，赶忙逃跑了。我们把抓获的土匪交给训练营

的新兵押送回部队，又继续赶路了。

1939年冬，运输处派我和助手出车运送汽油到贵阳。当时运输处有这样的规定，出车在外的运输兵，要听从兵站的负责人传达上级指派的任务。我们一到贵阳兵站，就接到上级的命令：广西昆仑关战场告急，你们卸下汽油立即赶到昆仑关去支援运送伤员。我们不敢怠慢，立即前往。昆仑关位于宾阳县城西南30公里与邕宁县交界处，是南宁的东北屏障，它周围重峦叠嶂，坡陡谷深，曲折而狭窄的昆仑古道盘绕于峰峦之间，成为桂南公路交通的咽喉，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日寇入侵后，我国沿海只有经过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保持畅通。为达到进一步封锁的目的，日寇于1939年11月中旬以一个师团的兵力登陆钦州湾，下旬占领南宁，12月初侵占位于南宁东北面55公里处的昆仑关，企图趁势北上直取柳州、桂林，完全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爱国将领决心夺回昆仑关，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抽调了几个军的10多万兵力到桂南会战。日寇依仗着昆仑关的险要地势，与我军对峙，我军数次发起进攻，伤亡人数众多。我们赶到宾阳临时战地救护所时，里面躺着许多伤兵，并且不断有伤兵被抬进来。我们顾不上路途上的疲劳，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运送伤员，得到了部队长官的嘉奖。

1942年5月，日寇入侵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原来抗日大后方的云南变成了抗日前线。日寇很快入侵滇西，于5月3日占领畹町。中国守军为了将日本侵略军阻拦在怒江西岸，决定炸毁惠通桥。正在忙着抢运汽油、轮胎、兵工器材等军用物资的南侨机工只好按上级命令将无法运回的物资就地烧毁后随部队撤退。此时，沿途一片混乱，一些日军穿着中国军装混在人群中，企图偷偷溜过惠通桥。5月5日，惠通桥被炸断，一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南侨机工被阻隔在西岸，有的不幸落入敌军手中惨遭杀害。只有少部分机工趁着夜色以汽车轮胎充作救生圈，冒着刺骨的寒冷，从水流湍急的怒江泅渡过来。此时，西南运输处已改为“滇缅公路管理局”，军运任务也锐减，车队解散。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南侨机工人员面临失业、饥饿、贫病交加的惨境，不少南侨机工露宿街头，冻死巷边，暴尸荒野，国民政府却无一部门过问。看到形势如此凄惨，我当时也动了思亲之念。好心的人劝我趁早回马来亚，一想到当初我没告别一声就离开亲人，不由心酸落泪。可是眼前日寇的铁蹄四处践踏着祖国的河山，国土未复，日寇未灭，怎能回家？想起两年前在我们的军饷被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扣压，生活陷于困苦之际，是陈嘉庚先生率慰问团来保山看望我们，给我们送来了蚊帐、毛毯、衣物、鞋子等物资，还给我们带来了海外亲人的问候。陈嘉庚先生对我们说，你们开的车子很贵，大多是海外亲人捐款买来的，

历经了千辛万难才送到你们手中，你们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好车子。虽然你们现在生活很艰苦，但你们要有信心，你们是代表海外千万侨胞回国参加抗战的，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抗战胜利。我一直以陈嘉庚先生的话激励自己，如果我没能坚持到抗日胜利，有什么脸面回去？我还是留了下来，可已经没有汽车给我们开了。在这段最艰苦、最凄惨的日子里，机工们只有自谋生路，互相介绍职业，互相支援摆摊或合伙开办食店、咖啡店、修理店之类。我也身处困境，四处奔走寻找工作。我参加了华侨互助会，（父亲将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华侨互助会会员章，于1994年捐赠给厦门华侨博物院作为文物珍藏。）在互助会的帮助下，我认识了一位广西老乡，他叫林翼南。此人在昆明金碧路开办一家广南昌公司，专营贸易出口生意，专跑昆明至香港。林老板看到我为人老实、办事稳妥、驾驶技术好，把我留在广南昌公司开车，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困境。

1943年初，我参加了盟军美国陆军炮兵游动修理服务队，再次得到了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先在昆明干海子修理各种类型的大炮，我把修理汽车的技术运用到修理大炮上。数月后，我被派到保山与其他人员会合，后被分成两个分队，每队约10人，我被编到第二分队，共9人。其中美国盟军5人，中国军4人（徐汉生、殷华生、曹民三、何应强），由队长徐汉生和一个名叫克罗纳的美国盟军中校带队。徐汉生是个技师，也是从南洋回来的，他专门负责修理望远镜和指南针，还兼翻译。大炮的其他部位属于机械性的修理是由我负责并兼开车。大炮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武器，弄不好，不仅杀不了敌人，反而会伤了自己人。所以我们对大炮的修理都很认真仔细，修完以后还要当场检验。有的大炮炮筒炸烂了，就换一个；撞针断了、秃了，要换、要磨；大炮因弹簧失灵，进退运转失灵，要调节；瞄准器失调打不准，要调整。我们是游动修理队，在一地修理完后又马上转到另一地，每到一处部队都很重视，派专车接送我们，官兵们对我们修理的技术很满意，并且颁发纪念奖状给我们。我们先后到过下关、大理、凤仪、弥渡、巍山、云州、祥云等地，也就是怒江以东地区，为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十一军、三十六师和独立炮兵营等部队服务，修理各种不同类型的大炮，我们的工作为滇西战役大反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4年冬，中国部队开始向占领缅甸和滇缅公路的日寇反攻。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们要随部队到怒江以西的阵地上去服务。部队给我们分队每人配备了卡宾枪、子弹和行军食宿所需用品。除了要求枪自己背着以外，其他东西由骡马驮着，人则步行。我们白天赶路，晚上在山林里挂起睡袋就寝；渴了就喝自备的水，饿了就吃罐头干粮，日夜兼程赶到怒江边，将早已准备好的美式橡皮艇吹胀，坐上橡皮艇顺利地渡过怒江。记得有一次，在赶往象达的途中，我

们走了几天几夜，又累又渴又困，这时自备的水已经用完了。因为白天赶着骡马去找水目标太大，加上我们宿营地离日军很近，只好等到天黑才敢下山找水。到了晚上，我一人牵着骡马慢慢地往山底摸去。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怕被毒蛇咬，想用电筒照路，又怕日军“游击队”发现，几次被锋利的草割伤了手脚，还踩中了死尸，使我毛骨悚然。但为了战友能喝上水，我壮起了胆子，什么都不怕了。到了山底下发现有一条小溪，我乐极了，立即从骡马背上取下两个铁卡桶到溪边盛水。花了10多分钟才盛满。正当我要回宿营地时，却碰上了日军“游击队”夜巡路过，我当即趴下，被惊吓出一身冷汗，动也不敢动。等了半个钟头，日军走远了，我才喘了一口气，赶紧牵着骡马将水运回宿营地。经过四天的跋涉我们才到了象达。这是同日军作战的前沿，离象达三四公里处即是我军同日军作战的红岩山阵地，我军第一、二、五、六、五十三、五十四、七十一军和三十六师部队轮番向占据在红岩山阵地的日军发起进攻。驻守红岩山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凭借着红岩山上所修筑的坚固地堡工事负隅顽抗。我进攻部队的大炮整日打个不停。我们第二分队是给第五十三军、第二军修炮的，他们的大炮一被打坏，就拖下来给我们修。这些家伙非常笨重，来回拖虽说仅三四公里，却很费时。我们干脆上阵地抢修，一边修炮一边参战。能亲手痛击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南侨机工所企盼的。苦战了两三个月，仍攻不下红

前方为抗日将士们修理各种大炮、机枪等军械。这一阶段，与合作的美国军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结下了诚挚的友谊。直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美国军人要回国，在保山惜别时，美军中校特别给我们每个人颁发了奖状，他对我们说：“这张奖状也是一张进入美国的特殊通行证，只要你们拿着它到美国大使馆，你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到美国来，希望后会有期。”虽然我没有到美国去，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也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可那段抗战经历却让我永远难忘。

可惜，在抗战时期获得的奖状连同其他证书，在“文革”期间全部被付之一炬了。幸亏我的老伴胆大心细，把三枚纪念章保藏下来。第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第二枚是“华侨互助会会员证章”，第三枚是“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纪念章上刻着：“保卫祖国”、“捍卫祖国”。今天看起来，倍感珍贵，闪闪的金光，更昭示了我们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心。

二

父亲不仅是许多人眼里为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民族英雄，而且也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身的劳动模范。

1946年，父亲完成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神圣任务，复员了。此时内战爆发，父亲期待着早日重返马来亚与家人团圆的愿望未能实现。为了谋生，父亲毅然回到祖籍家乡广西北流。经昆明广南昌公司老板林翼南的介绍，给私营老板戴羲开车。

1949年全国解放后，父亲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加入到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广西玉林建泰社汽车行开车。1950年被评为一级驾驶员。1952年因工作需要，先后调动到广东高雷区垦殖场、湛江市粤西垦殖分局、湖北省运输局汉口总站等单位开车。父亲工作认真积极，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安全行车几十万公里，没有发生过大小事故，成绩显著，1956年被评为湖北省运输局“劳动模范”称号，年年被评为单位先进生产者。1957年父亲商调回到广西边远山区百色县，分别在百色汽车总站、凌云县机械厂、凌云县商业局等单位开车。父亲对党一片忠诚，生活俭朴，吃苦耐劳，为人老实厚道，与邻里和睦相处，在我幼年时留下深刻的记忆。记得我们家的邻居梁主席，因患严重的胃病，做了胃切割手术，需要吃米饭补充营养。那时正遇“国家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受限制。当时党和政府非常关怀照顾华侨，我们家凭父亲是爱国华侨享受着优惠政策，每月都能供给几斤大米和杂粮。为了帮助邻居梁主席克服病魔，

渡过难关，父亲把每月享受优惠的几斤大米送给他，使梁主席很快就恢复了健康。1964年，父亲由百色凌云商业局调到南宁地区林业汽车队开车。当时车队领导对接收父亲调入工作不太满意，主要是嫌父亲年龄偏大，再加上有子女9人，怕我们全家会给单位添麻烦，因此在安排工作时，对父亲非常歧视和刻薄，把车队最残旧的、烧汽油最多的、跑得最慢的8号解放牌车辆安排给父亲驾驶。那时车队专跑南宁地区管辖的马山、上林、上思、宁明等15个县森工站运输木材，路况很差，运木材重，车更难走，所以年青司机都不愿意去这些最难走、最危险的山区森工站。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下，车队专派父亲去这些地方运输木材，一去就是几个月，直至完成运输任务才返回南宁。父亲对领导的调配安排毫无怨言，从来不向领导反映有任何一点困难。一年365天，天天出车，从未休息过，有时感冒发烧也不休假。每天都是早早就出车，很晚才收车。尤其是在“文革”动乱期间，父亲一心一意“抓革命，促生产”，不参加“派性”活动，不参与打、砸、抢。车队的同事们都参加“武斗”去了，可父亲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努力完成国家下达的林业运输任务。而车队个别领导对父亲这种“执著”的精神，指责为“逍遥派”。父亲爱护汽车就像爱护自己一样，经常利用卸货时间检查、保养车子，他开的车子如同新车一样。父亲还乐于帮助同事和年青司机，在路上碰到抛锚的车子，父亲总会停车帮助修理。有的同事病了，有困难找他，父亲都会尽力相助，甚至为同事顶班，为同事煎药擦药。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做人一定要忠诚老实，不要贪精学懒。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要给予帮助。一个人没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哪能立足于社会呢。”父亲的教诲，我们每个子女都铭记在心，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十几年来，父亲就是这样，用他辛勤的劳动和汗水，精湛的驾驶技术，驾驶那辆破旧的8号解放牌汽车，走南闯北，走遍广西的每条崎岖弯路。在艰苦的环境下，创下了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年年为单位节约汽油2000多公斤，安全行车120万公里的记录，为企业创效益，为国家作贡献。但当时受“左”的思潮影响，单位领导认为父亲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父亲的感人事迹和典型经验不仅没有得到宣传和表彰，甚至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政治上的歧视，但父亲却没有说过一句怨言，而是保持南侨机工特有的本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数十年如一日，直至1979年退休。

三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退休后，父亲被南宁市第三汽车运输公司聘为教练员。父亲对教练员一职非常认真负责，虽然

已年近70岁，但精力充沛，记忆力清晰，动作敏捷。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开车技术无私地传授给年轻一代，为公司培养出一大批青年司机。由于父亲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憨厚老实，为人师表，深受公司领导和徒弟们的尊敬和爱戴。

后来，父亲和母亲一起，又在南宁汽车客运总站行李托运房干包装工，每天起早贪黑，风雨无阻，默默无闻地奉献，为旅客行李托运包装，几年来从未出过包装质量问题。南宁客运站是一个对外的窗口，服务的窗口，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下车，车站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南宁的文明形象。因此，父母亲在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对待顾客非常热情和气。看到旅客有困难，就慷慨解囊给予帮助，看到不讲文明的人敢于批评指正，而且每天把工作场地扫得干干净净。父亲这种干一行爱一行的崇高精神，深受车站领导和顾客的好评，荣获南宁客运总站“五讲四美”先进个人称号。

1992年，父亲和母亲首次回到马来西亚探亲。父亲离开马来西亚已有50多年了，家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他的祖父母、父母、四妹和妹夫都相继离开了人间，只剩下三妹（父亲回国时，两个妹妹还很小）和表兄弟、表姐妹。兄妹相认，拥抱痛哭。三姑对父亲仅有的一点印象也记不清了，边哭边喊：“我的唐山哥哥回来了……”这场面令人心酸落泪。父亲和母亲在马来西亚探亲期间，亲眼目睹了马来西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以及人民安定小康的生活，深受启发。两老回到南宁后，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忘了自己的年龄，打报告申请了个体户工商执照，在自家旁盖了一间小店铺，经营糖烟酒杂货买卖，成为南宁地区南区宿舍大院里第一家糖烟酒杂货店。他们买卖公平，待客如宾，送货上门，服务周到，很受群众的欢迎。

作为子女，我们感到父母亲为国家社会、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应该让他们安度晚年了。但我们劝说不动，一些相好的同事和朋友也来劝说，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坐着吃“闲饭”，更不愿意向子女伸手要钱。而且，他们把三年来辛苦经营积累的一点钱，除了供给孙辈读书外，其余全部无私捐赠给灾区和社会公益事业。

半个世纪以来，父亲经历了不少磨难和坎坷，但他毫无怨言。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他被戴上“里通外国”、“历史不清”、“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等帽子，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来，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甚至牵连子女的就业、参军、入党、考大学等。面对政治上的迫害和种种歧视，父母坚强不屈，毫不妥协，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乃至中央提出申诉。但父亲却总是对我们说：“我是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参加抗日服务，打日本鬼子的，是爱国行

动，不是回来享清福的。”

我父亲对党、对祖国始终是赤胆忠心，他对回国参加抗战服务始终无怨无悔。他坚信“南侨机工回国抗战这段历史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肯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全家迎来了春天。1984年，我父母亲因“南侨机工”这段历史被扣上的莫须有“罪名”终于得以平反。1990年以后，父亲虽已耄耋之年，但他那颗“赤子心”未老。为了缅怀战友，教育后一代，继承陈嘉庚先生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南侨机工”为民族解放献身的精神，他每年都要和母亲一起，或者携带子孙，自费到昆明参加“七七”纪念活动，凭吊当年为国捐躯的南侨机工战友。

1998年8月23日，是我们全家最悲痛的日子，父亲与世长辞了。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对党的事业、对人民赤胆忠心，无怨无悔。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他是一位无私无畏的爱国者，是我们最爱戴、最怀念的伟大父亲。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每当想起参加中央电视台“重走滇缅公路”摄制组拍摄工作那段日子时，我心里总感觉父亲没有离开我们，他那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的面容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在鼓励我要把那历尽沧桑、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滇缅公路的历史镜头拍摄下来……我为三千两百多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史实而感动！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其赤子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66周年。回顾历史，我们怎能淡忘抗日战争那段惨烈的历史，怎能淡忘我们自己当年的抗日英雄！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一些国家仍抱着冷战思维，害怕、敌视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在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其当政者更是不顾周边国家的人民感情，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又企图修改本国的教科书以美化其侵略历史。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作为南侨机工的子女，我们一定要学习父亲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南侨机工”的精神，高举爱国旗帜，坚决拥护《反分裂国家法》，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积极努力。

看电影《海外赤子》引出父亲张金炳的故事

张烈明

1995年8月5日，我的父亲和我们永别了。他悄悄地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心。他爱国爱民的形象，将永远牢记在我们心里，永远鼓舞着子孙后代。

—

父亲是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团员，但他从不张扬。我也是12岁那年才开始知道一二。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跟着父亲到农科院露天影场看电影，片名叫《海外赤子》。讲的是抗战时期南洋群岛的青年华侨四处奔走，为抗日救国演讲、呼号、募捐的故事，内容非常生动，催人泪下。散场后我们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路上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太真实了！太真实了！就像当年一样。”“爸，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好奇地问道。“怎么不知道呵，你爸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爸，那您也是海外赤子？！”我拉着爸爸的手，又好奇又激动地问，“爸，您是怎样成为海外赤子的？”

父亲一下子拉开了回忆的闸门：“30年前，爸在马来亚侨居。也是这样炎热的天气，我们踩着自行车，背着木箱，走家串户宣传抗日、募捐救国，每天早出晚归，要跑好几十里。记得有一天跑山路，太阳火辣辣的，累得晚上回来吐了血，这是第二次吐血了。小时候被地主仔打伤吐过血，留下后遗症，经不起折腾。当时，老叔看着心痛（这里指的老叔就是我的叔公，父亲是跟随叔公出国侨居海外的），劝我不要再去了，但一想到祖国危在旦夕，第二天，我背起箱子又出发了。”

“后来呢？”我急着问。“当时国内缺乏汽车司机，号召南洋华侨机工，组织服务团回国支援抗日，爸一心想参加服务队，又苦于不会开车（父亲当时是在叔公店里当会计），急得要命，于是马上去学习开车，用了一个多月的



青年张金炳（张烈明 提供）

时间获得驾驶证。这下可把老叔急坏了，他百般阻挠，不让我回国，还给我找了个对象，想留住我。但报国心切的我，看都不去看一眼。老叔急得眼泪直流，苦苦的挽留，我就是不听，老叔说我脾气犟。”“爸，叔公为什么不让你回国抗日呢？”“也难怪他，你想想，哥哥把儿子委托给弟弟照顾，弟弟能眼睁睁地看着侄儿去打仗吗？若有三长两短如何向哥哥交代呢（这里的“哥哥”指的就是我的爷爷，“弟弟”就是我的叔公）？所以他死活不让我回国，但无论如何也动摇不了我回国抗日的决心……”父亲的一席话让我好感动，我对父亲的故事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后来，我父亲经过一番努力，说服了我的叔公，终于出发了。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一个海外赤子，应着祖国的召唤，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征程。那时他 25 岁。

回国后父亲先在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队运输人员训练所集训，毕业后编入华侨运输第一大队（大队长是刘贝锦）。由于父亲过去搞过会计工作，被任命为大队部的车务副官，负责调派车辆，记述车辆的动态，造送报表等工作。后来又调到第二中队任副队长（第二中队队长是张智源），协助队长搞队务工作，如派车、送车进厂维修、救济车辆等等，直到日本投降。

父亲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参加抗日战争一共 6 个年头，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许多南侨机工战友先后为祖国牺牲了，父亲也翻过车，流过血，但还是活下来了，他是个幸存者。

二

忧国忧民是父亲一贯的思想。“抗美援朝”时，父亲正在昆明会计学校当教员，当时国家比较困难，半年才发一次工资。一次正遇上发工资，上级号召为抗美援朝捐款，购买飞机。父亲当时毫不犹豫一下子把半年的工资都捐了出来。同事们都劝他说：“老张，你就捐一部分吧！家里还有妻小在等着用钱呢！”可父亲没有接受大家的劝告，他认为国家的困难是大事，小家的困难以后再想办法解决。他最终还是把钱全捐了，大家都说他脾气犟。当时我们三兄妹还很小，最大的哥哥才 7 岁，最小的我才 4 岁，跟着母亲和爷爷在广东潮州乡下，只靠母亲一个劳力维持全家，生活好苦。父亲一不寄钱回来补充家用，我们的粮食就接不上了。我长大后听母亲回忆起那个年代还很伤心。她说去跟人家借米，总说等孩子他爸寄钱来，马上买米还，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寄钱来，借多了再去借都不好意思了，但没有米下锅，还得厚着脸皮去借，到了人家门口，还没开口眼泪就往下流了。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父亲把钱都捐给抗美援朝了，也就

不再埋怨他了。妈说：“你爸就是这样，为了国家就不顾小家了。”

三

父亲读过两所大学，有着两本令人羡慕的本科毕业文凭。

他为什么要读两所大学呢？他在自传中亲笔写了这样一段话，他的爱国心在这里闪光：

说来话长，解放前我就听说“中国是以农立国”这句话。但是亲眼看到的却是粮食不足，还要靠进口的不合理情况。这使我对农业知识有了迫切的要求。

1952年全国高考，我便立志要学农，想为祖国的农业有所贡献，故报高考时，在填志愿学科五个志愿上都填个农字。结果如愿以偿，被录取进广西农学院农学系学习。

父亲在自传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读书的思想动机就是为一个“农”字。他想到国家急需农业人才，立志学农，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从而报考农业大学。这样，父亲就以同等学历考进了广西农学院，离开了昆明平正会计学校教师的岗位，走进了大学的门槛，当起了大学生。他没有读过初中、高中，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可以想像他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考上大学，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读完大学，更何况当时他已经是38岁的人，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经济上要克服的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可他心里想的是祖国的需要，其他都不放在心上。张智源（他与父亲是堂叔侄关系，他比父亲大，但辈分又比父亲小。关于我父亲作为南侨机工的事迹，还是他的夫人杨应吟讲给我听的）及其他同事都劝他不要去读书，他就是不听，他们都说他脾气犟。父亲既要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又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他只好一边读书，一边找工做。读书六年期间，仅回过一次家，我们兄妹三人对父亲都很生疏，以至1959年跟随母亲调入父亲单位时，见了父亲都不敢认，也不敢喊爸一声。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西农学院，分配在广西农业厅工作，广西农业厅又保送他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继续深造。这样又读了两年，共六年。他说本来不打算再去北京读书的，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于是我乐意接受了”。这就是父亲的心里话。

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农机研究所工作。他刻苦钻研，兢兢业业，为广西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1960年他研制出“湘桂—59式水稻收割器”，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水稻的收割量，因而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局的奖励。1978年，他退休了。由于在“文革”中受到折磨（“文化大革命”时，父亲挨批斗，整天写检讨，父亲如实反映南侨机工抗战情况，却讲他在摆功，父亲说：

“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有误，你们可以枪毙我……我热爱祖国，热爱党，我听从处理，我有罪……”群众讲他犟。的确，父亲当时都懵了。那场运动把人扭曲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那时父亲身心都受到很大伤害），父亲身体不太好，但退休后仍发扬有一分余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主动承担农机所防火治安工作，工作负责，成绩突出，连年被评为“防火先进工作者”，并获嘉奖。

父亲的一生以自己的诚实和热情紧跟祖国的需要，默默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表现着他始终如一的赤子之心。

（张烈明 任职于广西省农业机械学院）

泰国第一批回国抗战机工陈玉进二三事

陈文义

我们的父亲陈玉进，是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之后不久，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最早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南侨机工中的一员。

父亲1913年出生于泰国彭世洛府，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在曼谷谋生。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会说国语、粤语及家乡海南方言，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无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家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南侨同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赤诚，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活动中。父亲正值青春年华，且有一颗赤子报国之心，祖国的安危岂能置之度外？他极力说服了我的祖母，率先报名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秋，他毅然与热恋中的女友分手，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与其他30余位爱国青年一起组成回国服务团，踏上了抗日的征程。他们是首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泰国华侨青年。

经过7天的颠簸，父亲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广州港，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欢迎，并直接由《广州日报》社记者黄先生接待采访。随后父亲被派往广州西南运输处工作，担负广州、九龙、长沙、汉口等地的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不久后又随中国红十字会第26卫生处奔赴前线，运载伤员到后方医院。之后又到滇缅铁路局运载军用物资和铁路物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无论受命到哪里运输，都凭着对祖国母亲和同胞亲人的无限热爱、对日本侵略者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克服一切困难，顺利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运输任务。1942年缅甸、云南沦陷，父亲和几位一起回国的同伴们失业



青年陈玉进（陈文义 提供）

了，开始走上自谋职业之路。在被遣散的困难的日子里，父亲仍不忘报国，又和同伴一起加入盟军，先后在英军情报机关、美军505汽车队服务继续参加战斗，直至抗战胜利。他们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从1938年踏上祖国的土地投身抗日战争时起，无论在枪林弹雨的前方战线，还是在随时可能遭到敌机狂轰滥炸的险境中，无论路况如何不好、生活如何艰苦，他与他的同伴们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凭着精湛的技术出色地完成任务。

父亲在盟军服务时，有机会返回泰国执行任务。为了他的安全，亲友曾劝他留下不要再回国。虽然我们的五叔在家乡参加琼崖纵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这没有动摇父亲抗日救国、报效祖国的决心。

抗战胜利后，父亲留在昆明车行开车。此时父亲和母亲结婚建立了家庭。期间，经陈嘉庚先生多方交涉力争，回国抗日的华侨勇士可以返回南洋。父亲也办好了他和母亲返泰的护照、签证等，眼看就能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团聚了。但事不凑巧，这时一位同伴有难需要资助，父亲拿出返泰的路费帮助他，从而错过了出国与亲人团聚的机会。

解放后，父亲随几位一起回国的机工定居广西南宁。几位机工同伴合资经营一间小咖啡店。由于父亲没有资金，便和母亲到同伴的咖啡店做工。公私合营后，父亲进入南宁市饮食公司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和其他南侨机工一样，未能逃脱这场浩劫，被戴上“里通外国”、“政治历史不清”等帽子，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来，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9年，50多岁的父亲带着全家回到祖籍地——海南岛劳动改造。临别南宁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启程的前一天，父亲的三位战友来送别。他们用泰语谈论着，先是小声细语，感叹人生坎坷，最后一致约定：互相帮助，互相照应，互相勉励，勇敢面对生活，顽强的生活下去。说到激动处，几位老人竟唱起了他们回国抗日的南侨机工《出发歌》：“车在我们的手上，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奔赴沙场……”

此情此景，他们的满腔激情，让我们在场的子女感动得泪流满面。是啊，我们的父辈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勇赴战场不怕流汗流血，经受不公平待遇、历尽坎坷却无怨无悔。这是何等的坦荡胸怀，何等的豪情壮志，何等的可歌可泣！我们晚辈深受震撼。写到这里，我由衷地为父亲感到自豪：父亲无愧为爱国华侨，无愧为回国抗日的南侨机工！

父亲被安排到农村劳动改造，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无论如何困难，都能苦中作乐。他一贯乐善好施，乐于解囊相助。在家乡，无论是乡亲，还是生产队遇到困难，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挤出钱来以救燃眉之急，尽管他自己的工资是那样的微薄。父亲忠厚朴实、善良温和、乐于助人的品质和美德，深受乡亲们的称赞和尊敬。

1972年回城，重新回到南宁，但原来的公房已取消，全家8口人靠朋友帮助在一家整天机器轰鸣的工厂围墙外搭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竹棚栖身。父母继续回原单位饮食公司上班。父亲单位的工作对他那上了年纪和患有高血压的身体很不合适，但他仍毫无怨言地坚持每天按时上班。做子女的看到他喘着气干活的情景很担心，代他向单位提出换工作，未获批准。最后，工作几十年从没请过一天病假父亲，终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

记得1975年的一天，定居广西贵港当年与父亲一起回国抗日的一位叔叔，几经周折找到竹棚探望父亲。当他看到父亲瘦弱的身躯，憔悴的病容，简陋破烂的住处时，惊呆了。他用泰语喊了一声“玉进”，两位老人便抱头痛哭：“难道我们这伙人就该受这种待遇吗？我要让弟弟（其胞弟当时正随泰国访华团访华）把情况向中央反映……”泣不成声的父亲只一个劲地摇头，拒绝了。是啊，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又何止他们这一批老华侨呢？

在拨乱反正后，南洋华侨机工抗日回国服务的历史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一切莫须有的罪名也得到了平反。1979年至1986年间，我们分别接到为父亲的阶级成分与历史罪名平反的通知书，以及《人民画报》记载当年他们回国抗战的存真照片时，可谓百感交集。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了。端详着照片中父亲慈祥的面容，他的音容笑貌、与他相处的许多日日夜夜，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

父亲勤劳无私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优秀品质，无愧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他的言行教会了我们如何笑面人生，不怕困难挫折，脚踏实地为国家做贡献，他的崇高精神始终鼓舞着我们前进。

安息吧！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同时也永远怀念已逝去的南侨机工父辈们。

（陈文义 南宁市国欢日用杂品有限公司职工，现已下岗）

父亲温南勋爱国报国也艰难

温运通

我的父亲温南勋，1917年出生在印尼邦加岛水胆村，祖籍广东海陆丰。小学毕业后，跟二姐夫学过汽车修理，也曾留校当过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一个爱国华侨青年，父亲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四处募捐，为祖国的抗日事业尽心尽力。1939年3月，他加入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第四批队员。4月6日由新加坡启程，经缅甸回国。在昆明西南运输处培训三个星期后，调到下关当修理工。12月调到缅甸腊戍当司机，日夜运送军火以及各种抗日物资，行进在著名的滇缅公路上。当时的滇缅公路，地上道路难行、疫病肆虐，天上日本飞机不时来轰炸。许多华侨机工不幸被炸死，或因翻车、生病、挨饿而死，当时的艰险可想而知。

在缅甸八莫期间，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个云南盈江的傣族姑娘。日本攻占缅甸前，机工的车队到了昆明，母亲也一同来到昆明。惠通桥被炸断后，滇缅公路中断，机工队也被解散，许多华侨机工没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饿死病死街头的大有人在。父亲会英语，通过朋友介绍，谋得一份加油站的工作。之后又在美国陆军招待所开车。



温南勋和妻子（温运通 提供）

这期间，我大姐、大哥相继出世。一次，父亲开车外出回来，见四下无人，才知是日本飞机来轰炸，人们都躲进了防空洞。其中有个防空洞里只有一位大妈，她好心让父亲进到洞里，自己却靠在洞口，不幸被炸弹击中死去。父亲的手脚也被炸断。当时如果父亲靠在洞口的话，他肯定难逃一死。据母亲回忆说，每当轰炸过后，街上到处是死人，连树上都挂着人体残肢。所有这些都是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母亲、大姐和大哥来到缅甸，再从缅甸回到印尼。不幸的是父亲在一次开车夜行运货时遇上了土匪，小腿被子弹打断。致使两腿长短不一，此后走路一直跛着脚。据说，后来每位南侨机工都能领到两百美金救济金，而中国驻印尼使馆只发给父亲当时荷兰盾的几分钱。

我和我的二哥、三哥及大妹都是在印尼出世的。最小的妹妹是1955年在昆

明出世的。由于父亲从未见过岳父岳母，而母亲又思念家乡。1954年，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回到昆明。父亲被分配到昆明汽车总站做司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又驾车行驶在公路上。我母亲的家乡在云南盈江芒线，因未通公路，所以直到外公外婆相继去世，父亲都没见到他们。这时父亲得了风湿病、胃病。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家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父亲向有关部门申请回印尼，但一直没得到批准，只好在1961年离职来到盈江芒线，母亲的家乡。到了芒线，他再次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出国，并声明：如果不批准，我们全家将自行到缅甸再回印尼。9个月后，大约在1962年初，我们一家步行了几天，风餐露宿，在亲戚的护送下，来到缅甸，暂住在八莫。由于印尼政府不接受我们，三年后，也就是1965年3月，我们一家被缅甸政府遣返回国，安置在广东英德华侨农场。我当时已经15岁了，对前后所有的经历都记得非常清楚。1968年，父亲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关进了牛棚，被戴高帽、剪了阴阳头。由于四处游街还不能穿鞋，他的脚打满血泡，最后连路都走不了。开批斗会时，由我背着他进会场，斗完后又背回牢房。我当时只是个初中生，“文革”前，我在班里当过班主席、骨干。父亲被批斗后，我和妹妹都成了学校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目标。因父亲的问题，我曾被抓去关了一天，给我定的罪状是：在学生中“煽阴风，点鬼火”，和父亲搞“攻守同盟”，破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9年，我离开了学校，来到农场煤矿工作。这项工作极危险又辛苦，但我是个有上进心的青年，在煤矿工作了三年，当上了生产组长，并被评为五好职工。团组织要发展我入团，基层一致通过，队长还要我做采购员，可到了上面就是不批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能进到当时人们最向往的工厂。参军、提干……所有这些都没我们的份。

我们兄妹一直跟着父亲四处奔波，都没念多少书。我本人充其量也不过小学毕业。虽然上过几年初中，但都是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上的，不停的革命，把学业都革掉了。而我的哥哥、姐姐连小学都没念完。如今，华侨农场实行改革，我们全都下岗成为没有土地的村民。因为我们所有的归侨都没有带土地回来。一万多元卖掉了30多年的工龄，再用这些钱去买社保，等到退休时每月就只有约四百元的生活费，没有病痛还可以维持，若有病痛，全部自费。真不敢想像！而我未到退休年龄，只能自谋生路，没有任何部门理你。当然，话又说回来，也有关心群众的部门。父亲在1966年时胃穿孔，因为没钱，在广州一家大医院的走廊上躺了三天三夜。后来一位主治医生收留了他，为他做了胃切除手术。治疗费用无人买单，一位好心的病友提醒他写信给纪委。结果第二天就有人来到医院，要父亲安心养病，所有费用都会解决。父亲当时就感动

得流下眼泪。

父亲的平反是“按敌我矛盾定性，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来平反的。我们儿女都是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对待的。在过后的二十多年中，父亲不断地写信上访，到广州、北京有关部门，要求解决他的历史问题，可是都没得到解决，他的工资以及退休待遇都是农场普通职工的最低待遇。直到他过世（1997年5月19日，刚满80岁）的前几天，才收到一张发自清远市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抗日荣誉证书，外加700元奖金。

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在抗日战争中，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流过血流过汗。直到死，他身上还留有日本侵略者的弹片，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一位华侨的爱国之心。但他走到人生尽头，得到的却是“历史不清，对现实不满”的评价，死都不能瞑目！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缅怀我的父辈。让我们的子女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救国事业流过血流过汗的爷爷；要让他们知道有一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作出过伟大贡献的南洋华侨机工；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人生之路是多么的崎岖，同样的，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又是多么的曲折，要享受和平与安宁，该付出多大的艰辛和代价！

（温运通 广东英德华侨农场职工）

第三部分

红星照我去战斗

谢宾元没有给华侨脸上抹黑

陈 蕾

谢宾元，原名谢星，祖籍广东省三水县。他 1918 年出生，幼年时随母亲到新加坡，14 岁便进了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工，先后在德国人、英国人开的工厂干过活，从事机工工作 8 年多。他聪明好学，勤奋刻苦，掌握了一手好技术。他和弟弟每月薪水约 90 元，要养活六旬的老母亲。全家 3 口人的生活节俭有 30 元就基本够花费了，他们的生活在当时的新加坡可算是中等水平，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略有积蓄的小康日子。

正当谢宾元风华正茂，欲展宏图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侵略者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着祖国母亲的胸膛。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怎能忍受着这一奇耻大辱？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广大爱国华侨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扬，热血沸腾，奔走呼号。

早在谢宾元学徒时期，他就受到一些进步人士的影响，参加了当地共产国际外围组织的进步活动；有机会阅读《救国时报》等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的报纸。他受到启迪：国家不富强，便会落入任人宰割的地步；国家要强盛，就得靠自己。他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希望所在。当他看到日本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对祖国万般蹂躏的记录片时，年轻的血液在沸腾，即刻就下了决心“一有机会就回国参加抗日报国”。1937 年初，他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转为马共产党员。

“七七事变”的枪声，激起谢宾元更大的爱国热情，他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中。他参加组织了南洋“机械工人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新加坡华工抗敌后援会”，是这些爱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们在侨胞中发动募捐寒衣和救济款，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后援会”还经常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发动战争。1939 年 5 月 1 日，年轻的谢宾元作为机械行业的活动负责人，参与组织了万人大罢工，他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1939 年 5 月，在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加坡“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筹集了急救药品、医疗器械、武器弹药等一百多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并通过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委员会派谢

宾元等 16 人运送这些物资到中国。他毅然背着家人秘密做好回国的一切准备，拜托知心好友在他走后再将此消息告知他弟弟，嘱咐弟弟“我救国，你养家”。

二

谢宾元一行 16 人，从新加坡出发，鉴于当时的战事，他们必须先乘船抵香港，然后在越南海防登陆，再入境回国，途中备受惊涛骇浪的折磨，到香港后他又遭到二姐的“扣押”，但二姐没能关住他。他们到海防时，周恩来的副官龙飞虎和丘南章中校等四人，早已等候在码头，远远向他们挥手。

之后在镇南关入境，将途经贵阳、重庆、西安到宝鸡，这是他回国所经历的第一段充满危险的征途。由二十多部车子组成的远征队刚刚驶出友谊关，日军飞机就开始跟踪，只要是晴天，几乎天天“光顾”。上午九点至下午三四点钟，敌机总要沿着公路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过往的车辆及行人。谢宾元和同志们用树叶将车伪装起来，靠树叶遮、路边躲来避开扫射。司机在驾驶室内开车，车上还有人侦察敌机动向，随时指挥车内司机隐蔽。尽管如此谨慎，但仍难免有被击中的。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古人的诗句概括了西南地区道路的崎岖、狭窄和险恶，重庆附近的“吊死崖”就是一个典型。道路狭窄只容一车行驶。车旁是深达十几丈的悬崖，崖下到处是汽车残骸。他们执行的是一项为前线伤员运输急救药品的紧急任务，不容延缓，必须日夜兼程。由于山路险峻，精神要高度集中，丝毫松懈不得。他们并非全是职业司机，又不熟悉地势，即使在行进中特别警惕，仍有两辆车翻下悬崖，车毁人亡。这是一场没有枪炮和硝烟的战斗。谢宾元和战友们只有挥泪向不幸的死者告别，继续那艰难的历程。

在整个行程中最危险的还是过渡口，南方水多，渡口也多。当地摆渡是靠船夫拉着船沿河岸前行，把渡船拉到一定角度，猛然松开，让船顺水流自行冲到对岸。水流湍急，船的存亡全靠船夫凭经验掌握好角度。河里的水奔腾着、咆哮着，似乎要把船上的人吞掉；而天上的飞机不停的俯冲扫射、轰炸，炸弹不时在船的周围爆炸，掀起几米高的水柱，水花拍击着渡船和同志们，随时有船翻人亡的危险。在千钧一发之际，谢宾元把生死置之度外，指挥若定，顽强机智地把一船船的抗战物资安全护送到彼岸。

就这样，谢宾元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了千辛万苦，一次又一次的将抗日物资运达前线，直到西南公路被日军完全封锁切断，他才正式要求转赴延安。

三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头。侵略者妄图尽快的征服中国，对抗日根据地

进行惨无人道的疯狂扫射。抗日前线急需武器、弹药，兵工生产迫在眉睫，由于工作需要，手艺精湛的谢宾元被派往前线兵工厂工作。他急前线所急，欣然从命，放弃了奔赴延安的要求，从此踏上了奠定他以后事业基础的新征途。

1941年1月的一天，谢宾元终于来到山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听说有一位从新加坡回来参加抗战的同志发着高烧，带病坚持步行十多天来到前线，志愿从事兵工生产，便亲自到谢住的窑洞看望他。“总司令看你来了”，同伴们的声音掩不住兴奋，谢宾元不顾浑身病痛，一下子跳下炕来挺立在那儿。这是一个让他永生难忘的日子。总司令亲切和蔼地同他交谈了二十多分钟，询问他一路好走不好走，过国民党封锁线顺利不顺利，还特别关心海外华侨对抗日的态度。谢宾元激动地告诉总司令，海外华侨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在国外经常看报，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战况。朱总司令听后非常高兴，连说了几个好。总司令对他的关心，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首长的关怀。



谢宾元（前左二）重访山西武乡梁沟兵工厂旧址（1970年代）

初到武乡梁沟兵工厂，一切都那么陌生。衣、食、住、行与在新加坡迥然不同。新加坡气候温暖、湿润，这里冬天棉袄、棉裤、棉鞋全副武装，行动极不方便，久居城市走惯柏油马路的他在这河滩、山沟里还真有些步履艰难呢。在新加坡时吃大米、白面，这里是未经打磨的煮墨豆和玉米粒，他的肠胃本来就不好，现在吃这些东西更难消化。生活上的不便，环境的艰苦，并没有使谢

宾元灰心退缩。他顽强地努力与其他同志同甘共苦，不搞一点特殊。

日寇扫荡频频，在斗争中他们很快摸索出一套反扫荡的方法。谢宾元和同志们经过无数次演习，掌握了一套能使一座千人兵工厂在一小时内化整为零的方法。他们把机器分埋在七八里外的山沟中的神速、机动的战术，使日本鬼子一再扑空，败兴而归。1942年5月日寇发动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总部、军工部和抗大。日军不惜血本，调动飞机、坦克气势汹汹地向我方扑来。这是一次最野蛮最残酷的强盗行径，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炮弹从头上飞过，子弹在脚下呼啸，谢宾元三次冲出敌人包围，有一次不得不跳崖滚着下山，凭机敏才保存了生命。

战地生活极其艰苦，但谢宾元和同伴们依然情绪高昂，每天唱着革命歌曲，干得热火朝天。谢宾元无保留地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受到大家的尊敬。

梁沟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虽比其他工厂多，但仍很不齐全。厂里没有砂轮机，车刀磨损后，就得用磨盘改制的手摇砂轮机去磨，但因手摇速度太慢，磨不动车刀。谢宾元就动脑筋、想办法，摸索出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红热时用锉刀锉磨，再用油石背的土方法，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一道道难题，以简陋的设备生产出良好的武器。

1944年9月，谢宾元被派到到脑子沟兵工厂，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仅20天，就试制成功小型水压机，解决了压制大口径炮弹的关键设备，为人民军事工业开始制造一二〇、一五〇迫击炮创造了条件。由于战争急需，军工部长亲自给谢布置了120门炮三个月完成的硬任务。当时条件有限，要求又特别严格，炮筒公差不得超过2丝（2/7根头发粗细），炮筒中不能有沟，这些全都要靠眼睛看，没有其他办法。战争的需要就是命令，谢宾元迎着困难上，接下了这项硬任务。一连3个月，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常常忘了吃饭。身体顶不住，经常晕倒，但他仍矢志不移，精益求精，终于造出了无论在外观、光洁度还是尺寸上，都完全符合要求的大炮，受到军工部长的表扬。

谢宾元博得人们交口称赞不仅因为他是技术上的骨干，而且因为他热心帮助同志。有一位四川同志不懂得热处理，致使造出的枪筒报废。当时兵工厂里的钢材是战士们流血牺牲用生命换来的，非常珍贵。谢宾元耐心的一遍一遍给他讲，经过苦思冥想，还想出用天上太阳的颜色做样板的方法，使这位同志有了形象的认识最终掌握了这门技术。他对求教者循循善诱一时传为佳话，以致人们一有技术上的问题，就去找他求助。

白天，谢宾元辛勤地工作、热心的助人，夜里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学习，《论持久战》、《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一部部光辉的著作，像一盏盏明亮的

灯，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

兵工厂领导对归侨无微不至的关怀也使谢宾元备感温馨。一次缴获日军的白糖，军工部长派通讯员步行往返两天给他送去半斤；他打摆子，在当时医药奇缺的情况下，特批给他四针奎宁。革命队伍中的情谊，更加坚定了谢宾元革命到底的决心。

四

一唱雄鸡天下白，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光明。谢宾元又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1950年4月，谢宾元被组织上安排到中国第一个重机厂——太原重型机械厂参加筹建工作，并担任车间主任。此间，他在先后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南下调集大型物资设备、组织生产的特殊任务中，攻克桥墩弧度板与加工不锈钢的韧度等重大技术课题。

在大抓农业生产的1960年，配件厂由于产品质量过不了关而耽误了生产。组织上把这一大难题交给了谢宾元，望着那么多人期待的目光，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身为厂长的谢宾元一头扎进车间，与老工人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终于找出关键性的问题，过了质量关，救活了一个厂。厂里的老工人对他极为敬重，“文革”期间，工人们千方百计的保护他，使他少受了许多冲击。

多少年来，谢宾元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谢老已是年过七旬，他欣慰地说：“我没有给华侨脸上抹黑。”

（陈蕃 任职于山西省侨务办公室）

从印度回国的少年机工蒋印生

敖 勇

“舍命才算真豪杰，爱国方成大丈夫。”即将赴渝参加重庆市第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的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成员、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重长司）二十五队离休人员蒋印生先生，仿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汹涌澎湃的抗战怒潮之中。

20世纪30年代末，日寇猖狂入侵我神州大地，一时间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1939年，年仅13岁的蒋印生响应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民族责任感，从印度辞别父亲和殷实的家庭，回到祖国投身到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中。

一个13岁的少年为何敢投身炮火纷飞的战场？现年77岁高龄的蒋印生老人引用古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的话“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作了有力的回答。

当时日本为控制整个中国，对抗日物资加强封锁。西南边陲的云南到缅甸公路成为主要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都赖此通道运输。蒋印生先生一回国就投入紧张的运输工作。他和三千多名南侨机工战友一道，在滇缅公路这条抗日生命线上风里来雨里去，出生入死，为抗日救国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曾被誉为“粉碎日寇封锁战略的急先锋”，为广大华侨的爱国行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3年至1949年，蒋印生因运输成绩显著，被调往美国驻昆明华侨救急总署担任驾驶员，尔后，到贵阳国民政府汽车七团担任驾驶员。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蒋印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西藏军区任驾驶教官，为部队培养了众多的驾驶人才，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一、二、三等功臣和“军区积极分子”以及“军区最高政治荣誉”称号。

1958年，蒋印生因在部队功勋卓著，在部队精简中受到组织的特殊照顾，安排到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十五队（现重长司二十五队）任驾驶员。在地方驾驶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安全行车，爱护国家财产；在十年动乱中一心扑在工作上，不为名不为利，以娴熟的驾驶技术被评为本队第一名特级驾驶员。十年“文革”动乱后，通过党组织的长期培养和考察，1979年7月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及全国侨务工作会议。1982年当选为二十五队工会主席，直到1990年退休。其间，蒋印生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当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永川市人大代表及永川市政协常委。

蒋印生祖籍广东，祖父一代长年在东南亚各国做生意，家住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格答。1979年80高龄的老母亲通过外交途径终于找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蒋印生先生。1980年，蒋印生有幸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出生地——印度加尔格答。母子相拥畅述离别之情，母亲和兄弟姐妹劝他留在印度殷实的家庭，他动情得对母亲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心在中国。在印度时，他还拒绝一台湾国民党国大代表以十分优越的条件作许诺，游说去台湾。他祭别老父，挥泪老母，从印度回国后，仍然一心扑在党的侨务工作上。

1990年，蒋印生光荣离休后又被推选为二十五队退管会副主任和退需党支部书记。他由于工作出色，先后多次被评为原四川省、重庆市、永川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并参加了重庆市第一次归侨侨眷大会。他所在的退休支部被评为重长司先进支部，他个人也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蒋印生从少年到如今已逾古稀之年，他想到和做到的就这么一点：为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为祖国的繁荣和完全统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58年在华北军区后勤部服役时的蒋印生（蒋印生 提供）

（敖 勇 重庆《时事人物》杂志记者）

父亲程龙庆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车队服务

程晓华

我的父亲是一位历经沧桑而又很幸运的机工老人，是当年抗战期间回国服务的三千多名华侨机工幸存在重庆的四位老机工之一。

父亲出生在新加坡，3岁丧父，13岁丧母，在表兄的工厂当学徒，学习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新加坡的华侨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焚烧日货。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号召海外侨胞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内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整个马来亚。

当时父亲才18岁，正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祖国遭难心里很痛苦。他满怀爱国热情，坚决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通过考试，第五批回到祖国。

1939年5月19日，父亲从新加坡港出发，乘船在海上颠簸了两天后到达安南，又搭原船经过海南岛到达香港。在香港稍事休整后搭乘原船驶向越南海防，在河内办完入境手续，再进入镇南关附近的凭祥县。他们从这里驾驶着20辆汽车向重庆方向出发，路途中遭遇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最后经广西过贵阳到达重庆。

在重庆，父亲被分配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今红岩村）车队。休整五六天即出发到西安参加训练班。训练时间为3个月，早晨起床是早操要打背包跑步，上午下午是办事处的干部讲课要学习革命的道理，课余还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如：篮球赛、演文艺节目等。训练结束回到重庆后，只有父亲一个坚持留在车队，其他的人因怕吃苦相继离开了。

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车队，父亲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他俩经常用广东话问“小鬼，生活还好吗？习惯不习惯哪？”两年时间里，父亲三次驾车到延安。为了安全，车队每次至少有5~10辆车一起装运物资、一起出发，大部分是运送药品、汽油等急需物资，有时顺便护送地下党、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到延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拖延遣送机工回南洋。大多数机工都急于复员返回南洋，而政府又无具体办法和行动来协助，父亲与其他19名机工联名致函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通过表兄洪水星在《南洋商报》全文刊载此信函。

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才决定解决护照申请、路费等问题。因种种原因，父亲错过了回马来亚的机会，留在了中国。

解放后，父亲在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作，当公共汽车驾驶员。他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安全行车标兵。父亲60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接连出席了市第一、二届归侨侨眷侨代表大会。市政府有关部门、侨办、侨联对父亲很关心，逢年过节都到家慰问、关照，或邀请他参加市里举办的节日茶话会。

1961年困难时期，父亲对一中、三中读书的华侨学生很关心，还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这些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学生节假日经常到我家来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学生们亲切地称父亲为“程哥”。有些学生回国时父亲还会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帮助他们平安回家。

父亲晚年幸福，家庭和睦。作为南侨机工后代，我们要继承老一辈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向父辈学习。



晚年程龙庆和儿子程晓华

南侨机工蔡明训从士乃到延安的抗战纪实

林卫国

提起马来西亚归侨、太原南城区北营办事处离休干部蔡明训同志，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南侨之宝”。他是1939年从马来亚回国参战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的成员。抗战爆发以后，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共有3200余名。而今，在国内幸存健在的不足百人；而在山西，蔡明训是唯一健在的“南侨机工”。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成了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不过，由于他一直坚持参加劳动，得到许多锻炼，身体还算硬朗。谈起从南洋回国参加革命的经历，他眉飞色舞，格外兴奋，仿佛又回到年轻时代。

出国谋生

蔡明训是客家人，原籍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墩子寨村，1917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当地客家人有出国闯荡的传统。他的父亲曾去过沙捞越打工，二哥从小去了马来亚。15岁时，蔡明训眼看快到当“壮丁”的年龄，他不愿充当国民党打内战的炮灰，于是同几个客家乡亲一道，逃离家乡，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经过一个来月的飘泊，最后落脚在马来亚柔佛州距离首府新山不远的士乃。他的舅舅比他早到这里。亲戚朋友互相照应，为过上好日子而奋力打拼。

20世纪20年代初，士乃还是个“野兽满山跑，毒蛇遍地爬”的荒凉之地。后来，广东揭西河婆镇的客家人陆续南来，聚居于此，筚路蓝缕，流血挥汗，进行垦殖、开发，逐步把士乃建设成一个繁华热闹的华埠。因为揭西河婆人特别多，人们交际沟通一般都讲河婆的客家方言，所以有“小河婆”之称。1929年至1939年，是士乃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口由原来的数百人增至1万余人；街市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戏院100余家。入夜后，灯光辉煌，游人如鲫。这里盛产菠萝蜜、黄梨、胡椒和橡胶，成了柔佛州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货运业也相应发达起来，往来载货的汽车也达到100余辆。

蔡明训起初在一个菠萝蜜园里打工，后来跟一个叫余枝的老乡学开汽车。开始他跟着师傅跑车，从士乃的天成园拉货送往新山和新加坡，天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活很重，收入又很低。有一次他和师傅实在受不了，就向老板交涉，迫使老板为他们加薪。他本来就喜欢钻研机器，加上实践锻炼，很快掌握了驾驶技术。经过严格考试，并花了15元叻币的“手续费”，他终于拿到了一份驾

驶执照。独立驾车以后，他的收入也随之提高，每月能挣 30 元叻币，相当中国大洋 90 块。

告别南洋

1937 年 7 月 7 日晚，日本侵略军借口发动挑衅，悍然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惊了全世界，也打破了华侨在南洋的“淘金梦”。祖国人民在流血，华侨的心也在流血。南洋华侨群情激奋，同仇敌忾，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士乃的爱国华侨黄子松响应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于 1938 年创办了“南洋华侨筹赈难民总会士乃华侨筹赈支会”和“士乃华侨抗敌后援会”，在士乃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

士乃有一座由华侨投资兴建的“黄德茂同乐戏院”，是可容纳 400 多个座位的大型戏院。有时放映无声影片，有时上演广东戏。华侨学校还在这里主办抗日筹款活动，学生们手捧一朵朵“爱国花”，向观众和行人兜售、募捐。遇到这种场合，蔡明训总是踊跃认购。有一次，他还把一个月的工资 30 元叻币，全部捐献给“士乃华侨筹赈支会”。每次得知祖国遭受日本侵略者践踏蹂躏的消息，他总是义愤填膺，恨不得亲自拿起大刀，向着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黄子松先生还出面招募、组织两批爱国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驾驶华侨捐赠的汽车回国参战，而参加集训人员的一切费用均由他负担。第一批共 12 人，由彭士馨担任团长，于 1938 年 9 月 26 日启程回国，蔡明训的两个同乡好友——黄国光和余枝也在其中。黄国光回国后投奔了延安。他写信给蔡明训，介绍延安的情况：说延安是最平等最光明的地方，人人都有工作干，工人、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没有压迫和剥削；又说延安是真正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人人都在为抗日救亡而学习、工作和战斗，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蔡明训看了黄国光的信，心想：“这不正是我所追求和向往的地方吗！”于是，他立刻报名参加士乃第二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于 1939 年 2 月 13 日启程回国。这批共有 15 人，带 14 辆汽车，由马连裕担任团长、徐新准担任监督。蔡明训也负责驾驶一辆崭新的美国制造的福特牌卡车。离开士乃时，当地华侨社团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并在惠州会馆宴请了大家，然后到新加坡集中，连人带车乘轮船出海。

在甲板上，机工们望着茫茫的大海，个个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有人唱起了歌曲《告别南洋》。

蔡明训觉得，每句唱词、每个音符都在撞击着自己的心！他希望早日踏上

祖国的土地，早日投身救亡战斗。

奔赴延安

经过10余天的航行颠簸，蔡明训和团友们到达回国旅程的第一站——香港。他们住在九龙，稍作休整。当时东江抗敌后援会就设在九龙。香港总工会组织了隆重的仪式，热烈欢迎这些即将奔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专门来到技工服务团的住所看望大家。他是个高个子，当时比较瘦，在险恶艰难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性格。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远万里回国参战，证明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四万万同胞都团结起来，是不可战胜的。别看日本侵略者现在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早晚会被咱们打败，滚回他们的老家去！……”廖承志的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博得大家阵阵掌声。在技工休整期间，香港同胞募捐的抗战物资（主要是药品），也把14辆汽车都装得满满的。

离开香港以后，他们乘轮船来到越南海防。这是越南东部沿海的一个城市，离河内不远。回国参战的东南亚华侨，有许多人都取道越南经过海防。在这里，机工服务团住了一个来月，都是集体行动，不许单独行动。在越南境内，开车的全换成越南司机，直到进入两国交界的镇南关，才移交给南侨机工。

进了镇南关，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一种游子见了母亲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而使蔡明训尤其感到温馨的是见到了两个八路军的副官，一位叫龙飞虎，另一位姓谢。他们是专门来镇南关迎接南侨机工的，并负责护送其中愿意奔赴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技工。蔡明训在马来亚时就拿定主意一定要去延安，所以一见两位副官，好比见了老家亲人。他激动地说：“可见到你们了！”龙飞虎热情地说：“我们俩是周恩来副主席派来迎接你们的！”蔡明训焦急地问：“我想去延安，什么时候才能到呀？”龙飞虎说：“这里离延安还很远，一路上你们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他特别嘱咐大家要注意三点：第一、沿途有日本飞机轰炸扫射，要注意防空；第二、国民党军警特务经常抓走华侨学生和工人，所以要统一行动，以防不测；第三、沿途有疟疾等传染病流行，要注意卫生。

技工服务团行进到贵阳附近，曾遭到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因为有两位八路军副官的带领、引导，他们终于化险为夷。到贵阳以后，国民党军队来人拉拢他们，花言巧语地说：“往北的路很不好走，你们就不要冒险去延安了。留在这里也照样抗日，国军欢迎你们这样的有志青年！愿意跟我们走的，现在就给你们每个人发70块钱……”特务分子也乘机造谣惑众：“延安是个大劳动集中营，你们去延安是把肉送进虎口！男的要上前线送死，女的要留下来共产共妻

……”可是蔡明训一点儿也不动摇，愿意继续跟两位八路军副官走。

沿途经过贵阳、重庆、成都时，技工服务团的车辆、物资和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分配给国民党军队。到离开成都向西安、延安进发时，只剩下八路军副官和蔡明训、李文观两个人及两辆汽车了。他俩是铁了心要奔赴延安的，不管有多大的艰难险阻，都绝不动摇！

1939年4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蔡明训和李文观终于驾驶汽车抵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交际处专门开会欢迎他们俩。这时，陕北正值风和日丽、百花竞放的季节。在蔡明训心目中，不仅延安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蓬勃生机，而且每一个人的脸庞上都洋溢着自信和欢乐。从今后，他就要成为他们中一员，共同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工作、战斗。

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延安安顿下来以后，领导立即安排蔡明训到位于余家沟的工人学校（又称职工学校，校长叫张浩）学习。这是党中央专门为提高工人觉悟和文化水平而创办的一所学校。从马来亚士乃回国的第一批南侨机工黄国光也从“抗大”第3大队转到这里学习。蔡明训在国外听说延安有一所坦克学校，自己又有驾驶机动车的技术，便找到学校领导说：“让我到坦克学校学习吧，我要学开坦克，上前线打日本鬼子！”领导说：“延安现在还没有坦克学校。你想打日本鬼子很好，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学好文化知识和军事本领。”蔡明训明白了党中央的意图和苦心，便安下心来，在工人学校学习。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住的是自己开凿的窑洞，每个班十一二个人，除了学习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课，还要出操、跑步、训练。生活挺艰苦，但过得很充实，大家都不觉得苦。蔡明训最感到不适应的，是跳蚤太多，怎么逮也逮不尽，经常咬得他睡不着觉。后来也习惯了。

经过工人学校的培养、锻炼，蔡明训进步很快。由黄国光和队长黄保平的介绍，他在1939年7月27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中央决定将工人学校的学员送到前方去。大家知道消息后可高兴了，说：“这下我们可以到前方杀敌去了！”可是张浩校长对黄国光和蔡明训等人说：“你们几个另有安排，还不能上前方。”他们一听心急了，忙问张浩校长怎么回事。

党校受训

中央党校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在培养学员的过程中，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

组织上考虑到蔡明训、黄国光和陈全3人文化程度偏低（都是初小二、三年级），在编班时将他们编入以政治和文化课为主的班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由班主任杨英杰带领，安排他们到清涧县农村去实习，以便了解陕北的农村农民，获得具体的社会知识。说实在的，蔡明训这些华侨青年对北方了解是很少的，从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到地方语言等等，都很陌生。记得在奔赴延安途中，李文观（后改名鲁浩然）从来没见过虱子，感到好奇，为了看个究竟，特地掏钱让老乡替他捉几只虱子来观察，被大家传为笑谈。在进村实习之前，当地领导专门给大家介绍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说村里的老大娘很纯朴、热情，喜欢打听年轻人是否结婚，如果知道你未婚，就要给你找个“婆姨”（媳妇）。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大家遇到老大娘询问时，一概要回答已经有了“婆姨”。进村后，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因为预先想好了“对策”，所以没有出什么问题。

由于敌人封锁和天气原因，当时农村比较贫困，农民生活相当艰苦。吃的主食是粗粮窝窝头，副食蔬菜奇缺。吃的菜不是一碟自家腌制的咸菜，就是一盘临时用盐调的韭菜叶，即使发了霉也舍不得倒掉，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黄国光吃坏了肚子，住进了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才得以康复。大概是缺乏维生素的缘故，蔡明训有一段时间视力突然下降，几乎看不清物体，经过中央医院一位来自上海的医生的精心治疗，终于恢复如初。华侨青年在患病时，得到了很好照顾。班主任和学员们轮流到医院照顾，还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送给患者。蔡明训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才有这样纯洁高尚的阶级友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命不如一条狗，一旦生病便会被资本家踢出门外。共产党真是好啊！农村实习结束以后，大家返回中央党校进行正常的学习。这时，蔡明训的觉悟已经提高了许多，既知道为什么学习，又知道如何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还经常聆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这也是全体学员最喜欢的“政治课”。他曾经听过毛主席关于声讨汪精卫、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朱德关于“南昌起义”、建军经过的报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叶剑英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经过的报告，等等。这些振聋发聩的精彩报告，使蔡明训这些华侨青年思路大开，有拨云见日之感，更加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大家还有机会看到文艺团体表演的节目，例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对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斗争士气帮助很大。

在中央党校，学员们除了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以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地，自己解决一些食品（小米和山药蛋等）和生活用品，对付日本

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和攻击。蔡明训每次遇到劳动，总是一马当先。他从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身体比较结实，力气比较大，每次挑担子，都是满满两筐，重量在100斤以上。力气小的人，只好用手提一点东西，或者两个人抬一筐东西。他还参加过兴建中央大礼堂的劳动，从山上往工地上运木料，他都是争着扛大头。他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得到过一个用纸板做的奖牌，上面写着“无产者创造世界”的字样，另外还得到过毛巾之类的奖品。后来，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还学会纺纱、捻线。同志们夸他：“没想到你这个开汽车的老粗，还能干这样的‘细活’，真不简单啊！”他回答说：“这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1941年10月，蔡明训和黄国光等人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训练，从中央党校结业。由于学习自觉、刻苦，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文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原来在广东老家初小都没念完，到士乃也没再念书，大字识不了几个；现在提高到初中文化水平，学会了作笔记、写报告，能够看报刊、杂志。他最喜欢看《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特别关注重大新闻和社论。他盼望早一天赶走日本鬼子，好亲手建设新中国。

变成被审查对象

从中央党校结业以后，蔡明训和黄国光都留在陕北，从事财政、税务工作。蔡明训当过收费员、“卡长”、稽查队长。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他都尽心尽责，一丝不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这时的他，已有相当强的党性。首先，是坚决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党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讨价还价；其次，是干工作不抱私心，全力以赴，把自己从事的具体工作当作伟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他对工作太专注了，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有一位女学员对他不错。她是广东老乡，还是个大學生。但蔡明训一直把她当同学、当战友，一点也没有发展关系的想法。在绥德工作时，领导曾出面给他介绍对象，是米脂中学的一位姑娘，他还是没有谈。他总是说：“个人的事是小事，慢慢来。”

正当他一心一意干工作的时候，一场意外的打击降落到他头上。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蔡明训等30多人（主要是青年）被认定为“有问题”的人，集中到绥德办“整风班”，学习中央文件，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上级的审查。“整风班”的成员，有从国外回来的，有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有从根据地来的，有从“白区”来的，还有当地的领导干部。学习的中央文件，除了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以外，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社

会部副部长、情报部长康生的《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康生危言耸听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整风班”领导人还教大家唱《规劝歌》，要大家“摆脱黑暗，走向光明”，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并重申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蔡明训被列入“有问题”的行列，是由于他在一次讨论会上向领导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他文化低，又是从国外回来的，实在想不清这个问题。自己不懂，就要虚心向别人求教，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惹下麻烦。随着“锄奸”运动升级，“整风班”也出现了“逼、供、信”，不少人经不住折磨，承认自己是“特务”、“奸细”。连绥德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娃，也被打成了“特务”。蔡明训也被打成了“特务”，说他的“罪恶活动”是“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可是叫他“交代问题”，他却说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述从老家出国到士乃、又从士乃回国投奔延安的经历。“整风班”的领导人见他是个粗人，对他抓得没那么紧，还经常打发他到伙房去帮忙，干一些诸如挑水、煮饭之类的杂活。这使他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挨打、挨斗、被捕、被关的比比皆是。蔡明训不知道，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理出的所谓“特务”，竟然多达15000余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有70%左右的人在高压下被逼承认是“特务”。西北公学总人数不到400人，竟清理出“特务”208人。

后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到“整风班”视察，发现这里的做法不对头，反映给党中央。后来，中央下令纠正了，并对受打击的人进行甄别。经过甄别，解脱了一大批人。给蔡明训作的结论只有10来个字：“经甄别，不是特务，恢复原职。”

蔡明训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但他并不抱怨或消极。他把参加整风的经历当作经历了一场风雨，经受了一次锻炼。在工作中，他还是那么敬业、认真，甚至奋不顾身。有人说他：“你这么卖命图的啥呀！”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对咱们归国华侨是重视的、信任的。咱们不管干什么的，都要干好，干出个样子来，决不能给归国华侨脸上抹黑！”

人生无悔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将中国人民继续拖入黑暗之中。共产党不得不领导人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7年，精通驾驶技术的蔡明训根据工作的需要，告别地方，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解放战期

间，他随部队转战于华北和东北，参加过许多战役。他虽然没有上前沿阵地去与敌人拼刺刀，但日夜驾驶汽车为部队运送弹药及其他物资，也冒着很大的危险，可说是出生入死。

自从抗战开始，蔡明训就与老家失掉了联系。家里人以为他不在人世了，逢年过节祭奠先人时连他一块哀悼。后来，乡友黄国光回老家探亲，介绍了蔡明训的一些情况，母亲才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高兴之余却不知道怎样和他联系。在华北军区后勤部服役时，蔡明训有一次出差到广州购买汽车器材。经领导批准，请假2天（包括往返行程）回揭西河婆探亲。当时父亲已经客死印度，母亲已经六七十岁，还挑着担子在田里劳动。母子相见，激动万分，有说不完的话。但他实在没法多逗留一些时间，只给母亲留下了5元钱，一碗水没喝完，便匆匆忙忙离家归队了。他又一次尝到了“忠孝难全”的痛苦滋味。

1954年12月，蔡明训从华北军区后勤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国防部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证明书》。本来他可以选择回广东老家工作，但当他知道山西更需要他时，便愉快地到山西工作，一直到1984年离休。在地方工作30年，每次做鉴定时，对他的评语都是这样8个字：“任劳任怨，两袖清风。”有些青年人见了蔡明训住的是普通的房舍，家里的摆设是那么简朴，甚至找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便对他说：“蔡爷爷，你完全被‘赤化’了！”他嘿嘿笑着回答：“我是‘赤化’了，但还不彻底，我还有私心。不过我庆幸自己：自从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那天起，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

后勤部服役时的蔡明训

1989年7月，为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弘扬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兴建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蔡明训闻讯后心潮澎湃，再次想起过去的峥嵘岁月。他认为此举足以告慰全体南侨机工，特别是告慰那些已不在人世的南侨机工的在天之灵！

1995年8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给蔡明训颁发了《荣誉证书》，上面写道：

蔡明训同志响应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满怀爱国热情，加入南

洋华侨机工服务团，辞别亲人，远涉重洋，回国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发此证，以资表彰。

捧着证书，不善言辞的蔡明训只说了一句话：“我为党作了一些贡献，应该！应该！”

(2004年2月20日)

南侨机工黄国光的革命经历片段

林卫国

黄国光 1917 年 3 月 17 日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新埔塘村一户贫困农民家庭。父亲会木工手艺，外出帮人做活。母亲在家乡租种地主的土地，天天早出晚归，拼死拼活，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了 8 岁那年，黄国光缠着父母，要求上学。母亲恳求族长帮忙，于是从公产中拨给一些谷子，供他念了两年书，之后便辍学了。

河婆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在南洋飘泊谋生的人很多，投身革命的人也很多。黄国光的大舅、二舅都侨居马来亚的士乃。他们都是果农，以种菠萝为生，省吃俭用，寄一点钱接济家乡亲人。中国客家人就是有这样的传统：不安于现状，向往变革；敢于冒险，背井离乡，外出闯荡。

出国谋生

1927 年夏天，10 岁的黄国光同表弟表妹一起，由小舅父带领，也踏上了出国之路。动机之一是寻找生活出路，动机之二是保存家族的“香火”。自从彭湃领导工农红军在这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对支持和同情革命的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逃亡国外，也是为了逃避反动派的屠杀。

他们先乘一只小木船到汕头市，而后转乘一艘英国公司的大轮船出国。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黄国光心里充满好奇和兴奋，但也交织着忧虑和恐惧。航行到第二天，轮船突然停滞不前了，原来前方海水中，出现了一头庞大的“怪物”（后来才知道那是鲸鱼）。老板赶紧集合船工烧香叩拜，并向大海里抛洒一种叫“铜圣壳”的祭品。折腾了半天，“怪物”消失了，轮船又继续前行。开船后，轮船老板立即向乘客收取“敬神钱”。

轮船在茫茫大海里颠簸航行了 5 天 5 夜，终于到达了“石叻坡”（新加坡）。在异国土地上登陆以后，黄国光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各种肤色、各种穿戴的人，吓得头都不敢抬起来。舅父带领大家在一个同乡开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乘坐汽车奔赴马来亚士乃。到了二舅家以后，黄国光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次飘洋过海的经历不到 10 天，但黄国光却感觉仿佛度过了几年。从此，他成为一个飘泊异乡的华侨。

历尽艰辛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马来亚士乃还是个“野兽满山跑，毒蛇遍地爬”的荒凉之地。后来，广东揭西河婆镇的客家人陆续南来，聚居于此；筚路蓝缕，开发垦殖，终于把它建设成一个繁华的商埠。因为这里河婆人特别多，沟通交流一般都用客家话或潮汕话，所以有“小河婆”之称。

到士乃的头几年，黄国光一直在菠萝园里帮舅父干活。读书的念头依然经常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他想：将来我要自立，挣钱养家糊口，没有文化怎么成！他几次向舅父提出上学的要求，舅父总是一声不吭，默默流泪。他意识到这个要求确实让舅父作难了！舅父一个人要养活在马来亚的 7 口人，还要寄钱给国内的父母弟妹，千斤重担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哪有多余的钱供他读书呢？想到这里，黄国光再也不提读书的事了。

1931 年初，在黄国光的要求下，舅父将他送到一家茶馆里去当店员。既卖茶叶，又干家务活，一天工作 14 个小时，累得筋疲力尽，只挣一两角钱，还得挨资本家打骂。

由于实在受不了茶馆老板的恶气，黄国光在第二年初，就和一个叫桑美草的小伙伴，跑到新加坡一处种植园主看果园。当时，有个贫苦农友对他们说：“那里野兽很多，太危险了！你们最好别去，为挣几个工钱把命送了划不着。”而他们俩为了生活，已把一切危险置之度外。他们学习当地土著，在大树上搭建一个“窝”，夜间就上去住宿，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夜幕降临以后，怪声四起，不知是些什么野兽跑到树下来觅食，把他们俩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这样，老板一天才给他们 4 角钱的工资。

这样干了几个月，他们又跑到一个石料场去卖苦力。本想工作条件能有所改善，哪知道境况更差：工友们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狗食，每天穿条裤头，光着身子，在摄氏 30 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中连续干活 12 个小时，老板只付 5 角钱的工资。大家不堪压榨，联合起来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地的法院起诉。法院是袒护资本家的，故意一次又一次延期审判，工友们没钱打官司，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工友们忍无可忍，采取了武力抗争的办法，埋伏在路边，用石头袭击了资本家乘坐的小汽车，把汽车砸坏了，把资本家也砸伤了。工友们出了一口气，但也闯下了大祸。石料场再也呆不成了，于是大家就各奔东西，黄国光也就失了业。

流浪了一段时间以后，黄国光在老工友的帮助下，进了新加坡一家橡胶厂当童工。每天每人报酬 5 角，除了吃饭，个人只能得 2 角工钱。资本家剥削工

人的手段可谓“高明”：规定工人只能在工厂的食堂吃饭，每天伙食费按3角计算，而这样的饭菜在市场上只需花1角5分；凭这一招，资本家每天从每个工人身上又拿走了1角5分钱。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有一天，橡胶在滚压机边上卡住了，黄国光用手想把它拉出来，没想到反而把3个手指头压伤了。厂方不仅不给治疗，还在当天就把他赶出了工厂，砸了他的“饭碗”。

黄国光找到的第五份工作，是在新加坡一个叫丹戎加东的地方当装卸工。每天从早5点干到晚6点，中午只有1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活很重，条件又特别艰苦、苛刻。幸好这里有地下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发动工人罢工，向资本家要求提高待遇。新加坡是空运和海运的中心枢纽，装卸任务极重。工人罢工对资本家打击很大，资本家不得不向工人让步，给工人的工资每天由5角增加至8角。黄国光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自从黄国光外出打工以后，二舅父一直得不到他的音信（黄国光当时还不会写信），内心非常牵挂。1933年春节前夕，他苦苦寻觅，终于找到了吃尽苦头、又黑又瘦的小外甥，接回自己家里。他亲切地摸着小外甥的头，疼爱地说：“舅舅知道你是个有志气的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要再胡跑了，去学一门技术吧，有了技术将来也好找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

过了春节，二舅父找人担保，把黄国光送到一个华侨小老板那里去跟汽车（当驾驶员助手）。黄国光干得既勤快又刻苦，开车师傅是乡亲，教得既耐心又仔细。跟了两个月，黄国光就学会了驾驶技术。

黄国光兴高采烈地跑到新山警察局去考驾驶执照。他是有备而来，各项成绩都完全及格。但警官就是不给驾照，说是要先交5元钱什么费。一个穷工人哪来的5元钱呀！没办法只得空手返回士乃。师傅见他神情沮丧，就安慰说：“没关系，咱们可以再考。”第三天，师傅亲自陪黄国光跑到吉打警察局去报考。考试合格后，警官照样提出要额外收取5元钱；师傅二话没说，就把事先准备好的5元钱交给他。这样，黄国光获得了一本驾照，成为正式的汽车司机。

黄国光由徒弟变成师傅以后，表弟蔡明训也来当他的助手，后来也学会了开车。他们当时没想到，日后能凭这项技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大显身手。

学会了驾车，黄国光就拼命给资本家拉货（主要是菠萝和橡胶）。工作比以前相对稳定一些，但也成天要提心吊胆。一是在旺季时资本家光要求多拉快跑，不给增加工资，而淡季时却要减薪甚至裁员；二是在码头、路上，经常会受到警察或流氓的敲诈勒索。为了生活，黄国光和工友们只能咬牙忍受，尽力应付。

投身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先后攻占中国东北三省。海外华侨社会群情激愤，纷纷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马来亚各地纷纷成立“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半公开组织），组织、领导华侨开展各种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爱国侨胞看到国土沦丧，日寇肆虐，同胞身陷水火，认识到唯有团结抗敌，中华民族方有生路。

在“爱国光荣，坚决不当亡国奴”口号的激励下，作为华侨工人的一分子，黄国光不仅积极投身当地进步组织举行的罢工斗争，还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募捐活动，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他节衣缩食，挤出自己的生活费去捐献，而且跟随“后援会”的同志去向各界人士募捐。他们深入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向侨胞和当地人募捐。大家唱着自己编的歌谣：

你一角，我一毫，
涓涓滴滴汇成江河，
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
寄到前方去，
买子弹，购枪炮，
赶走日寇，扬眉吐气，
誓把中国保！

他看到华侨个个心系祖国，无论是大“头家”（老板）还是普通打工仔，不管平时有什么矛盾、过结，在国难当头之时，个个都是踊跃捐款，内心十分感动，说：“爱国的力量，团结的力量，真是伟大呀！”

黄国光在马来亚、新加坡，看到有不少印度人和非洲黑人在给资本家当奴仆，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都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自己才饱受欺凌，抬不起头。心里想：如果国家灭亡了，我们成了亡国奴，不也是这样的下场吗！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真是至理名言呀！他向往着有一天能够亲自奔赴抗日前线，同祖国人民一起战斗、杀敌！黄国光把自己的想法同彭士馨、陈全、郑苟等几个华侨朋友一谈，大家都深表赞同，异口同声地说：“好呀，咱们都回国打鬼子去！”

回国抗战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在土乃爱国华侨的慷慨支持下，黄国光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工人朋友带头组建起“马来亚土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他们很快办妥了两套回国手续：一套是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办理的到

同国共合作的平津 套且通过当地地下党组织黄活安先生办理的到陕北延安

的手续（给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他们早就从黄适安先生的口中，知道国内抗战的情况，知道共产党和毛泽东，知道延安是领导、指挥全国抗战的中心，一心一意想奔赴延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抗日。

1938年9月底，由12名华侨组成的首批“土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从新加坡启程回国。团长由彭士馨担任，团员除了黄国光，还有余枝、李文玉、陈全、郑苟、彭士钦等。彭士钦是彭士馨的弟弟，当时只有十来岁，是服务团中年龄最小的团员。他们共驾驶10辆崭新的大卡车，装满了药品、医疗器械等前线急需的物资。当天，在新加坡码头欢送的人多如潮涌。黄国光看到，舅舅也流着眼泪在人群中频频挥手。

黄国光所在的“土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的第一个团，其时，南侨筹赈总会尚未正式成立。可以说，他们为后来的大批华侨机工回国抗日，起了先遣队的作用。而从黄国光个人来说，真正迈开了追求光明和真理、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第一步。

经过7天7夜的海上航行，他们抵达香港，下榻一家社团会馆里，暂作休整。香港同胞和进步的社会团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们，连续招待他们达五六天之久。最使他们难忘的是，他们通过介绍，幸运地拜会了“国母”宋庆龄女士。宋庆龄女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询问：“你们准备到哪个战区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到西北战区！”“西北战区”表面上指西安，实指延安。“国母”会心地露出了笑容，说：“好！好！”很快为他们办好了相关手续。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热情地接见了团长彭士馨和黄国光。他不仅为他们开了到延安的介绍信，还亲自为他们画了一张沿途行军的路线图。

抵达广州以后，机工团按原定计划，将5辆卡车和所装载的物资送交国民革命军的办事处；然后驾驶停靠在别处的其余车辆，驶离广州，向西北进发。他们离开不久，广州就失守了。沿途大家目睹日军肆虐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景象：衣衫褴褛的灾民在扶老携幼四处流浪，死于轰炸和饥饿的同胞尸横遍野惨不忍睹，马路旁和山沟里到处是被炸毁的车辆……这一幅幅悲惨画面，激起大家对侵略者的无限愤恨，恨不得一下子抡起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1938年10月15日，机工团抵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杨之光等同志热情周到的接待了大家，当即给大家发放了棉衣服和其他用品，说：“你们往北边走，气候会越来越凉，可要注意保暖啊！”各界爱国人士知道有一个南洋华侨机工团到达汉口，也纷纷前来探望、慰问。当地报社记者都来采访、拍摄，纷纷发表消息：“马来亚华侨汽车工人服务队抵汉口，旋赴八路军前线工作”。对南洋华侨的爱国义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休整了几天以后，由于得知国民党

即将弃守武汉三镇，机工团急忙驾车离开，往陕西方向急驰。

不久，机工团终于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天，周恩来副主席、音乐家冼星海夫妇（他们早到一些，也准备奔赴陕北）及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出来迎接机工团，周副主席对大家说：“你们一路辛苦了！虽然还没到延安，但这里也是你们的一个家。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吧！”第二天晚上，办事处还专门为机工团举办了一个欢迎会，冼星海和另外一些同志表演了文艺节目。第三天，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带大家去临潼参观，介绍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活捉的情况，还请大家洗了温泉，品尝了陕西特产小柿子。机工团的团友在海外都是遭资本家压迫的穷“苦力”，哪受过这样的优待！因此个个都有些“受宠若惊”，切身感受到：共产党的“官”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啊！

在西安休息了4天后，机工团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向陕北进发。冼星海夫妇和一些爱国文艺工作者一路结伴而行。在经过国民党军的关卡时，按事前安排，机工团在前，冼星海等人在后。团长亮出了“国母”宋庆龄在香港给大家办理的护照。守关军人看了护照，未发现任何破绽，盘问了几句，大家用广州话应对。他们听不懂广州话，也查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挥手放行。

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以彭士馨为团长的马来亚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第一批机工，经过一个来月的跋涉，历尽艰辛，全部胜利抵达延安。他们离开新加坡后，途经香港、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地，终于投身于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的怀抱！当大家望见宝塔山上的巍峨宝塔，其激动的心情，犹如游子见到了久别的慈母。

党中央、毛主席对投奔延安的第一批南洋华侨机工，十分重视和关心。抵达延安当天，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谭政、交际处的金城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出来盛情欢迎，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他们被安排在“西北旅社”就餐，顿顿提供适合南方人胃口的可口饭菜。机工团个个备感温馨，但内心也过意不去，因为别人吃的都是土豆、小米、白菜之类的粗茶淡饭。

第二天，延安刚好举行有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群众大会。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机工团，并亲自领大家到主席台上就座。彭士馨代表机工团在会上讲了话。黄国光回忆起这件事，感动万分，说：“在这种民主自由的新环境中，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高的待遇！我们这些华侨工人，在国外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地位处境不如牛马。党中央毛主席这样厚待、关怀我们，我们心中的高兴和感激，真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黄国光所参加的回国服务团，是有组织地回国抗日的第一批南洋华侨机工，

是真正的华侨回国抗日先遣队，产生了巨大影响，发挥了带头作用。黄国光与大家一样，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1939年2月18日，就在黄国光他们回国3个多月以后，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招募的华侨机工，开始分批回国抗战。从此以后，在炮火纷飞的反法西斯战场上，出现了一支由华侨机工组成的军事运输队伍，一个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谱写抗战历史的悲壮群体。

延安受训

黄国光在回忆往事时，经常说自己“是个特别幸运的人”，因为他在抵达延安以后，曾先后在延安3所著名的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工人学校和中央党校学习受训。

机工团抵达延安后，天天受到优待。大家真的沉不住气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都说：我们是回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做客的；我们要求跟其他同志一样过艰苦生活，要求立即上前线！大家找八路军总部谭政委反映意见。谭政委和蔼地对大家说：“让大家吃好一点，是考虑到大家刚到北方，生活上一时会不适应。至于说上前线的事，还是要缓一下。毛主席决定让你们先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大家求战心切，憋足了劲儿，坚持一定要上前线。无论谭政委怎么解释，大家都听不进去。最后，谭政委说：“好吧，我再请示一下毛主席吧！”

毛主席对爱国华侨青年的愿望非常理解，说：海外侨胞对我党领导抗日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让他们先到前线看看也好。于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安排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机工团一行赴山西抗日前线，随行还有几个记者。华侨机工在海外从来没有长途步行过，因此行军速度不快，每天只走六七十里。离开延安以后，经过清涧、绥德，渡过黄河，大约走了10天左右，才抵达八路军120师师部所在地——山西省岚县。

贺龙师长、肖克副师长亲自欢迎华侨青年。一见面，大家又提出上前线打鬼子的要求。贺师长笑呵呵地说：“好！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打鬼子的吧！”第2天，贺师长安排几十名警卫战士护送华侨机工和肖克副师长一起，上前沿阵地隐蔽起来，观摩120师部队对日军的一次伏击。当日寇进入我军包围圈的时候，雄壮的号声突然响起，枪炮咆哮，火光冲天，八路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英勇地扑向敌群。经过一阵厮杀，全歼了敌寇。战斗结束后，战地记者还对部分战利品进行了拍照。事后，送给黄国光一张照片。黄国光视为珍宝，保存至今。黄国光一行人从来没见过打仗，这次亲眼看到了一场战斗，受到的教育和

震撼不小。原来打仗光靠热情和勇气远远不够，还要懂得战略战术，懂得具体使用枪炮的技术。贺龙师长在陪大家吃饭的过程中，亲切地和大家交谈起来。他只字不提党校学习的事，只是询问南方生活的情况，又谈到农村有的穷人遭受欺负为了自卫、专门到武馆学习武术，一个人能对付几个人，最后才把话题转到抗日，说：“打日本鬼子是需要本领的，只有学好本领，才能更好、更多地消灭敌人。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是！”贺龙又说：“你们如果能回延安学习上一段时间，再到前线来打日本鬼子，一个人就能消灭几个鬼子，总比你们现在一个拼一个要强得多得多！……”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贺龙师长是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哩。经过这一番开导，大家对于到抗大学习已经没有任何抵触情绪了。于是，在休息了两天之后，贺龙师长派几名战士陪同南侨机工，带着胜利品（包括几十匹战马）返回延安。黄国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被编入第三大队第一中队。在革命的大家庭里，黄国光勤奋学习，领导和战友也热情地帮助他。特别是指导员王庆田了解到他文化程度低，听课有困难，就经常下来对他进行个别辅导，给他吃“偏饭”，帮他学政治、学军事、学射击、学投弹。上级首长非常关心华侨学员学习的情况，经常来中队视察、了解。在这种氛围中，黄国光提高很快。1938年12月，他由指导员王庆田等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得到的最光彩的政治生命！”

黄国光还给马来亚士乃的表弟蔡明训写信，介绍自己和延安的情况。他说：延安是最平等最光明的地方，人人都有事情做；在这里工人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没有压迫和剥削；延安是真正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人人都在为抗日救亡而学习、工作和战斗，中国的未来希望就在延安……他动员表弟蔡明训也到延安来。表弟蔡明训接到信以后立即行动，报名参加“士乃华侨筹赈支会”招募、组织的第二批“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奔赴延安。

1939年初，中央决定将抗大第三大队中的工人学员抽调出来，成立一所新的学校——延安工人学校（又称职工学校），校址设在余家沟，由张浩（林育英）同志担任校长。蔡明训抵达延安以后也进这所学校学习。他们看到不少学员都上前线去了，心里着急起来，一齐找领导磨蹭。张浩校长对大家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是组织上对咱们工人同志的培养。”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黄国光，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对工人同志的特别关爱和寄予的厚望，于是服从组织决定，安下心来继续好好学习。

1940年初，中央决定将工人学校的部分学员派往前方。黄国光兄弟俩和其他华侨工友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次可以实现上前线杀敌的愿望了！那知宣布

上前线的名单时，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一听心急了，立即找张浩校长问个究竟。张浩校长说：“毛主席的意思，送你们几个进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想不通，有的说：“我们从国外回来，就是为了杀日本鬼子，凭什么不让我们上前方？”有的说：“我们已经学到杀敌本领了，现在需要上前方去接受考验了！”七嘴八舌，嚷个不停。最后，大家“逼”着张浩校长去向毛主席反映。第二天中午，张浩校长从毛主席那里请示回来，大家急忙找他询问请示的结果。张浩说：“毛主席还是要求你们去中央党校学习。”又说：“毛主席叫你们明天去一下。”第二天，张浩校长领着黄国光、蔡明训、陈全、杨岳等几个人去见毛主席。当时，叶剑英总参谋长也在场。毛主席说：“听说让你们去学习你们还不愿意？你们可是要吃亏的啰！”接着，毛主席又耐心地开导大家：打日本鬼子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组织起来，才能打败日本鬼子。党中央希望你们这些工人同志多学习一些知识、本领，才能承担党交给你们的任务，把对敌斗争的工作做得更好！……

听了毛主席的教诲，大家感到犹如一股甘露滋润着心田，一切浮躁情绪顿时烟消云散。毛主席见大家情绪已经平和，就说：“走吧！我同你们到中央党校去看看。”就这样，毛主席、叶参谋长和张浩校长3人亲自带着黄国光、蔡明训一行到中央党校。见了邓发校长，毛主席对他说：“我把这些华侨同志交给你啰，将来学习得好不好就看你啦！”黄国光、蔡明训一行异口同声地表态：“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第二天，他们几个人就高高兴兴打起背包到中央党校报到了。

党校领导考虑到黄国光、陈全、蔡明训等人文化程度低，便把他们编入以学习政治文化为主的班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由班主任杨英杰同志带领他们到延安东北部的清涧县农村去实习，以增加他们对国情、民情的了解，并锻炼从事群众工作的能力。在进村前，清涧县的县委书记接见了他们，给大家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他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很穷，但老百姓都很热情厚道。特别是一些老大娘，如果知道你还没有婆姨（老婆），就会给你介绍对象，你想推都推不掉。所以她们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回答说有婆姨了。如果再问婆姨在哪里，你们就说在延安学习……”进村后，许多人果然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有了思想准备，都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当时，陕北农村十分贫困，农民生活条件极差，完全出乎黄国光的意料之外。他很不适应，但怕脱离群众，总是咬牙坚持。没多久，可能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他突然得了急性胃肠炎，还挺严重，结果住进了八路军医院。在病榻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阶级友爱的温暖。同学罗志英、赵雪明等买

水果到医院慰问他，看到他病得挺厉害，甚至急得哭起来；班主任杨英杰看到他身体虚弱，专门买了只大鸡，炖好送到床前喂他吃。黄国光心里清楚，战友们为他花销的，是从自己微薄的津贴费里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这样的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才有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急性胃肠炎痊愈后，黄国光返回清涧农村继续实习，过了两个多月，才和大家一起回到中央党校。

在学习、训练过程中，黄国光和大家还经常听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等中央首长的精彩报告，得到他们的关心和照顾。黄国光本身也很刻苦、努力，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在各项考试、考核中，他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开荒种地的生产运动中，他还荣获“二等劳动英雄”的称号。1941年10月，黄国光从中央党校毕业。他的文化程度，也由原来的小学2年级，提高到高中程度。

特殊使命

从中央党校毕业以后，黄国光被分配到边区税务总局当督察员，而后又到陇东地区当县税务局长。1945年5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延安，接受新的使命。原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预测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这种可能以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抗日战争还可能会持续2~3年。因此，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派往华南地区发展，以打乱日军的战略部署，加速其溃败。1944年，以359旅为主力，组成一支5000余人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在年底离开延安向南进发。接着，又在1945年上半年，组建另一支特殊部队——“东江纵队”，拟派往敌后工作。这支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侨干部，其任务是返回东南亚侨居国工作；另外有部分干部将被派往日本工作。“东江纵队”由雷金天同志任纵队长，伍修权同志任政委。黄国光和另一位华侨机工陈全分配在一团一营一连当见习指导员，将返回马来亚工作。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岗野进接见了全体华侨干部并会餐饯行。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强调说这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求大家在远离根据地的环境中，务必处处小心，千万不可大意，同时要勇敢沉着，独当一面，不畏艰险努力完成任务。他还幽默地说：“当大家在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地纠正解决，不要等到问题成堆。总之，要‘零售’，不要‘批发’！”叶总参谋长也给大家讲了许多在工作中和生活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1945年5月下旬的一天，“东江纵队”告别延安踏上新的征程。

在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生活了6年半，一旦要离开，黄国光和其他华侨战友都恋恋不舍；但是一想到要奔赴新的战场，内心又充满了壮志豪情。未来会遇到什么？大家都不清楚，但都有信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部队开始长途行军，一路餐风宿露，经过延长、延川、绥德、吴堡等地，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经过中阳、汾阳、孝义、汾西、新绛、万荣、临漪、平陆等8个县，又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境内。经三门峡、渑池到达新安。在这里，遭遇了敌人，打了一仗。打死打伤了7个敌人，我方也牺牲了一名华侨干部。他们正要继续南下，忽然接到中央命令，说原来的任务取消，要纵队立即回师北上，日夜兼程，挺进东北。

原来此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和它的盟友德国纳粹一样，气数已尽，溃败在即。在中国，蒋介石反动派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已在暗中策划，即将挑起内战，魔爪将首先伸向东北。毛主席、党中央对于东北的重要性早已认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毛主席曾谈到东北问题，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东江纵队”使命的变化，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未雨绸缪做出的新的战略部署。1944年11月从延安出征的“南下支队”，转战于陕、晋、豫、鄂、湘、赣、粤等省的100多个县，经历大小战斗300余次，也因形势变化而终止南下，于1946年8月返回陕甘宁边区。

挺进东北

北上的征程同南下一样充满艰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队从河南新安掉头北上，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在汾阳县境内遭遇敌寇，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黄国光所在的连队在进山的路口上，与日本鬼子拼开了刺刀。黄国光虽然是第一次面对面和日本鬼子拼杀，但并不胆怯畏缩。他满腔仇恨积蓄已久，见了鬼子立刻燃起怒火，勇敢刺杀。几个回合下来，鬼子成了躺在他面前的一条死狗，而他仅仅右手受了一点伤。此次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由于指挥员有预见、指挥得当，所以大获全胜，共歼敌50余名，我方仅伤了几名战士（华侨干部吴枫同志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都出来慰问自己的子弟兵。他们平时缺衣少食，经常用野菜、树叶充饥，但却把自己舍不得吃埋藏多时的小麦拿出来，硬要送给子弟兵。大家推辞不过，买了一些麦子，

用石磨碾压后连皮煮着吃。凌晨5点钟左右，黄国光才吃了半缸子麦粥，司令部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原来根据侦察，汾阳城里的敌人已经出动意图报复；我军避其锋芒，决定甩开他们。黄国光被编入尖刀排，开始急行军，一口气跑了240多里地，终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进入我吕梁抗日根据地。途中，还打垮了3小股从碉堡里窜出来抢粮食的敌人。这是黄国光回国后第一次跑这么远的路，也是感到最辛苦最疲劳的一次。当胜利完成任务时，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一切辛劳也就烟消云散。部队在根据地休整了4天。人民群众用最热情的方式款待这支南征北战的部队，送来面粉、大米、猪肉、羊肉慰劳大家。黄国光和众多的华侨干部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部队要打赢仗根本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论持久战》1938年5月）真是英明的论断啊！

在吕梁根据地休整之后，部队继续北上。途中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高兴万分但并不轻松，因为国民党已在磨刀霍霍，策动内战，严酷战争形势又摆在部队面前！在河北省香河根据地休整了5天，而后日夜兼程，向东北挺进。

对于铁路知识，铁路管理局的大部分同志都知之甚少，都是虚心请教，边干边学。工作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黄国光至今不能忘怀。有一次，货运列车开到距离安农车站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负责押运的黄国光和姓张的参谋忙问究竟，司机答说机车里没有水了。黄国光主张让战士去挑水；张参谋坚决不同意，还把司机训斥了一顿，强迫司机继续往前开。结果，行驶不到一公里，机车就烧坏、彻底“抛锚”了。黄国光把这件事向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同志作了汇报，李政委十分恼火。结果，第二天就把张参谋的职务撤了。提起这事，黄国光有些内疚。张参谋当时的粗暴做法，其实是对于机车知识的缺乏，并非有意损坏机车。早知道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黄国光当初不一定会把这事“捅”出去。

不久，西满铁路管理局从吉林双辽迁至白城子。没几天，上级命令黄国光随同郭维城司令员一起，带领部队配合兄弟部队去围歼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国民党军，以便进一步夺取铁路线。当时城里还驻有苏联军队，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先挺进到齐齐哈尔外围的昂昂溪火车站，然后对齐齐哈尔实施包围。有一天，部队抓到一个出城刺探军情的国民党特务。郭维城司令员亲自审问，了解到敌方的一些情况，最后经过教育，把这个特务释放了。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特务又出来活动，落入我战士之手。这一次，司令部决定将这个顽固不化的特务分子枪毙。黄国光自告奋勇说：“让我来吧！”司令员说：“同意。”这是黄国光第一次执行枪决任务，但他毫不手软。第二天，黄国光带领一个排战士出去巡查，发现从城里出来一股部队，认为是国民党军；待靠近时，便命令战士们射击，奇怪的是对方并没有还击。经对话才知道是苏联军队，已有5名战士被我击伤。黄国光发现闯了祸，思想上背上了“包袱”，立即撤回部队，向司令员如实汇报。司令员安慰他说：“苏军一定会派人来交涉，你亲自给他解释清楚。他们喜欢喝烈性酒，到时候你跟他们拼上几杯，我想会没事的。”不一会，果然来了一位苏军少将军官，开始火气很大，质问我方为什么开枪打他们。黄国光诚恳道歉，并解释说：“早晨雾太大，我们没看清楚，还以为是国民党军呢。”苏军少将看着郭维城司令员，投过询问的目光。郭司令员点点头。少将双手一摊，说：“完事了。”一场误会就这么化解了。接下来是请苏军代表吃饭，气氛十分和谐，宾主双方都喝了不少酒。席间苏军少将向我方谈了驻守在齐齐哈尔城内的国民党军的情况。第二天我军即解放、接收了齐齐哈尔。西满铁路管理局随即改为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任命黄国光为秘书主任，兼人事科、军运科、材料科科长。工作空前繁忙，黄国光干劲十足，虚心学习，团结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曾获得军区的表彰。东北是人民铁路的诞生地，在艰难的创业

过程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以后陆续输送到全国各地，成为铁路战线的骨干。

1949年初，黄国光奉命到铁道兵团工作，担任第一团政委，兼工会主席。工作频繁调动，都是形势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从回国奔赴延安的那一天开始，他已下定决心：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绝不讨价还价，绝不三心二意！到职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几百名铁路员工的配合下，抢修郑家屯——义县——锦州铁路，为即将发动的辽沈战役抢运军事物资。铁道兵团的指战员多从步兵或机关转来，几乎都是铁道工作的外行。同时，由于日军撤退时散布了病菌，沿线还有鼠疫流行，必须时刻注意防疫。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只有边干边学，没有别的选择。他动员全团指战员争当“小学生”，虚心向老员工学习，不懂的就请教。全团上下终于变外行为内行，变生疏为熟练，很快学会了修路架桥等许多技术。许多指战员还学会了医疗护理工作。黄国光和团长、参谋长练就了打道钉的技术活，打出的道钉又准又快，连老员工都赞扬。他还学会了驾驶机车、倒车等技术，他发明的“装配式快速架桥法”，得到肯定和推广，为此荣获记大功一次。另外，他也掌握一些护理方面得知识，能够为指战员和职工打针、配药。在全团指战员的辛勤努力下，在铁路员工的配合下，终于胜利完成一系列修路、运输任务。其间，还负责将苏军供应的、存放在满洲里的一批坦克、大炮，秘密运送到锦州外围车站。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作出了贡献。

不久，黄国光又奉命带铁道兵团的2个连加入第四野战军第三纵队。他先后参加解放义县的战斗和辽沈战役。他勇敢果断，身先士卒。在辽沈战役中，他亲手缴获敌团长的驳壳枪1枝、卡宾枪1枝；纵队司令员表扬他，批准将缴获的枪支归他使用。其实，参加战斗并不是加入野战军的铁道兵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战斗结束后迅速接受和控制铁路，修复被战争损坏的铁路线（主要是锦山段）。这时候，黄国光和他的战友们对于铁路已经相当熟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上后勤供应大为改善，能用上崭新的被服，吃上缴获的牛肉罐头，战士和职工情绪高昂，干劲冲天，所以又快又好地完成各项工程任务。完成任务后，黄国光率领铁道兵离开四野三纵队，返回锦州铁路局。

南下工作

黄国光返回锦州铁路局的第二天，即接到东北局通知，说中央通知所有华侨干部马上进京。他和另一位华侨干部王凤贤很快收拾好行装，办好组织手续，到东北局报到。到了沈阳，看到其他单位的华侨干部已早一步来到，有陈全、

杨岳、周交臣、庄国英、潘宝秀、吴志民、范伟、张墩、庄仲仁、叶修青、冯昌仍、叶克、苏青等几十位同志。东北局组织部当即决定由黄国光担任领队兼党支部书记。休整了3天之后，乘坐自己生产的新车厢离开东北奔赴首都北京。

抵京后，由中央组织部接待。安子文同志到招待所看望大家谈工作问题。他说：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各部门都急需干部。中央准备把你们都留在北京，大家意见怎么样？说到具体工作，黄国光被安排在中组部干部处，与黄国光同团回国抗战的陈全分配到工业部门。大部分华侨干部都表示愿意回南方工作。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华侨干部，一贯听从党指挥，为什么此时反而跟组织考虑不一致、坚持要南下工作呢？原来，大家在北京停留了几天，发现首都在吃住行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认为自己都年富力强，应该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锻炼。南方解放较晚，情况比较复杂，条件比较艰苦，工作更富有挑战性；况且大家本来都是南方人，对南方的环境更容易适应。安子文同志听了大家的表态，说：“那我们再考虑一下吧！”就回去了。

安子文同志离开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认为还应该去“活动活动”。有的说：“咱们应该去找毛主席！”有的说：“应该去找朱老总！”有的说：“应该去找叶老头（大家对叶剑英同志的亲切称呼）！”黄国光说：“听说叶总参谋长过几天要到广东去，就请他把我们带回南方去吧！”大家一致叫好，最后推举黄国光、杨岳、周交臣几个人去中南海反映。第二天，黄国光一行果真直奔中南海，经过毛主席警卫员（在延安时就和他相识）的指点，找到叶剑英的办公室。一进门大家先问好，叶剑英见这帮生龙活虎的华侨仔，高兴地说：“你们回来啦，太好了！”立即吩咐警卫员拿咖啡茶和糕点招待。黄国光迫不及待地说明来意，说：“我们都想回南方工作，您跟中组部讲一讲，就把我们带上吧！”叶剑英稍加思索，就拿起电话同中组部联系。然后对我们说：“组织部同意了，你们后天和我一起南下。”黄国光几个人高兴得想蹦起来，急忙告别叶总回招待所向大家报告。

第三天黄国光一行按规定到火车站集合。解放军15兵团首长代表叶总参谋长向大家宣布：全体华侨干部随兵团司令部行动，其他干部（女同志留在北京）与兵团后勤部一起动身，最后大家在广州会面。这一次，黄国光以车代步，驾驶的是一辆美制中吉普。10年前告别侨居地马来亚驾车回国参加抗日的情景，又一幕幕在他脑海中闪现。当年的爱国热血青年，如今已成为一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成熟干练的干部。途中，他由于冒雨工作患了重感冒，发烧40度以上，又经历了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都顽强地胜利地挺了过来。他一次次地勉励自己：“我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战士，应该有坚强的意志和不

怕牺牲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敌人！”

1949年12月下旬，黄国光随解放军15兵团抵达广东省会广州。他是1927年夏天离开广东老家出国的，如今又踏上家乡的土地。世事沧桑，转眼过去了20多年！他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他的内心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迎接新的挑战。

抵达广州以后，黄国光立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广东空军处”处长（他的老战友杨岳担任空军大队长）。1951年又调往武汉，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修理总厂厂长兼政委。为了建设人民空军，为了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黄国光又精神抖擞投入新的战斗。

（根据黄国光同志的忆述整理，2005年5月16日）

第四部分

南侨机工子女眼中的南侨机工

1000

1000

南侨机工子女眼中的南侨机工

汤璐聪

开头的话

15年来，我接触过几十位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机工老战士。他们大多居住在云南滇缅公路沿线的行政区域。其他省市、海外亦有。

在云南，特别是昆明，当年健在的老机工我几乎都登门拜访过。在省外的机工也曾给我写过信。但那时，我从未想到过要写他们。因为我以为中国有那么多的文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记者，他们才有资格、有能力，用笔将这些为国家作出牺牲的南侨机工的事迹记录下来，留传于世。而我既无文墨之才，又无笔耕之道。我的秃笔描写不出他们的悲壮与伟大。可想起这十几年来，前辈们对我的关心，使我感受到父亲般的慈爱。从他们不断讲述的风雨历程中，时时唤起对父亲的思念，而这种思念自然又从他们的音容笑貌中得到慰藉。是他们的故事，使我对南洋华侨回国为抗日战争服务的这段历史，有了真正的了解与认识。他们用生命与热血书写的这段光辉历史，常常让我悲中有喜、笑中有泪。苦涩难咽，亦有橄榄回甜。对于我，这是一个震撼心灵的历程。因为所有的故事虽词曲不同，但其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旋律就是——赤子丹心，忠心报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一位位地离开了我，国内健在的只有十几位了，国外则不详。一想起这些，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悲伤。一悲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二悲于这些机工在有生之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所以，我鼓起勇气操起秃笔，将当初听到的、曾经点滴记录着他们当年的苦与乐、悲与壮的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阅正。

张家发来自巴拿马

张家发老人居住在昆明市潘家湾华侨新村，离我们家很近。我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到他家串门。张老和老伴很好客。他的孩子们都在昆明钢铁公司工作，孙子也随父母在昆钢上学。星期日休息，子孙们才来昆明与两老团聚。平时只有老两口在家，很喜欢孩子，常夸我的孩子聪明，以后定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个孩子现都已长大，读万卷书我不敢说，但确实行了万里路，都在国外

读书和工作，我还真得感谢两老的吉口良言。

以下是我于1999年8月整理的张家发老人的记述：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张家发老人每当向人们讲述他回国参加抗战的历史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

张家发老人祖籍广东，他的祖先在清朝年间就移民中美洲巴拿马。他于1918年出生在巴拿马，母亲是一位具有西班牙血统的巴拿马人。所以张老有着一半中美洲人的相貌特征。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英语和粤语，国语却一窍不通。现在他已会讲昆明话了。

1937年底，张老和他的二弟随同祖父到香港做生意，适逢中国抗战爆发。当时香港福生公司正招募一批司机，为西南运输处到越南接一批新车送往昆明，张老毫不犹豫地前去应募。

香港此时已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到处张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标语，到处都有集会演讲，动员国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张老的祖父是一位爱国华侨，积极支持张老报名回国服务抗战。1938年初，他们就开始陆续将100多辆汽车安全驾送回中国。

1939年初，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的南洋机工也先后来到了昆明，当局就将他们编入华侨先锋队。而张老他们较早回国的驾驶员大多来自中美地区及菲律宾等地，绝大多数都不会讲国语，更听不懂云南话，只会讲一点英语，所以全部都留在中印或中缅边境负责运送汽车或抗战物资，直到抗战胜利。

回忆当年，张家发老人感慨万千地说：“我真是幸运啊，和我一起从香港来的人，大多都在抗战期间牺牲了。最难忘的是有次我们接车快行至畹町时，不巧遇上日本飞机来轰炸。当时我们一队6人，各驾驶着一辆卡车，听到飞机的轰炸声时，我们赶快拉开距离，各自找合适的地方隐蔽。我的车排在第二位，和第一辆车因一时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朝前开。一时，听到飞机的引擎声就在头顶轰鸣，当时我一个激灵，来了个急刹车，飞机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子弹打在前面的汽车上，一下子就起了火。如果这时驾驶员跳下汽车，还是会保住性命的。但他没有弃车逃命，仍然往前开出十几米后汽车轰然爆炸，火光冲天，顿时车毁人亡。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惨状，内心还是有点害怕，也很悲伤，但更激起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这位牺牲的战友，是刚从菲律宾来的，我们明白他是为了保全大家才作出的牺牲，因为我们车上拉的都是弹药。遗憾的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战事又紧，相互之间来不及道声姓名，有时甚至来不及为牺牲的战友掩埋遗体，又匆匆上路了。当年我们联络招呼对方唯一的方式只是一句话‘华侨统统有’就算是认识了，现在想起来，

真是遗憾啊!”

解放后，已在澳门结婚定居的张家发老人在祖父的鼓励下，又携妻带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他驾车、修车技术精湛，哪里组建新的车队，他就被调到那里。云南的山山水水、村社边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张老以50万公里无事故，车辆保养优秀，考得一级驾驶员。他驾驶的汽车也被评为优秀车辆，并为交通行业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汽车司机，为云南的交通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国内的老机工中，张老的生活及家庭状况较好一些，因为他的祖父在临终前，交待张老的弟弟：“家发为祖国参加过抗战，现又参加祖国建设，他是我们家族的光荣，一定要将财产留给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十几年间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直至拨乱反正后，他才在香港与弟弟相聚，祖父的遗嘱也终得实现。

1982年，张家发老人在华侨新村购置一套宽敞舒适的住房。退休后，老两口过着幸福祥和的生活。三个孩子也都成家立业，孙子子女承欢膝下。每天清晨，张老沿翠湖公园小跑一圈后，回家和老伴在自家的小院子里做自编的健身操。老两口相依相伴，和睦一生。1999年，南洋机工回国抗战服务60周年之际，张老与他的老伴也迎来了令人羡慕的钻石之婚——60周年。

张家发老人于2002年逝世，老伴先他几个月去世，享年都80多岁。在与他们多年的交谈中，我认为，关于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应该始于1938年初。在陈嘉庚先生号召前，就陆续有一些汽车司机、修理技工和有其他技术的华侨青年，自发地或由当地社团组织回国了。如1938年前后，南洋各埠筹赈会、行会组织回国的土乃回国服务团和槟城机器行回国技艺工程队，巾帼英雄李月美就是槟城机器行回国技艺工程队队员之一。而张家发老人正是在1938年初回国服务的。



晚年张家发与老伴

叶亚味滇缅路上情未了

1995年仲秋的“南洋华侨机工赴中国抗战”图片展，巡展至马来西亚新山时，一位老人率家人步入了福建会馆展厅。多年与南洋机工接触的经验告诉我，这位老人一定是当年的“老机工”。我趋步向前想与这位老人交谈，但他用手势打断了我，只对着图片从头至尾地仔细观看，看完后，他主动过来与我打招呼。当得知我是展览团的成员时，老人拉着我的手走到几幅图片前，指指点点地告诉我一些图片上的人名，并对图片上的一些资料提供了重要的说明。而后老人又将自己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历史文物提供给我们共同展出，他就是现居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叶亚味先生。

叶亚味于1919年出生在马来亚柔佛州。从他的祖辈算起，他已是定居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了。抗日战争爆发时，叶亚味参加了第一批回国服务的机工队伍，英勇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上，直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了原侨居地。

叶老先生当年只身回国参加抗日，在残酷的战争中不仅幸免于难，荣归故里时还从云南娶回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傣家姑娘，且儿女成双。1998年7月4日，叶老先生特意来昆明参加南洋机工“七七”纪念活动时，我专程采访了他。采访过程中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时时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无限感慨但也十分得意的对我说“我的大孩子是在下关出生的，就叫下关啦，二女儿生在昆明，就叫昆明，可惜没去过海南岛和吐鲁番。”说到这里老人哈哈大笑，他告诉我他看过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接着，老人深情地回忆起过去。

我和我的老伴是在泼水节上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她是傣族人，当年也还是个小姑娘呢，她们那地方把小姑娘称作小朴哨，把我们年轻小伙子称作小朴冒。她的名字很好听，叫小鸾，小鸾啦，就是像凤凰一样漂亮的鸟。记得那天我们的汽车刚好在芒市休息，正赶上傣族的泼水节。我们看着那些身着五彩缤纷民族服装的小朴哨、小朴冒在大街上互相泼水嬉戏、又唱又跳的很开心，当时我们的心里也是痒痒的，可又不好意思上前。正在这时有几个小朴哨和小朴冒笑嘻嘻地朝我们走过来，还没等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哗啦！几盆水一齐朝我们的头上泼来，将我们浑身浇了个透。啊！我们当时高兴极了，大家一齐一拥而上，从他们手中抢过盆啦瓢啦，追逐着用水朝她们泼过去。正当我玩得开心的时候，有个小朴哨悄悄地在我背后从头上朝我哗啦浇了一大盆水，哇哈！我一时被呛得喘不过气来，眼睛也睁不开，待我抹抹脸上的水定睛一看，哇！好漂亮的一位姑娘，正对着我甜甜地笑呢，（哈哈大笑）我就紧紧地追她啦，（说到这里，老人幸福的脸上洋溢着几分得意的羞色，他不好意思地用双手

搓搓脸)她就是小鸾啊,我就是这样和小鸾相识相爱后结婚的。我们在中国生育了两个孩子。抗战胜利后,我携妻带子一家四口回到了我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我们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刚离开中国时,我们与小鸾的家人还常有书信来往,但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两国及国际上的原因,我们就与小鸾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几十年来,小鸾一直苦苦地思念着中国的家人,而她的家人也同样望眼欲穿地想念着她。小鸾的母亲因思女心切,就将小鸾弟弟的女儿也取名为小鸾。马中建交后,当我正准备带老伴回中国探亲时,老伴突发疾病,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为了弥补小鸾的遗憾,重温与小鸾一起生活过的地方,以慰小鸾的在天之灵,1993年,我只身来到了中国。凭着50年前的记忆来到了芒市,找寻着一处叫五棵树的寨子(现在的芒市红星街北里)。还记得小鸾的弟弟小名叫小二。真是天随人意。恰巧问到一位认识小二的朋友,就把我带到了小二的家。一进门,我一眼就认出了老伴的大姐、哥哥、弟弟。我激动地急步上前一手拉着姐弟的手,一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言不达意地说“我,我是小鸾、腾小鸾的爱人哪”。全家人激动得泪水直流。真没想到,我第一次踏上老伴的家乡,就找到了老伴的家人,这是我老伴的在天之灵福照着我啊!所以这些年来我每年都要回她的家乡代她看看她的亲人,看看她的朋友。更何况,这里也是我曾经热血沸腾过的地方。

老人的这段回忆,充满了对老伴绵绵的思念。这位傣家小朴哨,若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深深地感受到小朴冒浓浓的情意。她人虽去却情未了。倘若有来世,我相信小鸾姑娘一定会将爱情之水再次拨向这位重情重义的叶亚味。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亚味是在2002年4月中旬。那天晚上,我接到老人的侄女小鸾(与他老伴同名)打来的电话,托我去接叶老先生,并送他上飞机到芒市。当时我又惊又喜,我没想到这位老人还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再次到老伴的家乡来走亲。

我心中感慨万千。叶老先生于1996年到中国探亲离开昆明时,打了个电话给我。我和杨保华叔叔去他下榻的酒店看望了他。我告诉他,以后只要到昆明,就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送你。

从那以后,老人每次来时,总先打个电话通知我,而我每次接送老人家也乐此不疲。

但有件事至今都让我自责不已。那是在1998年接到老人的电话,我按时去机场接他。机场通知飞机晚点四个钟头。大概要下午才到。我只好只身返回,没想到飞机提前一小时到达。老人等我不及,自己去办理了一些事情。待我接

他到宾馆时，才发现护照不知何时丢失。当时，我们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想了很多办法，但因外交上的原因，让这位老人在昆明足足待了一年。那年叶老先生已近80岁，身体又不太好，在这期间住了几次医院，还出现了危险状况。老人性格很开朗，他说，这是他的老伴要留他在家乡多住一段时间。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后来等到他的护照办妥，我送他到机场。看着他衰弱的身体，我担心老人恐怕难得再来了，但又故作轻松地问老人家，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老人语音很重、语调很长地说：“我身体好了还会来。”

没想到事隔两年多，这位老人真的又来了。可想而知我那份惊喜。但是此次他真的很衰弱了。我去机场接他时，人都走完了，我还未见到叶老先生的身影。我着急但坚持地等待着。非常凑巧，叶老先生遇上了一位好心人，而这位好心人正好是我的朋友。在我这位朋友的照顾下，老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机场。

此次在送叶老先生回马来西亚时，我不无怜惜地说：“你下次一定再来，我一定来接你。”老人仍然用很重的语音和语调说：“来！一定再来”。可我已有三年没有见过这位老人了。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希望叶亚味老人还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越南华侨机工李志强扪心无愧

有位从越南回国的南侨机工叫李志强。从越南回来的机工算不算南侨机工？几年前曾有不同看法。

自我接触南侨机工这段历史以来，从云南省档案馆中，查知当年从新马两地来的机工比较多，也有少数从缅甸、泰国、香港甚至巴拿马回来参加抗战的机工。我接待了李志强老人后，第一次获知还有从越南回来的，而且为数不少。当年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各属”筹赈会招募机工，当然包括法属安南（即越南）。这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我在1995年11月28日致陈共存先生的信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上述看法，同时附上1995年10月20日我与李志强老机工的访谈录。该访谈录原文如下：

我叫李志强，现年78岁，是1939年回国参加抗战服务的华侨机工。

抗战爆发时，我侨居在越南河内，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于1939年4月8日从越南回国服务。当时我们一行共25人乘坐小火车到昆明，是第一批从越南回国的越侨，由潘友华领队到昆明。潘友华是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回国后就参加了飞行大队，我们就到了西南运输处，先在潘家湾集训（在潘家湾集训时认识王亚六）。集训结束后就分到华侨先锋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胡凯军，队部设

在遮放，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缅甸将物资运输到畹町，有时直接拉到遮放。

日本侵略军攻占惠通桥时，我驾驶的汽车刚过了桥不远，在我前的几辆车中有一辆装汽油的被炮弹打中起火，后面的车辆再也无法行驶，大家只好急忙下车找地方躲避。这时好几辆车又相继起火，炮火轰击后道路也被堵塞，大家只好弃车步行往昆明走。当我们走到保山时，保山遍地是死尸，一路上我忍饥挨饿，还患上疾病，步行到瓦窑时我已奄奄一息。所幸这时遇到一位熟人开着车才将我带到下关，在这个热心朋友家养病，病好后才返回昆明。西南运输处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我便随队服务直至抗战胜利。

机工复员回南洋时我已到了香港，由于染上疾病不能再继续乘船南返，只好返回昆明。到昆明后经介绍我替当时的云南省财政厅厅长林南园开车，直至参加昆明起义（我现存有起义证书）。和平解放后我就在昆明电子机械设备厂工作，直到退休。

在十年的“文革”浩劫中，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历尽坎坷。当时回来的一些证件都被烧毁，现仅存有侨务委员会奖状及军事委员战时运输管理局经 0839 号运输服务证明书等。林少川先生编著的书中第三部分机工名册中有我的名字（李志祥应为李志强）。

现居福建的郑天赐就是与我同行的，他所说的那个李广东就是我。

回首自己的一生，作为一名海外游子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参加抗战服务，扪心自问无怨无悔。

社会总是在发展进步的，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改变提高。听说这位老人在去世前，已得到联谊会的认可，甚感欣慰，在此我祝李志强老人一路走好。

见 证

滇缅公路中断时，有一部分来不及撤退的南侨机工滞留在敌战区，还有一些是因为与当地的姑娘结婚生子、不忍抛妻儿于不顾而留下来。陈团圆就是因留在村里而不幸落入日本鬼子惨遭杀害成为的南侨机工的烈士之一。

2005 年 2 月 5 日上午，我与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原畹町区委书记杨维诚驱车来到了云南省德宏州自治区芒市芒蚌寨，一个傣族人居住的寨子。采访了一位傣族老大妈，她就是当年亲眼目睹南侨机工陈团圆被日本鬼子活埋的见证人——咩帕所。

咩帕所老人今年虽然 92 岁高龄，但仍耳聪目明，生活能自理头脑也管用，思路很清晰，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我问她那时还是个小朴哨吧，老人开心的笑笑摇摇头说“不是朴哨是米巴了”（傣语朴哨即小姑娘，米巴是已结婚的妇

女。据老人的侄儿周金明介绍，这位老人当年在芒蚌寨算得上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呢！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芒蚌寨时，大家都害怕的躲藏在山洞里捂着耳朵，而咩帕所却站在外面看看飞机是什么模样。咩帕所老人听得懂汉语，也会讲一点汉语，她向我讲述时大多用傣语，但从她那悲伤的表情、激愤的手势，我能感受到日本鬼子的残忍和陈团圆殉难时的壮烈。



咩帕所追述陈团圆就义情况

下面是咩帕所老人的讲述（杨维成翻译）：

阿单（指陈团圆，潮州、闽南方言“陈”的读音为“单”）是向我买米时我们认识的。熟悉后我知道他原是在三棵树守军火的军队里开车，后来是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收集鬼子情报。日本鬼子占领芒市后，阿单跑到芒蚌寨来找我，我赶紧找了些衣服给他换上（老人边说，边拿出阿单穿过的一件衣服向我们展示）。这是我当时拿给阿单穿过的一件我们傣族上衣，因为日本鬼子见穿黄衣服的人就杀。我叮嘱阿单不要和任何人讲话。白天我让阿单到山里庄稼地里劳动，实际是为了躲藏，晚上再回到家里来。后来我们大家认为这里离芒市太近，担心鬼子会来。就让阿单到更远更偏僻的允金寨，想必日本鬼子不会到那里去。但没想到啊！（老人说到这里显得难过至极）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到允金寨把阿单抓走，第二天拉到芒蚌寨的水塘边来活埋，还通知寨里的人去看！我去时，看见土已埋到了阿单的脖子这深度。那日本鬼子真不是人哪！他不让你痛快的死，要折磨你让你活受罪。鬼子埋一点土，就使劲把土夯实一下，我看到阿单的脸憋通红通红的，眼珠子鼓的都快暴出来了！我看不下去，不敢看了。（说到这里老人用双手蒙上了双眼）我后悔啊！阿单如果还在我家住，也许就不会遭此难了！

善良勇敢的咩帕所啊！这不是你的错。阿单无论在哪里都逃脱不了日本鬼子的残杀，因为阿单是被汉奸出卖的（有关陈团圆烈士的详情，请阅杨维诚先生所写《野花环》）。

下午，我们在老人的侄子周金明的带引下，来到了阿单被抓的允金寨，见到了80岁的腾云发老人。据老人回忆说，那天晚上他听见日本鬼子到寨子里抓人，但不敢出来看，第二天听寨子里的人说，他们在芒蚌寨看见阿单、老莫、老王被日本鬼子活埋了，真惨啊！我问腾云发老人老莫、老王是什么人，是南侨机工吗？老人说是，我们寨子里的人都认识老莫、老王，他们俩都是广东人。

允金寨离芒市大约有50多公里，地处极偏僻的一个小山沟。周金明先生是当地人，我们在他的带路下还很难找到这个小寨子。我站在陈团圆当年被捕的屋前观察地形，房后就是杂木森森的大山。当年如果没有汉奸做内线，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目标地直扑允金寨抓捕南侨机工的。这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勾结日寇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

抵抗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的这场殊死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惨烈和悲壮的一页。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并不为刻记仇恨，而为昭示后人勿忘国耻。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及东南亚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把大和民族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日本军国主义在制造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中，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灾难呢？有154万日本军人死伤在中国的战场上，有129万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十个战场向中国人民举手投降，在其他东南亚战区的日本侵略者也向当地人民跪地缴械，并受到世界人民的正义审判。而广岛、长崎的日本国民，至今仍未摆脱原子弹的阴影。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日本国民及日本政府的反省吗？

因此，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是日本国民，决不能忘记这场反人类反和平的罪恶战争。全世界人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坚决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思潮，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1938年从泰国回国抗战的第一批南侨机工

南宁市侨联副主席、南侨机工子女殷红女士，多年来一直为寻访南宁地区的南侨机工及其家属、子女不遗余力的四处奔走探访。在她不懈的努力下，寻访到了居住在南宁的南侨机工及他们的遗孀遗属。并于1996年在南宁市组建了“南宁市南侨机工联谊会”筹备组，于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组织纪念活动。最值得我们欣喜的是，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寻访到了7位未曾载入历史档案

的南洋华侨机工，其中还有一位是巾帼女英雄。在现有出版物中的南侨机工名册里找不到他们的姓名。

这七位南侨机工是1938年秋至1939年8月，在泰国参加“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成员。他们是：

吴家运，男，1907年出生，海南文昌人。1938年秋在泰国参加南侨机工，属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一批成员，时任副队长。



吴家运 (1907—1999)



陈贵琛 (1907—1976)

陈贵琛，男，1907年元月出生，海南琼山人，原侨居泰国。1938年秋在泰国参加南侨机工，属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一批成员，任汽车驾驶员。

陈玉进，男，1913年元月出生，海南文昌人，原侨居泰国。1938年秋在泰国参加南侨机工，属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一批成员，任汽车驾驶员。



云大俊 (1906—1993)



方有 (1914—1981)

云大俊，男，1906年出生，海南人，原侨居泰国。1938年秋在泰国参加南侨机工，属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一批成员，任汽车驾驶员。

方有，男，1914年10月出生，广东汕头人，原侨居泰国。1938年秋在泰国参加南侨机工，属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一批成员，任汽车驾驶员。

冯家瀛，男，1915年7月出生，海南琼山人，原侨居泰国。1939年8月参加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抵达桂林，任无线电报务员。

吴秀芬，女，1916年11月出生，海南人，原侨居泰国。和丈夫冯家瀛一起于1939年8月参加泰国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抵达桂林，任护士。

截至目前，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中又多了一位巾帼英雄。只可惜这位巾帼英雄于1973年就去世了。

故 乡 行

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暨东南亚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马来西亚诸多热心友好人士的倡导和促成下，马中友好协会、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了“南洋机工访问团暨南洋机工参加中国抗战图片展”。留居云南省的16位南侨机工老人组成“南洋机工访问团”，这是他们自1939年回国以来第一次重返第二故乡的省亲之旅。

以厦门华侨博物院院长陈毅明教授为团长的图片展团，于10月17日晚先期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次日上午，在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总秘书郭仁德先生的陪同下，陈毅明教授率团拜访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社《南洋商报》。马来西亚精武体育会馆会长杨柏志、理事古润才、退休校长吴志超也出席了此次拜访。在以后的两天内，我们先后登门拜访了《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报》。各报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来自中国的抗日机工”将于21日在全国巡回举行“南侨机工赴中国抗日图片展”，并在版面上详细的刊出活动行程、图片展地点及16位南侨机工的姓名、相片、年龄、其现居马来西亚亲属的相关资料。

20日上午11时，图片展团全体成员会同马中友好协会财政、海鸥集团总裁陈凯希先生、郭仁德先生、吴志超先生以及其他社团代表和友好人士，满载鲜花前往机场迎接以杨保华先生为团长的16位南侨机工代表。此后两团人员一并前往马可波罗大酒店，参加了由承办当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郭仁德先生主持会议，筹委会主任颜清文致词，陈凯希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晚由马中友好协会会长奥斯曼·阿旺，设宴招待了来自中国的南侨机工及图片展团的全体成员。

21日上午10时，“南侨机工赴中国抗日图片展”在吉隆坡马华大厦拉开序幕，马来西亚副财政部长、拿督黄思华主持开幕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南侨机

工们为了正义，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战争的具体表现。通过图片对历史的记录，对后人有着警惕和参考的价值。二次大战给人类造成许多惨痛的记忆，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战争发生。”

在承办单位的安排下，两团人员由吴志超先生陪同。前往怡保、檳城、芙蓉、马六甲、新山，进行为期 10 天的参观访问和图片巡展。当地的华人社团、商团、雪隆海南会馆、符氏公会、中华大会堂及其他团体和个人，闻讯后均纷纷盛情款待，热烈恳谈。

南侨机工老人曾经在这里，受着椰风蕉雨的滋养。正值风华正茂的时候，他们却生不逢时的遇上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亡我中国的侵略战争。1939 年，他们年纪最大的 40 岁，已有妻室儿女；最小的才 16 岁亦有父母家庭。他们别离了亲人，同时也告别了生养他们的第二故乡——马来亚（马来西亚）。为着中华民族的尊严，为着祖国河山的完整，为着人类的正义，为着世界的和平，他们义无反顾的奔赴中国抗日战场。在烽火硝烟中，他们被造就成了时代的“南侨机工”，用青春和热血演绎了一部气壮山河的华侨抗日救国史诗。

中国华侨历史学家陈毅明教授从历史的角度高度概括了南侨机工参加中国抗战的历史功绩：“这是华侨史上一个最有组织、最具规模、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华侨群体，他们同时也是侨居地各族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代表，用具体行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因而，他们的赤子功勋将永彪史册，他们的精神将与日月同辉。”

从战争死亡线上幸存下来并留居中国的“南侨机工”，经历了国内的各种动荡之后，如今得享稳定安宁。但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之情，对海那边亲人的眷念之情却与日俱增。想着那绿波长长的海岸线（一缕抹不去的情丝），甘甜的榴莲（故乡多么使人流连忘返啊），芬芳的豆蔻（豆蔻年华就是在那里度过的）。脑海中早已经没有了战争的沉重，没有了“文革”的压抑，只有这抹不去，赶不走的亲情与乡思，企盼着在有生之年能回第二故乡——马来西亚看一看，踏上故土走一走。

56 年了，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和马来西亚的亲人失去了联系。此次得助于当地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在马的亲人闻讯纷纷赶到机场，企盼着能见到、能接到自己的亲人。

当 91 岁的陈介文老人一走出候机室，他 73 岁的女儿和 60 多岁的儿子、儿媳及孙儿孙女一窝蜂地迎了上去。老人激动得只会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半晌只说了两个字“谢谢”。其他老人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嘴里喃喃的说“哦！变了，变了，找不到了，不认识了。想不到啊……”甚至有几位老人悄悄地问我：

“我们现在真的是在马来亚（马来西亚）吗？这不是做梦吧？”

直至当天晚宴上，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奥斯曼·阿旺用马来语亲切的问到：“你们还记得沙爹吗，还记得 RO—JAK 的味道吗？”这一声温情的问候，释解了老人们拘谨的心情，使他们顷刻之间对生长之地百感交集，禁不住地用马来话异口同声的说：“记得，记得，我们还记得洛加、图沙、拉沙。我们就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嘛。”杨保华会长说：“我们到了这里，不知怎么感谢马来西亚华人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对第二故乡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甚至在梦里都在想，今天我们梦想成真。我现在站在了第二故乡土地上，可以欣慰的告诉你们，当年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我们完成了你们的重托。”陈凯希先生说：“在这里看到诸位老人个个红光满面，就像 18 岁的大姑娘。”幽默的话语使老人们轻松开怀，他希望老人们多看看第二故乡的变化，让老人们沿着马来西亚的西海岸“潇洒走一回”。

在热情友善的吴志超先生陪同下，访问团和展览团按照行程计划，到马来西亚各地参观、展出。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华人社团或商会的盛情款待。当地影响最大的华文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明报》、《中国报》等新闻媒介，连日里纷纷争相跟踪报道来自中国的“南洋机工访问团和展览团”。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38 篇消息、文章和 44 幅照片见诸各报。由于新闻媒介的作用，在华人中轰动效应很大。16 位访问团成员的亲人和一些战后返马的机工闻讯前往展出地迎候，与亲人、战友重逢团聚。

在吉隆坡，翁家贵老人找到失散了半个世纪的侄子。刘传授老人的哥哥从彭亨赶来看望这位当年用他的名字赴中国抗战的弟弟。在巴士上，84 岁的张子霖老人接到了亲属打来的电话，问：“你结婚了没有？”在槟城，杨保华先生年近 90 的哥哥偕同妹妹、弟弟及孙侄孙媳，近百十人，足够一个加强营，从吉打赶来看望他。在马六甲，黄振来老人的亲属为他送来了当地可口的山竹、色泽鲜丽的红毛丹。当我们尝着这香甜味美的水果时，也分享着他与亲人团聚的欢乐和幸福。

当我们一行人从槟城前往“槟榔屿华侨抗战罹难同胞、殉职机工纪念碑”时，见到了当年复员回到马来亚，现居太平的 79 岁机工刘桂华。他从报上获知我们的行程，早早的就守候在这里。他对记者说，他虽不认识这 16 位机工战友，不过很想见见他们，与他们握手，重温那段悲壮的历史。他对我说：“当年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报名赴中国支援抗战军火运输。理想与现实是两回事，之前我们都很天真，没有想到死亡这回事，即使有也觉得为正义捐躯是浪漫的。其实战争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这

些活下来的是幸存者啊!”当晚刘老先生带着孙子到中华会堂和我们一起参加了讲座会，与住在槟城前来会面的老机工杨森基、林水银欢聚一堂。

在马六甲，我们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乘坐的巴士刚到三保山，黄明生、王诗伟、彭光涵三位居住当地的老“机工”与他们的家人早早就等在这里了。到晚上洪发福老先生一家也来了。这位老人身体不好，可坚持要家人搀扶着他来见一见老战友。彭光涵老人曾于1991年到中国访问过云南的“机工”，此次在家门口又能和大家见面，老人们既兴奋又感慨万千。王诗伟先生说，我曾三次到中国旧地重游去找你们都没有找到，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见到你们。王诗伟老人悄悄的拉我到一边，请我代他打听一位友人的下落。我问他当年是第几批赴中国的，王老先生说：“当年我也是27岁的热血青年，在中国武汉合唱团演唱的‘有国才有家’的感召下，凭着一股爱国热情，毅然抛下怀有身孕的妻子和只有十个月大的长子，志愿加入了‘南侨机工队伍’。当我带着马六甲50多位热血男儿准备乘船去新加坡时，岳父母赶到码头声俱泪下的要求我留下。但是名已报了，只好硬下心肠别离了亲人。乘船到了新加坡，在同济医院与第九批南侨机工汇合，登上了陈嘉庚先生准备的丰盛号轮船。大家上船后，凡看到印有日本字样的物品都抛入海中。经过八天八夜才转辗到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运输处集训一月后，我们连人带车共25人，被派到广西南宁总部第十五大队三十五中队，负责桂越公路上的运输。主要是运输军事装备、医药、粮食及衣物等。在运输途中，我经历过好几次危险，还算命大，能够平安脱险。广西失守后，我们奉命到越南待命，到了越南又被法国政府扣留，因我身上有马来亚护照没有被抓，即刻打电报给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委会派宋子良去交涉，才将人带回昆明。回到昆明后重新编队在第十二抢运大队，被派往缅甸抢运物资。当时战况已十分紧急，中国许多地区已沦陷，国民政府派遣戴安澜率军入缅作战，因失利，戴将军英勇战死在沙场。1946年抗战结束后，我总算幸运的平安返回家乡马六甲。当年与我同行的五十多位本地机工，仅有十人与我一起回来，一些人就留居中国。”

晚上见到了王诗伟老人的老伴，她的话语中，对王老先生当年的别离略有微词。而王诗伟老人说他志愿加入南侨机工队赴中国，感到无比光荣，无怨无悔，但对当年抛下怀有身孕的妻子，十个月的儿子也感到辛酸后悔，并当众向敬爱的妻子连声道对不起。王老先生保存至今的老照片、资料，已成为有研究价值的文物史料。

稍迟，洪发福的老伴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当年他回去的时候，我正身怀六甲，可我还是支持他去。筹赈会在我们这里筹款，我就把自己的耳环、戒指

等首饰全部丢进筹赈箱中，当时我们马六甲的妇女全都是这样。”老人讲这些话的时候，两眼放光，心情激动，看得出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感到骄傲与自豪。此时，我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这位老太太的崇敬之情，也找不到一句恰如其分的词汇来赞美她的品德。我只深深的悟出为什么人们总爱把祖国、大地比做母亲。

祖国——气势伟大庄严，大地——胸怀博大慷慨。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槟城，当一位热心的同胞得知我的父亲曾是从槟城参“战”的机工，就亲自驱车为我寻访我的亲人，并依地址把我带到了父亲的原居故地，耐心地向左右邻舍询问。毕竟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我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但我感到了亲人的温暖。这位同胞与诸多的为我们热心服务的华人就跟我们的亲人一样。战争的残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幸免的，父亲当年为尽忠报国，别离了年迈的祖母，他临终前的遗憾就是未能回到槟城尽孝。国难当头，忠孝总是不能两全。所以当记者问我对此有什么遗憾，我想我应该为父亲骄傲，每一个处于那个时代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会那样做的。父亲的遗愿虽未了，但他们为之奋斗目标实现了，马来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沐浴着和平的阳光，先烈们可笑慰九泉了。

当年，为支援祖国抗战，千万侨胞节衣缩食，出钱出力，甚至奔赴战区。现在抗战胜利已经 50 多年了，这些已是耄耋之年的南侨机工们，能够回到第二故乡的土地上尽情的看一看、潇洒的走一走，和失散多年的亲人们相聚一场。这是他们几十年来梦寐以求，想都不敢想的世纪之梦啊！他们能不万分感激马来西亚华人朋友们的帮助，能不激动不已吗？对此，我们后人能不为之所动而产生共鸣吗？

与陈嘉庚后人同访南侨机工

陈嘉庚先生是我们华人华侨心目中的伟人。

我没有见过这位伟人，因为这位伟人谢世时，我还是个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孩童。我是从陈嘉庚先生的书中、从中国华侨历史、南洋华侨机工的历史中走近陈嘉庚先生的。

1993 年 10 月，陈嘉庚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在厦门举行。在新加坡远东发源公司董事主席黄保印先生的资助下，我与四位南洋华侨机工老人应厦门华侨博物院邀请，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

我们来到陈嘉庚先生故乡集美，参观了陈嘉庚先生的故居，并在鳌园缅怀先生的丰功伟绩。走进故居面对着他生前简朴的衣物，我深深的感悟着他的伟

大与平凡、辉煌与平淡。他穷一生的精力耗巨资创办教育事业，未给子孙留下一分资产，但给儿孙们也包括我们，留下了永远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就在这次活动中，通过陈毅明教授的引见，我认识了陈嘉庚的后人——长孙陈立人。陈立人先生身材高大神态飘逸，配上一副知识分子的眼镜，当时给我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1998年7月在昆明的西山森林公园，一身金黄唐装的陈立人先生又让我难识庐山真面目。相隔五年那满头的黑发竟被这无情的光阴带走！当天晚上我去陈毅明教授的房间，恰逢陈立人先生，于是在三人融融的交谈中，高深莫测的面纱渐渐消去，庐山真面目也逐步展示在我的眼前。此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领略到了陈立人先生的率真善良、谦逊平和的品格。他不仅是一位极平易近人的长者，而且是一位关注中国、热心于社会事业的慈善家。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为了在畹町举行的南洋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的奠基仪式，陈立人先生不顾脚上伤痛，千里迢迢的赶来参加活动。4月中旬，我受成都市侨务办公室的委托，向陈立人先生发出邀请，陈立人先生当时正在英国忙于事务，很抱歉地告知他来不了。后又听我说将探望采访成都市和重庆市的南侨机工时，他表示一定争取和我们一齐探访南侨机工。君子不失言。4月12日下午三点，陈立人先生匆匆赶到了成都市。一下飞机，当地官员和有关人士的热情欢迎，就让这位仁厚的兄长应接不暇。

2005年4月13日下午，在四川恒昌餐饮有限公司恒昌酒楼的会议室里，华侨领袖陈嘉庚之长孙陈立人先生与我们一起采访慰问成都市的南侨机工，并和他们进行了座谈。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南侨机工老人陈昌雄（94岁）、周树根（85岁）、谢锦（90岁）以及南侨机工子女和遗孀遗属。四川省侨务办公室主任周敏谦、机关党委书记吴振西先生、国外处处长刘以勤女士以及成都市侨办的领导和青羊区侨联、统战部的领导都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四川省（包括原重庆市）是最早关注南侨机工，率先为南侨机工落实政策、排忧解难的省区。在这次座谈会上，听着三位机工老人和机工遗孀遗属的讲述，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四川省的领导和各级侨务工作者对南侨机工的关怀、重视，并为解决南侨机工的实际困难做了很多实事。陈立人先生对此也有深刻的感触。他说：

我非常感谢恒昌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能够为我们在他这新开的酒楼里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在这豪华的酒店里接待南洋机工老人。同时也非



在成都的三位南侨机工老人：陈昌雄 94 岁（左）、谢锦 92 岁（中）、周树根 84 岁（右）（2005.6）

常感谢四川省侨务办公室的领导积极为我们组织了这次活动，使我有幸在这里见到了我们英雄的前辈，三位老机工以及几位南洋机工的遗孀和他们的子女，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是抗战胜利后在国外出生的，因此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太好，请大家谅解。关于南洋机工老前辈当年响应祖父的号召回到中国参加抗战，我从小就从我的父亲和叔叔们口中熟知。我了解你们（南侨机工）当年在滇缅路上的千辛万苦，并为在滇缅路上牺牲的南洋机工表示缅怀。南侨机工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胜利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你们没有回到南洋。而且还有亲人在南洋，可能有的至今还没有联系上，对此我也很感到遗憾。但当我了解到四川省侨办及各级侨务部门对你们如此的关心体贴，逢年过节都有来看望大家，为有困难的机工们解决问题，我甚感欣慰。记得十年前，在昆明的西山公园，我还见到过二十几位机工老人，这几年我也有机会常到昆明，所见机工老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有机会见到你们和你们在一齐座谈，我觉得非常荣幸。希望以后能够有多一点的机会与大家见面，多了解一点你们的心愿。此次是为了《南侨机工抗战纪实》一书，和林总、晓梅一起组织了这次采访慰问活动，其实也是为了创造一个机会与大家会面，希望大家，特别是南侨机工的子女们能够把这本书写好。我此次受到四川省各级侨

务部门及恒昌集团的热情礼遇，我明白这都源于陈嘉庚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创下的不朽业绩，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为他的事业奉献微薄的力量。我会为中国及四川省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发挥自身的优势，能够作你们的一座桥梁是我的荣幸。

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三位老人都发了言，其中周树根老人是亲自发言。他寥寥几句广东话，却表达了当年回国的决心和意志。谢锦老人由他的老伴代他表达了对陈立人先生的敬意，并感谢四川省各级侨务工作者对他们的关心和体贴。让我非常感动的是95岁的陈昌雄老人是从泸州赶来的，他不仅有儿子陪伴，而且泸州侨办的领导也专程陪伴前来。四川省各级侨务部门对南洋机工的关心与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已故机工吴璋老人的遗孀胡碧云女士和女儿向我们讲述了吴先生在滇缅路上的一件事。惠通桥将要中断前夕，日本鬼子已从缅甸入侵我国并占领德宏。吴璋与其他四位机工奉命往昆明撤退，在撤退的路上不幸被日本鬼子包围，突围时吴璋先生的腿被日本鬼子砍断，是战友们用两根粗树枝把他抬过惠通桥的。

吴璋老人生前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他过世后家庭生活非常困难，胡碧云女士每天早早起来卖早点以维持生计。她和子女遵照吴璋老人的遗嘱从不向国家伸手。四川省侨办的领导来看望她们问她们有什么困难，老人说有困难她们自己会解决，并给省侨办写了一封感人泪下的信。她在信中写道：“我没有困难，有困难我会自己解决，吴璋活着的时候就没给国家增加任何负担，现在我也不愿给国家增加任何负担……”当刘以勤女士谈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她如诉如泣的谈着这位老人的经历，让我心潮澎湃，泪下如雨！这就是我们英雄南侨机工的家属，她们的铮铮铁骨让我敬佩、让我感动！当然，也只有懂侨、爱侨、为侨的干部才能感受到老归侨自立自强、有苦有难自己克服的品格。

此次座谈会本来应该是由我来主持的，当我走进会议厅看到几位老机工和南侨机工的遗孀及子女时，突然想起当年在滇缅路上收集文物的情景，一阵无来由的激动涌上心头，我一时热泪盈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得不将手中的话筒交给身边的刘以勤女士。非常感谢刘以勤女士的默契配合，才使得我不至于那么狼狈。刘女士说：“我1998年9月大学毕业，到四川省侨办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陪同南洋机工老人们到峨眉山、乐山旅游观光。这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对南洋机工老英雄们的一次慰问性旅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南洋华侨机工，也是我进入侨界的第一课。他们的人品他们的精神至今都对我有着极大的鼓舞。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南侨机工他们就像小草一样的平凡，

但他们作出的事业却很伟大。无怨无悔的机工们为我们的祖国奉献了一生。所以我当时写了一篇歌颂南洋机工的文章题目就是《春草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我们的南洋机工就像春草一样，即便是化成泥土，他也要维护我们祖国这朵花。”

从宜宾赶来的南侨机工洪华民的女儿洪玉娘以及在座的其他南侨机工的子女，都在会上回忆了父辈的光荣历史。他们对父辈的评价是老老实实做人，认真真做事，从未对自己回国抗战这段历史居功自傲。而且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子女们都表示不会忘记父辈的光荣传统，以父辈的精神做人做事。对于陈立人先生的到来非常感谢，也一再表示感谢四川省各级侨办部门为南侨机工所做的实事。

在全体座谈人员的要求下，林晓昌先生向大家讲述了他与林福来老人这段动人的父子情。他说：

我17岁独自一人到缅甸闯天下，1986年开始在缅甸九谷和中国碗町之间往来做生意。有一天我在九谷正在做生意，听到旁边传来熟悉的闽南乡音。我抬头看见一位老人正和一位朋友在交谈。老人一口的闽南话让我心生好奇，我走过去和他攀谈起来。在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位叫林福来的老人来自厦门，现居住在中国碗町。我们交谈非常投机，特别是老人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老人从此成为了朋友。以后只要老人到九谷来，我就邀请他到我们家做客。长此以往，老人在我们家开始给我讲述他的历史，讲述他的抗战经历，他的那些经历深深的打动了我。

以后我们很熟了，老人就将他的地址留给了我（云南省碗町市和平街35号），并叮嘱我一定要来家里坐坐。于是我趁一次赶集的机会特意到了林福来老人家中。一进他的家，我看到老人居住的条件十分差，两间低矮的土房潮湿阴暗，简单的家具破旧不堪，还有一位与他相依为命体弱多病的老伴，两人就靠卖早点维持生计。

面对此景，想想老人当年抛弃国外富裕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国抗战，如今这把年纪生活竟如此艰辛，我心里十分难受。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到碗町来探望两位老人，并在生活和经济上给他们一点帮助。尽管那时我也不宽裕，但我已把两位老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两家的感情越来越深，特别是老人家给我讲的南侨机工的故事也越来越让我感动。1987年我的大儿子要出世了，老人非常欣喜，他直率的跟我说：“阿昌啊，我没有子女，你的大儿子生下来跟我姓好吗？”我想老人当年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勇赴国难，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把青春都贡献

给国家，我一个儿子跟他姓相比之下算什么？我毅然答应，以了却林福来老人的这一愿望，让我的大儿子姓林取名键辉，老两口高兴的不得了。自孩子出生后老两口天天守在医院忙上忙下，就如自己的亲生孙子一样疼爱。由于我们感情越来越深厚，我已隐隐感觉老人非常希望我也能姓林，圆他一个子孙绕膝的梦。终于有一天，老人的老伴对我把这话说了出来。这个问题确实棘手，中国人的姓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族标志，一个儿子随外姓还可能让族里的人理解，但全家都改姓远远超过了家族的传统观念。我经过深思，想到这几年与这两位老人朝夕相处，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深厚情谊。尤其是两个儿子的出世，两位老人就像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样的关心呵护。特别是林福来老人一生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无论社会对他多么的不公，遭受多少磨难，他从没在我面前表示过对国家对社会的不满，也很少谈及他个人的功绩。他谈的最多的是那些在滇缅路上牺牲的战友和他们的亲属。一想起这些，我还有什么犹豫的？认了这位值得我一生敬佩的老人做父亲，也是我的荣幸，在他的有生之年了却他的这个心愿，让我们全家永远的孝敬他。

老人听到这个决定激动万分，拉着我的手叫老伴快去买酒买菜，说要和我这个儿子好好喝个痛快。第二天又把我拉到九谷的观音寺，请方丈主持仪式让菩萨作证我与他正式结为父子。这还不够，老人拉着我坚持要到畹町公证处进行公证。

199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老人十分悲伤。为了不让老人孤单，我在缅甸为老人请了一个保姆。但保姆毕竟比不上自己人，我每次去看望老人，都能感觉到老人内心的孤独和悲凉。于是一年之后，为了照顾这位年迈的父亲。我们举家从缅甸九谷迁移回到中国畹町定居，一直照顾到老人去世。我敬养林福来老人并不只为他的贫困，而是为他的精神所动。我为他付出的精力财力是有限的，是应该的。而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价的。

最后，四川省侨办机关党委书记吴振西先生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总结性的讲话。他说：

我们四川省侨办非常荣幸有机会与陈嘉庚的后人——长孙陈立人先生，以及菲律宾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文化宣传部主任汤晓梅女士共同筹备组织了这次探访南侨机工座谈会。一进来就被这浓浓的侨情及华侨的美德所感染。我是军人出生，虽然不是归侨侨眷，但多年的侨务工作让我对华侨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对华侨有着深厚的感情。今天的这个座谈会非常有意义，其一，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怀着深厚的感情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贡献。其二，陈立人先生继承家风秉承祖德，专程到四川成都（重庆）

来看望南侨机工，充分体现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家族对南侨机工的特殊感情。近百年来陈嘉庚先生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书写着光辉的一页，华侨领袖这面旗帜一直高高的飘扬着。

回顾历史，当年有三支南洋华侨队伍到中国参加抗战，一支是一批南洋华侨青年，他们投笔从戎奔赴延安；还有一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东江纵队抗日武装；第三支队伍就是人数最多、最为集中最有组织的分批回国的南洋华侨机工。这是一支最了不起的队伍，是中国华侨史上最为悲壮的一笔。全国解放后，留居四川省（包括重庆市）的南侨机工有30人左右，但今天来成都参加座谈会的只有3位老机工，他们三位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在这里不仅仅是缅怀、歌颂南侨机工爱国主义精神，更主要是继承发扬这种精神。通过这个座谈会，我们看到了我们侨界的光荣传统、侨界的革命精神和侨界的骄傲。什么是侨界的光荣传统、侨界的革命精神和骄傲？就是南侨机工爱国主义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南侨机工为中国的抗战作出重大牺牲的精神就是我们侨界的革命精神；南侨机工队伍在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演绎了一场英勇悲壮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就是我们侨界的骄傲。

我们就是要继承他们的传统，发扬他们的精神，以他们的精神来做好我们的侨务工作。我们四川省的各级侨务部门，在四川省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对南侨机工都非常重视，各级有关部门对有困难的机工都给予照顾，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今天，省、市、区侨务部门的各级领导都来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我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把我们的侨务工作做的更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作为专司侨务的部门，就是要以亲侨爱侨的深厚感情去体现共产党的先进性，全心全意为侨办实事就是体现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

由于陈立人先生的时间有限，我们第二天下午就驱车赶往重庆，抵达重庆已是深夜12点多钟。重庆市侨办国内处的处长王燕女士一直在路上等着我们，替我们安排好一切之后，王燕女士才返回家中休息。

第二天上午10时，重庆市侨办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已为我们组织安排好此次探访活动。他们的这种工作精神，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他们对归侨的感情和对南侨机工的关心和爱护。

走进重庆市侨办的会议室里，三位南侨机工及遗孀、子女都已座候，这让我有点忐忑不安。我急步向前与三位老人握手致谦，并向大家问候。

座谈会由王燕女士主持，重庆市侨办的杨主任首先发了言。他说：“我今天代表重庆市侨办热烈欢迎陈立人先生一行三人的到来。陈立人先生的祖父陈嘉

庚先生当年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我们侨界的光荣，这面旗帜一直鼓舞着我们做好侨务工作。1997年我有幸到集美瞻仰陈嘉庚先生的故居，缅怀他的功绩。今天在这里见到他的后人陈立人先生，而且是专程到重庆探访南洋华侨机工及他们的子女、亲属，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促使我们将更进一步的把侨务工作搞好，全心全意地为华侨服务。”

陈立人说：“我特意从英国赶来看望、拜访大家，时间匆忙，幸有重庆市侨办的主任、王燕女士及其他工作人员帮我们组织安排，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召开这个座谈会，作为陈嘉庚的后人我非常的感谢。尽管我是在国外出生，但祖训难忘，祖籍难忘，所以我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每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因为这里等于是我的第二个家。此次也是特意创造一个机会来看望大家，现在就由晓梅将我们此行的内容向大家介绍。”

汤晓梅：“关于此次与陈嘉庚的后人陈立人先生到四川、重庆探访南侨机工老前辈和家属、子女，是我们恒昌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多年来的愿望，他让我向大家问候，以后一定会来探望大家。今年我们恒昌公司准备为抗战胜利60周年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滇缅公路的终点站——畹町建一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第二件事就是准备出一本书，这本书就以我们南侨机工的子女的立场、观点和认识，来叙述我们父辈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南侨机工，记住南侨机工。最起码要告诫我们南侨机工的子孙后代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为了将这本书写好，我和林晓昌先生、陈立人先生还有陈毅明教授特意策划了今天这么一个座谈会，同时也是借此机会与大家见面、交流，互相鼓励。我们不图笔下生花只求感情真实。就让我们一起共同聆听三位南侨机工老人的历史回眸。”

在座谈会上，林广怀（86岁）说：

回忆60年前，陈嘉庚先生号召我们回国参加抗日，才有今天这个座谈会，这个有他的后人陈立人先生亲自来看望我们的座谈会。因此，我感到非常幸福。回想抗战时，我才十九岁，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回国抗战的呢？第一就东北东三省沦陷，我记得那首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是受这首歌的启发，让我知道了我国东三省失陷。第二就是1937年武汉合唱团到南洋演出时唱那首歌（唱）：“有钱的出钱把乡保，练新兵操枪炮，要不然敌兵到，把你当枪炮，白白送了命一条。”对这两首歌，我印象很深，让我想到没有了国，哪还有家啊？这就是促使我回国抗战的原因。我当时是日光篮球队的队员，（当然，现在脚不行了）我们也上街筹款募捐，我站在一个高台上（唱）：“同胞们细听我来讲，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自己也捐款，

先后共募捐 2000 多元，统一由当地筹赈会汇往祖国支援抗战。

南侨机工八十先锋我就报了名，当时报纸一登我的名字在上面，祖母就跑到筹赈会不让我去。后来我就想个主意把原来的名字林江海改成现在的林广怀，才赶在第八批机工队回到国内来……

林老先生的光荣历史在《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重复赘述。

林广怀老人是位生性活泼、心态年青、可亲可敬的老人。他讲话时妙趣横生，歌声不断。他说他今天只说两点，第一只说幸福不说悲伤。第二就是说他是什么原因回国抗战的。他说他在南洋就很会做生意，抗战胜利后，他自己开了个汽车公司，既然是从南洋回来的，公司就叫南洋汽车公司。后来解放大军南下，他因为误听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所以就把公司卖掉，卖得 400 大洋。“四清”时说他是“老虎”要打他，但后来还是让他这只“老虎”过了关。他要求加入共产党，又说他历史不清不能入，他说不入就不入吧，那就比比谁干的好，最后还是年年被评为模范。他说他在汽车公司平平安安开车开到退休，现在嘛安享晚年享清福。要说对国家的贡献，还比不上沧海里的一滴水！

程龙庆老人今年 84 岁仍如十年前那么精神，两道长长的寿眉像寿星一般慈祥可亲。他说他要讲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最让他终生难忘的是在延安被鬼子的弹片划伤，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十分关心，专门派一位华侨机工来照料他。伤好后跑到球场看球赛，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人群中认出了他说：“小鬼，又来了，伤好了吗？”还嘱咐他要好好休息。程老先生说着这件往事，脸上呈现出孩童般的笑容，看得出他对这段往事的深刻记忆和表露出的得意。程老先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儿子儿媳都对他孝顺有加。老先生的光荣历史也在《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有详细记载。他的儿子程晓华的文章《回忆父亲》附后。

蒋印生老人真正是南侨机工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今年 78 岁。他是 13 岁时从印度回国的。蒋老先生满面红光，精神焕发。他的记忆力很好发言最长，可以从小时候的事说起。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享受着离休待遇。他现居永春，是由当地的侨务部门专门派车送他到重庆来参加座谈会的。他和林广怀老先生、程龙庆老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陈嘉庚先生的故居看看。因为他们今天见到了他的后人陈立人先生，很想亲自到鳌园缅怀他并告诉他，他们没有给领袖丢脸，没有给南洋八百万侨胞丢脸，抗战时期无论多艰苦他们都没有当逃兵，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赤子报国的忠心矢志不改。还特别想见一见陈毅明教授，因

为他们最记得陈毅明教授十年前在大会上为他们呼吁，那泣不成声的发言，让他们感动至今。

参加座谈会的南侨机工遗孀、子女都发表了自己的感受，他们异口同声的感谢重庆市侨办领导和工作人员对南侨机工的关怀，称赞当地侨务部门是他们的娘家人。已故机工陈寿全的女儿陈玉琴在会上说：“今天这个座谈会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回忆自己的经历。1989年父亲去世前，得知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在为南侨机工建纪念碑，父亲激动的泪流满面，他说他们3200多位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这段历史，总算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我还是要告诉父亲，祖国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南侨机工的后代也不会忘记你们。今天陈嘉庚先生的后人来看望我们，更激励我们牢记父辈的光荣历史，继承父辈的爱国精神，无论身在何处，无论是何信仰，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信念是始终不移的”。

此次到四川、重庆探望、采访南侨机工老人和他们的子女、亲属，一路都感受到两地侨务部门对南侨机工的关心和支持。在十多年前的一些报纸上，我就已看到四川省（那时包括重庆市）为南侨机工呼吁，为南侨机工讲话，南侨机工的待遇向有关部门反映。当年我也正是以他们的这些资料为依据，到国务院侨办及有关部门为南侨机工奔走呼吁。今天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不仅可以公开、大肆张扬的公诸于世，南侨机工老人为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贡献也得到了应有的社会回馈。尽管这个应有的回报姗姗来迟，尽管能享受这一切的机工老人为数不多，但这毕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进步的一个印记。

历史无价 多难兴邦

我这一生中最幸运的是经常能得到贵人相助。我所说的贵人并非是有钱（权）有势的人。他们可以是我童年的玩伴，在我知命之年的时候带给我童趣；他们是我工作中的同事，在我困难的时候伸出友谊之手；他们是我读书时的同学，当我命运多舛的时候给我勇气战胜苦难。南侨机工父辈们更是我心目中的高贵之人，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直面人生，他们每一位的人生经历都是我读之不完，写述不尽的宝贵资料。陈毅明教授则是我在不惑之年结识的一位大姐、一位教授、一位使我重新感悟人生的导师。在她的帮助下我知道“南侨机工”的历史价值，从而着手收集南侨机工的文物资料。

一直以来，我对历史文物的认识几乎是零，因为在我的人生阅历中这是一页空白。读书时没有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工作后是一位会计师。以后虽然一直从事文职工作，但对文物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微乎其微。是陈毅明教授的引

导和支持，使我对历史文物及其重要性有了些许的认识。才有了挖掘南侨机工历史文物的意识和收集这些资料的行动。从1993年至1994期间我从昆明开始，以后又自费沿着滇缅公路进行寻访和收集，从而及时的抢救了一批南侨机工的历史资料和实物。现在回想起来备感欣慰，了无遗憾，如果当时没有去做这个工作，现在来做恐怕就更难了。

陈毅明教授人同其名。是一位意志坚强有毅力又有聪明才智的温柔女性，在与她相处的十多年中，她那忍辱负重心胸豁达善解人意不怕困难的品格让我敬佩又自愧。她外柔内刚是非分明无私无畏一身正气的精神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时常折射出我的无知与不足。她就像一支燃烧着自己的蜡烛永远照亮着别人。认识陈毅明教授是我人生之大幸。但想起与她认识的过程还常常让我羞愧三分。

大概是1993年初，陈教授来电话找杨保华会长。当时杨老不在，我的朋友拿起电话随口说杨老不在他的秘书在（其实我从未任过秘书之职）。我接过电话听到的是年青姑娘清脆悦耳的声音，对方自称陈毅明，是厦门华侨博物院的，想了解南侨机工的一些情况。我心想这大概是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自以为是的滔滔不绝的讲着，陈毅明教授则静静的听着。数月后在厦门见到了陈毅明，原是位比我年长的大姐姐，心中暗自羞愧却不便言表。多年来这位年龄上的大姐，生活中的良师，精神上的益友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如果说我在收集南侨机工历史文物的工作中作出点成绩，那么这点成绩是与这位仁人分不开的。

当然也与南侨机工父辈们及他们的子女们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是分不开的。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幸福还是艰辛，都不讲任何条件，就把历经周折珍藏多年的文物资料交给我。这种支持和信任，让我感到万分荣幸。接过他们手中的文物就像接到一份厚重的历史使命，看到他们用心血保存的这些文物史料，就像看到他们当年驰骋在滇缅路上的飒爽英姿。

在收集南侨机工文物资料中，使我认识了很多南侨机工老前辈，也认识了一些和南侨机工历史有着直接关系的人物，如原云南省交通厅工程桥梁工程师谢自佳先生，他曾在修筑滇缅公路的工程中任技术员。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滇缅公路上的历史照片，而且大多是谢老先生亲自拍摄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日本飞机轰炸功果桥的照片，是谢老先生亲自拍摄的。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年日本鬼子是如何狂轰烂炸，而南侨机工就是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抢运着抗战物资。这照片见证着南侨机工穿越抗战烽烟的历史。

还有一位与南侨机工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原侨光小学校长梁佑贤女士。因为南侨机工互助会当年就设在侨光小学。



南侨机工叶亚味与侨光小学校长梁佑贤（右）

昆明侨光小学是新加坡侨领侯西反先生于1942年所筹办，1943年正式开学。当时只有初级小学4个班，教职员工7人，校长（梁佑贤女士）1人。学生全部为侨生，都免费入学。由于缅甸沦陷，侨胞一批批来到昆明避难。两广同乡会理事长苏剑泉先生组织救侨委员会，安排难侨住宿及解决医药、治疗等费用。但侨童流浪街头者众多，侯西反先生当即发起创办侨光学校，修筑校舍于福建会馆（即今侨民小学）。当时侨胞家庭困难，为使儿童安心求学，学校每天免费供应中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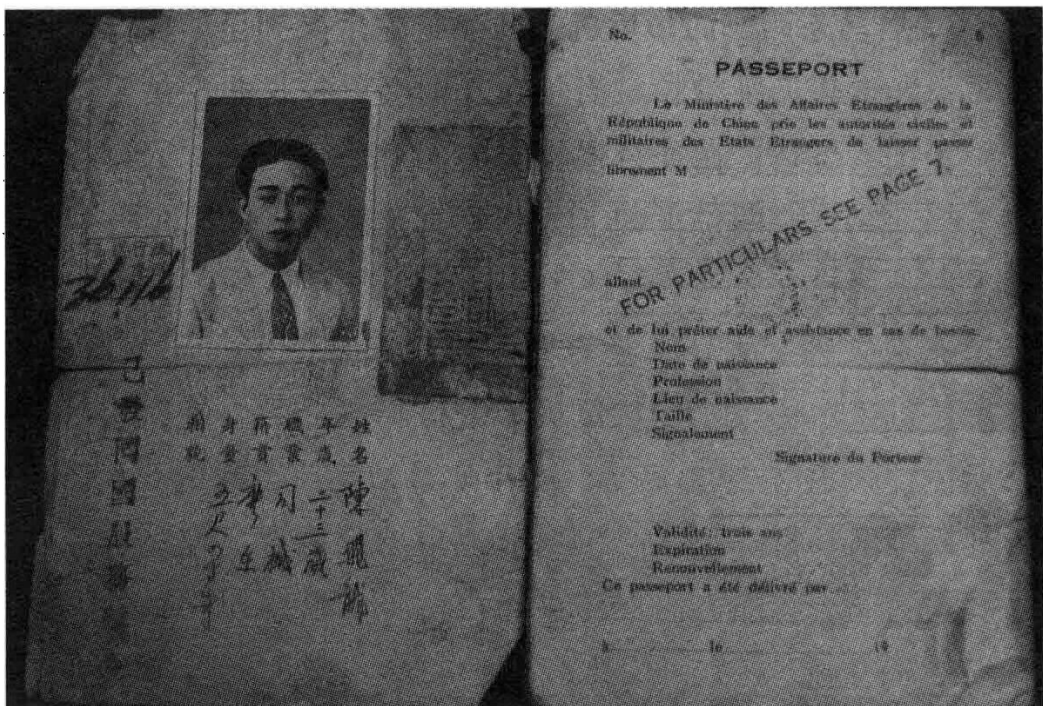
当时还有华侨机工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分批回到祖国在滇缅路线上服务。情况极为困难，缺乏车辆，道路失修，机工贫病交加。侯西反先生就在昆明福建会馆组织华侨互助会，向海外募款亲自动员捐赠衣药物品回国救济机工，又办了华侨通讯刊物。（引自梁佑贤：《侨光简史》）

侯西反（1883—1944）是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的得力助手。1939年12月被新加坡英殖民当局以“反英”罪驱逐出境，回国后任职于国民政府。1944年11月10日因赴重庆筹措经费从成都返回昆明时，飞机在昆明机场附近坠毁，不幸遇难身亡。梁佑贤校长亲自到遇难现场寻找，经辨认遗体后将其安葬，并于13日在昆明举行了公祭。由于历史的变迁，侯西反先生的墓地现已无法找到，但其墓碑却在一次修建房屋施工中从昆明市侨联的地下被挖掘出来（不知何因会埋藏于此处）。此墓碑现存放在昆明市博物馆。

2000年，现居马来西亚的华侨机工叶亚味先生来到昆明探亲时，向我打听梁校长，他说他非常想见梁校长，当年在互助会梁校长非常关心南侨机工的生活，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在征得梁校长的同意后，我陪着梁校长驱车来到了叶亚味先生下榻的宾馆。两位世纪老人相见真是感慨万千，他们相互都还记得彼此的容貌。那天梁校长还跟我讲述了一件事。当时有一位南侨机工不知何因，被国民党当局抓走关押起来，说是有共党嫌疑。是她多次到关押所据理力争，并愿为这位南侨机工做保，才使这位机工获得释放。梁佑贤校长在侨光小学任校长一直到退休，今年已92岁高龄。今年6月初我还去看望了她，精神还是那么好，每天都要读书看报。我在心中默默地为她祝祷着：好人永远平安！这次从她那里，我得知现居新加坡的白清泉老机工于上月中旬在新加坡去世，享年96岁。白老先生是1939年由南侨总会组织的第一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即“八十先锋”的总领队。抗战胜利后他历经万难回到新加坡，曾任职于《中兴日报》，不久后，创办大华食品有限公司，至20世纪70年代，已是名声大震的“酱油大王”。

最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南侨机工陈飞龙，他是提供文物资料最多的老人。1992年春天，我走进陈老阴暗潮湿的住所，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当时，他躺在床上已不能说话了。他的老伴在耳边告诉他，我们来看他了，陈老张嘴啊了两声，眼角滚下了泪珠。看到老人一家三代住在这不足20平方的破屋子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我向陈老的老伴说明来意，老人家从破旧的抽屉里拿出一包用红布包着的包裹，打开来让我看。这是我见到文史资料最多的一次，其中有几张纸质文物是我过去未曾见过的。陈老先生的老伴征询他是否要把文物资料交给我时，老人躺在床上点了点头。

陈飞龙老人祖籍广东，抗战爆发前侨居马来亚柔佛州新山埠，是第三批经越南回国的南侨机工。听杨保华老会长说，陈飞龙会说很流利的马来话。而老人的子女对我说老人生前很少提及自己的历史。我很能理解这番话，因为我接触过的很多南侨机工，他们对当年回国参加抗战服务的经历以为很平常。他们常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嘛，大家都很年轻，都是热血青年，都想回来打日本鬼子，那个时候谁都会这样做。”我捧着陈飞龙老人的这些文物，看着老人用过的军用水壶，心潮澎湃。虽然我写不出老人很多的事迹，但睹物思人，这些物证在无声的永远的传述着陈飞龙老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壮举。在老人去世前我又曾去过两次。值得欣慰的是老人在去世前，他住的那房屋属于拆建旧房，老两口分到了新住房。老人去世后我曾为他老伴今后的生活找到了老人的单位，一位领导听了我的介绍后，非常感动，他说原来只知道这位老人



陈飞龙的护照

是华侨不知道是南侨机工。他们单位当时非常困难，在第一线修公路的职工都拿不到工资，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陈老先生的事情处理好。过了两天，陈老的女儿告诉我都处理好了，这位领导也来电话告知了我。

对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悲壮之举，在收集南侨机工历史文物的过程中，我有着刻骨铭心的了解。也正因如此，每次讲到南侨机工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面对着他们的悲，更想起他们的壮，想起他们当年热血报国虽历经悲欢离合而无怨无悔时，更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伟大与平凡。

走笔至此，我再一次由衷的向南侨机工老前辈及他们的子女们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的很负责的告诉你们，当年凡是经过我手向你们征集的南侨机工的历史资料、文物，我已全部完整的交到厦门华侨博物院收藏。近些年来，还有些国外的机工和后代也给我陆续的寄来资料，也包括今年我们又收集到的，我都将在今年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整理出来完全交给厦门华侨博物院。我也希望那些曾采访过南侨机工，写过南侨机工，收集过南侨机工文物资料的朋友们，能够善始善终的把南侨机工的事情做好。目前我手中还有一些南侨机工老人和他们的子女写给我的借据，希望我能帮他们要回当年一些人从他们手上借走的文物资料。一个人如果借了他人珍藏的历史资料和文物长年不还，甚至颠倒为商品，那么你的人格不免也随着掉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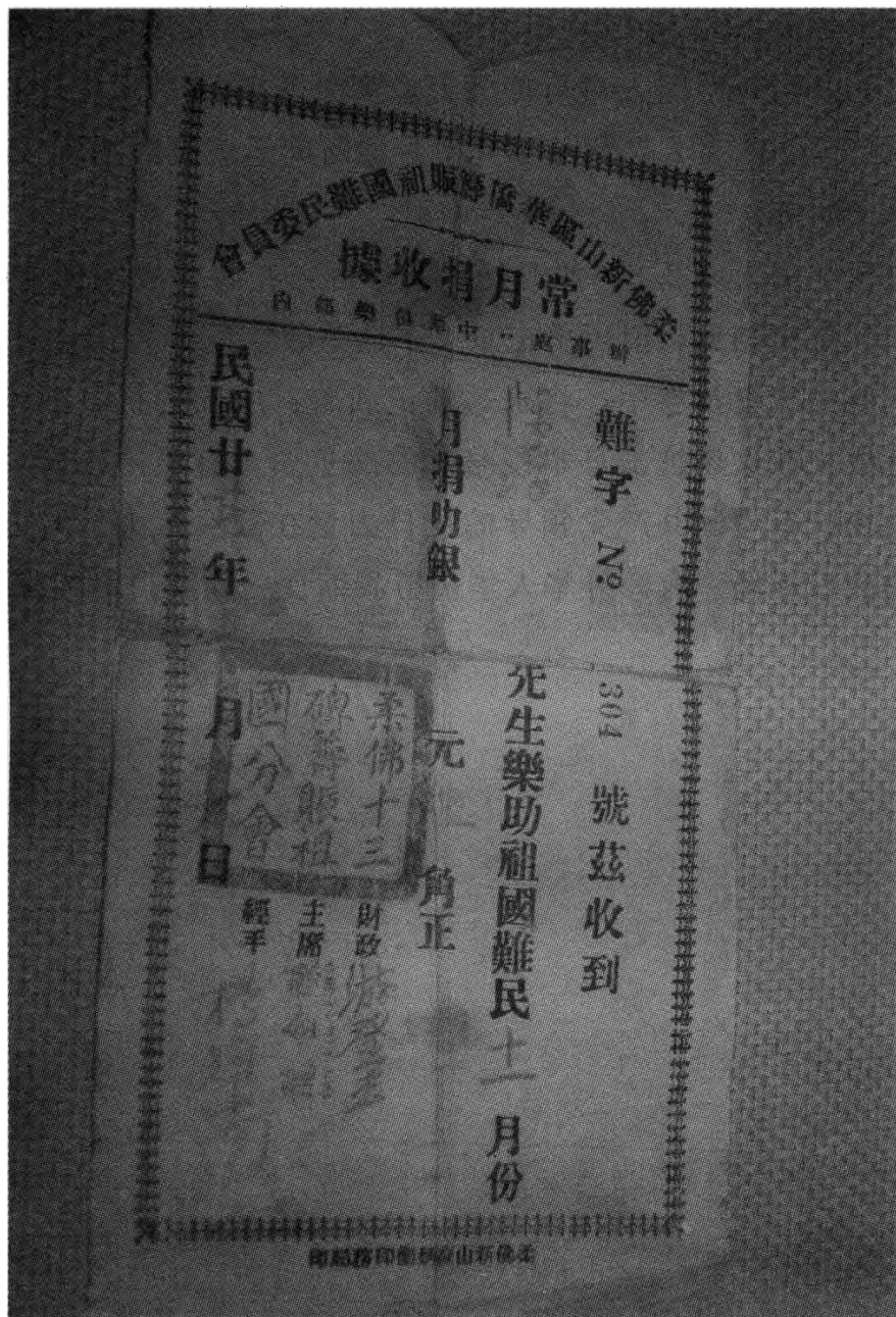
时间可以治愈创伤，淡化苦难的回忆。但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座知识宝库，她记录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漫长的奋斗足迹。治理国家、振兴民族、发展经济，应“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历史不能抹杀，更不容篡改。抹杀和篡改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3200 多位南侨机工参加中国抗战，是海外华侨高度自觉的行动。从“九一八”后，旅居世界各地的侨胞就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特别是“七七”抗战爆发后，从亚洲到欧洲、从南美洲到北美洲、大洋洲，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就有爱国华侨的社团组织，就有为国捐输、抵制日货的浪潮。海外一千万——南洋八百万侨胞风起云涌的救国运动，实际上是在世界范围开辟了中华民族抗拒日本侵略者的又一个战场，浩浩荡荡，汇成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支生力军。

1941 年 4 月 11 日《华商报》曾报道：

在南洋，谁没有缴纳筹赈会的月捐，谁的襟前就没有月捐牌，各报就会把他的大名登出来，无论是劳动阶级、薪水阶级。按入息缴百分之五以上的月捐。从抗战开始至今没有间断。

在菲律宾，华侨的捐款是长期性质的，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商店的职员，拿出百分之二十的薪金捐献国家，一般资本家的捐款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陈飞龙珍藏的筹赈会捐款收据

缅甸华侨每月自动认定月捐及特别捐。

暹罗华侨好多商店都有组织的按月抽薪金百分之五。

香港最初没有赈筹会组织，月捐起步较晚。1938年底，每月月捐总计二万余元。

美国华侨从抗战第二年起，制定出周密的长期捐输办法，即每人每月限购公债五十元。

各地捐款最多的是马来半岛。人数少捐款多的为英国。

月捐带有强制性，因为这是衡量一个人爱国不爱国的具体标尺。

仅此，可见当年华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之一斑。在这种情怀的驱使下，抗战头三年华侨捐献飞机 216 架，救护汽车 1000 多辆，坦克 23 辆，其他如棉衣、麻袋、医药等物品不计其数。

当时的国民政府宣布，从 1937 年到 1941 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为 226 亿国币，其中华侨捐款为 53 亿，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府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当时中国人口有四万万，海外华侨一千万，只占全国人口的 2.5%。南侨机工 3200 多人，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运载抗战物资 45 万多吨，平均每天运载量 400 吨。

这就是只占全国人口 2.5% 的海外华人华侨，在海外战场创下的累累战果。虽无枪林弹雨、短兵相见，但历史记录下了这些数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中，将永远的记载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在这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有中国政府军与侵华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广大的地区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力量的敌后战场；有海外华人华侨节衣缩食、踊跃捐输的海外战场。

第五部分

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华侨群体

1. *Chlorophyll a* (Chl *a*)

[illegible]

忆 66 年前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片段

潘金成

1939 年初，抗战处于敌我相持阶段。我国沿海口岸有的已沦陷，有的被完全封锁。但国民政府早已有应急措施：赶建滇缅公路。这时，滇缅公路已竣工通车，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已打开。沿着这条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腊戍与缅甸首都仰光，联接从仰光到印度洋出海口。从此英美援华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得以输入，而我国支援英美的矿产品也循此出口，昆明对内地可与川贵及大西北联接成一块。

公路的修通，急需数千名的汽车司机和修车工。国府向陈嘉庚先生呼吁，陈嘉庚先生发出拯救国难号召，广大华侨热烈响应，于是就有从 1939 年起连续八九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来自泰南、吉打玻璃市及吡叻的应募机工先由陆路到槟榔屿集中，然后改由水路乘船去新加坡与各地机工会合，出发回国。

时光已过逝 66 载。那时我 14 岁，是槟城钟灵中学学生，只记得与钟灵铜乐队、口琴队参加一次欢送游行。记忆只留下片段的痕迹，对参加活动，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下面的情况。

一、学校口琴队名曰“百人口琴队”，参加活动的实际上只有 40~50 人。我是寄宿生，同宿舍的学长四五人是基本队员（有的是组织者），在他们引荐下参加口琴队。我从 10 岁起就爱吹口琴。到钟灵时口琴已很熟练，掌握的曲子也不少，较复杂的广东乐曲《小桃红等》都能吹奏，而且能打拍子。当时槟城琴行正进口一批清明花耐尔（又译“好来”HORNER 口琴），价格不菲，因音量宏亮共鸣声好颇受欢迎。我校的口琴队就用它武装起来的。当时领队兼乐队指挥是一位高班学长叫林铃逊，音乐很有造诣，口琴队内有 5~8 支低音伴奏（BA65），大部分队员指定用普通吹奏（用舌头不打拍子），在当时一支 40~50 人的口琴队也相当于三四把手风琴，演奏效果是蛮不错的。

二、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大会会场设在头条路（我们叫 Magagine）春满园游艺场。在春满园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大会的盛况已没有印象，我仅清楚记得大会结束后，开始游行。队伍从春满园出发，沿着头条路向东北经过沓田仔（此街叫 Carnanor Street）前进。沓田仔有集中于此的大书店、文具店，素有槟屿文化街雅称，街上挤满侨胞，高呼口号，表示对机工的敬意。从沓田仔向南转入打石街（Jalan Arch），路窄，因游行人挤，无轨电车也停下让道。到

了打石街南头往东就是沿海港墘路，走过很长一段，过了大年轮渡码头，再往北走就是驳船泊地。身穿灰色军服、打绑腿的机工们，背上行李，下了驳船划到轮船上船。

三、口琴队当时确定在游行中吹奏的曲子，现在记起来的有：《光明赞》、《马赛曲》、《凯旋曲》（记不起曲名但其英文歌词是“Triumph, triumph the boys are marching.”）、《牺牲到了最后关头》、《保家乡》、《长城谣》、《再会吧，南洋！》、李叔同由《旅愁》改编的《送别》等。校铜乐队演奏间歇时，我们口琴队就接上，轮流吹奏。

历史有巧合，我有幸于1991年4月去大理开会后，五一节到昆明，去西山游览，在美丽的滇池畔巍峨的山脚下，凭吊“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我陷入了绵绵的回忆之中，怀着深情和敬意向故去的机工们默哀。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记起我国军民当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其间也包含了3200多机工所作出的牺牲。这充分体现了华侨对祖国的热爱。而一支小小的口琴也让我受到爱国主义的亲身体验。66年前的一些片段让我永记心中，常用爱国主义来鞭策自己，直至生命終了。

（潘金成 山西省阳泉市政协主席）

九十老叟蔡若水对南侨机工的调查研究

陈宪光

近 20 年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逐渐引起了华侨历史学界、侨务界和影视界的重视。但是，国内最早关注南侨机工命运，调查、搜集、整理南侨机工的资料，并积极给予帮助的蔡若水先生，却鲜为人知。

早在 1985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蔡若水相继在福建《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和《泉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发表了题为《“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部分调查史料》与《“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纪要》两篇文章。其后，又在《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一、二辑）发表了《“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纪要》的《补遗之一》和《补遗之二》。这些文章披露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历史和南侨机工的状况。介绍了南侨机工蔡联璧、汪延生、蔡汉良、庄霖助、叶天来、黄党生、陈武烈、刘瑞齐、林开者、郑天赐和李石屑等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经过以及他们的感人事迹和不幸遭遇。

蔡若水何许人？他为什么写南侨机工？南侨机工是华侨，是从国外回来的，是与境外有着种种关系的人，在当时，人们大多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对华侨仍心存恐惧，而蔡若水居然敢写南侨机工？！

与南侨机工是同行

蔡若水是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泉州分公司的退休职工，今年已是 90 高龄，自 1991 年移民美国新泽西州，但仍长住家乡泉州。1937 年，他考入福建省汽车管理处，从此投身汽车运输界，从站务员做起，1939 年提升为永安汽车总站副总站长，1941 年调任朋口总站总站长。抗战期间，朋口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出入福建车辆多在此集散。日寇南侵后，大批难民经朋口进入内地，尤其是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回国难侨（包括流落云南的回国抗战机工）也多数经朋口归来。蔡若水经常无私地为他们提供帮助。为此，福建省政府还专门下文委派蔡为难侨接待专员。1943 年，永春籍侨领郑玉书、颜子俊、尤扬祖从海外脱险归来，投巨资与省银行合组福建华侨兴业公司，聘蔡若水为运输部经理。1947 年 9 月，蔡若水应聘为福建省公交公司的业务股长，1948 年底回泉州筹组泉厦汽车公司，专营个体商车。1946 年蔡若水被推选为福建省第三届公路工会理事长，以后又被选为全国公路工会常务理事，1947 年在首届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为国大代表。这样，蔡若水不仅有了资深的工作经历，又有相当的政治背景和人脉关系，从此确立了在福建汽车运输界的地位。

正因为长期在汽车运输部门工作，使蔡若水有机会认识了许多当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从南洋回国抗日的汽车驾驶员、修理工。早在 1943 年蔡若水担任福建华侨兴业公司运输部经理时就聘用马来亚华侨陈金顺为驾驶员。陈是

良，决心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从此，蔡若水开始帮助蔡汉良四处申诉。蔡若水多次代蔡汉良书写申诉信，陪同他到泉州地、市两级侨联、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了解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希望有关人员能理解蔡汉良回国抗日的赤诚之心，公正对待蔡汉良，改善蔡汉良的处境。在与蔡汉良交往时，蔡若水遇到退休后在永春居住的南侨机工刘瑞齐。刘瑞齐的经历同样深深触动了蔡若水。刘瑞齐是马来亚华侨，第八批南侨机工，编入第十五大队四十四中队，参加过广西南宁战役，抗战结束后在国民政府独立汽车连当司机，1949年9月在成都随汽车连方连长起义，1952年转业回乡。刘瑞齐回乡后生活长期窘迫，无法享受应有的政治待遇。蔡若水在了解到刘瑞齐的情况后，多次帮助刘瑞齐向侨联、武装部、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反映其过去的经历，希望能按起义人员落实政策。但是问题一拖再拖，总是解决不了。

蔡若水目睹了身边这些南侨机工的遭遇，看到这些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日的功臣所受到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十分同情。在多次申诉四处碰壁而毫无结果时，蔡若水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价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斗争史的大是大非的严肃问题。这段历史应该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应该还本来面目。

让人们了解南侨机工

蔡若水认识到要让人们了解南侨机工，自己首先必须先了解南侨机工。从此，强烈的责任感，促使蔡若水把南侨机工问题作为他晚年的主要研究课题。1976年蔡若水提前退休，开始有计划、有目标的收集南侨机工情况，首先采访调查身边的南侨机工，不断扩大采访面。蔡若水多次自费到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厦门、福州、漳州、龙岩等地采访幸存机工和知情者，多方收集、订正各人的口述史料，历经8年，仅采访笔记就多达数十本，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当他听说蔡联壁先生要去云南探亲（其夫人是云南人），蔡若水登门拜托，请求帮助联系留在云南的原西南运输处的故旧，了解散居在云南的南侨机工。遗憾的是蔡联壁先生一到昆明，触景生情，过于激动，加上高原反应竟一病不起，致使蔡若水联系云南南侨机工的愿望推后了好几年。20世纪80年代初，蔡若水开始整理采访到的“南侨机工”史料时，经常得到原福建泉州市文史办主任陈盛明老先生（厦大南洋所研究人员）的指点。在文章框架和体例方面，蔡若水采纳女儿蔡治淮（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的建议，以“史料”和“纪要”的形式成文。1983年陈老先生审阅了蔡若水文章的初稿。因为蔡若水的采访面不断扩大，南侨机工的史料一再增加，文章的内容也

一再增加，数易其稿。1984年初陈盛明先生抱病协助蔡若水最后定稿，并把《“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纪要》一文交时为泉州市政协文史办负责人曾栋先生发表于《泉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上。《“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部分史料》一文，是蔡若水亲自交原中共泉州市委统战部部长谢永华先生转《泉州华侨史料》主编庄为玠先生，发表于《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都选择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的1985年。之后，1986年、1987年，蔡若水又相继在《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一、第二辑，发表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纪要的若干补充》和《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纪要补充资料》。1988年蔡若水又与陈自强（漳州一中历史教师陈盛明先生之子）合作，在《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发表了《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等。在这几篇文章中，蔡若水向世人介绍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由来、组成及部分斗争史实，专题介绍了南侨机工蔡联璧、汪延生、蔡汉良、庄霖助、叶天来、黄党生、陈武烈、刘瑞齐、林开者、郑天赐、李石屑等人从南洋回国抗战的经历和斗争史迹。在文章中，蔡若水还将他采访了解到的南侨机工按“姓名、原籍、侨居地、所属单位、回国后工作单位、现在情况”，以及抗战结束复员后，“返回闽南工作未再出国者”、“留在云南工作者”、“返回南洋者”、“在西南牺牲者”、“广东籍南侨机工”等进行分类、整理列表。先后共整理发表了81位南侨机工的资料。在蔡若水采访笔记中待核实订正尚未整理出的南侨机工还有多位。这些来之不易的资料的公布，使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史迹重新发掘出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日后南侨机工争取公平待遇、恢复名誉，为推动陈嘉庚先生发起的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积极影响。

为促使南侨机工问题的早日解决，蔡若水还通过华侨大学陈允敦教授引荐，在1985年初带蔡汉良到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参观，把蔡汉良介绍给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并与纪念堂、华侨研究所的同志座谈，向华侨所和纪念堂提供了蔡汉良保存的证章、证书、奖状等珍贵文物，补充纪念堂的展览，扩大影响，以求引起各方的重视。随后，蔡若水还把刘瑞齐、郑天赐等幸存“南侨机工”介绍给华侨研究所。1985年夏，蔡若水赴京，专程为蔡汉良平反事，两次拜访庄明理先生和张楚琨先生，还将了解到的南侨机工状况向庄老先生反映（庄明理先生是蔡若水舅舅著名西医黄和贵先生的至交，1930年代庄在泉时常住在黄和贵家中）。老先生表示一定尽快反映蔡汉良问题和南侨机工问题，并要求蔡若水通知蔡汉良等南侨机工，在华侨大学校庆时到华大与他见面。1985年底，庄明理到泉州参加华侨大学25周年校庆，接见了蔡汉良等，在华侨大学陈嘉庚纪



刘瑞齐（右）与蔡汉良（左）（蔡若水 提供）

念堂看到蔡汉良提供的南侨机工的证章、证书、奖状。当看到蔡若水发表在《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上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部分调查史料》一文时，庄老先生非常激动，随即交代华大复印 30 份带回北京。不久，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学术访华团一行 6 人访问泉州，也向当时《泉州华侨史料》负责人庄为玠要去该文。陈共存先生则将该文复印给新、马社团和有关人士，着手搜集返回南洋的南侨机工的状况，并于 1986 年 1 月组织率领新加坡南侨机工访问团到云南滇缅公路考察访问。1986 年底，国务院侨办、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对在国内的南侨机工给予生活保障，发给荣誉证书，予以表彰。沉寂了 30 多年的南侨机工，得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从此，蔡若水奔波了十数年，以个人的力量，靠着微薄退休金的支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采访调查，承受着政治压力，独立完成的维护南侨机工抗日史实的数篇调查报告，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实事求是路线，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引起各方的严重关注，最终促成了南侨机工问题得以解决。

南侨机工精神的传承

当南侨机工事迹载入史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为南侨机工落实政策文件公布后，幸存的泉州南侨机工奔走相告，纷纷登门道谢，都说蔡老先生做了件大好事，功德无量。一时间蔡若水不到8平方米的卧室兼会客室经常是挤得满满的，这些来自各地的南侨机工及其亲属，一起回忆当年回国时的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回忆被遣散后的生活无着、贫病交加，回忆“文革”中的种种不幸，更多的是回忆蔡若水采访他们时，他们的疑虑和不解，这一切都使蔡若水感慨万千。

作为蔡若水的子女是深知父亲独力、自费采访南侨机工之艰难。当时蔡若水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落实，长期不公正待遇已严重损害他的身体，但他仍不顾年老体弱，靠微薄的退休金，数年如一日地奔波在采访中。在采访过程中，有的机工不愿再提起往事，有的怕再惹麻烦，更多的是对能否得以落实政策持怀疑态度。面对复杂的现实，蔡若水通过和他们拉家常，激起他们对回国抗战峥嵘岁月的回忆。他凭着自己多年在汽车运输部门工作建立起来的威信和多年同事形成的信任感，终于采访到关于南侨机工最真实、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核实机工们提供的史料，他不仅动员夫人周吉卿女士及子女、媳妇抄写资料、文章，查阅史籍，还经常到处奔波与当事人核对史实，致使心脏病多次发作住进医院。可以说，《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纪要》等文章的发表，倾注了蔡若水及其家属多年的心血。更为可贵的是，当蔡若水看到南侨机工的问题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时，他没有把自己多年独立自费采访到的资料，以及与幸存南侨机工建立起来的关系视为己有，他深深知道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全面反映出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全景。于是，他毫无保留地向华侨大学、北京、云南等地的来访者，尤其是华侨大学的青年教师提供线索，介绍他所认识的南侨机工，提供原始采访记录、资料、文稿，提供搜集到的文物或其影印件、复印件，就像当年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献给国家一样，从来没考虑要得到任何回报。对蔡若水的这种举动，许多同志都大为不解，包括子女起初也不能理解，哪有把自己辛辛苦苦独立采访到的还没有发表的宝贵资料，二话没说就提供给人家。但蔡若水不这样看待，他认为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是私有知识财产，这些南侨机工用生命和热血创造的功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和精神财富，应回归社会。南侨机工为了爱国，为了抗日作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应该把他们的史迹提供给研究者，提供给每一位关心南侨机工的同志，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史实，尤其是年青人，蔡若水对南侨机工的重视与敬重，感动着子女们。他的子

女支持他为南侨机工的事所做的努力。

应该说，蔡若水发掘南侨机工史迹的这段史实，不失是一篇弘扬南侨机工精神，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老人忧时忧世，忧国忧民，愿为伸张正义而不断付出的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后学的榜样。笔者是蔡若水先生的儿媳，一名史学工作者，清楚地看到，正是南侨机工精神激发他克服难言的艰辛，坚持采访南侨机工，整理南侨机工的史迹，勇敢宣传南侨机工。笔者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是“四人帮”的跨台；如果不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如果不是众多史学工作者及侨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课题的提出和研究单靠某个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时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今天，人们不会忘记南侨机工爱国抗日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人们也不会忘记蔡若水先生发掘“南侨机工”史迹，传承、弘扬南侨机工精神的贡献。

（陈宪光 任职于华侨大学）

我所认识的南侨机工

林天福

1957年我从印尼回到北京读书，1958年响应祖国的号召到祖国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来到了祖国的边疆——云南省德宏州的芒市。

有一天我在芒市的街上闲逛，突然听到有人用口哨在吹着 Terlang Bulang（马来西亚的国歌），我心生好奇，这边疆地区怎么有人懂得马来西亚国歌？循着歌曲声，我走近了这位吹口哨的人，是一位在街头修理手电筒的叔叔。我上前问这位叔叔是哪的人，怎么会唱马来西亚的国歌？这位叔叔毫不迟疑的告诉我：“我是抗战时期从马来亚回来的华侨，是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来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机工”。从那以后，我认识了这位当年的华侨青年先锋队员，南洋华侨机工叔叔——谢川周。

1984年，我调到了州委民政侨务局当副局长，专搞侨务工作。1985年开始落实侨务政策，我就计划作好三件事。第一是宣传好中央对华侨的政策，第二是在全州进行归侨侨眷的调查工作，第三就是一定要落实好南侨机工政策的工作。这三件事情，特别是对南侨机工的政策，一天不落实好，我一天也睡不好觉。因为我以前就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有海外关系”、“有特嫌”，不仅本人受到迫害，连子女都受牵连，读书、工作都受歧视。南侨机工当年别离了自己的父母、妻子，放弃安定的生活回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反而变成了历史罪人，这是为什么？这很不公平！因此在落实他们的冤假错案时，一定要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让他们有一个公正的位置。这样，他们才能抬起头来做人。所以一定要得到州党委、州政府和各界的重视和认同。

在州委大力的支持下，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当选了代表、委员，甚至政协委员。在全州对归侨侨眷进行普查登记，对南侨机工逐家逐户进行拜访、慰问。南侨机工说，想不到还有这么一天。由于他们的年纪已很老迈，因此我们于1984年国庆期间组织他们到北京参观，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的变化。当时州侨联的业务经费每年仅几千元，我们就拿出3000多元做这件事。到了北京火车站，受到全国侨联领导的亲自迎接。老人们非常感动，当时那种场面真是感人，个个都是泪流满面。在北京，南侨机工老人受到张国基主席的宴请。对于南侨机工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他们感受到作为华侨，作为南侨机工的体面，做人有意思。

经过这么一段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南侨机工的情况和困境受到州党委州政府领导的重视，在政策上、措施上有保证，因此他们在晚年能享受各种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他们不是罪人，而是华侨抗日的功臣，值得我们学习。

(林天福 德宏州侨务退休干部)

战争是把双刃剑

汤璐聪

我喜欢读方军的文章，因为他笔锋犀利，文章精辟，敢砭时政，实话实说。

我也喜欢方军这个人，因为他朴实平淡，真诚善良。他采访的人物不管是将军、士兵，不分职高、位卑，只要是为抗战作出贡献的，都是他笔下的民族英雄。

他的父辈老八路，当年小米加步枪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生活中的方军只要有醋溜白菜土豆丝就能写出好文章。

他真无愧是老八路的好后代。

认识方军也是源于南洋华侨机工。

七八年前，他还在北京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工作，奉公到昆明采访、收集南侨机工文物和资料。我窃喜有北京作家来写南侨机工，自然愿为他当马前卒。我带着他在昆明的大街小巷直至玉溪，走访了20多位南侨机工。然而他意犹未尽，独自跑到保山、滇西又寻访了几位。回到昆明时，手里拿着几件日本鬼子的破钢盔、刺刀、饭盒……很大方的让我随便留一件。我心想，这些鬼东西上面都沾染着中国人民的鲜血，放在家中晦气！我不要！

但是我佩服他的这种精神，因为这些东西是他跑到海拔4000多米的松山上挖掘到的。方军的文章之所以脍炙人口，可读性强，是和他的这种写作精神分不开的。我曾陪他去采访过百岁老人张家福，张老汉只有一颗牙，说话走风漏气，一句话我只听得懂一个字。方军为了能听清老人的话，跟着张老汉同吃同住了一个多星期。

这几年他为云南的抗战史写了不少文章，使外界对云南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作用有了不少的了解和认识。但同时我又非常生他的气，为什么南侨机工的文章一字不见？我去电去信质问他，他每次都非常抱歉、非常客气的说：写！写！一定写！后来我知道了他没写的原因。当年因为是“公务”到云南，所以“公务”下的采访资料全部要归公，归了“公”的“物”没人继续“公务”，想“公务”的方军却被挤在门厅外。

好在无公务的方军现在更务实了。这不，他的第二本书《最后一批人》在今年抗战60周年出版了。

方军的第一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我见过日本人，但我没见过鬼子

兵。我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日本鬼子是凶恶的、残暴的、灭绝人性的。方军让见识了一个鬼子兵，而且是一个女鬼子，但这是在 60 多年前的称呼。现在这位叫胜坚靖子的日本女士，我称她为胜坚老师。



胜坚靖子（中）2003 年在北京

胜坚老师满口标准的普通话，不要介绍她的名字，你肯定以为她是地道的北京人。慈祥的脸面还能看得出当年的风韵，但看不出她已经有 80 岁的年纪。她每年都带着日本学生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并引导学生资助中国贫困地区。她用自己的亲生经历，向学生讲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切，我从日本学生卑谦的表情，和对我们恭敬的态度中感受到。这种卑谦、恭敬使我对胜坚老师更添一分尊敬，对日本学生也多了一分亲切。

胜坚靖子向我们讲述了两件事，都是她自己的亲历。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 1945 年，17 岁的胜坚靖子在哈尔滨日本陆军医院担任护士。当苏联军队快打进哈尔滨的时候，她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将住院的日本伤兵全部用毒剂注射致死。没过几天，苏联军队打进了日本陆军医院，胜坚靖子从医院二楼的窗台跳下逃跑了。

胜坚靖子随着大批的日本难民往北跑，跑到一片芦苇塘中隐藏下来。这时，有婴儿的哭声响起，苏联军队在后面不远处紧追不舍，为了保全大家的安全，一道命令——把襁褓中的婴儿全部捂死。

听到这里，我们全部人都流泪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无独有偶。今年初，我们的电视剧组在畹町，到一个叫法坡村的寨子拍电视，我走进村中，看到村中的大树上吊着一颗炮弹壳。我想日本鬼子在德宏两

年多的时间里，一定来过这里。找到村里最老的村民一问，果不其然，法坡村当年是日本鬼子的医院驻地。村民说日本人走时也是把伤兵全部杀死，大概有400多个日本伤兵。前几年村民挖地时，还经常挖出尸骨。

我们的剧中有一场戏，日本鬼子将南侨机工捆在村口的大树下，活活的打死。村民告诉我，确实有中国同胞被日本鬼子捆杀在这棵树下。历史和现场——这么巧合！

战争真是把双刃剑，操刀手杀别人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那天到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公寓见胜坚靖子，一行5人中我稍年长且女士，其余四位都是军人出生，包括文人方军。他们四位服兵役时分别在陆、海、空部队，加上我——民兵（我还真当过民兵营长哩）。我看看我们的“陆、海、空”，观察着我面前的十多个日本学生，我在遐想，如果在60多年前，我面前的这些日本学生是否也是鬼子兵？如果是，那么，我想，我们5个人对付他们是绰绰有余的。尽管日本现在的经济比我们发达，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但从精神面貌上看，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谈话时，我发现胜坚靖子的眼光时时在我脸上停留，而我的目光也一直在在她脸上扫荡，我在仔细观察她。后来她走到我的身边问我是作家？记者？我说都不是，但我告诉她我是南洋华侨机工的子女。南侨机工你知道吗？就是抗战爆发时，由三千多侨居东南亚的华侨青年中的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组成的回国抗战服务团，在滇缅路上运送抗日物资。滇缅公路你知道吗？我的父亲当时侨居马来西亚，就是为了抗日才回国的。她问我父亲是否是在战争中去世的，我告诉她，虽然我的父亲不是在战争中牺牲的，但我父亲有一千多名战友牺牲在这场战争中。

我心无介蒂，坦率的对她“抗日、抗日”地讲着，同时也观察着她的表情。我发现胜坚老师不仅坦然，而且很认真的在听我讲。当我介绍完后，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哦，哦”两声说：“是嘛，是嘛，我们日本人就是对不起中国人民嘛。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用我的毕生精力，致力于中日人民的友好，教育我的学生，中日不能再战，永远不战！”

后来我了解到，逃跑后的胜坚老师被中国的一位军人救护，以后就嫁给了这位军人，她们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期，中日邦交后，他们才回到了日本生活。

我欣慰有胜坚靖子这样的日本人，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语言向中国人民谢罪。尽管她是来自于民间。

而另一位日本青年，既无知又出言不逊，一位正气凛然的中国青年与之较酒。一人一瓶红方威士忌，当场喝完。喝完后中国青年醉了三天三夜不省人事，

日本青年几个小时后生命归西。(请看方军《最后一批人》)

我叹息这位年青的日本人，由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受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同时，白白送掉自己的命一条。我说战争是把双刃剑，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将自己伤害。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战争，如今的中国也不是 60 多年前任铁蹄践踏的时代。我听说这位日本青年的父母，不愿媒介报道这件事情，我猜想，不愿报道的原因，是他的父母比他多一点历史知识吧。

化戟为犁。我想起了挂在法坡村中的炮弹壳，现在村民们用它作为集合的钟声。我希望那象征警钟长鸣，但我更希望敲响的是永远的和平之音。

中日不要再战！世界不要再战！

单骑千里滇缅路

(与四位游侠座谈录)

汤璐聪

今年元月中旬，我和陈毅明教授在边关名城畹町接到厦门方面的信息：有6位厦大学生利用假期准备单骑走访滇缅公路，预计在春节前后到达畹町。

为这6位同学的精神感动，我们在畹町积极组织南侨机工的子女，与畹町侨联和畹町宣传部准备好好的迎接这6位勇士。遗憾的是春节过后直至2月14日我们离开畹町，还未见到6位勇士的面，而且连他们的消息也终断了。

2005年3月31日上午9时许接到孟向东电话：“我们现在金碧路上，大约十多分钟到。”

这就是6位游侠单骑走访滇缅路，历经60多天，行程1000多公里，于28日胜利返回昆明后，我接到他们的第一个电话。

稍时，4位长胡子长头发、脸膛被高原紫外线晒的黝黑的青年一路风尘的走了进来。孟向东是最后一个跛着脚进来的，他的年纪，他的身体状况让我无由的惊讶，而他的精神让我由衷的敬佩。原来这位自由撰稿人就是当年单人单骑周游中国大地的勇士。此次活动就是他在网上发起组织的，采访林晓昌是他们此次活动的计划之一。

时间：2005年3月31日上午10时

地点：恒昌国际集团公司驻昆明办事处

人物：林晓昌（以下简称林）恒昌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南侨机工子女

汤晓梅（简称汤）恒昌国际集团公司文化宣传部主任、南侨机工子女

孟向东（简称孟）自由撰稿人

江兵（简称江）从事多媒体、网络、平面设计者

赖永顺（简称赖）从事多媒体工作、从天津骑自行车到厦门参加者

赖恩典（简称恩）从事多媒体、网络、平面设计者

汤：欢迎你们，辛苦了，还有两位同学呢？

江：张文清和宋歌是厦大的学生先回去了，因为学校开学。

汤：我和陈毅明教授得到你们的信息时，我们还以为春节期间在畹町能见到你们，直至2月14日前都没有一点你们的消息。

江：春节期间我们才走到大理，大约有400公里路程吧。

汤：回到昆明后还给你们发过信息打过电话也没联系上。当时我们得到的消息和在网上查获的信息，以为是6位大学生。今天见到你们有点意外但非常高兴。

赖：我们四个不是学生，孟向东是自由撰稿人，我们3个都从事多媒体工作。

孟：我们是沿着滇缅公路的老路行走，所以有的地方收不到信息。

汤：你们此次单骑滇缅路的主题是围绕抗战60周年吧，只访南侨机工？还是包括远征军、驼峰还是整个滇西抗战。

孟：60年过去，两个政权的替换，不好评论，但抛去这些色彩，全民族的人民团结一致抗战，不易抹去。当时的滇缅公路称为血线，如果没有这条血线，中国就可能会灭亡。20万筑路民工、3200多位南洋华侨机工、美国援华飞虎队，远征军这些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故事。

林：是啊！整个抗战的胜利，滇缅公路功不可没。一些年轻的人不知什么是滇缅公路，是20万民工用血和肉筑成的这条路。惠通桥不断，就没有驼峰航线，没有这两条血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汤：滇西抗战这段历史，由于宣传不多，知之人甚少，特别对于南洋华侨机工、驼峰航线、美国援华飞虎队。你们此次以这种方式重访滇缅路，我想会在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

孟：你为林福来老父亲修基建碑——怀园，我理解。但修建南侨机工纪念碑，你是省政协委员、德宏州侨联副主席，你可以呼吁啊，为什么还要自己出钱呢？

林：因为我们德宏这个地方还是个贫困地区，目前政府还拿不出钱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州政府及畹町开发区的领导、从中央到省里的有关领导和部门都非常支持这个事情。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这件事是做不成的。

汤：建纪念碑也是论述历史的一种形式，是为前人树撰让后人楷模的。但这还是需要政府的支持，很多事情不是有钱就能办得到的。

孟：可以简单讲讲你的个人历程吗？

林：我的经历是太苦了，1979年10月我身上只有10元人民币加上两斤白糖，单身一人从昆明走到缅甸。坐过牛车、马车、拖拉机、农用车。一路上是遇上什么车就搭什么车，什么车能让我搭我就搭。那时东西便宜，几角钱就可以买一斤香蕉。就这样用了25天的时间走到了畹町。（说到这里很感叹，双手摆摆）不讲这些了。总之我也是双脚走过滇缅公路的，所以对滇缅公路很有感情。

孟：寄予此你对滇缅公路有感情，纪念碑建成以后如何管理？

林：建成以后由畹町侨联和宣传部管理。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我付出的只是资金是值得的。这可以教育后人、教育后代不要忘记先辈的精神。

孟：看了纪念碑的效果图，这在畹町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虽然畹町是弹丸之地，但不得不写，还没有个人修纪念碑的。

林：我只捐款，纪念碑是属于政府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批准，无论个人有多大的能力也是办不到的。

孟：左右邻居怎么看，你怎样给自己定位，老板、名人、机工后代？

林：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建纪念碑还会遭人骂。我是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做生意，百分之四十做侨务工作，特别是南侨机工的事情。

孟：基本定位为商人。

林：是啊，以商定位以商养商，才有资本做社会公益事业。

孟：你的身份是中国，还是……？

林：中国，为了老父亲申请回国的。

孟：你深知他们对国家的奉献，但社会对他们不公。你怎样看待民族、国家和个人？

林：以大局为重，没有国家那有小家。

孟：青山埋忠骨，荡气回九州！南侨机工的爱国之心代代相传，这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源泉所在。

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

林卫国

论及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能不提到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事迹。可是对于“南侨机工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如何投身抗日战争的”这类问题，许多人不是很清楚，尤其在北方更是如此。

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永春县。由于出身华侨家庭，我比较早就知道南洋华侨机工。年轻时，就听担任过永春县蓬壶镇侨联主席的父亲提及过南洋华侨机工，我们永春县就有几个南洋华侨机工。我担任山西省侨办主任期间，有机会接触南洋华侨机工，甚至同他们交上了朋友。退休后，我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并采访报道过南洋华侨机工，对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有必要回顾那段抗战的历史，将南侨机工那鲜为人知的一页呈现在国人面前。

南侨机工的由来

1938年10月，上海、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战略防御阶段。

在海外，华侨社会群情激愤，纷纷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爱国侨胞看到国土沦丧，日寇肆虐，同胞身陷水火，认识到唯有团结抗敌，中华民族方有生路。1938年10月10日，南洋45个埠的168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举行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先生为主席，实现了在抗日救亡目标下华侨团体的大联合。“南侨总会”以“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为宗旨，大力开展各种活动。

在国内，沿海各省均被日军占领，海上运输全被切断，广九铁路亦被占领。当时缺乏工业基础，大部分武器靠从国外购入，即使后来开辟驼峰航线，但由于日机的轰炸及各种条件限制，空运补给能力有限，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庞大需要。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部分依靠陆路运输，国民政府只能在陆路运输上想办法。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在西南大后方修筑两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公路：一条从云南昆明—开远—蒙自—屏边—河口南出国境直抵越南河内，即滇越公路；另一条从昆明—楚雄—下关—保山—畹町出国境同缅甸公路相接

直达仰光，即滇缅公路。1939年初，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两条公路相继完工。特别是滇缅公路，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它全长1146公里，动员了20万民工，耗时半年多才建成，成为战时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最主要通道，是补给中国抗战物资、维系中国生存命运的交通大动脉。

有了路，还需要有车和人，而当时国内有经验的大卡车司机及汽车修理工奇缺，临时培训又来不及。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39年初致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招募华侨机工。设在昆明负责管理这两条运输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属准军事机构），也派主事人赴南洋与陈嘉庚商洽有关事宜。陈嘉庚先生认识到此事关乎抗日大业，迫在眉睫，立即召开“南侨总会”专门会议，决定：一、在各地华侨报纸上发布第六号通告进行公开招募；二、直接发函各地属会，要求“从速进行办理”。在南侨总会及其所属筹赈分会的发动和组织下，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南洋华侨青年积极响应，报名踊跃。由于对机工年龄（要求在40岁以下20岁以上）、身体素质等要求较严，一些条件欠缺的爱国青年求战心切，甚至想尽办法“蒙混过关”。

经过10天的严格筛选和精心筹备，第一批回国服务机工80人（其中新加坡华侨32人，马来亚华侨48人）集合完毕。陈嘉庚主席在接见大家时，发表讲话说：“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艰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1939年2月18日，他们全副戎装在新加坡登上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启程，经越南抵达昆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南侨机工八十先锋队”。动身时，机工们个个情绪激昂，高唱《运输救国歌》：

同学们，

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唤醒着同胞，

团结着华侨。

不怕山高，不怕路遥，

收复失地，赶走强盗，

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此后，半年内有15批机工相继回到祖国参加抗日，共有3193人，其中有4名为女性。连同马来亚士乃回国服务团2批27人（第一批12人为先遣团，早在1938年9月26日就已启程回国）、槟城机器行回国服务技艺工程队1批32人，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回国的8人，总共达3260人。

从此，中国抗战史上，就有了“南侨机工”这个名称。“南侨机工”是“南

洋华侨机工”的简称，系指1938年、1939年自东南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爱国华侨汽车运输工作者。回国的南侨机工中，大部分在滇缅公路服务。有少部分没有在“国统区”停留，而是继续北上，冲破层层阻碍，历尽千难万险，最后抵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还有一些南侨机工则曲折辗转，投奔活跃在华东抗日战场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尽管他们同样都是为了抗日一个目标，但后来的命运却不相同。本文着重介绍留在“国统区”从事抗日工作的南侨机工的情况。

南侨机工的四个“十分”

有一些华侨史研究者把回国抗日的南洋华侨机工称为“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我很赞成。我认为，之所以说他们“最为悲壮”，是因为他们具有四个“十分”：

一、决心十分坚定

他们身居海外，心系祖国，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为了抗日救亡，个个奋勇当先，义无反顾。舍小家，为国家；牺牲自己，挽救民族。祖籍福建永春的马来亚华侨刘瑞齐，是第8批回国的南侨机工。他参加机工团时，才结婚没几天，同时还经营着一间商店、一辆卡车和1000棵橡胶树。但他认为：“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于是瞒着家人和新婚妻子，偷偷报名，参加第8批机工队伍回国抗战。后来妻子忧郁成疾，卧床不起，老岳父写信叫他回来照顾一下。他回信说：“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妻子病危时，老岳父曾关掉商店，回国寻找他，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滞留国内数年之久。就这样，刘瑞齐为了抗日救亡，抛弃了温暖的家庭，永别了新婚妻子。另一位永春同乡、马来亚华侨颜世国，也是第8批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他在当地一家布店当汽车司机，薪金优厚。后协助朋友经营杂货铺，赢利甚丰。1939年春节，他在马口埠举行婚礼，夫妻双双将结婚戒指和节省下来的婚宴费用，捐献给当地的筹赈会，以支援祖国抗战。接着，他把已有身孕的妻子送到槟城岳母家中安顿妥当，便瞒着母亲和弟妹，跑到新加坡参加机工团回国。祖籍广东大埔的马来亚华侨张光旺，是个裁缝师，生活稳定。为了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日，他毅然卖掉自己的自行车，买了汽油，向一个姓杨的师傅学驾车，掌握了驾驶技术。并化名“张万森”，报名参加机工团，奔赴滇缅公路服务。原籍广东南海的马来亚华侨机工汤耀荣，自幼父母双亡，靠老祖母抚养成人，成为闻名遐迩的修车高手。他走了三步“暗棋”：瞒着祖母，偷偷到筹赈会报名，并特别交代不能登报宣扬；同时向好友说出真情，请他们代为关照老祖母；最后悄悄

给老祖母留下一封信表明心迹，请求老祖母原谅自己不辞而别。就这样，他怀着“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毅然踏上了回国抗战之路。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陈嘉庚表扬的这位南侨机工，就是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他自愿放弃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收入，参加收入微薄（每月只有30余元津贴）、工作危险（时刻都有生命之虞）的机工团，投身抗日战争，最后牺牲在运输战线上。

从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共3260名。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司机、修理工，又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等等。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其决心之大、意志之坚，皆感人肺腑，可歌可泣！

有一首歌曲是描写南侨机工豪情壮志的，也是南侨机工最爱唱和经常唱的，歌词如下：

车在我们的手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奔赴沙场。
统一意志，集中力量，
冲！冲没了一切恶势力，
干！干激了领袖的主张。
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
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

二、贡献十分卓越

对于南洋华侨在抗日战争中财力方面的贡献，已有不少著作记载。陈嘉庚先生所著的《南侨回忆录》有着较详细的叙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洋华侨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是如此……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每月捐款高达1000万元，如果将捐款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在国内可发行4倍纸币，即达4000万元。而当时抗日正规军（国民政府军队）有300个师约300万人，每月食饷军费约4650万元。至于寄回祖国的侨汇，则数量更多，作用更大。”

在人力和技术方面，南洋华侨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应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招募的南洋机工，在抵达昆明后，先接受了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后由西南运输处正式分配工作。1400多名南侨司机被集

中编为6个大队，驾驶卡车1200多辆，派往滇缅公路服役。其余的南侨司机则编入混合大队，与国内机工并肩抗日。南侨修理技工除一小部分随队担任抢修工作外，其余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方的汽车修理厂工作。有些机工还被派往湖南、广东及越南、缅甸等地服役。大多数则集中在滇缅公路服务。据统计，常年来回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多达3000辆以上，其中近1/3是由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大家不怕苦，不怕死，过着“道路为乡车为家”的生活。

功果桥与惠通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日寇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0年10月，日方专门成立“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从越南河内频繁出动飞机，对功果桥和惠通桥进行重点轰炸。1941年1月23日，功果桥被27架日机轮番轰炸毁坏，日本电台广播说：“功果桥已被炸断，滇缅公路国际通道三个月之内没有通车希望。”然而，聪明无比的南侨机工却从附近仓库中征集到几百个空汽油桶和大批木板，仅10个小时就用钢索扎起长达300米的大浮桥，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满载军火物资的车队开过江去，保证了这条抗日大动脉的畅通无阻。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机工们还把浮桥建造成活动式的。有空袭警报时，可将浮桥左右分开，隐蔽于两岸树木之下；警报解除时，再拉出来连成一座浮桥使用。

1940年7月17日，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压力，英国政府宣布自7月18日下午6时起封闭滇缅公路缅甸段。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南侨机工们迅速组织起来突击抢运，夜以继日、不顾疲劳地将堆积在缅方一侧的大批军用物资运进国境。10月18日，关闭3个月的滇缅公路重新开放。此后，一直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侨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其中仅1941年一年就运入机枪、炮弹、汽车和各种药品等达13万多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缅甸。应英国政府的要求，也为了保卫这条极为重要甚至是最后的国际交通线，当时的国民政府把第5、第6和第66军组建为中国抗日远征军，先后开入缅甸对日作战。此时南侨机工不仅要抢运抗战物资，又担负起运送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任务。从1942年3月到4月，远征军先后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同日军作战。仁安羌战役解救出被日军包围的7000多名英军。由于丘吉尔政府没有防守缅甸的决心和准备，作战中又歧视中国军队，未能与远征军很好配合。而蒋介石又处处迁就英美，致使远征军连遭损失。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被日军占领。4月底至5月，中国远征军陆续退却，南侨机工又担负起运送远征军撤回国的任务。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又缺乏“天时、地利、人和”之条件。南侨机工不

畏艰险，知难而进，为了抗日大业，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闯过一道道难关。

部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服从抗战大局的需要，转移到其他战场工作。例如：1942年8月，盟军在昆明招收第一批南侨机工50人，由李卫民担任领队，赴印度机场，从事运输工作。1943年初，盟军又派遣南侨机工200多人，参加远征军，赴印度从事抗日军事运输工作。1943年5月，部分南侨机工被吸收参加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统辖的136部队，由林谋盛、庄惠泉负责，潜入马来亚敌占区，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后来林谋盛在马来亚被日寇逮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1944年4月，盟军总部又从南侨机工中，选调部分精干人员，派往东南亚，潜入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原籍福建南安在南侨机工蔡汉良，1944年5月被盟军派往泰国，化名蔡坤，潜入日军占领区从事侦察工作。他大智大勇，巧妙与敌特周旋，查明日寇设在原始森林深处的拉温军事基地的情况。历尽千难万险，于1945年5月，将情报带回昆明，向盟军总部作了详细的汇报。盟军经过核实之后，从昆明和印度调动大批轰炸机，对日军拉温基地进行了猛烈轰炸，一举摧毁了日军的军火库、火车站、电台、高炮阵地，大火整整燃烧了六七天。南侨机工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牺牲十分巨大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共牺牲了1028人，约占回国人员总数的1/3。可以说，滇缅公路差不多每公里路段上，都埋下一具南侨机工的忠骨。他们的牺牲，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死于条件险恶的行车事故。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由昆明至边镇畹町为959.4公里，由畹町至缅甸腊戌为187公里。沿途高山、深谷、悬崖、峭壁、陡坡、急弯不计其数，还要跨越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等湍急河流。一路坡陡路窄，行车异常艰险。英美盟军的司机行车到这些地段时，往往胆战心惊，止步不前，要请南侨机工代为驾驶。特别是当雨季来临的时候，路面更是泥泞不堪，还时常出现塌方。有不少南侨机工就是在危险路段上发生事故以身殉职的。他们连人带车坠入峡谷深渊，往往连尸首都找不到。

二是死于缺乏救治的流行疾病。南侨机工的工作环境，都是高温、潮湿之地。高山连绵，沟壑纵横，树高林密，杂草丛生，到处瘴气弥漫，蚊虫成群，许多机工患上疟疾等疾病。当时，整个大后方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异常缺乏。许多机工由于缺医少药，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不幸身亡。参加第八批机工团回国的马来亚华侨沈茂山回忆说：“滇缅公路所经的深山老林和热带坝子，是疟疾流行的地区，许多华侨机工染上了这种病都丧了命。1940年底，

我也患上了恶性疟疾。虽然住进了西南运输处医院，但病员多床位少，再加上缺医少药，医院就把我赶了出来，叫我自己求医治疗。后来，幸好遇到在生活书店供职的朋友，在她的帮助下，我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41年1月27日《新华日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疾，平均死亡每日约计七八人。”第四批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陈荣，熬过了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在复员回居住地与家人团聚的几天前，却在半途染病身亡，令人痛惜万分。

三是死于日本军队的疯狂屠杀。对于中国抗战的“输血管”——滇缅公路和滇缅公路上的“主力军”——南侨机工，日本军队可谓恨之人骨！他们频频出动空军和地面部队，疯狂地进行袭击。据统计，自1940年10月18日至1941年2月27日的130多天内，日寇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公路重点地段达20多次。在如此险恶的情况面前，3100多名南侨机工毫不退缩，他们和6000多名国内卡车司机和机修人员一起，日夜不停地奔驰，为祖国输送抗日物资。面对敌机轰炸，他们出生入死，恪尽职守，毫不退缩。由于汽车日夜奔忙，损耗严重，修理工的工作也日益繁忙。而修理班的驻地，也成为日寇飞机袭击的重点目标，损失严重。第八批回国的马来亚机工陈昌雄，曾在西南运输处第十七大队从事汽车维修工作。在昆明工作了半年之后，第十七大队奉调西南运输处重庆分处。修理班的工作地点靠近一片坟地。石砌的古坟，成为机工们的天然防空洞；警报一响，就往坟地里钻。他回忆说：“有一次，敌机连续7天7夜轮番轰炸，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炸死炸伤了许多人。一天，我正埋头修车，遇到空袭来不及隐蔽，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向我扫射。我马上跳进水田里，浑身沾满泥浆，总算拣了一条命。回头一看，修理班的工棚被炸中了，许多汽车包括刚从国外才买来的新车，都被炸坏了，到处燃起熊熊大火……”

四是死于战斗失利的军事行动。1942年4月30日，滇缅公路缅甸境内终点站腊戍失陷，日军装甲车利用滇缅路大举向中国推进。1942年5月初，云南边境重镇畹町失守，日军冲到怒江咽喉惠通桥西岸，中国军队不得已采取紧急措施炸毁惠通桥，力图阻挡日寇东进。爆破时，桥上挤满了过桥的难民和载满货物的卡车。一声轰隆巨响，许多人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坠入江中，景象惨不忍睹。还有数百名南侨机工和近千辆汽车及几万侨胞，被阻挡在对岸，无法渡过怒江。那些无法撤回的南侨机工在放火烧毁卡车和物资后，一部分冒险泅水渡过怒江，一部分就地参加游击队，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能逃脱日军魔爪，惨遭杀害。祖籍福建南安马来亚机工吴璋，是1939年2月18日启程回国的第一批南侨机工“八十先锋”成员。中国军队炸毁惠通桥时，他所在的车队9人滞

留西岸，被日军围困。在焚烧车辆之后，被日军抓捕充当苦力。夜间，他们趁哨兵打盹之机，互相松绑，朝江边逃跑。哨兵被声响惊醒，疯狂向他们开枪扫射。结果，只有他一人成功逃脱，其他人都四散失踪。他迅速脱掉衣服，口含驾驶证，跃入冰冷、湍急的怒江，被冲到下游艰难地游回东岸。由于凉水的刺激，他一直咳嗽，结果落下哮喘的后遗症。他步行了两天，到了保山。途中因又饥又渴，喝了路边的脏水，结果又患上了痢疾。在保山，他找到过去机工队的驻地，但已空无一人。在加油站，他在一堆废弃的军用卡车中，寻找可用的部件，拼装成一辆勉强可以使用的破车。运载同路的难侨，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开了两天半，才抵达昆明。在西南运输处，由于无人管，他只好和一些机工朋友结伴，四处流浪，直到抗战胜利，才在四川结婚落户。

四、遭遇十分坎坷

善待南侨机工这些流血流汗的抗日精英，是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尽之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南侨机工的遭遇，可谓一波九折，历尽劫难。

在回国服务过程中，有些南侨机工被当局以“违犯军令”等罪名逮捕，投入监狱。祖籍海南的新加坡华侨李山河，是1939年8月第九批回国的南侨机工。1941年4月，在保山因开车搭载一名亲戚而被拘捕，判处2年零6个月徒刑，投入昆明第一监狱关押。在狱中，他看到还有几十名南侨机工被关押，罪名五花八门，大都是含冤入狱。在狱中，机工们饱受殴打、饥饿等羞辱折磨，还要受犯人中的恶棍“四大金刚”、“八大天王”的敲诈勒索，真是暗无天日，苦不堪言！当敌机空袭时，那些狱吏警卫只顾自己，跑进防空洞躲避，而对于那些被关押“犯人”的生死，则全然不顾。1942年，狱中流行霍乱，“犯人”得不到救治，5天之内就死亡了100多人。

华侨领袖陈嘉庚时刻关心祖国抗日战况和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的命运。1940年3月，他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见畅谈，并两次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11月底至12月初，陈嘉庚在结束考察团工作后，不顾疲劳，再次沿滇缅公路视察并慰劳南侨机工，对改善军事运输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为了改善南侨机工的生活条件，“南侨总会”曾筹集一批包括毛毯、奎宁丸在内的急用物资，送往军运前线发给每个南侨机工。但由于国民党军政机构一些人员的贪污腐败，不少物资被截留、私吞，南侨机工的处境仍相当艰难。

管理滇缅公路运输的机构，开始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1941年11月，改为“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中缅运输总局”（简称“中缅运输总局”）。1942年8月，又变更为“军事委员会

运输统制局滇缅公路运输局”（简称“滇缅公路运输局”）。主管部门三易其主，不顾国家正处危机四伏、急需用人之际，竟对远离亲人的南侨机工实施裁员遣散，使他们的驾驶、修理特长无从发挥，飘泊异乡，成为无业游民，生活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沦为乞丐，露宿街头。1942年12月15日，《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救济回国华侨机工》，陈述华侨机工失业流浪的悲惨处境，要求政府、救济机关及赈济团体，应立即采取行动，使归国侨胞各得其所，万万不可敷衍了事，推诿延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幸存的南侨机工及其家属，同当地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并盼望早日返回南洋与家人团聚。是年9月，“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庄明理为南侨机工复员事，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8项要求：1. 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2. 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3. 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4. 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5. 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6. 发给南返机工服装；7. 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可作为奖励，另一方面可作为南返生活费；8. 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上述8项提议，虽获侨务部、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等部门认可通过，但迟迟不能落实、解决，致使劫后余生的南侨机工再次陷入困境。1946年10月，经过陈嘉庚先生的再三督促交涉和众多正义人士的强烈呼吁，南侨机工的复员南返问题终于得以解决。1946年10月26日，第一批复员机工219人（携眷属412人）终于踏上了南返归途。实际上，获准遣返、享有奖金及领到服务证书的总共只有1114人，仅占当年回国抗战机工总数的1/3。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不是某个党派的事情。在国难当头之际，能挺身而出，投入抗战，无论是参加“国军”，还是参加“共军”，无论是在“国统区”服务，还是在根据地服务，都应该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但定居在大陆的南侨机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却相当不好。他们大部分在基层小单位工作，收入微薄，生活窘迫。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到处大揪“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南侨机工（特别是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南侨机工）的遭遇更是悲惨，几乎都遭受过打击甚至迫害。他们的贡献功绩不仅得不到承认，反而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海外关系”等于“里通外国”，回国抗日成了“历史问题”，甚至成了一种“罪恶”。女扮男装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李月美的遭遇最为典型。

李月美祖籍广东台山，1918年出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生性泼辣，爱好运动。当她知道祖国大好山河遭日寇蹂躏、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难，不禁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她和同学们积极行动，抵制日货，组织义演，卖花募捐。“南侨总会”招募机工时，她瞒着父母，女扮男装到报名点应征，终于实现了回国抗日的愿望。经过军训以后，她被分配到设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1940年的一天，李月美在一次行车事故中身负重伤。在医院抢救、治疗过程中，她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性别。康复后，她和精心照料她的团友杨维铨结为伉俪。这位当代花木兰的英雄事迹，顿时传遍了海内外，何香凝女士曾为她题词“巾帼英雄”。1946年，李月美复员回到槟城，与家人团聚。而后，与丈夫、孩子移居缅甸经营一家咖啡店。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并语重心长地叮嘱她：“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回到祖国读书吧！”李月美牢记周总理的教导，说服了丈夫，分批将孩子送回祖国培养，最后自己也回国定居。

“文革”爆发后，李月美被从广州下放到山区英德华侨农场，下田“劳动改造”。她被扣上“资产阶级”、“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游街示众，拳打脚踢，遭受一次次批斗、打击。随着迫害的步步升级，她的身体完全垮了下来，经常昏倒过去。1968年8月28日深夜，这个在抗日战争中驰骋沙场的刚烈女性，用镰刀割断手腕上的动脉，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对“文革”暴行作最后的一次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月美的冤案虽然得到彻底平反，但南侨机工这个群体的幸存者，却在和平时期永远失去了一位英雄。华侨史学者林少川在《当代花木兰》一文中写道：“李月美壮烈牺牲了，她没有死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之下，没有死在异国他乡；她死在号称‘最最革命’的人手里，她死在她梦寐以求的故国家乡；她热情如火地从异国他乡归来，没有想到得到的是如此的归宿；这是一个无限执著的爱国‘巾帼英雄’的悲剧！”

南侨机工的身后事

对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一直给予肯定和颂扬的是南洋侨胞。机工回国参战，侨胞时刻牵挂，竭尽全力给予接济；机工复员南返，侨胞给予英雄般的欢迎和照顾；机工为国捐躯，侨胞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哀悼和缅怀。

早在1946年7月7日，为了追悼和缅怀回国参战的华侨烈士和罹难同胞，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在升旗山与鹤山交界的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除“浩气长存”和“忠灵不朽”的题词外，还镌刻碑文如下：

慨自滔天祸水，起于卢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切恨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之天职；无老无少，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招募机工，大收骊驾辇车之利；技参军运，竞树蜚乌挽粟之功。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宜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布肃清之令，更颁炮烙之刑。公冶被诬，同羈縲继；嬴秦肆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扬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所幸两声原子，三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第飞扬白旆，虽远树于东瀛，而闪烁青磷，尚游离于南廓。客过岷首，空怀坠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忠之碣。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极思掩盖，借安英灵。奈经处处搜寻，始得一丘之草。兹者卜地旗山之麓，建立丰阡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埋玉无忧。庶几取义成仁，亘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历万古而长昭。

1947年11月30日，马来亚雪兰莪华侨筹赈会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的南侨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镌刻着如下的文字：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我国政府，颁发动员令，全民抗战，歼彼倭奴。南岛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沿海各地，均遭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为运输孔道，以资接济，唯战区辽广，辘重运输，急如星火。驾车人材，须尽量搜罗，方克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遣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八年，沐风栉雨，备尝艰苦，幸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固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为可风，爰为之铭曰：机工技术，驾轻就熟。机工勤劬，风尘仆仆。机工任务，滇缅往返。不畏天险，褒斜馆谷。祸生陡变，丧身寒谷。为国牺牲，谁不敬服。自来殉国，必有记录。勒诸丰碑，良志芳躅。

在国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侨务政策逐渐深入人心和贯彻落实，这段曾被遗忘和颠倒的历史，终于恢复本来面目，获得公正的评价，幸存者的处境逐步好转。1986年9月，定居在云南省的70多位南侨机工，在昆明成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推举杨保华为理事长，王亚六为副理事长，郑文聪为秘书长。联谊会举办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为机工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同年11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嘉庚先生之侄陈共存先生继承先辈遗志，继续关心南侨机工的命运，特率团专程考察滇缅公路，调查访问南侨机工的生存状况和丰功伟绩。年底，中国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南侨机工可享受100%的退休金待遇。

1989年，为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

表彰和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在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兴建了一座“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磨难，总算有了明确的“说法”，幸存的南侨机工心里感到了无比欣慰！有的南侨机工甚至把碑文背了下来，经常朗诵。一些怀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也为改善南侨机工处境而奔走呼号。例如厦门华侨博物院负责人陈毅明同志，一直坚持“爱侨为侨”的理念。2000年春，她在撰写《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一文的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提出《改善南侨机工待遇的提案》。她阐明改善南侨机工待遇的重大意义：“营造尊重有功于祖国、有功于社会的华侨、归侨的社会风气……这对于社会有激励和警示作用，对促进侨务工作的发展也有好处。”陈毅明同志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可惜在当代中国，除了侨界人士以外，知道南侨机工事迹的仍然很少。至于研究南侨机工的图书以及反映南侨机工的文学艺术作品（小说、电视、电影等等），更是凤毛麟角。人们知道平型关战役，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知道陈纳德飞虎队……却不知道为抗战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南侨机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作为一个老侨务工作者，我老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有必要去做些什么，让更多人了解南侨机工。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一段不可抹杀和忘记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一项永垂不朽的光荣。为此，在“非典”肆虐期间，我被一种责任感所驱使，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一次次出去采访已成耄耋老人的南侨机工。

据报道，至2005年初，全国还健在的南侨机工只剩十几个人。云南省是南侨机工最集中的地方，仅存9名，而且都已是风烛残年。南侨机工，作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群体，他们已经一个个离我们而去；然而，作为反法西斯战争最伟大的丰碑，却不应该就此消失。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写下上述的文字。我愿把这些文字当作一束鲜花，敬献给那些已经辞世的南侨机工的在天之灵！愿南侨机工这个光荣的名称代代相传，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

1. 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2. 中国侨联文化工作部、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风雨同舟》，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
3. 张央作：《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侨史资料》1988年第6期。
4. 作者本人对南侨机工蔡明训、黄国光二同志的采访记录。

（林卫国 原山西省侨办主任）

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碑记

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德宏州各族、各界人民为彰显海外侨胞历史功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原滇缅公路中国段之终点——畹町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以缅怀先烈，不忘国殇，昭示后人，激励来者，永志纪念。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一时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神州危在旦夕。当时我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大多数被日军封锁，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滇西 20 余万民众自备干粮工具，风餐露宿，肩挑锄刨，劈山开路，过水架桥，日夜奋战，以血肉之躯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筑就一条起自昆明，贯通滇西，连接缅甸，近千公里被称之为“道路史上的奇迹”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成为了我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大批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沿此路运往国内抗日前线。随着战事的发展，滇缅公路运量陡增，一时驾驶、维修人员奇缺，前线后方纷纷告急。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来自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三千两百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九批回国。他们辗转于滇、黔、川、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滇缅一线，地处边沿、经济落后，山高路险，环境十分艰苦，但机工们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夜以继日，风雨无阻，抢运军需，维护车辆。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抗战。其间，在日军战机的反复轰炸中，在热带疾病的肆虐中，在意外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中，南侨机工有一千余人为了祖国抗战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长眠于备受战争蹂躏的祖国西南边陲的土地上；有一千余人抗战胜利后返回了侨居国；有一千余人留居祖国自谋生路。

斗转星移，岁月流转。海外侨胞“爱国无悔，报国无怨”、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报国情怀，感天地、泣鬼神，为我们民族精神之宝贵财富，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南侨机工后代恒昌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为继承发扬父亲的爱国精神，捐资三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兴建此纪念碑，以表心志。德宏州人民政府特立此碑文，以告慰先烈，昭示来者。今华夏崛起，边疆稳定、经济繁荣，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任重道远，海内外中华儿女尚须加倍努力。

编者的话

这本小书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版，赶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与读者见面，这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首先，我们得感谢南侨机工子女们和一些侨务干部的积极配合。没有他们用心出力写出好稿件，书就无从编出。

其次，我们感谢厦门大学蔡永明老师和华侨博物院李丽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既当读者，又当编辑，从文字方面进行了一番疏理，使文章符合基本要求。

第三，我们感谢原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猷同志，以八十高龄不辞辛劳细读了大部分文章，并详细提出修改意见。我们还要感谢著名作家方军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专程从北京南下昆明帮助改稿。黄猷和方军两同志的鼎力相助，使本书的质量得到全面的提升。

第四，我们感谢陈嘉庚先生的后裔、恒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和马来西亚爱国联谊会主席郭仁德先生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本书编辑、出版所需费用。同时感谢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博物院）财务组给予经费管理上的帮助。

最后，我们还要对给我们以期待、鼓励的南侨机工老人和陈嘉庚先生的长孙陈立人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敬意。是他们的期待与鼓励形成压力，给了我们以动力和勇气。于是我们不揣浅陋，终成此书。

限于水平，错谬之处，尚祈原谅并批评指正。